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民国政坛内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言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国同盟会，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表现软弱无力，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组织涣散，内部意见分歧，对拥有兵权实力的袁世凯妥协退让，以至最后交出政权，导致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其他一切照旧。继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之后，从1912年至1928年，形成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时北洋各派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只是挂了民主共和的招牌，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并未被打破，各种旧势力依然存在。各派军阀、各种势力间，矛盾重重。军阀之间不断内哄，造成连年不断的混战。随着各派军阀势力的兴衰，北京政府的总统、内阁犹如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短短的十七年中，就有46届内阁，其中寿命最短的一届，总共只有六天，政局长期陷于动乱与不安。1927年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势力覆灭，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表面上全国统一了，实际南北地方势力，仍各自为政，拥兵割据一方，新军阀间更大规模的混战，时时爆发，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又将中国拖入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时期；此后随之而来的是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可以说从1912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无日不在战乱之中，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旧中国的现状与国情。

1912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38年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混乱最动荡的一个历史时期。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所推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各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革命势力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时爆发尖锐的冲突与斗争。国内外反动统治者除去采用战争屠杀的手段之外，往往又借助于阴谋暗杀，以翦除政敌，镇压革命派。在此期间，政治谋杀案件，层出不穷，而这些案件又往往与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紧密相关，故轰动一时，引起舆论界及各方人士的极大关注。报刊连篇累牍地推出所谓内幕新闻、独家报道，众说纷纭，犹如万花筒，扑朔迷离，一时令人如坠五里雾中，莫明究竟。然而事过境迁，斗转星移，这些曾为众人瞩目的新闻焦点，早已不为人们所注意。这时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知情人，或多或少透露出些内部消息，有关资料也陆续披露，使当时这些疑案、悬案，得以曝光，令人们终于能窥得此中的一角秘密。根据这些线索，就有可能在众多相互矛盾的种种记载中，去伪存真，逐步看到这些事件的内幕真相。

例如，1918年皖系军阀徐树铮枪杀直系军阀现职将军陆建章，1925年徐树铮被枪杀于京津铁路途中，这是两件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当时报刊争相报导，说法不一。现在根据新史料的发现和知情人所披露的内情，两件疑案之前因后果，均可搞清而确凿有据。前者由于1918年孙毓筠至宫崎滔天函近几年在日本发现（见《民国春秋》1989年第4期《陆建章之死与直皖矛盾》一文，时孙因与陆联系从事反皖系的活动，为此曾向日本人宫崎筹措借款），知陆建章当时正积极在“山东、安徽及江苏之江北等处”组织策动反皖系的武装力量。陆在北洋军阀中属于老字辈的人物，北方一些省的督军、镇守使多为其同学和部下，具有搞垮皖系的能量，他的活动，直接危及皖系军阀的统治。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徐树铮视陆为眼中钉，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是陆被枪杀的内幕。陆为冯玉祥的舅父，陆死时冯仅任混成旅旅长，势单力薄，只好容忍沉默，但在1925年时，冯已是国民军总司令，成为

一大军事派系的首领。徐树铮之被枪杀，当时报载，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出面承认，徐为其所杀，系报杀父之仇。实际背景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民国史上这类重大历史事件很多，且均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关系密切，本书共撰写陶成章、宋教仁、张作霖等政治谋杀案件内幕始末 15 篇。他们之中，有的是民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有的是著名左派和民主人士，在近现代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们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被谋杀、刺杀的，如结合他们的政治活动，真实地记录下事件的前后始末，将会对读者了解和研究民国史有所参考和帮助。

本书各篇执笔人，多为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所写选题多属他们各自专题研究中熟悉的历史事件。在撰写时，他们也多力求吸收现有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最新史料，从而保证了本书内容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所以本书又不同于一般的稗官野史，失于道听途说。读者可在阅读之余，熟悉和了解民国史上的一些重要史实，亦可供治史者参考。

本书各篇体裁不一，但多注意到文风要严谨朴实，文字要通俗化，以避免一般史学论者偏枯燥的弱点，希望它能是一部雅俗共赏的读物。编者的主观愿望，或可能陷于水平而落空，但笔者企望有更多语言生动可读性强的史学著作问世，为当前普及与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与教育，做出贡献。

章伯锋

1991 年 6 月

民国政坛内幕

蒋介石刺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点，上海广慈医院突然来了两个穿西装的不速之客，敏捷地跳墙、上楼，走进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休养的头等病房。这时，陶成章正面里而卧，两个西装客连声呼喊“陶先生！陶先生！”当陶成章转过身子的时候，西装客即掏出手枪射击，子弹从陶的左颈喉管旁深入脑部，立即血流如注。二人行刺后，扬长而去。当日陶成章逝世。

1月15日，孙中山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内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孙中山要求陈其美“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孙中山哪里知道，陈其美就是刺陶案的主使者呢！

陶成章投笔赴东瀛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1878年1月24日生，父亲陶正，漆工，兼营砖灰业，有八、九亩土地，日子过得很拮据。陶成章15岁时，即在故乡的陶氏义学执教。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陶成章迫于父命，也曾钻研斯道，但无所成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惨败，陶成章因此萌发了“投笔从戎”的

念头。自此，这个年轻人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义和团运动中，陶成章离乡北上，游历奉天、蒙古等地，并到北京，计划刺杀西太后，因无从下手作罢。南返时，道经徐州，因缺乏旅费，步行七昼夜几乎饿死。

1902年夏，陶成章加入当时知识分子中正在掀起的留学热，东渡日本，初入清华学校，继入成城学校。次年4月，因为沙俄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东京中国留学生掀起拒俄运动，成立拒俄义勇队，不久，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为了支持这个新生的爱国团体，陶成章曾捐款相助。1904年1月，与魏兰相偕回国，暂寓杭州，时当夏历年底。魏兰对陶说：“杭州、绍兴相隔一水，先生何不归里一游？”陶答道：“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恐怕就不能再出来了。”于是，二人遍历浙东桐庐、云和、温州等，联络白布会、龙华会等秘密会党组织。许寿裳回忆说：“陶成章蓬头垢面，天寒时，用草绳做衣带，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运动浙东诸县的豪俊起义，屡遭危难，而所向有功”，即指这一段经历。5月，在杭州写成《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上卷。叙述夏以前的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博厚、高明、悠久等特点，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自作之，自述之，自因之，自果之，绵绵翼翼，继继绳绳，光曙东亚大陆者，已数千年于兹矣”。这一年秋，黄兴拟在长沙起事，陶成章与蔡元培在上海计议响应，准备袭取金华、衢州、严州等地，然后率兵入皖，一路进攻南京，一路进攻江西。为此，陶成章与魏兰在嘉兴、杭州、兰溪、金华等地积极作了布置。但是，长沙方面始终没有消息，陶成章等了又等，才打听到，长沙起义计划已经失败。这样，陶成章不得不重返金华，布置隐蔽。

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有一个名为“暗杀团”的组织，它

由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来，目的在于暗杀满族权贵。蔡元培觉得这一目的过于狭隘，因此，便与有关人士计议，定名为光复会，誓词为：“光复汉

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而退。”除暗杀外，也准备组织暴动。由于蔡元培了解陶成章和会党广有联系，便劝他加入光复会。自此，陶成章即成为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

陶成章在日本的时候，学习过催眠术。1905年再赴日本，继续研究。同年夏归国，在上海通学所讲授催眠术，并且编撰了一本《催眠术讲义》，后来鲁迅先生曾回忆说：“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这年冬天，陶成章与龚宝铨、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以体育专修科的名义招纳会党成员进行训练，准备起义。

按陶成章的想法，起义方式有两种：一为中央革命，即在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发动；一为袭取重镇，即攻夺有政治和军事意义的要地。1906年初，陶成章与徐锡麟萌生了“捐官学陆军”的念头。他们得到绍兴商人许仲清的赞助，通过徐锡麟姻亲、前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分别捐得了道员、知府等头衔。这样，便由官方备文，公派赴日学习军事。不料，徐锡麟是高度近视眼，陶成章身体也不合格，军事仍然学不成，二人快快返国。陶成章联络东南革命党人，自称五省大

都督，分浙东、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甫、皖北、上闽、下闽为十军。10月，陶成章与龚主铨、苏曼殊在杭州暂住，谣传他们将于29日进攻省城，清吏向巡抚衙门密告，要求逮捕。但巡抚张曾扬担心拿不到证据，逮捕后会引公愤，没有同意。11月，陶成章离杭，再赴日本。

1907年1月4日，陶成章加入同盟会。不久归国，准备响应萍浏醴起义。他打算率领勇士数十人潜入南京，破坏军政机关，乘机发动军队起义，但不幸消息泄漏，无法进行，只得又一次东渡日本。

同盟光复两相对垒

陶成章到日本不久，即卷入同盟会的矛盾漩涡。

当时，日本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充分体现出来，罢工斗争高涨，社会主义运动也处于很活跃阶段，并且建立了政党组织——社会党。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又还很幼稚。1907年，日本社会党分裂为软、硬两派。软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在第二国际影响下，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定议会斗争，宣扬无政府主义。前者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组织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在日本社会党的软、硬两派中，陶成章接近硬派。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撰文，提倡中国的革命家与日本的革命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章太炎首先响应幸德秋水的倡议，与印度流亡在东京的革命者组织亚洲和亲会。陶成章和张继、刘师培以及日本社会党人山川均、大杉荣等参加了这一组织。与此同时，张继、刘师培、章太炎

等人在东京掀起“倒孙风潮”，要求改组同盟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6月，张继、刘师培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该会提倡在中国进行“无政府革命”，发刊《无义报》，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多所“批判”。陶成章因认为孙中山作事“武断”，对张继等人的倒孙活动表示支持，参加过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并在会上作过讲演。这一时期，他和张继关系密切。10月25日，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召开政闻社大会，响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陶成章曾和张继、平刚等人前去冲击会场，打得梁启超等人狼狈奔逃。1908年1月，张继因和幸德秋水派关系密切，受到日本警察追捕，逃往法国，所遗《民报》编辑部工作便由陶成章接任。2月25日，该报发表广告称，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陶成章曾选录明末钱谦益、陈子龙、夏完淳等人遗文为《桑海遗征》，在该刊发表。

当时，“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受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主张“直接行动”——暗杀和总同盟罢工。陶成章与他们不同，仍然主张武装起义。1908年春，曾赴青岛一行，计划仿大通学堂办法在该地创办震旦公学。其后，又偕张恭回国，在杭州召开大会，联络江、浙、皖、赣、闽五省会党，组织革命协会。该会保留了传统的会党色彩，定名为一统龙华山；堂名为汉族同登普渡堂，它以“岳爷爷”为崇拜的偶像，宣称要收回“大明江山”，所有新设官职均取法于“大明大唐”。但是，在若干方面，它又表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其章程称：“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章程设想革命之后“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在经济上，章程主张“土地公有”，要求“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富豪的阶级”。但是，东南会党复杂，各方意见不一，革命协会终于未能组织起来。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焦点转为经费问题。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的“倒孙风潮”，严重地伤害了孙中山的感情使他对同盟总部十分失望。自此，孙中山将全部心血和热情都倾注到了南洋方面。1907年8月，孙中山积极支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办《中兴日报》，使之成为宣传革命和与改良派论战的新阵地。同时，又积极整顿南洋各地同盟会，酝酿将它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08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胡汉民为支部长，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这样，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和南洋相反，东京同盟会总部愈来愈涣散，《民报》的问题也愈来愈多。《民报》在归章太炎编辑后，逐渐倾向于谈国粹，说佛理。孙中山、胡汉民离日后，原主要撰稿人朱执信，汪精卫等也陆续离日，《民报》谈佛理的文章更是逐渐增多。1908年2月刊行的第19号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缘起说》。有读者批评其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这种不满当然不会是个别的。因此，销数锐减，窘迫得付不出印刷费和编辑人员的伙食费，章太炎有时只能啃几块麦饼。在此期间，章太炎曾多次呼吁南洋方面接济，但前后只收到过三百元资助，这当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陶成章准备亲往南洋招股。对此，孙中山及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均加劝阻，理由是南洋同志甚少，而且

大多不是资本家，不会有多大效果，建议在东京另筹。但东京也并无丰厚财源，1908年9月，陶成章决意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为《民报》募捐外，还要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到南洋后，陶成章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拿出了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发生误会，与孙中山争持不休。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五万元，以便“回浙办事”，对此，孙中山推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陶成章要求为他写介绍信去各地募捐，孙中山同意了。

“南洋经济恐慌”确非孙中山的托词。自1907年黄冈之役起，至1908年5月河口之役止，孙中山共在南方边境发动了六次起义，用去近二十万元。南洋华侨中有力捐款同盟会员大都已成强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后，六、七百名起义战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至新加坡，又需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经济更形拮据。10月16日孙中山致檀香山同志函称，“党中财政日困”，所言应是事实。

在南洋活动初期，陶成章还和孙中山保持着合作关系，他曾在《中兴日报》上发表《规平实》、《再规平实》等文，参加和保皇党人的论战。但是，由于在经费上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积极支持，陶成章决计“独自经营”。他制订了章程，开始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决行团为名进行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说明：“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巳夏，由总会长蔡、湖南分会长黄，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这段文字突出地夸张了光复会的作用，它绝口不提兴中会，把成立在前的华兴会说成是光复会的湖南分会，把光复会说成是同盟会的母体，显然，都是在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作准备。稍后，陶成章即积极联络在南洋的李燮和等人，印刷会章、盟书，雕刻图印等物，计划发展会员，建立组织。

南洋是同盟会的根据地。从兴中会起，孙中山就在南洋活动，当地华侨对同盟会是熟悉的，光复会则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陶成章不得不仰仗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威望。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声明“本会既为同盟会分会，故本章程订定后，移知东京总部及南洋支部”，所得款数“亦移知东京总会及星洲分会”。但是，陶成章的募捐活动却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1909年1月，陶成章到坝罗，正值《中兴报》代表到埠演说，言“《中兴报》事紧要”，并称：“陶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捣鬼，开始攻击孙中山。他在与人书中说，“弟本不说中山坏事，盖犹为团体起见，不得不稍留余地，至是逼弟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已。”其间，陶成章曾向孙中山索取介绍信至各地收款，为孙中山拒绝。这以后，陶成章去到爪哇，开始建立光复会组织，不久各地分会陆续建立。这样，南洋就有了两个并行的各成系统的组织，一个是同盟会南洋支部，一个是自称附属于同盟会总部的光复会。光复会的传统活动地点在江浙，陶成章在南洋树旗活动，明显地造成了和南洋支部争夺群众和影响的对垒局面，如果说，1907年东京的倒孙风潮表现为对个人的不满，“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建立表现为思想上的分歧，这一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组织上的对立了。

在树旗活动后不久，陶成章又在错误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还在1909年5月间，陶成章就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9月，陶成章到滨港，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声言“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同时提出九条要求，其主要者为：1.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2.废除南洋支部，各分会一律直属东京总会；3.再开《民报》机关。《罪状》并诬称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其兄在九龙建屋，用款不足，孙中山汇款助建云云。其后，陶成章便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在东京的“倒孙风潮”之后，孙中山即不大过问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的工作，这是事实，但是《罪状》大部分属于不实之词。它得到了少数江浙人的支持，却遭到了黄兴等人的坚决拒绝。黄兴一面向陶成章作调停劝说，一面和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申辩。

黄兴的调停、劝说、申辩都没有能打动陶成章。在公布《罪状》的要求被拒绝后，陶成章便决定自行发表。他在与人

书中表示：“与中山已不两立”，“不若由二三人出面发表之，从此分为两歧罢了。”其后，便由陈戚涛、魏兰将《罪状》油印百余份，寄给了南洋各报。

陶成章的行动迅速影响了章太炎。在公布《孙文罪状》的同时，章太炎也刊发《伪（民报）检举状》，再次参加对孙中山的攻击。

《民报》于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1909年秋，黄兴筹备复刊。因为对章太炎主持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章太炎多年困苦支持《民报》，一旦恢复，却被排斥在外，因此大动肝火。他指责续刊《民报》为伪《民报》，在《检举状》中攻击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并主观武断地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他说：“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与陶成章、章太炎相呼应，当时在法国的张继则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他“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陶成章到东京时作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争取黄兴，开除孙中山，另推同盟会总理，掌握同盟会的领导权；另一手是取消对同盟会形式上的附属关系，公开分裂，重建光复会。在开除孙中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与李燮和、胡国梁等通信，声称同盟会东京总会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整顿，必须另行组织机关”。他又积极动员章太炎，对他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章太炎长期对孙中山不满，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虑利害得失，对此自然表示同意。

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日本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由于基本群众在爪哇等地，因此，光复会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下辖各地分会，形成了所谓“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的局面。这样，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就由意见分歧发展为公开分裂了。

蒋介石广慈刺焕卿

陶成章和同盟会的矛盾在筹备广州起义过程中有了缓和，但随即又重新加剧。

光复会重建后不久即在各方面陷入困境，对孙中山的攻击不得不停止下来。1911年，黄兴电邀李燮和等参加筹备，计划在广州发动一次新的起义。李燮和出席了在檳榔屿召集的发难会议，会后努力动员华侨捐款，胡国梁、柳聘农等并赶到香港，向起义指挥机关报到。陶成章应李燮和等电召，也到达香港。这样，长期分裂的两会关系就出现了转机。但是，这种局面并未能维持很久。广州起义失败后，身兼光复、同盟两会会籍的革命家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却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1911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发刊《锐进学报》，作为秘密联络机关。

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7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嵩山路沈宅开会，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

陶成章虽然走了，但是，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合作。11月3日，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

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李燮和不同意，于11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这样，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回国。两天后，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被推力总参议。当时，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二十五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11月9日，陶护送前浙江巡抚增韞到上海，并为之买好船票，命其于10日返回东北。13日，《民立报》上刊出一条消息，声称“增韞允浙军政府，筹赠经费二十万”，并称增与其母女“确已押送赴沪交纳”。陶成章认为这条消息意在影射，于11月27日刊登广告，表示对此“置之不理”。《广告》并称：“杭城谣言叠出，对于仆咸有猜疑，甚有谓仆挟有南洋巨资二十五万，往绍兴练兵谋独立之举，可笑孰甚！”陶成章表示：“今南北未下，战争方兴，仆何敢自昧生平，而争区区之权利？谓仆得增韞款二十万及绍兴谋独立，其视仆不亦左乎！”

苏沪光复后，革命党人的急务是攻取南京。11月下旬，陶成章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一带练兵。12月2日，南京

攻克，但陶成章的“练兵”计划并未停止。加上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

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间有讥评”，自然容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于蜗角间。”正是看到了这一危险。

12月15日，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在他回国之前，马君武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题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其中谈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又称：“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军队。”这里所指，当即陶成章。批评虽然是不点名的，但见之于公开报刊，可见其尖锐程度。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消息。陶成章在沪已大不利，于是，避居客利旅馆。后又迁居国民联合会、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等处。12月29日，同盟会会员欢迎并宴请孙中山宴席上，陶成章遇见王金发与褚辅成。王长期与陶不和。30日，陶成章移居广慈医院，给夫人孙晓云写了张便条：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吾姊鉴。

未署“从弟东生”，未署真名。1912年1月7日，陶成章在上海《民立报》发表通告，中称：

当南京发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问题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爰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禱！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是陶成章耍的一个手法，他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故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希望藉此保身免祸。

在孙中山回国前夕，《民立报》曾大肆宣传孙中山将携带美金巨款及兵舰若干艘回国。及至孙中山抵沪时，却对中外记者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部分成员发生误会，以为《民立报》的宣传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1月11日，陶成章得到孙中山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疑再次泛起。恰在双方都不大痛快的时候，又发生了浙江都督继任人选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甚至说：“继是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但陶成章却没有因这一片呼声而忘记自身的处境，于1月12日发表通电，推荐属同盟会系统的蒋尊簋继任浙督，意在向陈其美等人表示，自己无意于争权。但是，陶成章的这一意图却未被他的旧属理解，沈荣卿等致电陶成章，宣称“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要求陶早日回浙，筹备一

切，不能“一再退让”。

同日，沪军标统蒋介石向光复会系统的张伟文、曹锡爵表示，与陶成章本无意见，想见陶当面言明，庶免误会。当即决定下午2时在光复会机关一晤。在蒋陶二人见面的时候，“融洽异常”，蒋介石询问陶成章的地址，陶即书一条相告。当夜12时，有人持函到广慈医院，声称是通过蒋介石转交的杭州快信，署名临时协会，13日，陶成章将该函出示张伟文，张伟文认为浙江只有临时议会，而无临时协会，对此表示怀疑。次日凌晨陶成章即遇刺。

犯众怒老蒋遁日本

关于刺陶案的凶手，当时人已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前几年，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底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诋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苏，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1907年，徐锡麟依靠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9年，陶成章在南洋、东京等地“诋毁”孙中山，“掀起党内风潮”，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又云：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鸣）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为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来（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容，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这一段文字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不管是出于哪种理由，刺陶都是错误的。在这些理由中，有些明显地不实。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但是，蒋介石的这份自白对于说明陶成章之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既有远因，又有近因，远因是同盟会长期的内部矛盾，近围则是陈其美和陶成章之间的尖锐冲突。

光复会竟作烟云散

陶成章被刺，上海舆论哗然。1月17日，《大共和日报》发表批评说：“弹丸匕首者威敌之具，所以济军队之不足地。若以纤芥微嫌，循环报复，甚至片言齟齬，亦借此以泄忿，甚惧乱之无涯矣。”19日，再次发表时评说：“恃拳銃之威而强人以从我，否则必杀之，拳銃之专制。执拳銃者，尝愿革专制而希共和者也。”21日，沪军都督府和绍兴旅沪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人们当着陈其美的面，纷纷发表演说，谴责这种卑劣的暗杀行为。沈剑侯说：“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吾同胞当必代为雪仇。”孙铁舟说：“陶君之死，必死于争竟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毕，即将手枪扔到桌上。会场上充满了悲壮激烈的气氛。在舆论的强烈批判下，蒋介石不得不“辞职东游”，躲到日本去了。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雇人杀死。

光复会是辛亥前后东南地区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被刺后，该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遂逐渐解体。

民国第一大冤狱 ——辛亥首义功臣张振武冤案

由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成功，1912年元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了。它宣告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但是阴谋家和刽子手并不因一个民国的成立而变得圣洁和仁慈，就在人们还沉浸在民主共和胜利的喜悦之时，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冤案也正在酝酿筹划之中。这场冤案的受害者竟是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创建民国的功臣——张振武和他的助手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反满清武昌首义建丰功 为国民仗义直言埋祸根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罗田人，生于1877年（光绪三年），早年曾入湖北师范学校学习，后东渡日本，求学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依仗他们的洋枪洋炮争先恐后在中国攫取特权，野蛮地强占租界和租界地，疯狂划分势力范围，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

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年轻的张振武目睹国势“危殆极矣”的惨痛景象，感到只有提倡尚武，振兴国家武力，方能强国雪耻。在日本留学期间，张振武特别注意于军事攻守战法的学习和研究。日本东京是海外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聚集着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骨干力量。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更是风行。张振武也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经人介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计划发动皖浙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突然拔枪怒射巡抚恩铭，首先发难。张振武就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之一。起义因寡不敌众失败。次日，徐锡麟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被残酷杀害，张振武也被迫亡命日本。不久他又冒险回国，在湖北以教师为职业，暗中进行宣传和革命组织活动，利用职业之便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的反满革命思想。讲历史时，他向学生讲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满清如何入关，如何奴役汉族；讲地理，就讲清政府是如何与列强订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让大片国土，以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反满情绪。学生们很受感染，许多人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参预革命活动，投身反清。

张振武也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的重要领导人，负责会中财务。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他不惜卖掉罗田和竹山老家的田产。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准备在武昌起义的事情突然暴露，彭楚藩等人被害，蒋翊武等下落不明，情况万分危急，张振武与其他领导人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提前起义。起义爆发以后，在张振武建议之下，成立了军务部，负责掌管军队编制，人事配置，饷项支出等等。当时任命孙武任部长，张

振武任副部长，但孙武受伤，不能视事，张振武代理部长职务，全面负责。

袁世凯率领的清廷北洋新军大兵压境，而武昌革命党方面人员、武器均处劣势，双方战斗极为艰苦。张振武在汉口、汉阳作战中，曾三次印发《敬告我军人的白话文》，鼓舞士气。凡军队自武昌开赴前线，均先在都督府门前集合，由张副部长作战前鼓动。11月16日得到报告，说清军将至新沟，

汉阳危急。张振武立即命令部下，将军务部能战斗人员点名编队，支援汉阳，他亲自率领连夜驰赴前线，夜晚行军中他不幸身负重伤。

11月27日汉阳陷落以后，都督府召开扩大军事会议，有人建议放弃武昌，东取南京作为根据地。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原清军协统黎元洪，本来就无意抵抗，因此立表拥护。张振武义愤填膺，择刀斫地，厉声喝道：“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众人面前被如此顶撞，黎觉得极为难堪，但也只得赶紧改口表示与武昌城共存亡。然而连黎元洪都有弃城之意，武昌上下更是人心惶惶，个个准备逃难。张振武不顾重伤未愈，骑马举刀沿街高呼：“汉阳不守，乃我军疑兵之计，武昌万无一失。”军民闻之稍安，可是黎元洪仍然在12月2日黎明不顾阻拦，率其亲信逃至城外葛店。张振武闻之不胜愤怒：“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众人认为大敌当前，不宜轻易更替都督，此事只得作罢。黎元洪出走以后，守城之事由张振武全力协助刘公负责。更换都督一事，以后也没有人再提起，张振武也早忘得一干二净，然而这一切，黎元洪都深深地埋在心中。

黎元洪本系驻守武昌的清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参加甲午中日海战，担任定远舰驾

驶，后来受到张之洞的赏识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逐渐升到协统并兼任武昌武备学堂校长。10月10日革命党发动起义以后，黎元洪立即集合队伍准备镇压，并亲自杀死了一个来联络二十一协起义的革命党，随即躲到一个部下的家中藏了起来。军队中的革命党都是中下层官兵，缺乏政治经验，封建思想也比较浓厚，认为需要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出面领导，才有号召力。当时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等也还来到湖北，而黎元洪身为协统，且平时对部下尚不刻薄，于是就被选中。黎元洪被革命党搜出以后，起初坚决拒绝领导这场“叛乱”，但革命党竭力相劝，黎元洪才不得已默认现实，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但当天夜里他还是回他的协司令部住宿，不愿呆在都督府。张振武本来对推举黎元洪就不大同意，闻听黎元洪又跑回二十一协司令部，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甚至声言不如就此杀之，以免后患。但其他人力主优容，张振武也没再追究。黎元洪却就此对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黎元洪凭藉“领导”武昌首义的资本当上了民国第一届副总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以上。民国初年中国政界“四大巨头”“孙、黄、袁、黎”之中，黎元洪给人的印象是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而且既不属袁世凯的北洋派，又非孙中山、黄兴的同盟会，俨然一位和平中立的第三者。他还经常由他的秘书、做得一手好文章的酸儒生饶汉祥起草些四六句文章、电报，不问谁是谁非他说上一套不关痛痒的反对战争、要求安定的废话，当时颇赢得了一些人心。然而真正领导武昌起义的许多革命党人并不把这个他们用枪逼出来的“民国元勋”放在眼里。张振武秉性刚毅直率，对黎元洪的许多行为

更是多次公开表示不满。黎元洪无可奈何。而这一切，无论在心理上还是从实力上，都使这位坐镇武汉的副总统时时感到一种无名的羞愤。

气上气元洪用计借“大刀”
计中计总统拉弓射“双雕”

1912年3月，袁世凯靠着天衣无缝的两面派手法登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南北实现统一。但实际上“统一者其形式，不统一者其精神”，同盟会的南方各省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实际仍处于对抗地位。同盟会希望通过他们掌握的地方革命政权，保存发展革命势力，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袁世凯则企图依仗他们攫得的中央政权，铲除和消灭革命力量，继续保持和维护封建式的专制独裁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袁世凯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裁兵”。武昌起义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各省军队如潮水膨胀，民国成立，兵多饷绌，也造成秩序混乱，袁世凯乘机提出“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但须从遣散军队入手。”他受命其亲信，手下大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提出具体计划，以清末各省原有军队的数量和军饷的数量为依据，凡超过原来数量的，是兵裁兵，是饷节饷。这计划听起来颇为动人，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实际上是等于将南方各省解除武装。因为清末时期南方军队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远逊于北方。民国现有的军队大多是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革命党招募的新兵。而北方袁世凯在清末训练了大量新式装备的北洋陆军，兵多饷足，并且直属于陆军部，在实力上已占较大优势。如果按

照段祺瑞的计划实行，裁军完成之日也就是革命党束手待毙之时。对于这样一个存在明显不平等的阴谋计划，当时的大多数人却没有看透，人们只是从国家财政困难的角度觉得裁兵是富国救民之路，参议院大多数议员对裁兵计划抱支持态度。同盟会中也只有少数人保持较清醒的头脑，反对这个裁兵计划，甚至明确表示：我们所以不主张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在湖北的副总统黎元洪对于裁兵计划则是喜出望外，他想的主要倒不是国家财政紧张，而是觉得扩大自己权力，排挤打击异己的大好时机到了。

湖北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被称为首义之区，武昌起义之后，军队发展迅速，首义有功人员数量很多，需要给予适当安置，因此裁军尤为复杂。黎元洪却一味从自己利益出发，致使军队风潮迭起，政治性暴动屡屡发生。于是黎元洪决心将原有军队全部勒令退伍，另行征补。这样一来，矛盾更加激化，湖北“倒黎”空气日渐浓厚。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在湖北的地位，黎元洪一方面极力向袁世凯靠拢，甚至在1913年4月4日致电袁世凯“请伤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维持地方秩序。一方面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内部矛盾，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熟读兵书的黎元洪清楚记得《孙子兵法》中“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这句话。

武昌起义之时，革命党中有“三武”闻名天下。此三武者，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也。最让黎元洪头痛的就是这个张振武。孙武本来也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他原本想自己以首义的军务部长取得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当不在话下。谁料南京政府成立时，陆军总长黄兴竟挑了蒋作宾担任这一职务，孙武不免大失所望，于是由怨黄兴而迁怒于同盟会，决心另组政党与同盟会抗衡。不久孙武等就在上海成立了民社，

反而推举黎元洪做了民社名誉上的领袖。张振武虽也列名参加了民社，但不参预其事，因为他并不满意黎元洪，与孙武也有矛盾。因为一件小事，孙武曾下令枪决了张振武的卫队长。因而他只自行其事，努力扩大力量。因他性格豪爽，不拘小节，许多事情自己并不觉得，但却得罪许多人。他赴上海购买武器，将领得的钱款除正当开支外，还用以宴请各方人士，手面又大，因此挥霍浪费不少。黎元洪乘机派人清查帐目，想借此将其搞臭，并通知上

海方面要求监视张振武行动。张振武闻之，一怒之下跑回武昌，下船之后直奔都督府。黎元洪听说张振武找上门来，知道不好对付，急忙吩咐：就说我没在。话音未落，张振武不顾卫兵阻拦，冲进黎元洪办公室，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还要监视老子，告诉你姓黎的，老子能把你推上这个位子，也能把你拉下来，你另不识抬举。”黎元洪心中有鬼，对张振武无可奈何，连称：“误会、误会，春山，此话从何说起呢？”张振武怒气未消：“从何说起？是谁派人要查老子帐，你说？”“这……这，这都是尧卿所为，与我无关！”尧卿就是孙武的字。黎元洪一见张振武怒气千丈，急中生智，把矛头转向了孙武。张振武与孙武之间本来就有矛盾，经黎元洪这么一说，虽然也半信半疑，但心中对孙武也更加不满。

黎元洪为自己挑拨了革命党人间的内部矛盾的手腕颇为得意，他哪里晓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为了削弱和打击南方革命党势力，袁世凯也是煞费苦心。黎元洪和张振武等人的矛盾以及黎元洪所处的尴尬地位，袁世凯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觉得黎元洪态度中立，如果推一下就可能倒向革命党，如果拉一下就会成为自己在南方的重要同盟者，一方面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一方面又可以利用黎打击革命党。参谋次长陈

向袁世凯献上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袁世凯立即派陈前往武昌，按计行事。陈到了武昌，多次与黎元洪密谈，转达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问候并对黎元洪所处有职无权的地位表示同情。这使黎深受感动。临走之时，陈似乎是漫不经心他说：“三武一日不离开湖北，则副总统一日无权啊！这些人都是卒伍下吏出身，若由大总统把他们招到北京，宠以高官厚禄，不会不去，这样副总统则无后顾之忧矣。”经陈这么一点拨，黎元洪顿开茅塞：调虎离山，“不过不知袁大总统……”。“如果黎副总统不弃，敝人愿意为此奔走一番。”“那就拜托二庵兄了。”

5月份，“三武”就被黎元洪作为首义有功人员“推举”到了北京。袁世凯立即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的名衔。顾问，顾问，顾（雇）而不问。虽然一月薪俸大洋不少，生活优裕，八大胡同也令人怡心销魂，但张振武无法忍受这种无兵无权，象被困在笼中老虎样的生活。他曾当面责问段祺瑞：“难道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吗？”他还多次向袁世凯呈递条陈，说明边疆事务紧要，急应派兵屯垦，并毛遂自荐，要求主持屯垦事宜。为了敷衍他，袁世凯送给张振武一份蒙古屯垦使的委任状。但张振武要申请经费，设立机构之时，则无人理睬了。张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几天以后，竟突然出现在武昌，打出了屯垦事务所的牌子，并以蒙古屯垦使的名义，要求黎元洪每月提供经费一千大洋，声言要招募精兵，率赴蒙古屯垦。黎元洪先是听说张振武回汉已经顿时手足无措，随后张振武又上门要钱，黎元洪更是恼羞成怒，可又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因为他心里明白，张振武毕竟与孙武和蒋翊武不同。记得早在2月间，尽管孙武已组织民社拥黎为领袖，黎元洪还是暗中操纵一些中下级军官发动所谓武昌“二次革命”，在27

日晚突然包围孙武住宅，宣布罪状，悬赏缉拿，一时满城风雨。孙武当晚恰巧在汉口，没有回家，未被当场抓住，但事后也只好宣布辞去军务部长。黎元洪则发表通电，称“企请更换军务部长，既昭各同志之公道，亦遂该部长之初心，元洪亦未便挽留”云云。黎元洪之所以敢如此，就是因为孙武虽位居军务部长，但却手中无兵，没有自己亲信部队。张振武则不同，他亲自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湖北将校团。无怪乎黎元洪一听说张振武又回来

就坐卧不宁，寝食不安。袁世凯听说张振武突然不辞而别，擅自返回湖北，心中顿觉不快；没想到此人竟如此傲慢，连我这个大总统也不放在眼里。不久又接到报告：张振武在湖北独树一帜，招兵买马。袁世凯闻听此信，心头一震，他突然意识到，此人不可小视，如若处置不当，将来遗患无穷……。

不久张振武在湖北接连收到袁世凯三封急电，殷殷敦请他迅速赴京共商国家大计，那言词的恳切和急迫，似乎张振武晚到一会儿，国家就有大厦将倾之危。黎元洪也送来了4000元路费，摆酒设宴为张振武饯行，祝张振武此次进京为国民一展雄才，并不无献媚般表白：“对于张君，元洪可抚心自问，绝无丝毫相待不好之心，此言可鉴天日。”

大总统盛情相邀，副总统热情相送，得到如此重视和厚爱的人，当时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个。张振武觉得如果再置之不理，难免让别人说自己太无礼。于是决定8月北上。为了以防万一，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随同进京。张振武在“一路顺风”、“多多保重”声中，含笑挥手与亲朋故友告别。然而谁曾料到，此番告别竟使张振武“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功臣宴振武方维双遇难 无实力革命党不了也了

1912年8月10日张振武一行抵达北京。此次来京与前次相比大有不同。北京上下大小官员对张振武一行一切行动均优礼有加。袁世凯几次召见，亲自询问湖北情况，听取张振武殖边屯垦的宏大规划。北洋政府军政要人轮流坐庄，张振武几乎无日不宴。张振武深受感动，反觉得自己进京之前还心存戒意，未免太那个了。他也多方联络奔走，宴请各党派领袖，希望大家“消除党见，共维大局”。闲暇之时也到八大胡同走走，重叙旧情。但他哪里知道此时京汉之间密电往还，一个卑鄙的阴谋已经成熟。

8月15日晚八点，为联络南北感情，张振武在当时北京最豪华的饭店——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出席宴会的大都是北洋军队重要人物，如毅军统领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参谋次长陈等。席间杯觥交错，谈笑风声，军人聚会没有太多的温文尔雅，一个个酒酣耳热，红光满面。只是段芝贵显得有些心神不定，酒喝的极少。酒过三巡，段芝贵走到张振武面前，他拍了拍上衣口袋：“春山兄，小弟有大总统军令在身，不敢久留，只好先告辞了。得罪，得罪。”“香岩兄既然军务在身，振武就不便强留了。走好，走好。”段芝贵拱了拱手转身出门去了。

又过了一阵，宴会结束，张振武送走客人，也乘马车离开六国饭店，准备回下榻的西河沿金台旅馆。马车出东交民巷西口，行至棋盘街，突然马蹄被绞索绊住，一个马失前蹄，

车翻人倒。只听一声警笛，顿时伏兵四起，一拥而上，张振武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已经被五花大绑。他正欲呼叫，只见灯光一闪，段芝贵走到面前。张振武万分惊诧：“香岩兄，这是……”。段芝贵挥手打断张振武，不慌不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张振武面前一晃。张振武只看清上面盖着朱红色的“大总统印”四个字。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段芝贵提前退席的原因。张振武立即被押往西单玉皇阁京畿执法处。

张振武还不知道早在一个小时以前，段芝贵的拱卫军和京师步军统领衙门的旗兵已经冲进了金台旅馆，逮捕了方维等随行人员，为了不惊动城内，

直接关押在了城外孙公园玉皇庙的京畿执法处分局。

16日凌晨。时正8月的北京，这时候却让人感到一丝寒气。执法处内以：“杀人魔王”闻名的执法处总长陆建章正襟危坐，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春山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张振武望着这个几个小时前与他举杯共饮的刽子手没有说话，只是盯着陆建章的那双耗子样的眼睛。陆建章却丝毫不以为难堪，只是摇了摇头，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随后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站起来走到张振武面前。“黎副总统从武昌来电，说你‘破坏共和，昌谋不轨’，要求袁大总统‘立予正法。’”张振武看也没看那张纸，说“电报有假！”“是啊，起初大总统也颇为疑惑，去电询问，但黎副总统回电：‘不杀张振武，实为天下之害。’”“电极是假的！！”张振武似乎不是在说服陆建章，而是想说服自己。“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执行大总统的命令。”

“生死我早已度外，但既然我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就应公开审判，拿出证据，岂可凭空杀人！”张振武想到法律或许可以救命。

“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说完，陆建章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色阴沉，远处响起一阵沉闷的雷声，要下雨了，执法处偏僻的西跨院里，张振武被绑在一棵一人高的木桩上。张振武思绪万千，不禁仰天长叹：“不料共和国竟如此黑暗！”随即饮弹而死。与此同时，方维亦在城外被害。参预领导武昌首义，为创建民主共和国做出极大贡献的民国功臣、革命志士就这样倒下了。

张振武、方维被杀！消息传出，舆论为之大哗。直到16日下午，北洋政府才在金台旅馆门前贴出一张由步军统领江朝宗和京畿执法处总长陆建章签署的布告：

“为晓谕事：照得阳历8月13日奉临时大总统军令，8月13日准黎副总统电开：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成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狡结党，桀骜自恣，……。”布告将黎元洪来电全文照录，并依此判处张、方正法，最后又命令按上将军标准予以厚葬，拨款3000元抚恤遗属。但这并不能平息众怒，全国各地纷纷发表通电，指责政府不经法律程序擅自杀人，违法犯罪。国会参议院中更是人声鼎沸，湖北省全体议员（除汤化龙一人外）要求政府即日派人前往议院做出明确说明。

8月18日，由参议院张伯烈等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案》。参议院共和党民社派领导人刘成禹在议院拍案大骂：“政府如此杀人，简直是强盗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竟有以这样的强盗行为戕杀人民的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我们多么不幸啊，我们竟看到了这样的政府！如果照此推理，那么民国起义的功首，造成共和的臣子，不都可以一一捕杀了，任凭那一人为帝为王了吗？”23日，陆军总长

段祺瑞被迫到参议院接受质问。他却说：“杀张振武是根据黎副总统的电文，此案已经由黎副总统在湖北裁判，又经袁大总统开会研究，实属案情重大，因此以军法从事。”话还未说完，张伯烈站起来打断了他：“犯人在北京，为何由武昌裁判？既由武昌裁判为何又要待到北京后才杀。这显然是一个阴谋！袁大总统不能只凭一封电报就随便杀人。电报难道也可以杀人，法律规定，不经审判就可以杀人吗？”段祺瑞越解释越乱，连他自己也搞不

清自己说些什么，气得恼羞成怒，大声喊着：“政府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有危害国家者便可杀之。”此言一出，台下一片质问之声，段祺瑞干脆拂袖而去，一走了之。参议员们一个个怒气未消，有人主张应对政府提出弹劾。可是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若提出弹劾案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方为有效。可是参议院自成立之日也从未到齐过四分之三的议员。弹劾自然从法律上就无法实现。对于敢于违法杀人的总统，奉公守法的议员们却干瞪眼没办法。

与此同时，黎元洪又假惺惺地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丑剧。8月22日他打电报给袁世凯，自请免去参谋总长和鄂军都督的职务，并向参议院提出辞去副总统职务的报告。在发出辞职报告之后，又害怕参议院真的趁机免了他的职务，随即又密电在京的同党迅速竭力暗中运动，勿使生效。还派出亲信分别赴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活动，辩白解释。

黎元洪把张振武送到北京，借袁世凯之手杀之，就是企图以此来减轻甚至隐瞒自己的罪责。不过在袁世凯面前玩弄借刀杀人之计，黎元洪似乎有点班门弄斧。袁世凯心里明白得很，在杀张、方同时就准备了开脱的后路。一方面宣布以大将军规格予以厚葬，并赠大洋三千扰恤，同时将黎元洪来

电全文公之于众。21日又在总统府宴请民社派参议员张伯烈等人，席间热情备至。袁世凯即席发言：“张振武在民国真可谓有才、有功之伟人，世凯实在钦佩之至……可是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利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似乎他成了一个天真单纯的受骗者。另一方面尽管黎元洪欲加治罪何患无辞地罗列了张振武的一串罪名，但终难掩盖其阴险的目的。同盟会8月22日发表公开启事，宣布革去他的协理职务，并予以除名。

然而事情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又是众说纷坛，争论不休。同盟会中有人认为“百万言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对武力只有用武力解决。但更多的人害怕再发生动乱和战争，认为再主动乱，中国将有亡国之危。因此，舍求之法律断不容另有他说，以生危险之象。正在僵持不下之际，8月18日，孙中山却从上海启程北上与袁世凯共商建设民主国家的大计去了。而且很快又从北京致电黄兴，认为袁世凯正因张振武被杀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并催促黄兴迅速进京，共议大事。喧嚣一时的张振武被杀案不久便不了了之了。

张振武被杀案既削弱了革命党的势力，又使黎元洪在政治上更加倒向并依赖于袁世凯。张、方的被杀更暴露了革命党阵营内的软弱、混乱和分散。袁世凯对形势看得更清楚了：革命党没有决心更没有力量和北京政府抗衡。他在独裁专制的道路上更加大胆和没有顾忌了。1913年3月，枪口又对准了他专制独裁道路上的又一个障碍，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宋教仁。

为民主宪政流血第一人
——宋教仁死难经过
枪声骤起 上海车站有刺客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车站。在午夜到来之前正是车站最繁忙和紧张的时候。上下车的旅客熙熙攘攘，不大的上海车站显得有些拥挤，墙上贴着各式的广告和红红绿绿的标语，更增加了嘈杂、混乱的气氛。

11点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正在广播，召唤旅客赶快上车，列车就要发车了。车站上大钟指向了10点45分。检票口只剩下两个检票员。不远处有个小水果摊，小贩不停地向四处张望，偶尔在嗓子眼里挤出一一点声响，也听不清他吆喝的什么。不远处还有一些候车的人。这时从车站贵宾候车室走出六七个人，有的穿着西装革履，有的则是长袍马褂，一个个气度非凡，边走边说地向检票口走来。其中走在中间的个子不高，两眼不大但烁烁放光，充满神采，薄薄的嘴唇和刀削一般的下巴给人以善辩能言和坚毅果敢的印象。突然间传来“砰”的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两声。只见那个小个子身体一晃，向前踉跄了几步，一下子趴在一张椅子上。

枪声一响，车站顿时大乱。有的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拼命向门外跑，逃命的人们被放在地上的行李拌倒，又撞翻了小贩的水果摊。只见一个穿着旧黄军装的人，正踩到了一颗水果上，滑了一跤，连忙又爬起来，慌张地向四处望了一下，夺门而逃，随着混乱的人群消失在夜幕之中。

站在检票口的那一群人顿时慌了手脚，有人上前扶住那踉跄倒在椅子上的人。只听传来一声撕肝裂胆的喊声“钝初，钝初，你怎么啦？”

“呜——！”列车启动了，长笛一声，划破夜空，象警号，也象哀鸣。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前农林部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先生昨日在沪宁车站遇害。晨雾中传来报童一阵阵的叫卖声，宋教仁的名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飘荡。“宋教仁被害，生死不明”、“宋教仁被害，凶手不明”……。

1913年是民国纪元的第二年。中国人刚刚剪去了脑后拖了近三百年的辫子，头脑感觉一阵轻松，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欢欣鼓舞涌上心头。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摧毁了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的政府诞生了。

然而历史并非这样的简单和顺利，封建势力也并不甘心拱手出让手中权力。就在革命党人攻占武汉之时，清王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率领他亲手训练新式装备的北洋陆军扑向湖北。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凭借他手中精兵良械，大耍政治手腕。袁世凯对清王朝一方面诅咒发誓忠于

那“孤儿寡母”，一方面又缓兵不进，以革命党的存在抬高自己在清廷的地位，报那“回籍养荷”之仇；对革命党一面进攻，一面密议诱惑妥协。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袁世凯又以武力相威胁，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发表通电反对共和，叫嚷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支持袁世凯，他们以袁世凯出来统一南北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对南方实行经济封锁，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军费极度困难，不得不对袁世凯妥协退让。1912年1月15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

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自己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得到孙中山保证以后，立即转而指使曹锟反对共和的北洋将领通电要求共和，加紧逼迫清帝退位。此时他已不管那“孤儿寡母”哭天喊地、咬牙切齿地咒骂他的祖宗八代了。2月12日，在太和殿的宝座坐了三年的宣统皇帝溥仪，终于应验了那“就完了，就完了”的不祥之言。

2月14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递交辞呈，并推荐袁世凯自代，次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清王朝的总理大臣，剪去辫子就变成了民国大总统，似乎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真的并没有一条鸿沟，岂止没有鸿沟，而且只不过是一件官服、一条辫子的差异而已。

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认为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均已实现，今后的唯一目标就是“民生主义”，于是拿着袁世凯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的委任状，兴冲冲地去考查、筹办建设二十万公里铁路的事情了。

但是革命党中却有一个人和孙中山想的不一样，他就是

此刻躺在医院中生死不明的宋教仁。

英雄历程桃源渔父反清朝

宋教仁，字遯初，又作钝初，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阴历二月十八日生于湖南桃源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桃源在离常德西八十里的沉江北岸，风景秀美，人杰地灵。西晋时为武陵郡，曾被大文学家陶渊明描绘成一个与世隔绝，有着仙人一般生活图景的美妙去处。生长在这桃花源里的宋教仁并非那么“怡然自乐”。在他12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一家七口：有年老的祖母、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靠着一些薄薄的田产勉强度日。1899年宋教仁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学习，当时一般读书人仍大都攻读四书五经，以求科场夺名、仕途有阶。同时新思潮不断涌来，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变前夕的躁动。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渐渐地觉醒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不断冲击着古老陈腐的专制王朝。1903年宋教仁考入刚刚成立的新式学堂——湖北武昌文普通学堂。在武昌，他结识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接收了新思想，并结识了革命党的重要领袖黄兴。

“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要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要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

“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给宋教仁以极大的震动。

这一年的冬天，宋教仁专程到长沙和黄兴等成立了秘密

革命组织华兴会，并担任副会长，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04年华兴会准备10月10日在长沙举行起义。宋教仁9月28日抵达长沙，他还不知道起义的秘密已于9月15日泄露，长沙城内此时正到处搜捕革命党。幸亏在街上碰巧遇到一个华兴会员，他才及时离开那是非之地回到武昌。但学校已将其开除，宋教仁被迫又逃到上海，随即赴日本留学避难。来到日本不久，23岁的宋教仁就充分显示了他的杰出才干。他四处奔走，

联络志同道合的留日学生组织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并为刊物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革命思想，矛头直指清政府腐朽专制制度，在留日华人中产生极大影响。1905年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宋教仁成为其中重要骨干。同盟会决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机关刊物。由于它鲜明的反清立场和感染力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日本警察封闭了《二十世纪之支那》。于是宋教仁等又创办《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仍由宋教仁经理《民报》一切事宜。

宋教仁不仅是个理论家、宣传家，也是个实于家。他认为过去一次次起义的失败是因为革命活动多侧重于中国南端，没有北方的呼应，孤掌难鸣，不能给统治者沉重地打击，而北方靠近清政府统治的中心，在那里活动，与南方起义相呼应，可以给腐朽王朝更大地震荡和打击。于是1908年，宋教仁和白逾桓、吴昆等由日本经朝鲜到达辽宁（当时叫奉天）。他决定联络辽东大孤山一带的“马贼”李逢春、金寿山等“绿林豪杰”，响应孙中山等在南方发动的武装起义，攻占沈阳，进逼榆关，矛头直指北京。但不久因白逾桓被捕，起义之事泄露，宋教仁再次被迫逃亡日本。

经过亲身的体验和认真思考了一次次革命失败的原因，

宋教仁认为革命应居中，不宜地处偏僻，于是提出了组织中部同盟会，以武汉、南京为中心，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主张，1910年宋教仁又一次回到国内。

回国以后，宋教仁一方面积极进行组织的准备，同时担任上海《民立报》主笔，以“渔父”和“桃源渔父”的笔名继续撰写文章，抨击政府腐败，批评内政外交，分析国际形势。他的文笔雄肆，倍受读者欢迎。

1911年7月，经宋教仁等多方努力，“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并积极推向长江中游，各地遍立分会。不久即在武昌城头响起炮声，宣告了清王朝末日的到来。

为获民主 教仁组建国民党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为法制局局长。于是宋教仁以极大精力和热情投身于法制建设工作，把他对民主共和的希望、设想全部融汇进他起草的一条条法律条文之中。临时政府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颁布了，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县，停止刑讯；取消清朝法律中对各类“贱民”的歧视条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主奴名分；剪辫、禁止缠足，以及保护和鼓励发展工商业、文化教育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宋教仁对资产阶级共和理想的理解和向往。

3月30日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袁世凯正式任命了以唐绍仪为总理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命为第一任农林总长。宋教仁得知以后，立即打电报给唐绍仪，认为“农林非所素习，断难胜任”，以示推辞。但又表示愿意出使日本，寻求国际对民国承认，“事毕即回国，尽瘁党务”。但

在唐绍仪一再挽留之下，宋教仁只好接受农林总长这个职务。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临时政府的所在地由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南京迁到了弥漫着浓厚封建气息的北京。

4月20日来教仁来到北京上任。虽然留日期间学习的是政治、法律，任农林总长并非自愿，但农业、林业关系国家命运，百姓生活。宋教仁上任以

后还是尽心竭力，努力工作。他调集资料，拟订整顿、发展国家农林的各种计划和措施。当时中国土地荒废不少，他主张首先要由政府制定法律，奖励农民开垦经营：提倡植树，在森林茂盛地区设立农林局，将森林经营收归国有；采用新式技术，兴修水利工程，除害兴利。他认为中国农民多半缺乏经营的财力和专业知识，主张设立专门机构，为农民提供贷款；同时设立农业学校、试验场，提高农民的专业知识。他还主持拟定了边境开垦、移民、植林的各种法律草案，并在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

宋教仁上任不久就到农林部所属的农事试验场视察。农事试验场在北京的西直门外，也就是今天北京动物园一带，清朝称“三贝子公园”，建于1907年。当时仿照西方国家博物院的形式，一部分为动物园，一部分为植物园。动物园中有各种珍禽猛兽、动物标本陈列室。植物园有花圃及各种农作物试验区。宋教仁喜欢这里的恬静和乡村景致，就住进了试验场，同时命人将园内打扫清理，对外开放，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但是，政府内的工作并不能使宋教仁满意。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国务院负责处理实际政治责任，临时大总统只是国家元首，政府成员的任命须经临时国会——临时参议院通过；总统颁布法律，须经国会批准，国务总理及有关总长副署方为有效。袁世凯并不甘于做这样的

总统，对国务院的工作处处掣肘、牵制，国务院反被搞的有名无实。不久就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

王芝祥是直隶（今河北）人，民国成立以后，直隶士绅及议会推荐王芝祥担任本省都督。唐绍仪也以此做为当总理的条件向袁世凯提出，袁当时满口答应。但王芝祥到了北京以后，袁世凯却暗中指使其爪牙军人通电反对。袁世凯就以此为借口，要改委王芝祥为宣抚使到南京遣散军队。唐绍仪拒绝在改委的委任状上副署，谁想到袁世凯竟将没有总理副署的委任状直接交给王芝祥，擅自破坏《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总理唐绍仪愤而辞职。宋教仁本来就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内阁中做这样一个农林总长，于是也提出连带辞职。拖到7月中旬，袁世凯才不得不同意宋教仁的辞职。

宋教仁离开了政府，就专心投入党务活动。他认为改革中国政治的首要之处，就是实行民主宪政，推行政党政治。即进行公开公平的政治竞选，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责任内阁，推行其政治主张。7月21日，宋教仁在北京同盟会大会上被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实际负责全党事务。宋教仁主张，同盟会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在未来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绝对多数的席位，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组成责任内阁，合法地推行同盟会的政策主张，实现其政治信仰，党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围绕这个中心目的。为了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扩大声势，由宋教仁主持，同盟会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宋教仁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党派，共同合并为“国民党”。为了保持统一和一致，国民党的纲领放弃了同盟会“平均地权”等积极进步的主张。虽然同盟会中有人反对，但究属少数，未能阻挡住这股合并潮流。

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当选理事。理事们又推荐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又推荐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这样国民党的事务实际由宋教仁全面负责。从此宋教仁更专心于

筹划国会议员选举之事。

1912年11月，全国各省、地区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结束，参议员每省10人，众议员每80万人选1人。由于宋教仁等人的努力，国民党在各地积极开展竞选运动，结果国民党在众议院596席中占296席；参议院274席中占123席，大获全胜。这无疑使宋教仁极为兴奋。当他在家乡桃源听说消息以后，立即登程赶回上海。一路上，他不断发表演说，抨击北京政府无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各地报纸竞相转载。按照政党内阁原则，应由议会中多数党组成内阁。因此，宋教仁一时成为全国极为瞩目的人物，甚至传言他将出任总理执政组阁。

俗话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当国民党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袁大总统却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总理赵秉钧也觉得威胁就在头顶。于是首先由袁系的报纸刊出“某当局之时事谈”、“匿名氏驳词”，对宋教仁的演说词横加责难、谩骂低毁。宋教仁毫无惧色，先后在《民立报》发表了“驳某当局者”、“答匿名氏驳词”，针锋相对，纵论时政。并经与黄兴等商议之后，口述了《国民党大政见》，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民党对国家政体、政府组织和当前时局的政策主张，准备以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制定出真正的共和宪法，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舆论也普遍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中最具有政治见解和经验的领袖之一，是最有希望组织内阁出任总理的人选。

泪洒床前 陈其美发誓报仇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4月8日在北京开幕。袁世凯也几次打电报给宋教仁，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于是宋教仁决定3月20日由上海乘11时沪宁快车前往南京，然后转津浦线北上。就在宋教仁临行前，上海已纷纷谣传有人要阴谋加害于他。许多人劝阻宋教仁暂时不要北上。宋教仁听后坦然一笑，摇摇头说：“不会的，光天化日之下，怎容有这样卑劣手段，况且，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即使有危险，我又怎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古语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宋教仁不良死，奈何以死惧之。”

3月20日晚，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陪同下，宋教仁来到上海车站。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走在中间的那个看上去精明干练的人正是宋教仁。第一枪正射入了他的腰部，他踉跄了几步就倒在椅子上。黄兴急忙上前扶住。于右任赶紧到站外，拦截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此时医院走廊里挂钟的时针和分针重叠在12的数字上。

当值班的护士看见急匆匆闯进来的人时就感觉到发生了大事，急忙领进候诊室。时至午夜，大夫们早已下班，夜里值班的大夫又刚被一个电话叫去急诊，急救室里也只剩一位护士小姐。护士小姐看清伤势，进行了紧急处理，又转身抓起电话叫来了住在医院附近的德国医生。就在护士小姐打电话当儿，于右任看见宋教仁脸色惨白，冷汗珠一颗一颗从额头上冒出来，大张着嘴好象有什么话要说，急忙把耳朵贴近。只听见宋教仁断断续续他说：“我疼极了，恐怕不行了，有几

件事托付于兄。”“你说吧，我听着呢。”“一，我所存在南京、北京及东京的书籍，我只有这些遗产，把它们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中清寒，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我死后，请克强和诸位老友为我照……照料。其三，国事还望诸位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我……我

好疼啊。”“钝初，你不要多说，放心！放心。”医生来了以后立即将宋教仁抬进手术室，他解开宋教仁被鲜血染红的衣服，看清了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受伤处离心脏很近。当取出子弹时，时间已经到了次日零点三十分了。宋教仁刚一清醒，又想到这次乘车北上的责任，请黄兴立即代拟电文连夜打给袁世凯。黄兴迅速拟好，请宋教仁过目。“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叩。”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更是群情激愤，多次开会商讨缉拿凶手。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黄兴和陈其美积极与各方联络，致函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悬赏万元。沪宁铁路局认为车站内发生凶杀案件，事关路局声誉，因此也出赏金五千元。江苏省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

医院里，宋教仁手术以后，伤势依然没有好转，而且不断呕吐，大小便中出血严重。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为防止意外，干右任亲

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一群新闻记者一直坚持在门外等待了1个小时50分钟，终于看见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了。他们一拥而上，将医生围在中间。“先生们，请安静。”医生一边擦去头上的汗水，一边说：“手术的情况是这样的：此次手术，在腰腹之间开了一个六寸长的刀口，仔细检查了大肠，发现大肠有一处被枪弹洞破，故肠中之饮食溢出于肠外，此其痛楚之原因。其肠外之血亦有随破裂口浸入肠内，此为大小便出血之原因。这次手术已将肠中洞破之处修补，血块洗去。”说到这里医生停顿了一下，似乎想找一个合适的词。“您对宋先生生命安全有否把握？”一个记者紧追着问。“我们已经作了一切努力。其余的……”医生耸了耸肩膀“要看上帝的安排”。

22日凌晨3点左右，宋教仁的体温渐渐下降，手脚发凉，心跳微弱，呼吸急促。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闻讯赶到医院。这时宋教仁已无力说话了。他用眼睛环视这些曾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战友，双手合十，与大家诀别，又张开嘴好象有千言万语。黄兴把头靠近他的脸：“钝初，你放心去吧。”周围的人们强忍悲痛，与他们这位才华横溢、壮志未酬的领袖告别。1913年3月22日凌晨4点48分，宋教仁气绝而逝，年仅32岁。黄兴用手将来教仁仍然直视前方、死而不瞑的双眼轻轻合上。人们放声痛哭。陈其美边哭边用拳头捶打着床沿喊叫着：“此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搜查妓院 要犯落网案未明

就在医生们竭力抢救宋教仁生命同时，破案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上海地方检察厅和公共租界的巡捕分头调查。两

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大家所知道的只是由宋教

仁身上取出的一粒勃朗宁手枪的子弹，和车站脚夫捡到的空弹壳。就在人们觉得山穷水尽，无从着手之时，突然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

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举行隆重的移柩仪式。将宋教仁的遗体盛殓，由沪宁铁路医院移往法租界的湖南会馆停放。天空中飘着蒙蒙的雨丝。送殡的队伍中有学生、商人、军人，还有日本的友人宫琦滔天、朝鲜的革命流亡者等。青天白日旗、红黄蓝白黑的国旗等旗帜为前导，随后是军乐队奏着悲壮的哀乐，遗像，灵位，海军乐队，花圈，军人的队伍，国民党党员和前来送殡的各界人士，依次而行。楠木灵柩，安放在扎满花圈的马车上。马车行进在送殡的队伍中。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医院出发，经四川北路、蓬莱路、河南路，绕道福州路、浙江路、松江路等，到三洋泾桥。在《民立报》社门前，《民立报》全体职员举行路祭。《民立报》社长于右任哭述着宋教仁在《民立报》担任主笔的往事，热泪盈眶，胡须颤抖。他最后说：“朗朗乾坤，偌大民国，却容不得一个敢为百姓争民主，为国家争宪政者，公理何在！今天，我不敢为私交哭，不敢为《民立报》哭，实在是为中华民国的前途而痛哭啊。”于右任话音未落已泣不成声，闻者无不纷纷落泪。一路上又不断有许多人加入了送殡的队伍。队伍又经郑家桥折而向南，直达斜桥湖南会馆。十几里的路上，人山人海，观者如潮，盛况为上海空前。会馆挂满了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谏文。

夜幕刚刚降临，设在南京路通运公司楼上的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来了两个操四川口音、学生模样的人，说要会见国民党负责人有秘密报告。交际处主任周南陔立即将二人请进屋内，其中一个便说：我们因为来沪投考，住宿在四马路鹿鸣旅馆。隔壁房间住着一个衣衫不整、面目凶恶的小个子。自称姓武，名士英，每天常到我们房里摆龙门阵。说他先前在云南军队里做过管带。一天，向我们借了两块大洋，说要坐车到西门外去，并且说有人要提拔他，让他干大事情，事成之后即可大富贵，借我们的钱以十倍奉还。我们将信将疑地借了两块钱给他，她看样子很高兴，又拿一张照片，给我们看。他还指着照片上的人说，这个人不好，该杀。又拿出一张名片，说这就是提拔他的上海有名人物。我们当时没把他的当话当真。可第二天报上登载宋先生被刺消息，而且有照片，我们才发现与武士英给我们看的相片，竟是一个人。今天又看到这么多人给宋先生送殡，觉得宋先生是个好人，所以特来报告。周南陔觉得事情太离奇，便急忙问：“武士英给你看的那张名片，说是上海有名人物，记得是谁么？”两个学生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了。其中一个犹犹豫豫他说：“那名片上的姓说普通也不普通，说生僻却也不生僻，似乎有长长的一撇。”周南陔不敢怠慢，一面向陈其美报告，一面派人随两个学生到旅馆去盯住武士英。送走了这些人，周南陔几个人就猜想这个名片上带长长一撇的姓，煞费了一番苦心，也没猜透。是姓虞、姓唐、是廖、是廉，还是周、是方？一个个都猜了，还是莫衷一是。陈其美听到消息后也赶到这里，坐镇指挥。根据“上海有名的人”来看，他觉得姓虞倒很有可能。因为虞洽卿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大买办资本家，很有势力。可他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呢？时间不大，去旅馆的人回来报告：旅馆说武士英今天早晨就结帐走了。周南陔气得一跺脚：“唉！线又断了。”可是去的人却从武士英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江苏巡查长应桂馨，法租界西门路文元坊”。人们

这才恍然大悟，那“长长的一撇”原来是个应。陈其美立即派人向租界巡捕房报告，请求立即逮捕嫌疑犯应桂馨。几天来，周南陔等为抓凶手绞尽

脑汁，熬红双眼，今日如漆黑夜中看见一线光明，一个个就象饿鹰一样扑向猎物。

公共租界总巡、英国人卜罗斯也正为这案子发愁，听到报告，立即亲率50号西探总目（探长）阿姆斯特郎等人去捉拿应桂馨。当他们赶到西门文元坊应宅时却扑了空，家里人说应到他的姘头、妓女胡翡云那去了。卜罗斯留下两人监视应宅，其余又赶到了胡翡云那里。又说胡和应都到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那赴宴去了。于是卜罗斯又带着人立即追到了迎春坊。迎春坊在湖北路，是上海的“红灯区”，到夜里这一带很是热闹，灯光荧荧、车声轱辘，这一家倚门接客，卖笑逞娇，那一家是押客登门，腾欢喝彩。红灯绿女之影相望，喝酒猜拳之声相闻。十多名中西警探把迎春坊前后左右围了个水泄不通。卜罗斯带人进了李桂玉妓院。此时应桂馨正在楼上厢房中饮酒作乐。忽听楼下有人高喊：“应老爷，楼下有人找！”应桂馨面带酒意，摇摇晃晃走下楼来，“哪位朋友找我？也上楼喝两盅吧。”话音未落，黑影处阿姆斯特郎一伸手，只听“咔”的一响，手铐已落在应桂馨的右腕子上，应桂馨酒意顿时吓没了一半。虽然应桂馨有一身武功，但还没待他摆开架子，已经被一拥而上的巡捕连打带拖地押入停在街口的“香港汽车”，立即风驰电掣般开往南京路老闸捕房。

巧骗证据 意外收获擒凶手

应桂馨也叫应夔丞，是当时上海滩上极有头面的人物，而且与革命党亦有许多联系。早年他曾和别人一起开过烟馆、戏

园，后来到苏州花银子捐了一个候补知县，在官场上混了几年，又到广州编演血新剧。武昌起义爆发以后，一看清王朝气数已尽要垮台，于是转而在上海四处探听各方消息，向同盟会报告，投机革命。上海光复以后混入上海都督府，在都督陈其美手下当谍报科长。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应桂馨又跑到南京，混入总统府卫队。陈其美写信告诉孙中山，此人华而不实，不可重用。于是应桂馨被派到下关兵站，不久因故被撤职。应见投机不成，从此渐渐与革命党疏远，组织什么共进会，自称会长，联络青红帮，到处活动。后来不知如何又混上了湖北侦探队长，又忽而当上了江苏巡查长，颇受江苏都督程德全赏识，因此在上海滩也颇有势力。卜罗斯心里清楚，抓这种人，不同于普通中国老百姓，如果没有有力的证据，将会使巡捕房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可是应桂馨当然自己不会承认他与宋教仁之死有何联系。于是第二天天一亮，卜罗斯就率领20多人，前往应家搜查证据。

应桂馨的家在上海小西门外，徐家汇路文元坊北弄二号，三楼三底的房子，装潢华丽，陈设相当阔绰。门外高悬“江苏巡查长公署”、“共进会机关部”两块牌子。巡捕们进得门来先将前后守住，一切来往人员只许进不许出，男女宾客、闲杂人等一律分别软禁，女眷在楼上厢房，男人在楼下西厢。布置好以后，便分头搜查。不料在他三上三下房子里翻箱倒柜，衣橱、文具、抽屉、镜架各处搜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关于刺杀宋教仁的片纸只字。英国巡捕和同来的国民党人都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周南陔听说以后，也立即赶到了文元坊。一路上他脑子不停地打着旋转，琢磨怎么才能把证据搞到手，想了一路也没想出好主意。到了应宅门外一抬头看见了那两块牌子，突然间，

就象说书人说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悄悄地来到了楼上，步入软禁女眷的厢房。厢房里应桂馨的大老婆、小老婆们一个个心惊胆颤，缩成一团。她们一大清早，有的没起床就被急促的砸门声惊醒，也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就被糊里糊涂地赶进这间小厢房里。起初以为是绑票，可又见没捆人，而且有好多外国巡捕，心里正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周南陔进门以后，装模作样地大声问了几句，随即很机密似的压低声音说：“我是应大哥的知心朋友，在巡捕房混事，刚才在捕房里已和大哥接过头。大哥让我回来告诉你们，不必着急，事情有眉目了，明天就可以放出来。但是有一些秘密文件，大哥关照，让赶紧取出来秘密交给我转移。”这些女人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见没有什么反应，他又故意装作着急的样子：“快点，快点！如果让巡捕房翻出来，大哥生命可就危险了！”女人们果然中计，一个年轻小妾鼓了鼓气站起来说：“阿拉是晓得的，但外面看的这么严，怎能弄法？”周说：“有我，不要紧，你只说在什么地方？”应妾没说话，一猫腰将她站着的墙角地板拨动一下，地板是活的，掀开后，从里面提出一只小箱子，用眼睛示意东西都在这里。周南陔一见心中暗喜，如获至宝，但表面装着很平静地接过箱子，连忙又问还有别的要紧东西没有？应妾摇摇头。周南陔转身提箱出门下楼。在楼下客厅里与阿姆斯特郎等开箱详细检查，只见小箱子内藏有文稿、信件、密电码本和其它文件。

陈其美看到密电内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在应桂馨背后一层层的后台竟是如此之大。

虽然抓到了应桂馨，骗出了证据，可是那个直接实施杀人的武士英到哪里去寻，到哪里去找呢？说来更是奇巧，在搜查应公馆的时候，人们把目标都集中在寻找秘密文件上，而在应公馆的不少闲杂人等都暂时关在楼下西厢房，也没有审

问。秘密文件找到以后，大家又想起武士英。于是有人带着戏弄的口吻，有意无意地对着软禁在厢房的人高声喊了一句：“谁是武士英？”喊话的人以为武士英必定不会在应宅，即使在也不会承认。岂料话音未断，立即有人应声“有！长官有什么吩咐？”随着声音只见小个子闪到前面，立正站好，身上穿了一件旧军装，好象是刚出操的大兵，这一声“有！”倒把喊话的人吓了一跳：“你——你就是武士英”？“正是。”那家伙还连连点头。得了，找的就是你，跟我们走吧。就这样武士英意外地捉到了。招来两位四川学生一认，果然就是鹿鸣旅馆借钱之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武士英又叫吴福铭，本是山西平阳龙门人，自幼不务生业，后入清军当兵。辛亥革命时在云南七十四标任二营管带，并曾代理七十四标标统。民国成立以后，军队遣散，武士英就来到上海。此人多年混迹于清军之中，身上练了些武功，枪法也好，只是头脑简单，不谙世事，只要给钱，给谁干都行，干什么都行。有人觉得此人可用，就把他引见给了应桂馨。应桂馨正为刺杀宋教仁找不到合适的人发愁。找不摸底的人，怕枪法不准坏了事；让心腹人去，又怕万一当场被抓，损兵折将。一瞧武士英枪法高超，头脑简单，见钱眼开，立即许下一千元大洋的赏金。武士英正在破落之时，一听说一千大洋，满口应承。20日夜就怀揣照片来到车站。行凶之后，逃回应宅领赏金。应桂馨当时说要等确切消息证实，只先给了三十块大洋，其余过后再补。谁知第二天报纸消息说宋教仁身负重伤，并未牺牲，气得应桂馨大骂武士英

无能，只会吹牛皮。武士英赏钱得不到反挨一顿臭骂，只觉得自己晦气，一连几天躲在妓院里喝酒抽大烟。23日下午看见送殡的队伍从大街走过，才知道宋教仁确实已死在医院，于是第

二天上午就急忙跑到应宅来讨赏钱，谁知就正落在网中。

真相昭白 总统幕后是祸首

3月25日，孙中山中断在日本的访问，提前赶回上海，主持国民党工作。江苏都督程德全同时赶到上海，命令上海地方审判厅长黄涵之参加英法租界法庭会审。同时命当时北洋政府驻上海负责对外联络的交涉使陈贻范，向上海领事团提出将应、武二犯移送中国法院审理的要求。但是，外国领事团回答是：虽然宋教仁被刺的案发地点沪宁车站在中国管辖地区，但应桂馨被捕是在公共租界，武士英被捕是在法租界，因此必须先由租界方面预审，证据确凿以后，当将罪犯引渡于中国当局。

“宋教仁被刺案与北京政府有关”，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全国上下沸沸扬扬。虽然外界传闻、猜测有眉有目，但租界当局一言不发。租界法庭对应、武二犯预审之时，法官的问题也是话中有话，丝毫没有涉及实质内容。程德全聘请的代表、中国政府方面的律师德雷斯几次请求庭方公布搜查到的证据，但陪审官、英国副领事极力反对：“这些函件的内容，与中国政治关系极大，我们必须向北京公使团请示后，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公布。”越是这样就增加了公众的兴趣，各种传闻日益增多。国民党领导人也连日在黄兴和陈其美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经过几次预审，租界当局将应、武二犯分别于4月16日、17日引渡中国上海司法当局。18日将所得到的各种证据也全部移交，共有：皮箱一个，五响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两粒，密电码三本、大量函电。上海交涉使陈贻范一见证据也是大惊失色，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因此立即邀请江苏都督程德全、巡按使应德闳、国民党方面黄兴、陈其美以及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涵之、检察厅检查长陈英等各方面重要人物到交涉使公署共同检验，并商讨处理意见。在黄兴、陈其美等坚持之下，决定4月25日以程德全、应德闳的名义将证据电告总统袁世凯、国会参众两院、国务院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并决定同时由上海地方法庭开庭公开审理，按照法律程序解决。

就在法庭公开审理的前一天，4月24日上午，凶手武士英在严密的监守之下，却突然暴亡。此乃杀人灭口之计毫无疑问，但法医检验了三回却说查不出因何致死，既无外伤，也无内毒。虽然武士英罪在当诛，死有余辜，但死因不明，至今仍是一大疑案。悬浮了七十余年的问号，何时才能变成句号，目前还不得而知。

4月25日夜十二时，程德全、应德闳将调查结果及证据通电公布。次日《民立报》以醒目的标题，独家刊出：“注意！注意！！注意！！看民贼的手段，宋案证据之披露”并登载证据照片等。其中最重要的有1913年1月14日国务总理赵秉钧致应的密函：“密电码送请查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2月4日洪述祖致应密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3月13日应致洪密函有“《民立》记宋钝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

为扰乱”等语。同时，洪致应的密电提出：“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14日应桂馨打电报给洪述祖：“梁山匪魁（以宋江代指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18日洪述祖回电：“寒（指十四日）电应即照办。”19日再次去电催促“事速照行”。20日，应桂馨密电洪述祖：“匪魁已灭，我军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报。”这证据就象一枚重型炸弹，轰动全国，震惊世人。原来这暗杀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理赵秉钧，就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居间联系人就是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无怪乎租界当局要请示北京外交使团，如此骇人听闻的政治谋杀，他们也难免要“少见多怪”了。

这里不免还要说一说洪述祖、赵秉钧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首先说这洪述祖。洪述祖绰号洪杀胚，生长在江南名门望族，自幼娇生惯养，性格放荡不羁，结交一些狐朋狗党无赖之徒。后来在台湾巡抚刘铭传手下作幕僚。1885年中法战争时期，福建运往台湾的两船的械被法军截获。战争结束以后，刘铭传派洪述祖与法军谈判，提出以货物换回两船饷械。洪述祖借机从中渔利，侵蚀贪污。事情被刘铭传得知以后，刘大怒，立即召回洪述祖。按军法此罪当斩，洪述祖自知钱能通神，用大量珠宝金银贿赂刘铭传手下人，为其求情。结果仅处以监禁三年，洪借机逃回大陆，以后又到处游说，施展逢场作戏，阿谀奉承之能事，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做过湖北通判，整日混迹于烟馆、赌场，当时被称为“汉口嫖界大王”。以后在天津又结识了赵秉钧，可谓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民国成立以后，赵秉钧做了内务部总长，他又跟着进了内务部当秘书。

这赵秉钧更是一个奇人，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这来无影，是因为没人知道其真名实姓，何方人氏。你问他姓，他是百家姓上第一姓，你问他名，他名秉钧，天子脚下第一人。你问他生辰，他说甲子年正月初一子时正，第一干支岁首头一时。从他幼时记事始就在河南临汝一个书香人家做书童，也不知父母何人，后不知如何就结识了袁世凯，清末时曾做过

典史等小官。1905年升至清巡警部侍郎，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始作俑者，深得袁世凯重用。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他就当上了内务总长。唐绍仪内阁辞职以后，陆徵祥没几天总理就由赵秉钧取而代之了。这个民国史上第一个警察头子，亲自指挥了这场民国史上第一次卑鄙的政治暗杀血案。面对这样的对手，国民党又该如何呢？

意见分歧 国民党多虑误时

面对这样腥风血雨般残酷的政治斗争，国民党内部却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虽然宋案发生之时国民党就很清楚，幕后指使者定是袁世凯无疑。但证据发现以后，国民党却对如何了结此案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下船伊始，孙中山还表示此事应当慎重，要按法律的程序彻底根究凶手。当得知幕后指使者竟是他曾寄予极大信任的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时，孙中山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他意识到，这时刻法律已经成为废纸，一味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无异于自束手脚，任人宰割。因此在国民党领袖们的秘密会议上，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应该夺取主动权，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各个省区组织军队，武装讨袁，先下手为强。他说：“过去，我看错

了袁世凯，是我的过错。现在，袁世凯想使封建专制死灰复燃，辜负国民的付托，必须将他除去。国会只是口舌之争，法律也没有抵抗专制的力量，对付袁世凯这个拥兵自重的野心家，也只有诉诸武力这条路了。应该乘此反袁之声举国苦狂之时，起兵讨袁。我们只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不及。”并且表示：“若有两师军队，我当亲率北上问罪。”但国民党内以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则坚持主张公布证据，以法律途径解决。他们认为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华民国，而且中蒙问题、中俄、中印边境形势日益险恶，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争，势必给列强出兵干涉提供借口，则中国有再次被瓜分的危险。而且国民党手中实力也远不及北洋军阀，贸然兴师，袁世凯借口破坏国家法律、统一，以武力相压迫，后果不堪设想。会上谭人凤站出来表示拥护孙中山。他说：“公道在人心，如果证据是非大白天下，袁贼不仅出兵无名，而且外国也不会再借款给他，他军费无所从来，那时云南、广东远在边睡，袁世凯鞭长莫及，湖南为南北要冲，三省宣布独立，义旗一举，天下必为响应，袁世凯何惧之有？”黄兴颇为不满地站起来对谭人凤说：“你的一番议论虽然豪爽，可是我们的兵有多少、枪有几支？钱又从何而来？辛亥一役，民国元气尚未恢复，如果贸然兴兵，必致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我们创建民国，制定法律，实行法制，怎可又出尔反尔，破坏法律。我们证据在手，待到国会一开，可以组织特别法庭，法律并非没有效力。证据公布以后，全国人民必能因此而觉悟，军人必能因此而觉醒，各派政党也必定看穿袁世凯的面目，团结一致。那时国会不选其为正式总统，袁世凯不攻自倒。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几次会议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结果直到证据公布之时，国民党也没有制定出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法庭也因受到司法总长许世英的阻挠而未能成立。

袁世凯又玩弄两面派的老伎俩，一面加强武力镇压的准备，一面进行诡辩和抵赖，遮掩他的罪行。一次，北京各界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会”时，袁世凯授意京兆尹王治馨为其开脱。王治馨这个糊涂官僚在会上大放厥词，顺口胡诌

什么：“我晓得，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但暗杀属于不正当手段，因此没有杀。由此可见，总统和总理都是与宋案无关的。”气得袁世凯顿足大骂。真是欲盖弥彰，人们对袁世凯看得更清楚了。

就在国民党内部争执不下之时，袁世凯却在积极活动，一面设法掩盖其罪恶阻止法庭审判，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的步伐。

再说应、武被捕以后，在北京的洪述祖作贼心虚，抢先逃到青岛的德租界。租界当局以杀人同谋嫌疑将其扣押。袁世凯装模作样派内务次长向德国交涉，说要押解回京，但不久，洪述祖就“查无着落”了，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赵秉钧到厅接受质问，袁世凯又忽而冒出一个抵制的手段。5月16日，一个自称为“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周予敬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她乃奉“血光团团团长”黄兴之命，来京进行政治暗杀。第二天，北京军政执法处就根据指控逮捕了参议院国民党籍议员谢持，罪名是谢持是“血光团团员”。同时北京地方检察厅向黄兴发出传票，要求到厅对质，想藉此将全国的注意视线转移。没料到黄兴却一传即到，并向上海会审公堂保证随传随到。在舆论上，袁世凯撒布迷雾，转移视线，编造谎言，无不尽其

之能事；在行动上，袁世凯加紧筹措战争经费的步伐。

本来民国成立以后，国家财政就面临极大困难。与英美德法四国在华银行团的贷款谈判一直在进行。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取更多在华特权，在借款问题上强加了极其苛刻的政治条件，不承认就不予借款。因此民国初年几任内阁都不敢采取这个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宋教仁案发以后，全国反袁

之声日起，袁世凯下决心以武力征服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国家利益早已弃之脑后。就在程德全公布案件证据的当天，未经国会同意，久未露面的内阁总理赵秉钧忽然偕同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鬼鬼祟祟地从后门溜进汇丰银行，与在那里等候的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的代表签订了大借款合同，以五厘的高息借得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巨款，并且将国家盐税完全置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成为民国史上最大的卖国借款。随即又在5月2日组成了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的“战时内阁”，并调兵遣将，派倪嗣冲为安徽清乡督办，由河南向安徽进发，派赵倜与北洋第六师李纯部队集中于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又派海军游弋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摆开了武力征服国民党的架子。不久又造谣说湖北发生的“兵变”系黄兴指使，又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撤销了黄兴陆军上将军衔。一直到了1913年7月，国民党才在孙中山率领之下被迫发动“二次革命”。但是国民党既无实力抵抗，又错过了良好的机会，“二次革命”命中注定地失败了。

善恶有报 天网恢恢疏不漏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宋案的凶手们一个也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

应桂馨乘着二次革命混乱之机，越狱逃跑，事后溜进北京，自恃功臣资格要找袁世凯兑现“毁宋酬勋”的诺言。原来赵秉钧、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许多密电虽被搜去，据说他还有更秘密重要的文件藏在别处，都是袁世凯唆使其暗杀的密证。应桂馨以此要挟袁世凯。袁世凯不得不虚与委蛇，给了些钱物。应桂馨乐昏了头，便在北京招摇撞骗，并讨了旧

日相好胡翥云做了姨太太，接到北京，大出风头。袁世凯岂能容他如此张狂。1914年1月19日，应桂馨又揣着一大笔钞票乘津浦列车南下去干什么秘事。他哪里知道怀揣着的不是钞票，而是他的催命符。火车刚过杨柳青，有人在头等车厢里发现了血肉模糊的一具尸首，那就是应桂馨的下场。赵秉钧也是气得转了向，竟打电话问袁世凯：“谁刺杀了应桂馨？”得到的回答是：“总统。”“这样对待手下人，以后还有谁肯替总统做事！”他哪里料到这一句话就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赵秉钧气得称病不出，袁世凯派来了自己的医生。吃了医生的药，赵秉钧突然七窍出血，一命呜呼。总统不需要他再操心还有谁替总统做事了。两年以后，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在人们的唾骂声中，归了西。只剩了个洪述祖逍遥法外。到了1917年4月也许洪述祖认为没人再记得当年的沪宁车站的枪声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当他得意洋洋在上海南京路上陶醉于自己当年的巧妙杰作的遇想之中时，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已经寻找他四年了，此刻正紧紧盯着他的背。这个少年就是宋教仁的儿子宋中。他胸怀杀父大仇，无刻不在注视仇人动向。就在洪述祖抬腿上车之时，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拦腰死死抱住……1919年3月27日，北京大理院判决处以洪述祖绞刑，立即执行。

宋中来到父亲墓前。原来宋教仁牺牲以后，国民党在上海沪宁车站以北

约十里的地方购买了一块约一百多亩的田地，作为墓地，名“宋园”，将宋教仁先生安葬于此。抬头仰望，只见上尖下方的塔形墓由红砖砌成，上下五层，高丈许，最上一层砌以白色瓷砖，墓以黄石封顶，前竖一纪念碑。他心中默默感谢，上苍有眼，让我得报父仇。父亲啊！您可以安息了。随后他又来到静安公园，园中草坪正中一座铜像，宋

教仁手支下颌侧坐沉思。不知是谁在像前放了一束鲜花，火红火红的映亮了宋教仁的脸。铜像基座上正面刻章太炎手书阳文“渔父”，背面是用阴文铭刻着于右任撰书碑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志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身被横祸仇无觅 ——黄远庸命丧旧金山

1915年12月27日，大洋彼岸美国旧金山都坂街和上海楼菜馆发生了一起枪杀案，被害者是中华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时年仅32岁。案件发生后，舆论哗然。人们发问：一代“报界奇才”与何人结下如此大恨深仇，竟致惨死异国他乡？

时至今日，这件刺杀事件仍是一个未揭开之谜。谁人是凶手？又受何人指使？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然而，我们从远生短暂的生涯中，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他从事记者职业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这绝不是泄私愤，图报私仇，而是一件道道地地的政治谋杀案。

清末举人 不求高官厚禄 民国记者 志在督责财政

黄远生，原名基，字远庸，发表文稿时喜用“远生”笔名。1884年远生出生在江西九江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黄儒藻在科举仕途上颇不得意，只获得个外放浙江的小小官职。母

亲姚氏为名门闺秀，知书、习礼、明诗。远生从幼年起就深得母亲教育熏陶，而他又聪颖过人，1900年16岁参加科举考试，就榜上题名，中了秀才。1901年南浔公学肄业后，继续在家课读。1904年，在家人的催促下参加乡试，排第七名，为举人。1905年，黄远生21岁，进京参加会试，联捷成三甲第八十名进士。这次科举考试后，清朝光绪帝即下诏废科举，设进士馆，并诏新第之授京职者，入馆学习，或者游学外国，三年后视所呈功课的好坏，再授官职。远生没有得到京职，被分配到河南任知县。但他有志于游学，不愿作这地方官，于是再三请求，遂获准赴东瀛学习。远生在日本就读中央大学，一边学习法律，一边研读日、英等文字。1909年秋，远生学成归国，调至邮传部任员外郎，很受重用，升授参议厅行走，并兼编译局纂修官。远生渊博的学识，优美的文辞，令见者无不夸奖。

这时，远生的同乡、出使比利时的大臣李盛铎奉诏从欧洲回京，与远生同住在北京海岱门内，相隔咫尺，过从甚密。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己丑榜眼，见远生喜爱文学，又有志于朝章国故，评论时政文笔犀利，颇为中肯，就对远生说：“吾见欧洲士人之诸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广闻博涉，必为名记者。”鼓励远生做新闻记者，远生为之心动。从此开始，他便走上了新闻记者的道路。

黄远生从业新闻记者得心应手，每每以独特的采访形式，获得新闻，很快就成了新闻记者中的佼佼者。远生的居室，是他广泛结交各界人士的场所，迎来送往的人士中，不仅有达官贵人、政客、艺人，也有中西厨师诸色人等。无论是显贵者，还是位卑者，也不论是亲近者，还是疏远者，远生均以同样礼貌接待，都能与他们敞怀快言，高谈阔论，无所禁忌。

他能身坐局中，一边手出骨牌，耳听客语，一边口授书记发稿。如果是机密的内容，就默记于心，待夜深人散后，奋笔疾书，以电稿拍发。黄远生五官并用之敏捷，才气之纵横，在新闻界传为奇闻。远生交客频繁，生活又不拘小节，招来许多秽言碎语。有人说远生起居无节，挥霍无度。远生听后

却不以为然，说：“君乌知乎此！新闻记者宁有起居之可言，款客诚多费，然客实不啻为余之间接采访员，纵系道听途说，试循其线索而深考之，亦不难得其十之七八，故客来于我为新闻供给者，又何能吝于款待，而使人视为畏途耶？”所以，远生不需要每日疲劳奔波，得到的消息却多属真相，而以“先”“广”“确”著称。这并不是每一个记者都能做得到的。

民国成立后，黄远生发誓不作官，不作议员。在北京，他任律师，并任上海《申报》驻京记者，同时也为其它报刊撰写文章。他的文章通俗浅近，别具一格。他的笔触广泛涉及了民国初年的政局、外交等各方面重大事件。远生虽为清末进士，但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了一定的了解，头脑里溶进了一些民主思想。从日本回国后，远生不止一次接触到官僚政界的腐败，心中甚是失望。有一次，远生因官费一事，去见抚台。抚台并不因他为学生而小看他，反而夸奖他能以自己的能力生活。随后抚台指着在座的各位官员很不客气地说：象你们这帮既无才能，又无志气的人，只会钻营行事，就是菩萨复生，怕也难救了。远生思忖这帮官僚听了这番话，一定会悻悻然拂袖而去，谁知这帮官员不仅不气不恼，反而个个胁肩谄笑如故。这件事使远生很受刺激。还有一次，远生随某公赴安东，事后在他记述的见闻中写道：“安东者，号称吾国土地，而完全日化者也”，“官于此者，大抵被人看作犬彘不若……钻营奔走，乃比内地尤甚。此曹岂特无廉耻，乃并无心肝；岂特无心肝，乃实无皮骨。”远生感叹道：官吏如此，中国人为奴不冤也。他发誓不愿作官，绝非无因，盖是不愿在这腐败场中追逐沉浮，熏黑了自己的良心耶。

辛亥革命之际，远生曾被推为代表，往谒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论说颁布宪法的事情。平日十分显赫的奕劻、那桐，处此危急关头，亦战战兢兢，情状很是可怜，惶恐心情溢于言表。庆亲王说“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那桐局蹐而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事后，远生说：“余非到此等时，尚不知彼等之恶劣，一至于斯也！”官僚的腐败无能，中国政界的黑暗，都强烈地刺激着远生的心，也坚定了远生用手中的笔作武器去揭露时弊，抨击腐败的决心。他力求作一个不靠官、不依派，完全独立的、正直的新闻记者，作一名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尽力呐喊的斗士。

有识之士 出公心评时政 忧患国事 督政府为民生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孙中山以崇高的声望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然而，大约孙中山也受到当时社会上认为袁世凯为一伟才的说法的影响，竟于22日声明：如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自己便即辞职，推袁世凯为总统。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宣布退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第二天，袁世凯急忙通电声明赞成共和。于是，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2日，南

京临时参议院又一次迁就袁世凯，正式议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样，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为了继续欺骗孙中山等革命派，袁世凯又虚情假意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以为羁绊之策。

面对民国建立以来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作为一个有敏感政治头脑的记者，远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相继详细报道，并深刻分析、评论了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会谈的种种情况。远生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欣赏并信任袁世凯的态度，以及孙袁两人相见时的推诚相待，很不以为然。他说：袁世凯乃一大可怀疑之人，对他过于轻信，将来很可能误国误民。他抄录了时人对袁氏的评论，果敢断言：袁世凯权谋百出，专以手段取胜；袁世凯利用手段、势力有余，而爱国及独立之热诚不足；袁世凯思想并未脱离旧轨，不可能断绝与旧势力的联系、造就中华民国的独特的新的政治面貌。对孙中山过于信任袁世凯，轻易宣布不受第二次总统之职，且希望袁世凯任十年总统之举，远生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依靠外国人来约束袁世凯，只能是软弱无力、一厢情愿的预想。并断言过分信任袁世凯，则“政治上暗潮将生莫大之变化者也”。

孙中山把总统之职很大方地送给袁世凯之后，转志于实业。远生认为，孙氏图借外债六十亿兴办铁路二十万里，在中国政治、财政不统一的情况下，是不合时宜的置国家生死

存亡问题于不顾的举动，成功的可能亦属飘渺得很。远生对此进一步阐述指出：我意今尚非高谈建设之时，其原因一是政治不清，国无基础，豪疆大猾，连峙为奸，外交、军事、司法、财政、警察等急须统一；二是民生凋敝，人民苦于无法，横虐之下，农工商民，仰屋坐叹，忧苦不可终日。故必“尽心于地方之治安，人民之生业，而后乃有建设可言。今所谓政府及政客，视此真正之平民政治之基础，渺然不屑置意，而日日高谈建设，官僚派则相语以维持现状”，这样下去，必有亡国之虞。因此，一切事情，首先必从保国入手，只要能“保得中国不亡，则中山之理想，不患无实行之日”。

黄远生不愧为民国初年的有识之士，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不顾个人的生死，敢于直言不讳评论孙中山、袁世凯等人，无所偏倚，据实报道，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位头脑清醒、态度严肃的新闻记者。评论时局，针砭时弊，只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为着眼点，无拘束于任何党派的眼色，显示了他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和无比的胆识。

评责政局 为谋民主共和 不投袁门 缘引杀身横祸

1912年11月，北京出版《少年中国》周刊，它的宗旨是揭露社会黑暗，以求唤醒民众，并对政府尽忠告和监督之责。这又为远生提供了一个评说时局之得失、针砭政党之偏颇的园地。此时，袁世凯已经利用种种手段，完全掌握了全国的最高权力，并且为了稳住孙中山，特授他以“筹画全国铁路全权”，督办全国铁路。远生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尽管无法左右政局的发展，但能凭借记者独到的眼光和手中之笔去评论、监督政府，宣传民主共和的思想，尽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的职责。远生在《少年中国》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国情，并对袁世凯之所作所为进行评论。他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在当时处于十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对于国情，远生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同心对外，

保证国家独立，并谋求解决关系到国家命运的财政与外交方面的重大问题。对于袁世凯，远生则非常直率地亮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既不绝对排之，却也要“以公明之正义”对其加以督责。

远生写了许多评论袁世凯的文章，如：《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利之别》、《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等。批评袁世凯专事笼络个人爪牙，扶植亲己势力，无视于民国大法大典，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种种做法；对于袁世凯“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心中甚是反感。

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多数席位，有人推测国会正式选举时，袁世凯未必能当选总统。远生对此也十分关注，认为竞争总统是国家常有之事，总统为民国公仆，非一姓一人之私产，希望中国能够公开竞争总统。认为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以及一切中华民国国民，有愿参加竞选者，都可以发表竞选声明，进行竞选。然而，袁世凯要的是专制独裁，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力受一点侵犯。他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又调兵遣将镇压了“二次革命”，并且在1913年10月6日亲自导演了一场亘古未有的逼选总统的闹剧：调来数千名军警，团团包围国会，强逼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议员们无法出门，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最后不得已满足了袁的要求。袁世凯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不久，于11月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会中国国民党籍议员资格。1914年1月更是肆无忌惮地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12月还公布《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且得连任，继任候选人由总统提名，为复辟帝制作准备。

袁世凯这种种拙劣、卑鄙的表演全部落入黄远生的眼底，使远生更生反感。他以记者的敏感和责任心，对宋教仁案、中日交涉、大借款等许多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作了详细的报道。秉笔直书，撕尽袁氏的面具，欲使其不可一世、包藏祸心的嘴脸昭然于天下。并以他傍近舞台，感受真实，提请国人注意，这一混世魔王很可能要复辟帝制，且断言了袁氏的最终失败。

当时袁世凯正积极筹划帝制，而黄远生却对他多有抨击，于他不甚有利。袁氏当然不会放过远生，但黄远生在新闻界颇为知名，袁氏也想倚藉他的名望，为自己复辟帝制充当吹鼓手。所以，袁世凯对黄远生的种种抨击，佯示宽容，并极力罗致远生入己之彀。

远生虽然在文章中已经暗示过袁氏的狼子野心，但当帝制之器声猛涨时，他也没有多少准备，而一旦让他吹捧帝制，更是使他措手不及。

一天，总统府内史夏寿田，奉袁世凯之命直接找到黄远生，向他说明袁氏心意，让他做一篇文章，吹捧复辟，赞助帝制。这件事使他十分窘迫。他心里十分不情愿，所以延宕了七、八天。可是袁氏天天派人来信催促，他又不好十分抗拒，不得已，做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论文，表示他对帝制的看法。成文之后，他便带着内史的来信，连同文章送给他的朋

友林志钧先生看，并对林说：“真是不好意思，只得用这些不痛不痒的话来搪塞了。”然而他还是于心意之中觉得过不去，又把文章的最后一段改了，使文章中赞同帝制之意的份量更轻。这篇文章传到袁氏手中后，袁很不满意，便又派人示意远生，要他再做，其要意自然是要远生彻底改变自己的根本宗旨，竖起降旗，明确表示自己对袁氏和帝制的膺服。

然而，黄远生毕竟是一名正直的、有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即使受到威逼，也始终不肯迁就。当然，以他一个记者的力量，自然不可与一国之大总统相

抗衡，所以他便只有远走而避之了。

9月3日一大早，黄远生一反往日晚起的习惯，跑到林志钧家里，对林说：“那些人当真要和我过不去，消息甚确，我决不可留了。”谈了一会儿，他便匆匆离开林家，直往前门上了火车，南下去沪了。

黄远生离京来沪，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误会。有人认为他是奉袁世凯之命，到上海主持《亚细亚日报》的。对此，远生乃致书《甲寅》杂志编者章士钊，表明来沪不是为此。同时还在《时报》上向《亚细亚日报》发表声明，声称“远生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合，故于贵报未曾出版之先，即已在京沪各报声明脱离关系。”公开表示与鼓吹帝制者划清界线，宣布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远生在上海并未逗留许久，很快就东渡日本。此期间，他因深深感慨于自己的遭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忏悔录》一文，他写道：“余在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这是何等的痛心疾首！远生在日本亦未居数日，又发

现好象有人跟踪自己，只好再度遁逃，避之于美国。可是，那里又岂是他安身立命之乐土哉？

笔谏四党 以求国民生计 罹难异邦 凶徒鸿飞冥冥

民国初期的政治势力有三：一是袁世凯所卵翼的北洋军阀官僚派；二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三是梁启超、汤化龙所领导的进步党。国会解散前，国民党在其中占有多数席位，进步党的地位仅次于国民党。袁世凯常常利用进步党以排斥国民党，以致二党经常交哄于国会，两败俱伤，因使政党政治无从实现，袁本人则乘机扩大了势力。

黄远生作为一名记者，其正直之处，不仅仅表现在他对袁氏的无情揭露上，而且还在于他秉持着一种公正之心，评判各家党派的得失，无所偏倚。民国初年这三大政治力量乱哄哄的情形，自然也在他的笔触所及之内。

远生在清末曾同人一起创办宪友会，此会在民国成立之后隶于共和党，所以远生平日主张与共和党较为接近，但因他志趣于新闻，故党见不深，无偏好于任一党派。也正由于这一点，他对这三大势力对立情状颇为不满。他曾在《论衡》杂志撰文指出：“时贤之口头禅，动称以国家为前提，特其言行不一致耳！使其一致者，则吾请劝袁总统勿专从操纵政党上着想，国民党勿专从对待袁氏个人着想，进步党亦勿专从对待国民党着想，大众齐心协力，专从中华民国之前途着想，各自殉其所信以尽瘁焉，各自输其诚款以相容纳焉，则国步庶有几希之幸耳！”对于民初政治舞台上国民党、共和党

和民主党共存的局面，远生还提出了“三党合并论”，指出：“自有此三党，而雄才大略之袁君，得以操纵而左右之，而政治监督之基础日坏。自有此三党，入主为奴，党同伐异，而中国几无公是非，无真毁誉。一班无耻之官僚，反得利用为护符，而立于不败之地。……自有此三党，全国稍有才力聪明之士，各据旗帜，奋矢相攻，彼此立于不共戴天之地，而全国乃骚然内讧，以坐待他人之宰割。”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袁世凯，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统统为其笔锋扫及，痛快淋漓而又尖锐激烈。但如此四面树敌，自

然为其日后被害种下祸根。

远生还提出“不党主义”的主张，他说：“记者虽无似，亦知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一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党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论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之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主张要主持公道，必须由“超然不党之人”来主持事务。

远生对于党派没有好感，主要是因为他见各党为扩张势力，多不守政党道德，专以利禄诱人入党。他说“今但闻某省以都督系某党中人，非其党者不得任官。且有甄别属员，不以贤否，而以党别者。某省下札，至云查某员非本党人员，着即撤差。……试问此等党既发达之后，于党有何益处？于国家亦有何益处？”远生对这种情形十分愤慨，曾登报声明：“自今而后，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

尽管黄远生对各个政党的批评是出于为国家着想，以尽新闻记者的职分，可他评人论政，无所讳忌，秉笔直书，而对民初党争，尤多砭戒，虽因之名声益盛，却亦因之使忌恨者益多。又因其对各派政党进行十分激烈的抨击，这样更是

引起各个党派对他的不满，并因此怀疑他是袁世凯的御用文人。而袁世凯也十分阴险，他利用远生对各派政党进行抨击的文章大造舆论，这样更使各派对远生有切骨之恨。

在民国初年的各个党派中，与袁世凯最具深仇的便是国民党。袁氏窃夺革命成果，刺杀国民党领袖之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早已引起了国民党对其的切骨仇恨。袁世凯又时时利用进步党以排斥国民党，这样国民党对袁派之人和进步党人同具仇恨。而黄远生不仅有袒袁的嫌疑，而且被视为“进步党政客”。于是，他赴美之举，便引起了在美华侨革命党人的密切注意。

1915年冬天，远生抵达美国后，在旧金山的华侨革命党员，多向林子超先生探问黄的历史。林答道：黄远生乃是进步党的第一流策士，解散国民党及削夺国民党之各都督兵权，皆其主谋，深得袁世凯的倚重。当时国内时局屡变，形势不稳，而旧金山党人远离祖国，不能尽知个中情形，很可能听信林子超之一面之言，视黄远生为本党之死敌，而欲置之死命了。

12月，黄远生自美国东部到达旧金山。在这里的康梁派宪政党便于12月27日在都坂街上海楼菜馆，设宴款待他，正饮酒谈话之间，忽有两名刺客，跨阶而上，闯入座间，拔枪朝远生射击。黄远生应声仆地，瞬息便气绝身亡。两位刺客却鸿飞冥冥，不知所之，亦不知其为何方所指使也。

远生之死，一直为一大谜，迄今尚无明证以破解之。关于他的死，当时有两种记载：一是说袁世凯因其不赞成帝制派人杀的；另一说是旧金山华侨误认远生为帝制派而杀的。而这两种说法都和他作新闻记者写时评文章有关。据各种情况分析，在美之华侨革命党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殆袁世凯之威逼，使黄远生遁避海外，而又因革命党人对其误解至深，亲

手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此亦可见当时革命党人行事，亦多草率之处。

远生在日本中央大学的同学欧阳成悲愤地写道：“阅报，知黄远庸游美，受刺于旧金山之党人。党人以为效忠政府也，不知远庸此行固不表同情于帝政者。郁郁不得志，北京既不能托足，去而之上海，党人复危词以恫吓之，乃愤而遁扶桑，游在美，甫抵旧金山，而惨祸遽膺，伤哉。”“远庸为一狂

放少年，风流自喜，遂以文字贾祸，伤哉。乱世人命，乃蚂蚁之不若也。”

象黄远生这样的新闻记者，“报界奇才”，只因敢于直言陈述已见，最后落得个客死他乡，横尸海外。而凶手却潜逸倖深，不露踪迹，不知何方主使，岂不是太惨了吗？远生赴美前曾慨叹“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被其不幸而言中！呜呼哀哉！英年不寿之民国成立后第一位因文字而罹祸的新闻记者！而这桩谋杀案留给人们的又岂能仅仅是不平而已！

黑道与白道的漩涡

——陈其美被刺记

风声凄厉，雷鸣隆隆，黑云压城，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革命者在呼唤风雨，荡涤这几千年的污秽，但狂风暴雨却迟不下，愤怒，忧郁使他们铤而走险。他们要依靠游侠义士，杀开一条血路，去迎接洗礼。暗杀一时成为革命的重要手段。恐怖曾经吓倒一些无能的统治者，但并不能铲除旧社会的统治基础。无能的满清贵族垮台了，袁世凯继承了旧势力的衣钵，革命的成果被军阀吞噬了。革命者不得不重操旧业，继续不懈地斗争。革命大潮奔流不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江湖义士、绿林好汉，忽而冲在前台，忽而又改弦更张，风云变幻，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在一阵阵腥风血雨中，有一位风云人物，他就是革命党的健将陈其美。陈其美策划并指使蒋介石刺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主持侦破了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案，精心部署刺杀了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然而最后自己却因遭叛徒暗杀而身亡。他一生短暂，却声名显赫，富有传奇色彩。蔡元培认为他可与历代侠士齐名列传，称得上是民国第一豪侠。

上海滩头 暗结帮会倒清廷
议事厅里 威压群雄称沪督

陈其美字英士，家乡是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人文荟萃的浙江湖州。1878年1月17日，那内忧外患丛生，国势日趋凌夷的岁月，陈其美诞生在一个商人家庭。湖州是一个商业繁盛的都市，上海开埠以后，湖州帮商人在此颇有势力。因为跑码头的人多，湖州人中帮会势力也很活跃。陈其美家和上海商界的联系就极为密切。陈其美13岁失去了父亲，为了谋生，不得不停止了学业。在一个亲戚的引荐下，他离家到石门做了当铺学徒，这便一学就是12年。但陈其美是一个奋发上进的青年，关心时事而且交游广阔，养成了豪放豁达，办事果断，敢做敢为的性格。

机遇和努力是共存的。陈其美不愿做井底之蛙。1903年，他毅然脱离了使自己不能施展宏图的环境，来到了上海这个藏龙卧虎的通商大埠。起初他在湖州同乡开的同康泰丝栈里做一名小小的助理会计。陈其美的表叔杨信之是一个商界要人，陈其美与上海商界逐渐建立了联系。

但是，严重的民族危机，使陈其美无心从事商业。1906年，他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路，开始入东斌警监学校学习，不久又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这两所学校是孙中山请日本寺尾亨博士出面创办的，专门用以训练革命的干部。陈其美到了日本，置身于革命思潮蓬勃发展的留学界，犹如蛟龙之入大海。他很快就加入了同盟会，并在革命党人中间，渐渐崭露头角。

1908年春天，陈其美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候，同盟会、光复会在上海、江浙一带的活动受到清廷的摧残，一时陷入消沉。陈其美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决心要排除一切困难，重整旗鼓。陈其美积极联络商界要人，很快在上海打开了局面。但上海同其他地方不同，它不是军事重镇，没有多少军队可以从事策反活动，然而帮会势力却很大。陈其美决心要掌握帮会势力，争取他们参加革命。帮会中人，许多是无业游民，绿林盗匪，要驾驭得法，没有一点手段是不行的。为了掌握帮会，陈其美加入了青帮，很快获得了大字辈的身份。通过会党势力，陈其美慢慢控制了上海地面上的茶楼酒馆，妓

院剧场，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掩护。陈其美仗义泼辣的作风，使得他很快就得到会党中人的拥护。当时，浙江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被害，她手下一位强悍的会党领袖王金发逃入深山。陈其美得信后，派人四处寻找，千方百计把王金发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营救出来。王金发秘密到了上海，陈其美既加以保护，又予以重用，使得王对陈十分佩服，甘心效力。上海另一会党头目应桂馨，在家乡宁波办了一所学校，叫应氏崇义学堂。但不久，应桂馨与当地士绅发生冲突，校产被封。陈其美知道后，亲自到杭州、宁波向地方当局疏通，终于使学校重新开学。应氏父子感激之余，把自己在上海的家提供给陈其美作为活动的据点。后来，陈其美结识的一个与青帮、红帮都有关系的刘福彪，也表示愿效犬马之劳。陈其美逐渐成了革命党人中能够驾驭上海会党的核心人物。

1908年冬，陈其美在上海与革命党人筹备起义，内奸刘师培、汪公权向端方告密。端方马上照会租界当局，派出警吏查抄了设在德福里的机关，革命党人张恭被捕，解赴南京。陈其美一方面冒险前往南京组织营救，一方面令王金发搜杀

刘师培、汪公权。王金发将汪击毙以后，又挟枪找到刘师培。刘吓得跪地求饶，答应设法保障张恭安全，才拣了一条性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地革命风起云涌。陈其美在上海也夜以继日地从事起义的发动工作。他与杭州、上海、南京各地党人联络，积极配合，准备响应武昌起义。当时武汉革命军受到清政府疯狂镇压，战斗失利，杭州起义也受阻，南京军界暴动又失败。于是，陈其美决定迅速在上海起兵，突破清廷在江浙一带的统治。他的主张得到了上海商界领袖人物，如李平书、沈缙云、周舜卿、虞洽卿等人的积极支持，并且提供了大笔经费。商界掌握的自卫性的准军事武装——商团，在陈其美的积极活动下，决心参加起义。与此同时，同盟会员张承燾和刘福彪等帮会分子也组织了敢死队。

11月3日，陈其美亲自带领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发动上海起义。但在守局清军的抵抗下，敢死队的攻击受阻。于是，陈其美只身冒险闯局，劝谕守军缴械投降。但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不听劝谕，将陈其美扣留，企图加以杀害。经过一个同情革命的士兵张杏林对张士珩陈述利害，张士珩才心有顾忌，在局势未定之际，将陈暂时拘禁起来。商团、敢死队和光复会的李燮和等听说陈其美被扣，敢死队进攻失利，决心死中求生，同心协力，做破釜沉舟的努力。第二天凌晨，各部奋勇反攻，迅速攻占了制造局，陈其美获救。

上海起义成功之后，参加起义的各界要人于11月6日召集会议，商量推举都督。当时，派系林立，主要有陈其美的同盟会派，上海商团派，光复会的李燮和派。陈其美带了八十名敢死队队员来参加会议，刘福彪随身护卫。在会上，商团推李英石出任都督，同盟会推陈其美出任都督。同盟会考

虑到武昌首义，同盟会没有掌握领导权，所以，一定要争取把江浙一带掌握在手中，沪军都督一职在所必争。会上争执激烈，双方剑拔弩张。这时刘福彪突然拔出了一颗手榴弹，高擎在手，叫道：“攻打制造局，陈先生吃了这么大的苦头，都督非选陈先生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最后商团方面被迫作出让步，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

陈其美担当都督后，积极组织和推进浙江起义，组织江浙联军攻克了南京，为奠定东南半壁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同盟会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奠定了基础。从此，陈其美就成了同盟会的柱石之一。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各方面的矛盾非常尖锐，社会上拥护袁世凯的势力很大，同盟会在各方夹击下，势单力薄。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一职，也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其他派系借口上海不是军事重镇，要求取消沪军都督一职，由江苏都督统一管辖。当时，在革命阵营内部，同盟会和光复会历来也是积怨甚深。李燮和被排挤出上海，更使光复会深为不满。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不甘于自己势单力薄，极力设法组建军队，企图争取浙江都督一职，发展光复会的势力，与同盟会争胜。孙中山本人虽然主张两派和解，但两派在各地的火并依然越演越烈。陈其美为维护同盟会的利益，力图压制光复会的势力。这时，陶成章正在上海广慈医院养病，陈其美遂指使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蒋介石设法买通一个光复会员王竹卿。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蒋介石和王竹卿撬门进入医院，被看门人发现，谎称有要事来见陶先生，旋即登楼入室。正在睡梦中的陶成章闻声醒来察看，王竹卿即出手枪击中陶成章头部，陶当即毙命。

陈其美运用铁腕，不择手段进行派别斗争，遭到反对派的强烈攻击。陈其美不得不以退为进，屡次要求辞职。但沪军都督一职在当时形势下，对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关系重大，孙中山一直不准陈解职。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袁世凯给陈安排了一个工商总长的职务，陈没有推掉，就以沪军欠商界款项无法还清，都督职务一时无法脱身为借口，迟迟不交卸沪督职务。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黄兴以南京留守职务，维持南京军队。但黄兴有兵无饷，袁世凯又拒绝给他军饷，反对派又攻击他割据东南。黄兴度日如年，一方面急匆匆遣散军队，一方面要求辞职。陈其美闻讯后，大为吃惊。南京留守，对同盟会在东南的政治、军事势力关系十分重大，倘黄兴辞去留守一职，同盟会在南方的势力，就失去了中心和军事锁钥地区。于是，他亲自赴南京，劝黄兴不要辞职。同时，他布置柳承烈前往苏州，联络蒯佐唐、蒯际同兄弟，组织洗程会，准备先以驻苏州的先锋营发难，推翻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江苏都督一职抓在同盟会手中。但程德全老奸巨滑，手腕灵敏，经验丰富，程先发制人，捕杀蒯氏兄弟，解散先锋营，而对外不事声张。这时，黄兴南京留守一职也无法维持了。6月15日，程德全即到南京，接受了南京留守交卸后留下的军队，将都督府改驻南京，掌握了东南重镇。陈其美势单力薄，不久，也被迫交卸了沪军都督一职。

袁世凯深知陈其美厉害，深怕陈留在国内，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一方面时时侦探陈及其部下的动向，一方面敦促陈出洋考察工商。而陈其美一直以料理沪军欠款为借口，延宕不走。这样，袁世凯和程德全对陈其美，一直如芒刺在背。陈其美虽然不担任沪军都督了，但在上海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息。陈也时时注意着袁世凯的动向。

1913年3月，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来到上海，准备北上，组织国民党内阁，自己出任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沪宁车站，准备登车北上，临进站时，被暴徒开枪击中，不治逝世。陈其美在宋遗体旁愤愤顿足呼喊：“此事真不甘心！”陈立即布置了侦破工作。陈其美很快就发现凶犯原来就是自己以前手下的帮会领袖应桂馨，在袁世凯指使下策划了暗杀宋教仁的暴行。原来，这个帮会分子应桂馨有奶就是娘，战争结束之后，无所事事，就被袁世凯用金钱收买了过去。陈其美当即派手下人向租界巡捕房揭发，要求逮捕应桂馨。租界巡

捕房逮捕了应桂馨和凶手武士英，在应的住处起获大批证据，证实了国务总理赵秉钧指派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使应桂馨收买暴徒武士英杀宋密谋。宋案真相大白，遂使这桩关系重大的政治谋杀案，得以迅速侦破，为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提供了铁证。

称霸上海 郑汝成淫威猖獗 运筹帷幄 陈其美歼除顽凶

宋案的出现，犹如晴天一声霹雳，给许多毫无思想准备的国民党人以极大的震动。当时，孙中山在访问日本后回到上海，对于袁世凯政府公然使用暗杀手段对付国民党的合法运动，非常震惊。孙敏锐地洞察到袁世凯全面扼杀革命的阴谋。孙中山说，只有用武力才能推翻袁世凯的罪恶统治。随即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迅速起兵讨袁。陈其美和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不大赞成孙中山的主张。陈、黄等人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没有进行过充分的战争准备，一批革命党人虽在南方掌握着军队，但兵力尚不足与袁抗衡。他们希望通过合法途径来罢免袁世凯。同时，他们也看到，国家在辛亥革命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元气尚未恢复，迫切需要和平。一次暗杀案，也不能使广大的人民打消对袁世凯的幻想。所以，他们迟疑不决，久久下不了起兵的决心。

但是，袁世凯毫不心慈手软。他乘革命党人犹豫之机，决心抢占先机。袁世凯得到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积极支持后，就把湖北作为北洋军的前进基地，派遣北洋第六师、第二师进入湖北，随后又命令北洋第六师进驻九江，压迫江西的革命党人。同时，袁世凯又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施加压力，迫使程同意北军南下。于是，袁世凯饬命海军中将郑汝成率领北洋精锐臧致平团，自海道南下，进驻上海制造局。

郑汝成是袁世凯的心腹干将，精明强干，治军有方。他一到上海，立即把上海当地的军队调出制造局，统统分割监视起来。当时，上海本地军队有两个团，都是陈其美的旧部。陈其美本以为动员这两个团足以对付郑汝成。由于革命党人犹豫不决坐失时机，这两个团又被北军监视了起来。当革命党人决心起兵反抗袁世凯的武力压迫的时候，这两个团因为态势恶劣而动摇起来。两个团长竟躲藏起来，不愿指挥部队起兵讨袁。陈其美只好一面通过上海商团领袖李平书出面，劝说郑汝成和平让出制造局，对制造局进行封存，待大局明朗后重归国家。但郑汝成态度非常强硬：“我们是奉袁大总统的命令来保卫制造局，如果有人前来攻打，我们只能遵令抵抗。”

虽然，郑汝成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但这次陈其美碰上了一个强硬的对手，当南京援兵到达上海后，陈其美即于7月23日凌晨指挥各部围攻制造局。然而，这些部队军事训练和

装备很差，指挥系统也相当紊乱。郑汝成指挥的北洋军依仗有利地形沉着应战，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也比讨袁军精良。而且，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舰队，用强大炮火支援郑汝成。讨袁军伤亡惨重被迫纷纷后撤。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讨袁军越战越弱，士兵伤亡散走大半，而北洋援军纷纷南下，陈其美被迫退守闸北、吴淞。不久，陈其美在闸北的司令部，又被租界英军侵入，包围缴械。陈的旧部刘福彪也在吴淞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投降。吴淞在海军围攻下，被迫放弃了，陈其美只好转入地下。

郑汝成仗战胜余威，称霸上海，被袁世凯委以镇守使的重任，统率两师重兵，屯扎在松江、龙华、制造局至吴淞一线。郑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地镇压在上海、江浙一带活动的革命党人，甚至深入租界地区，搜杀潜伏活动的革命骨干。

陈其美在上海坚持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奉孙中山之召，前往日本，襄助孙中山整理革命队伍，以便东山再起。孙中山决心组织中华革命党，实行领袖独裁制，以便集中力量，统一意志，战胜敌人。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由孙中山出任总理，陈其美出任总务部长，负责中华革命党的具体事务。

上海自辛亥以后，就成了各种政治派系竞逐的一个中心。陈其美和中华革命党把大量精力放在上海，积极组织力量，长期潜伏，伺机起义。袁世凯当然也不放松对上海的控制，在上海撤放了众多的密探，来对付党人。郑汝成坐镇上海，施展出各种手段，图谋剿除革命党人。1914年9月，在上海租界，中华革命党的重要干部范鸿仙被暗杀，真相一直不明。与租界内的暗杀活动配合，郑汝成出动军队，在中国地界内捕杀了范鸿仙的部下二百多人，制造了血腥的恐怖。此时，陈

其美往来于东京和上海之间，进行秘密革命活动，袁世凯把陈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

这时有一个姓梁的人，通过各种关系到处找陈其美。有一次，梁在日本通过一个外国人找到了陈其美的踪迹，梁就托这个外国人向陈其美表示愿意提供一笔活动经费。陈其美觉得内中十分蹊跷，没有理睬。这个姓梁的人，又通过一个旅日华侨，再次向陈其美转达这个信息。陈又未予理睬。有一次，陈其美秘密回到上海，也被梁侦察到了，梁转了十七、八道手，再次向陈其美表示了提供经费的意思，但陈其美看穿了其中的诡计，没有上当。袁世凯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袁托人告诉陈其美，愿意出五十万元，资助陈到各国考察工商，不要过问国事。陈其美哪能答应？但陈其美的活动经费非常拮据，筹款非常困难。当陈为经费问题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想起，为什么不冒冒风险，从袁世凯那里收下这笔钱呢？陈就向对手表示愿意接收这笔五十万元的巨款。袁世凯老奸巨滑，只答应分期付款，不同意一次交清。陈其美一算，分期付款，一次所能收到的钱太少，没有冒险的必要。这笔买卖也就没有做成。

天下的事，总是一波三折。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孙中山虽然一再组织起义，均没有成功。然而，料想不到，袁世凯当了总统以后，并不满足，非要过过皇帝瘾不可。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不仅遭到革命党人反对，进步党人反对，袁自己手下的那些功臣宿将也不愿意低头称臣。全国一下子沸腾起来，于是，孙中山积极部署革命党人起兵反袁。

1915年10月，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准备离开日本东京，前往上海为大举起兵作准备。启程前，在与朋友郊游时

划船落水后受伤，陈谎称伤重住院，乘机化名高野英一秘密回到上海。不久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党淞沪司令官，准备起义。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西路）渔阳里5号设立总机关部，召唤在其他地方活动的蒋介石、杨庶堪、丁仁杰、余祥辉等人回到上海，参加机关部工作。

起义的组织联络工作，日日夜夜紧张地进行着。陈其美根据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和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要获得起义成功，首先要在黄浦江上袭取停泊的海军军舰，然后使用海军炮火同地面兵力配合，协同进攻制造局，

这样才能获得首义的成功。然后，再夺取吴淞要塞，控制整个上海地区，进而发动浙江起义，攻取南京，奠定起义军在东南半壁的基础。

中华革命党要在上海发动起义，又碰上了原来的对手郑汝成。郑精明干练，足智多谋，对袁世凯又死心塌地，很不容易对付。陈其美和革命党人商量，认为要想起义取得成功，首先就要除掉郑汝成这只拦路虎，郑除掉了，在上海的北洋将领杨善德庸碌无能，就好对付了。于是，陈其美决心组织刺杀郑汝成。

郑汝成与革命党人交手已经三年多了，深知上海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而陈其美手下的人，在上海茶楼酒肆、妓院旅社都布置有耳目，对袁世凯方面的活动侦查得了如指掌。所以，郑平时非常警惕，深居简出，戒备森严。陈其美要想刺杀郑汝成，谈何容易！然而机会终于等来了。这就是大正天皇加冕典礼日。原来，日本明治天皇于1912年逝世之后，由大正天皇继位，但还没有举行登极典礼，加冕仪式正好选择在11月10日举行。日皇加冕是件大事，日本驻沪领事馆是一定要召开庆祝会的。当时中日关系非同寻常，袁世凯图

谋称帝正指望日本予以全力支持。郑汝成作为在沪的最高军事首长，又系袁氏心腹干将，当然不能不给日本人捧扬，到时候肯定会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表示祝贺。这正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陈其美把这一切计算好了，就将手下的杨虎、孙祥夫叫来商量，制订了刺杀郑汝成的具体方案。他们预计，郑汝成从设在龙华的司令部到外白渡桥北侧的日本领事馆，既可能乘汽车来，也可能从黄浦江上乘兵轮过来。而汽车线路，可以有多种走法，拦截很不容易。陈其美决定募集十多位敢死的壮士，设五卡分兵把守，非杀死郑汝成不可。他把第一卡设在十六铺，第二卡设在跑马厅，第三卡设在黄浦滩，第四卡设在海军码头，第五卡设在外白渡桥。这五卡都在租界之内，没有中国军警警卫。陈其美仔细掂量了这五卡的轻重，深感这第五卡最为重要。因为这里离日本领事馆很近，是郑汝成从陆路来的必经之地，而汽车过桥转弯必然要减速，是狙击的良好时机。于是，陈把外白渡桥一卡作为重点，决定把技术精良、忠肝义胆的壮士部署在这里。

孙祥夫与陈其美商定了刺杀计划之后，向陈其美推荐了吉林壮士王晓峰、山东壮士王明山、奉天壮士尹神武。王晓峰、王明山两人是好朋友，枪法熟练，勇敢剽悍。平时这两人不大喜欢讲话，而做事敢做敢为，专重信义，而且对袁世凯图谋帝制，早就义愤填膺，誓愿以死讨袁。陈其美深入了解了这两位壮士的情况，估量能够挑起刺杀郑汝成的重担，就亲自和他们谈话，布置任务。陈其美怀着沉重、严峻的心情，对王晓峰、王明山说：“讨伐袁世凯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袁世凯如果不死的话，一定要首先在上海起义。如果想在上海起义，就一定要先杀掉郑汝成。所以，刺杀郑汝成，就是

打倒袁世凯、也就是保存民同。你们二位的意见怎样呢？”王晓峰、王明山听完这一席话，严肃地回答说：“您说得很对，我们一定誓死执行您的命令。”陈其美随后仔细地向他们交代具体任务，说：“我听说郑汝成明天一定会去日本领事馆祝贺日本天皇的登极典礼。我已经在各个重要处所布置了敢死的壮士，但还是担心会出差错。外白渡桥是郑汝成最后一定要经过的地方，我希望你们二个人担任最后的狙击任务，那么郑汝成一定会被你们杀死的。不过，这一带租界当局警备森严，郑汝成虽然死了，你们二人也很难逃走，一定会被抓走处死的。但是，民国会因此而保存下来。二位能不能不

顾自己的生死去执行这个重大的任务呢？”王晓峰、王明山慷慨悲壮地回答说：“好啊！我们有堂堂七尺身躯，一定要奉献给自己的国家。”

10日那天，天气晴朗。革命党人侦悉郑汝成将在下午1点钟到达日本领事馆。孙祥夫遂率领王晓峰、王明山、尹神武于上午11点半提前前往外白渡桥设伏。不久，一辆黑色轿车快速驶来，里面坐着身穿高级大礼服的郑汝成，镇守使署卫队随车护卫。狙击手发现后，立即准备出击。在这瞬间，孙祥夫突然觉得情况可疑，立即命令部下停止行动，以免暴露目标。原来，郑汝成作为上海镇守使，系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庆贺日皇加冕大典，是极为庄严郑重的外交活动，郑汝成焉有不穿八面威风的中将制服，佩戴勋章，而穿文官服装的道理呢？孙祥夫的决断非常精明正确，从而避免了一次导致行动失败的冲击。这辆轿车过后约20分钟，一辆轿车又疾驶而来，车的前部坐着三名警卫，郑汝成坐在右边，着一身金碧辉煌的军礼服，气度轩昂自得。郑的总务处长舒锦绣坐在左边。孙祥夫一眼验明了郑汝成的正身，等汽车放慢速度，准

备上桥的当口，立即发出暗号，命令行动。王明山迅即向汽车投掷炸弹，可惜力度过猛，投到了车后，轰然一声，炸弹爆烈，行人失色，纷纷逃避。在一片混乱中，郑汝成的司机猛然加速，企图冲过桥去。王明山眼看郑汝成就要逃走，急忙冲向前去，再掷第二弹，正中车前，把车盖炸裂，玻璃纷飞，汽车瘫了下来。王晓峰迅速登上汽车，左手攀车栏，右手持驳壳枪向郑汝成头部猛射。郑汝成、舒锦绣当场被击毙。王明山、王晓峰看到任务已经完成，自己也陷入租界巡捕的包围之中，意气泰然，王晓峰立在桥头向过路群众演说一分钟，随后束手就擒。不久，王晓峰、王明山被租界当局引渡给中国官方处死了。

郑汝成被杀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如丧股肱，竟然一天滴水未进。袁亲自为郑汝成书写挽联：“出师竟丧岑彭，衔悲千古；愿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

诡计百端 袁世凯图害英杰
壮志未酬 陈英士罹难殒身

一场暗杀，不过是暴风雨前的一声雷鸣。郑汝成被击毙之后，袁世凯任命驻上海的北洋第四师师长杨善德出任松沪护军使，接替郑汝成负责上海军事。

陈其美除掉郑汝成这个心腹大患之后，认为杨善德比较平庸，于是，即刻部署起义。暗杀案发生之后，袁世凯也加强了上海的戒备。一方面把驻在上海表现动摇的军队调走，一方面派萨镇冰到上海安抚反袁情绪高涨的海军官兵。以检阅海军为名，向海军官兵发放厚饷，以笼络海军官兵。并命

令不大可靠的肇和舰于12月6日起程调往广州。

这样，陈其美海陆并起的起义计划将被打乱。有人主张提前发动起义。陈其美权衡再三，决定提前于12月5日夜，即肇和舰起锚前夕，发动起义。按计划，以两艘小艇分载革命党人，从陆上前往袭击肇和、应瑞兵舰，策动兵舰官兵起义，陆路方面，与海军配合，分路进攻制造局、南市、县政府、警察署、中国银行等重要目标。这天晚上，各路革命党人按计划分头行动，肇和兵舰在小艇策应下，当即宣布起义，调转炮口，向制造局发炮攻击。但

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周，策应应瑞兵舰的小艇被英租界巡警扣留。应瑞兵舰官兵事先又受到袁世凯方面的收买，舰上党人势孤力单，又没有陆路党人策应，无法举行起义。待到天色微明之后，肇和兵舰遭到海军其他兵舰的围攻。而陆上各队没有海军策应，又受到优势敌军的攻击，纷纷败散。肇和起义很快就失败了。

肇和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打响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枪，促进了护国战争的爆发。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猖狂复辟帝制的袁世凯。

护国运动的风潮越来越大，袁世凯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护国官兵要赶袁下台。但袁世凯视权若命，十分恋栈，拼命抵抗，不肯放弃实权。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想在南北之间调停，从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在这种局势下，上海的军事首脑如第十师师长卢永祥等，也脚踏两只船，私下里和进步党人孙洪伊以及上海商界的代表商量独立的事。局势变得越来越混沌起来，各种势力都要利用袁世凯地位动摇的机会，从中捞上一把。陈其美所策动的海陆军，本来就常常为金钱所左右，局势一混沌，反而观望起来。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袁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也

在活动让袁退居幕后，以便将来重新出山。象龙济光这个盘踞广东的袁世凯的爪牙也在这个时候宣布独立，一些进步党人，一些旧官僚也纷纷出来反袁，但依然盘踞着各地，执掌政权，差不多同辛亥革命一样，把政权抢了过去。这样下去，岂不要生出第二个、第三个袁世凯来？因此，孙中山一心一意要靠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建立起中华革命党统治的民国。斯时，日本方面看到袁世凯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也就不再支持袁世凯，而想利用南方的反袁派来推倒袁世凯，扩张日本在华势力。由于日本政府对华方针起了变化，孙中山得以通过民间渠道，从日本方面借到了一百万元日币，于是敦促陈其美赶紧发动起义。

一方面是孙中山急于起义，一方面运动的海陆军却在犹豫观望，陈其美只得不断用钱收买海陆军军官，指望他们拿了钱以后起义，有一次已经约好了起义日期，但等了一夜，一点动静都没有。又有一次同安舰拿了钱准备起义，但到约定时日，舰长逃走，官兵发生骚乱，主持起义的宋振束手无策，觉得对不起同志，发愤投水死了。

这时候，陈其美办事极不顺手，经济也越来越困难，各方面的事情又十分繁忙，日夜难得休息，心情既不好，身体也越来越坏，形容枯槁，精神委顿。陈其美素来胆大，经常独自出去活动，这时他急于筹措经费，发动起义，更把生死置之度外，因而对袁世凯方面派的刺客的防范便放松了。

袁世凯一直不断地派人跟踪陈其美，前后共派了六七批人。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接到北京一个朋友的来信，说袁世凯忌恨陈其美比忌恨孙中山、黄兴还要厉害。嘱托陈其采赶紧转告陈其美，行动务必十分秘密谨慎。陈其采马上转告了陈其美，陈其美却十分坦然。他对弟弟说：“好极了。我告

诉你一件事体，今天上午有一个同乡兼带亲戚关系的某君来看我，负有袁氏重大的使命。他说，袁氏曾汇洋七十万元在交通银行给我出洋游历。此款随时可取。我说现在我们党里很穷，供给党里用很好。那人说：‘这笔钱是给你出洋用的，不作别用。如果你不要，便将这笔钱对付你。总之，这笔钱是为你而用的。’我听了这话，很气愤地对他说：‘我干我的事，他听他的便。’我说完，也不送他，扭头就走。”当时，陈其美看到革命事业面临

重重困难，护国运动中各派蜂起，而最终又将象辛亥革命那样归于妥协，心里十分悲愤，他不惜冒一切风险也要搞到发动起义的一笔经费。这就给袁世凯收买的凶徒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二次革命中，陈其美虽然不愿意再招募游民组织军队，但他仍然不能不用会党来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张秀全、韩恢、胡侠魂就是一批长期参加革命活动的会党分子。韩恢二次革命时想在上海活动，但陈其美不同意，之后就同何海鸣一起跑到苏北去活动。后来看到黄兴兵败出走，南京十分混乱，韩就跑到南京去，鼓励江苏第一师、第八师士兵恢复独立，与冯国璋、张勋在南京打了半个月硬仗。这时候，韩恢等人陈其美虽然一起革命，但也经常有矛盾。张宗昌了解这个内情，就拉拢韩恢的一个部下叫程子安的人，叫程暗杀陈其美。还有一个叫朱光明的人，拉拢许国霖和程子安一起进行谋杀陈其美的活动。

许国霖、程子安了解到陈其美眼下经费紧缺，就设计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来引诱陈其美上钩。许、程找到一个叫王介凡的中华革命党的人，又通过王介凡找到陈其美手下一个亲信干部李海秋，让李去同陈其美说，鸿丰煤矿公司有一块矿地，要向日商中日实业公司抵押借一笔款子，日商

要求有人担保，鸿丰公司希望陈其美作保，借到款子后，以十分之四（二十万元）帮助陈作革命经费。陈其美虽然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太妥当，但当时经费紧缺，正苦于没有办法，既然有些机会，就想冒险试试，便答应可以介绍。李海秋就同陈其美约定，于5月18日下午带鸿丰煤矿公司的办事人及合同底稿来请陈其美签字。

5月16日，陈果夫由渔阳里陈其美住处到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陈其美的办事处去找陈，在路口看到分布着十来个人，对往来人员很注意。有一个人急急忙忙询问另一个人说：“是不是？”那个人回答说，“是戴眼镜的。”陈其美是个近视眼。陈果夫当时年纪还轻，看到那么多人注意他，心里觉得很可疑，又跑到新民里11号蒋介石的住所，才找到了陈其美。当时陈其美胃病很厉害，大家都在说治病的事，陈其美叹口气说：“我的病治不好了。”接着就和其他人谈别的正事去了。陈果夫也就顾不上把这件可疑的事告诉陈其美。

5月18日下午，陈其美从渔阳里到萨坡赛路14号去按约会客。他在路上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夫竟主动问他，是不是到萨坡赛路？好象对他很熟，他心里有点犯疑，到了办事处后，就对人说：“今日好生奇怪，黄包车夫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不过，他也没有十分在意。

这个萨坡赛路14号，是在法租界内，由一个支持孙中山、陈其美的日本人叫山田纯三郎出面承租。这是一幢三层楼，山田就住在二楼，底楼是客厅和饭厅，三楼就成了革命党在上海的一个机关。因为有租界和日本人的掩护，所以比较安全。陈其美一到就急急忙忙和等着他的刘基炎商量烟台起义的事。刘基炎要五千元经费，陈其美就要吴忠信去楼上问分管财务的廖仲恺。当时，廖仲恺、胡汉民正在和山田纯三郎下

棋。廖把手一摊，对吴忠信说，没有钱，手边只有五百元了。陈其美只好请廖仲恺倾囊而出，把五百元钱都给了刘基炎，其余的以后再设法补给刘。陈其美忙里忙外，一直没有闲着。

袁世凯收买的凶手们，秘密地张开了罪恶之网，里里外外进行着周密的布置。程子安招集了一帮凶手，王殿章、王润甫、王子连、潘甫庭等拿了手

枪、石灰包分布在萨坡赛道 14 号周围的马路上，随时准备袭击。李海秋是这里的熟人，负责带路，与许国霖、程子安、王介凡及一个日本人分乘马车前去与陈其美见面。杠福生租借了汽车、马车在门外等候，以便行刺后迅速逃跑。李海秋既是这里的常客，又按约定前来，门卫没有戒备。李海秋把许国霖带进来之后，就去请陈其美。陈其美随即下楼在客厅与客人——相见，刚刚坐定，准备谈正事的时候，李海秋突然推说合同底稿忘了带来，必须亲自去取。说完就匆匆忙忙离席走了。李海秋刚刚出门，两个凶手就冲了进来，拔出手枪齐向陈其美头部射击。陈其美连中几枪顿时死亡。一时枪声四起，王介凡也被乱枪打死，潘甫庭被击成重伤，也不知是何人所打。刺客见陈其美已死，一面打枪，一面向外逃走，14 号里的人，躲过乱枪之后，一齐出来追捕刺客，巡捕们听到枪声也纷纷赶来。但凶手们都一阵风逃走了。检点 14 号的人，丁景梁腹部受伤，曹叔实手肘受伤，一个女仆耳朵击伤，一个厨师的手受伤。真是一场腥风血雨。

事发之后，许国霖所雇的汽车夫很快就到巡捕房报案，于是凶手许国霖就被抓到了。不久，还抓到了一个在弄堂口放风的宿振芳，随后李海秋及一些嫌疑犯也被捕。许在法公廨供称：“受朱光明嘱使，为政府办事，赏格十三万。其目的先办政府最忌之陈先生。”宿振芳在法捕房二次供称：“程子安

奉张宗昌命令，暗杀陈先生。”李海秋始终不承认参与凶杀阴谋。公廨经预审犯罪明确，又系刑事犯罪，即引渡归上海地方检察厅承办此案。上海当时为北洋派控制，极力操纵审判，抹煞案情真相。许国霖在上海地检厅即推翻在法公廨的口供，只承认知情，不承认实施暗杀。许编造案情说，陈其美的被杀，完全是党务关系，是以党杀党，即党内自相残杀。许国霖又说，这一案子是程子安所干的，程子安是张秀全、韩恢、胡侠魂等的部下，对陈其美非常不满。云南独立的事发生之后，为将来的都督人选问题，他们又和陈其美发生争执。程子安，王介凡就决计要谋杀陈其美。上海地方审判厅经过审理，再次歪曲案情，认定事实，说程子安，许国霖组织鸿丰煤矿公司，招附商股，以振兴实业之名，行补助党费之实。后来商借外债，邀请陈其美担保，因为陈其美有多借二十万作酬金的条件，王介凡等觉得条件太苛刻，感到很气愤，但是党费又迫不及待，只好勉强答应了，于是乎谋杀陈其美的决心也就因此而定下来了。17 日，许嘱程子安预备，一方面通知陈其美第二天签字。18 日先让宿振芳在门口望风，见面以后就开枪行凶。根据这个事实和刑律有关条款，判处许国霖死刑，宿振芳有期徒刑 15 年。但这一案件上诉到江苏高等审判厅后，高等厅借口许国霖虽然是同谋，毕竟不是主谋，判处极刑，量刑过重，改判无期徒刑。面对主谋，则没有加以追究，也就不了了之，此案内幕真相，也就被掩盖起来了。

陈其美遇刺之后，孙中山丧失了一个得力助手，非常悲痛，但当时政局十分紧张，又不能亲临祭奠，更增添了无限伤感。所幸不久，袁世凯于 6 月 6 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急病死。孙中山才提出公开祭奠陈其美，彰显他维护共和的功绩，但是没有得到允许。陈其美的遗体一直寄存在上海。

直到 1917 年 5 月 12 日，才由孙中山等陈其美的生前友好，在上海公开开吊，随后将其遗体运回湖州故土，于 5 月 18 日隆重安葬。孙中山亲笔题写了“陈公英士之墓”的墓碑和“成仁取义”的石坊，以示永久的悼念。

汤化龙血溅加拿大

维多利亚的星期天是平静的，当地的居民都恪守着多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谁也不会去设想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东方人在这里饮弹丧命。

下午八点时分，从空旷的街道上传来了阵阵急促的枪声，一片混乱过后，维港重归于平静，街道中留下了两具尸首躺在血泊之中，其中一人便是以中国众议院议长的身份游历美国后来到维港候船归国的下野政客汤化龙，另一个便是刺杀汤化龙的凶手国民党人王昌。

很快，这一桩谋杀案通过电波传向四方，传到国内，颇使不少人感到震惊。人们不禁要问：死者汤化龙究竟是怎样的人物？是什么原因遭到暗杀呢？

笔耕兴家立志当官革弊政 进士及第追求新知游东瀛

汤化龙，别字济武，原籍是湖北省浠水县（旧名蕲水）。他的先世，几代人都是经商致富，一百多年间家境一直非常富裕。到他祖父汤德澡这一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因为战乱，家中商业遭到重大损失，家境一落千丈。他的父亲汤聘莘，为了重振家业，便弃学经商，奔波往返于九江、安

庆各地，力图恢复昔日的光辉。1874年（清同治13年）10月，汤化龙出生在这样的商人家庭中。他幼年身体瘦弱，却异常聪颖，四五岁时就喜欢听老人讲战争故事。稍长，在家塾读四书、五经，记忆力很强，又十分好学，在乡间一时得有“神童”的绰号。1892年（光绪十八年）汤化龙19岁，在浠水县参加科举考试，获得第一名，补为县学附生，一般人通称他为汤秀才。

这时清朝政治腐败已达极点，贪官污吏借端敲诈勒索，无所不为，乡间如发生一起人命案，十里以内有钱人家都要受到连累。正在逐步恢复元气中的汤家，接连两次遭到此种不白之冤，欠债超过一千银元，再次濒临破产地步。为了赚钱贴补家用，汤化龙开设家塾，招生收费，并日夜伏案作文，博取官学奖金。如此辛勤笔耕，未出三年竟将负债还清，家境也开始好转起来。经此一番波折，汤化龙发誓将来一定要当官做御史，革除这种虐政。

1897年，汤化龙被浠水县补为廪膳生，每月可以领到官家的生活津贴。他进入黄州（今黄冈）经古书院，继续学习。这所书院是清末著名洋务派、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的，标榜“以实学培养人才”，所谓实学，不过是稍为矫正八股文学非所用的弊病。汤化龙接受这种“实学”教育，加上第二年（1898）戊戌变法运动对他的影响，从此奠定了他走改良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1902年，汤化龙参加湖北省的“乡试”，中了举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2月，到河南开封参加清政府礼部主持的“会试”，考试完毕，受山西提督学政宝熙聘请，到山西大学堂担任国文教习。同年秋，到北京参加“殿试”，被录取为二甲第108名进士。这次考试，当时称光绪甲辰科，是中

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最末一次。二甲进士，共取录120名，除汤之外，还有谭延闿、蒲殿俊、张国溶、沈钧儒等人。这些人都和汤化龙称“同年”，以后其中的许多人在政治上都和他发生过不同的关系。

考中进士后，清政府任命汤化龙为刑部主事，官拜六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接连遭受列强侵略，内忧外患，形势日益危急。许多知识分子大声疾呼要求改革，进入二十世纪初叶，到国外留学，吸取新知识，形成一股热潮。汤化龙除竭力赞助他二弟汤芑铭考取官费留学法国外，他自己也请求清政府咨送日本，带职留学。到东京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法律科，学习三年。这期间，他广泛涉猎日本书籍。当时清政府修改旧法律，公布一系列新法令，他取其中《违警律》，加以注解阐释，写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5月，在日本东京印行出版。此书参考诸家学说，旁征博引，和某些抄袭翻版作品有所不同，使他博得了法律学者的美誉。

在东京，汤化龙还联络同乡留学生，组织“湖北教育会”，相约回国后发展教育，因而他又成为热心教育的人士。

1909年（宣统元年）春，汤化龙由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跨海回国。

弘扬立宪谘议局风云际会 附和革命军政府宦海沉浮

1909年，汤化龙从日本回国时，正值清政府在各省积极筹建“谘议局”。因为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中国民主革

命形势有极大发展。清政府为抵制革命，缓和政治危机，先是宣布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命令各省成立谘议局，临时代行省议会职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做为建立议会的基础。1908年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及《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具体规定在1909年开设谘议局，1910年建立资政院。因此，各省自1909年3月起，即忙于选举谘议局议员，筹建谘议局。当时湖广总督陈夔龙经地方人士推荐，乃奏调汤化龙回鄂参加筹备工作。

汤化龙到武昌后，与张国溶等先组成地方性的立宪团体、湖北宪政筹备会，于1909年5月20日正式成立，由汤、张二人掌握全部活动。

1909年10月14日（宣统元年九月初一），湖北省谘议局，按规定和全国各省谘议局同时如期开幕。绅士吴庆焘当选议长，汤化龙当选为副议长。第一届会议结束后，吴即辞职，汤化龙遂继任议长。谘议局地址在武昌阅马场。

清政府的“新政”、“立宪”，原本都是一种骗术，但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却真的希望能象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行“君主立宪”，以期分享一点政治权力。这些人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即起而响应，在各地组织团体发起立宪运动，因此这些人后来被称为立宪派。各省谘议局成立后担任正副议长的，如江苏张謇、直隶孙洪伊、山西梁善济、四川蒲殿俊、湖南谭延闿、福建刘崇佑等都是立宪派著名人物。张謇尤其是其中的巨擘。

清政府既非真心想让谘议局成为真正的“省议会”，自然不肯给它实际权力，即使明载于章程上的权力也为地方大官所限制而无法行使。立宪派当然不能满足，谘议局第一届会议后，张謇游说十六省谘议局，各出代表三名，齐集上海，于

1909年11月27日成立了谘议局联合会，决定组成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要求缩短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迅速召开真正的国会，成立责任内阁。

因此这个联合会又称国会请愿团

请愿代表到京后，第一次递请愿书得到回答是拒绝所请。第二次不仅拒绝所请，还给予“严厉斥责”。立宪派感到愤懑，1910年8月9日，各省谘议局正副议长再次齐集北京，召开联合会，选举汤化龙为主席，决定进行第三次上书请愿，这次他们利用资政院开院机会，请资政院代呈请愿书，并通过资政院中的立宪派，促使资政院通过了请求速开国会的议案。为了缓和局势，清政府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原定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三年，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在国会召开前，先厘定官制、设立内阁。这又是一种“缓兵之计”。请愿同志会内原属“预备立宪公会”的一派，却感到满意，不再继续请愿。但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等则不相信此种诺言，坚持要求次年即召开国会。汤化龙继续奔走于北京、武汉之间，或开会联系商团，或发电与各省谘议局呼应，进行尤为积极。

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出台，“立宪”骗局揭穿，全国舆论哗然，立宪派也深感愤慨，决定6月份在北京召开谘议局联合会，议论对策。

当汤化龙由汉口乘京汉路火车出发赴北京时，到车站送行的群众，达一万人之多，群情激昂。汤化龙亦当众发表演说，誓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次联合会集会，首先于6月4日正式成立了一个政党性的组织，名宪友会。它以请愿同志会为基础，主要负责人是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等，在资政院内有雷奋，籍忠寅

等。总部设在北京，在十个省设支部。其中湖北省支部负责人主要是汤化龙、胡瑞霖等。这是立宪派的一次大联合，汤化龙在立宪派中的地位从此巩固，其以后组织政党的“本钱”亦渊源于此。

其后，谘议局联合会连续呈递了两份“皇族不宜充内阁总理大臣”的奏折。清政府当然不肯有丝毫的让步，而是准备采取镇压手段。当东三省第三次国会即将召开、请愿代表抵达天津时，清政府即命令直隶总督陈夔龙将彼等驱逐出境。立宪派至此陷入完全绝望境地。

这时，川鄂湘粤各省保路运动已开始，清政府逮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9月7日（阴历七月十五），更在成都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武装起义。

谘议局联合会这时决定，各省谘议局提前开会，意欲与清廷力争，援救被捕诸人。但革命怒潮迅猛发展，汤化龙回武昌不久，谘议局会议未及召开，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革命爆发。一夜之间，光复了武昌全城。11日清晨，起义将领决定集合到谘议局，开会邀请绅耆父老商量建立政权办法。有的人便去找汤化龙，汤当时家住武昌巡首岭（后改名粮道街），穿过蛇山隧洞到谘议局相距不足一公里。他很快来到了谘议局，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议员阮毓崧、沈维周、刘赓藻、胡瑞霖、秘书长石山俨等亦均应邀到会。另一些人又找到黎元洪，也强迫他来到谘议局。过午，会议开始，汤化龙被推为主席，首先致词说：“革命事业，兄弟素表赞成”；建议“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最后说：“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这些话不一定是真话，但他的态度一开始就和黎元洪大不相同。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吴

兆麟提议说：“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望人，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获得到会人员的通过。这样，汤化龙一夜之间由清政府

谘议局长变为革命军政府的民政长。

汤化龙担任民政长所做的工作，主要有通电全省宣布起义宗旨、要求各地军民各安职守；因当年湖北水灾严重，通会蠲免全年田赋；以及起草文电、接见英美驻汉领事等。此外，还致电各省谘议局，号召响应。确实也起了一些作用。

起义时逃出武昌的清总督瑞澂、湖北布政使连甲等，企图通过在武昌的清朝官员柯逢时，与黎元洪进行联系，10月13晚，派人来军政府送信时，被革命党人抓获，当场枪决了四个人。事发后，汤化龙有些惴惴不安，说：“你们要人做事，为什么又不相信人？随便杀人是坏事的。”从此对革命党人心怀疑惧。革命党人也谣传他与清军有勾结。为了讨好革命党人，他揭发柯逢时藏有与清军机处通电用的《辰密》电码。密码由柯家取出后，他提议并亲自起草，伪造瑞澂电报，夸大革命军声势，密电清政府，以扰乱清军视听，给清政府造成一定混乱。但汤与革命派互相猜忌，终不可解。

起义之初，军政府内部工作十分混乱，10月14日，同盟会派遣的居正、谭人凤到武昌后，汤化龙与居正商订军政府内部组织条例六章二十四条，取消起义当天暂设的谋略处，将军政大权集中于都督和政事部。在政事部下设内务、财政、编制、文书、外交、交通、司法七局，俨然内阁组织。汤化龙任政事部长，以夏寿康、张国溶、胡瑞霖、阮毓崧、刘赓藻、石山俨、黄中恺，沈维周等分任七局正副局长，没有一个人是起义将领。经黎元洪批准，于10月17日召开大会公布。当

时居正把此条例说成是同盟会预先拟好由他带来的，因而骗得一致通过。但随后，革命党人感到“所用非人”，于10月25日再次召开会议，推翻了这个条例。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政事部，将其中文书局改属于秘书处，其余六个局均改为部，与军务部平行，直属于军政府。各部部长也重行任命革命党人担任。将汤化龙左迁为编制部部长，张国溶为副部长。编制部本为闲散职务，汤化龙已夺得的大权，至此又完全失去。正好，宋教仁此时来到武昌，计划制订约法。于是汤化龙和宋教仁共同研究约法问题，经过二十多天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吸取美法两国宪法之长处，由宋执笔起草约法。宋教仁先制订公布了一部《鄂州约法》，随后以此为蓝本，制订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期间，黄兴来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总司令，与清军作战。11月27日汉阳革命军失利，退守武昌，黄兴辞职，当夜离武昌，乘船去上海。次日，汤化龙亦不辞而别，和黄兴的参谋长李书城及胡瑞霖、黄中恺等同船到了上海。到沪后，汤化龙、万声扬提议，离武昌时未经请假，应该补发一个电报。胡瑞霖愤愤说：“应该指摘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种种歧视，所以才离鄂来沪。”这也是后来武昌方面排斥汤化龙的一个原因。武昌方面骂汤化龙是“湖北逃将”，汤亦不再为武昌诸人讲好话。

12月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27日黄兴离沪到南京，汤化龙亦同往南京。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随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为法制局长，汤化龙为法制局副局长。2月中，汤化龙递上了一份辞职呈文，大意说：接受委任之初

即感恐惧不安，但当时正在军事时期，怕如提出辞职会被认为煽动苟且偷安之风，所以不敢提。现在和议告成，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建设需要人

才，而各方才士、大儒已接踵而来，自己粗鲁，没有大志，深怕原非革命派而获罪过或受讥诮，为此请求辞职让贤。满篇牢骚，反映他内心一片怨气，离心离德。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很赏识汤化龙，任命他为陆军部秘书处长，一直到4月初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结束。

组党结派汤化龙倒向袁门 分分合合进步国民两党仇

民国既建，各方政客纷纷组党结派，期望在政治上争得一份地位。对同盟会心怀不满的人，更积极组成反对党。章太炎于1912年1月3日即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公开与同盟会对抗；武昌方面的孙武到南京企图活动一个次长位子，未能如愿，便联合武汉不满中央政府诸人，拥戴黎元洪，于1月20日组成民社，汤化龙亦在2月前后，纠合原宪友会一些人，组织共和讨论会，树立了他基本的政治资本。3月2日，原“预备立宪公会”派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称统一党，汤化龙亦被选为统一党参事，这是他和立宪派的一次新的合流。

袁世凯窃得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政府北迁。临时参议院亦北迁，于4月28日在北京复会。临时参议院议员原为每省各三名，现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改为五名。湖北省临时议会于4月12日增选出汤化龙等二人为临时参院议员，并于4月27日到院报到。这样，汤化龙又进入民国的“议会”，并于5月1日被选为副议长。

当时袁世凯想的是取代爱新觉罗氏做皇帝，恢复封建专制，根本反对“议会政治”，对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好感。但政党林立，已成事实，不能不慢慢对付。革命派虽轻轻交出政权，但对袁世凯不能放心，幻想引进西方式的议会政治，组织责任内阁，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对此难以容忍，因而视革命派为首要敌人。袁一方面采取分化瓦解、收买、屠杀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消灭革命派；一方面拉拢、收买反同盟会的各党派，以期在“议会政治”中，正面压倒革命派。在袁的授意下，那个“统一党”联合民社及几个小党，于5月8日组成“共和党”，在临时参议院中席位几乎超过同盟会系统，成为可与同盟会抗衡的御用党。

但同盟会并不示弱，在宋教仁等策划下，同盟会系统五个政团合并，于8月25日建立国民党，在临参院内又成为第一大党。

是年10月间，立宪派的主要领袖人物梁启超自日本回国。袁世凯立刻用虚伪的礼仪和大量金钱，将梁启超及汤化龙等收罗到手，在汤化龙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内，并入“共和统一党”及另外三小党，组成民主党。成为国民党、共和党以外的第三大党，无形中增强了拥袁党派的势力。

但是，自1912年12月开始，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议员的选举工作在全国进行，至1913年2月选举揭晓，仍是国民党大获全胜。正式国会分为参众两院，国民党在两院共得392席，共和、民主、统一这三个拥袁党加起来只有223席，还不到它的三分之二。于是国民党欢欣鼓舞，宋教仁到处演说，幻想真的组成“多数党”的责任内阁。袁世凯秘密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刺杀了正欲登车北上组阁的宋教仁。4月8日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幕，成立参议，众议两院。

袁世凯首先大力支持汤化龙竞选众议院议长，对议员威胁以外，加之利

诱，收买选票，开价从五个银元增至一万二，终使汤化龙勉强以过半数票当选。

同时，袁世凯又指使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再组合成为一个大党，于5月29日正式成立，即所谓进步党。汤化龙和民社的孙武一派成见极深，本不愿见到名列一处，但经梁启超斡旋，又因三党协商分配权利，将众议院议长给了汤化龙，汤得到满足终于同意合并。进步党的实际主持人即汤、梁二人。

汤化龙一就任众议院议长，就禀承袁世凯意旨，首先谎言临时参议院已通过了供武力镇压革命派使用的“善后大借款”，要求众议院也给予通过。但谎言被揭穿，欺骗未成。随后讨论借款案时，汤化龙又指使进步党议员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甚至对持反对意见的国民党议员动武，大打出手。当时舆论批评说：“今日两党党员，不啻两国，其水火不相容，直视昔日满汉之界限为尤严。”

不久，刺宋案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7月中，“二次革命”爆发，进步党完全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赞同武力镇压。袁世凯捕杀国民党籍议员，进步党也不闻不问。参议院议长张继南下，进步党即乘机改选进步党的王家襄为议长。

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对推翻清政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民国建立后，该党倒向袁世凯，充当了袁世凯攫取全国政权、屠杀革命群众的帮凶角色。尽管如此，袁世凯并无爱惜这些政客之意，只因当时他还是“临时大总统”名衔，需要表演通过投票机器“转正”这个过场，当时未便发作。9月5日，进步党人通过了“先选总统，后制订宪法”的决议，为袁提供方便；10月6日，在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主持下，投票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转正手续办完后，议会对袁世凯再无其它用处了，11月便明令查封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致使两院均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汤化龙虽希望打掉反对党，又不希望国会完全消失，还想采取一些挽救办法，但当时的熊希龄内阁，仰承袁世凯鼻息，不予支持。11月15日，两院只好宣告停会。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解散国会，2月又解散各省议会。民国初年议会道路至此断绝。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将国务院改名“政事堂”，用徐世昌为国务卿，任汤化龙为教育总长。袁之用汤，一方面为了羁縻，另一方面，也因袁用汤之二弟汤芑铭为河南都督，为袁卖力，大杀革命党人，希望这兄弟二人均为己用。汤化龙政治欲望强烈，早在1913年3月就曾想代理教育总长，为临时参议院否决。至此才如愿以偿。但袁世凯却不给他任何实权，除当时河南都督张镇芳建议停办小学，还有人要求恢复科举制度，经他据理力争，得未改变学校制度外，一切均未能如愿。只好每天用两小时自学英语。

1915年8月，袁世凯成立筹安会，准备于1916年登极称帝。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制。梁启超亦反对帝制。汤化龙欲与袁脱离，又怕袁怀疑他。9月份借口看病，请假赴天津，至12月在家属逃出北京后，才绕道到了上海。这时梁启超已到昆明，发动进步党人蔡锷起义，护国战争开始。

护国军入四川后，湖南地位至关重要。谭延闿代表国民党，在上海与汤化龙接洽运动湖南汤芑铭独立。汤芑铭因残害革命党人极多，深怕报复。汤化龙以维持汤芑铭之地位为交换条件，双方拍板成交。1916年5月29日汤芑铭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国人皆曰可杀”的咒骂声

中病死，护国运动结束。

进步党和国民党在反袁斗争中的一度携手，反映到重开的议会中，两党亦曾有短暂的合作。袁世凯既死，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汤化龙代表进步党，谭延闿代表国民党，在上海商定收拾时局方策，倡议恢复国会，恢复《临时约法》，组织国会同意之内阁。梁启超与唐绍仪联名通电恢复《约法》，南北妥协，段祺瑞被目为“反对帝制”的“功臣”而出任内阁总理。痛定思痛，全国人民殷殷望治。

汤化龙在沪时，计划在北京办一份报纸，做进步党的机关报。李大钊正巧此刻由日本留学回国。李之留日，曾受汤资助，二人私交很好，汤邀李主持编辑工作。李希望利用这一工具开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便欣然接受，取名《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在北京正式发刊。李大钊任总编辑，连续发表宣传民主思想抨击官僚政客的文章，深为该报老板所不满，对文章擅自乱改，李愤而辞职。不久，研究系与段祺瑞交恶，《晨钟报》发表揭露段借款卖国消息，1918年9月底为段封闭，12月，梁启超将报名改为《晨报》复刊。李大钊利用旧关系，自1919年2月7日起把《晨报》第七版改版为著名的《晨报副刊》，使之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阵地，这倒是汤化龙无意中做的一点好事。

1916年6月建立的段祺瑞内阁，丝毫没有满足人民渴求安定和平的期望。相反，表面上它似乎容纳各派，南北妥协，实际凡非北洋系者，逐渐都被段党排斥出去。段祺瑞以北洋派首领自居，窃踞政权后，即专制独裁，卖国举债，妄图实现其“武力统一”迷梦。

梁、汤一流政客，虽标榜“开明专制”、“贤人政治”，其实骨子里是希冀在反动势力庇护下，获得一官半职。梁、汤

在袁世凯倒台后，曾高唱“不结党”，想借此更新人们的耳目。但不出两个月，汤化龙又组起了“宪法讨论会”，梁启超也结成“宪法研究同志会”。1916年8月26日，汤化龙回到重开之众议院，复任议长。29日，即合并是述两会为“宪法研究会”，实际是进步党的复活。“研究系”这一名称也就从此开始。

汤、梁两会之合并，是为了想在国会中组成一个大党，以压倒重返国会的原国民党势力。自1914年6月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后，国民党已不复存在，重返国会的原国民党系议员已分化为许多小系派。但研究系既已投靠段祺瑞，甘心为其御用党，当然希望在国会内占有多数席位，压倒反对党。由于研究系一意拥段，国会开议后，论战又起，双方互视若仇讎，在讨袁斗争中的一些容忍、协作精神，此时已被相互间的谩骂涤荡一空。研究系议员与益友社（原国民党系统）在讨论制宪问题时，又大肆动武，议会尊严完全扫地。

1917年2、3月，北京政府因参加欧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院”指国务总理段祺瑞。段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日本以借款为饵，诱段参战，欲逞其独占中国的阴谋；段则企图利用日本援助实现“武力统一”。“府”指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参战需要国会同意，汤、梁为支持段祺瑞，卖力动员研究系赞成参战案，但参战案遭到原国民党系统坚决反对。

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鼓动各省督军召开会议，压迫黎元洪同意参战并解散国会。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5月10日众议院讨论此案时，段祺瑞袭用袁世凯手法，雇用流氓二千人，包围封锁会场，欲强迫通过参战

案，结果引起更大反感，19日众议院通过决议，暂不讨论此案。同一天，徐树铮再一次召开督军团会议，决定采取最后步骤，对国会施

加压力，迫使通过参战案，否则督军即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研究系因见国会与段矛盾尖锐，难以通过参战案，因此也参加了此次督军团会议，鼓动督军团逼黎解散国会。

5月23日，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段离京赴津发动武力倒黎。

为了拆国会的台，以助段祺瑞之解散国会的目的，5月31日汤化龙带头辞去议长之职，研究系议员七十多人也纷纷辞职离京。汤化龙亲自到蚌埠，游说督军倪嗣冲等发出要求解散国会的通电。汤返津时，在车站遇到记者吴虬，吴问汤此行目的，汤对吴耳语说：“不日即见分晓。不如此，不能斩草除根也”。

最后，黎元洪在张勋的逼迫下，终于于6月13日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率领“辫子兵”进入北京，于7月1日演出复辟一幕丑剧，并驱逐了黎元洪。这样，经过徐树铮、汤化龙、梁启超三人的导演，解散国会、赶黎下台两事均达到目的。7月1日，段祺瑞连夜到马场调兵，梁、汤接着也来到马场，组织讨逆军，驱逐张勋。很快段祺瑞将张勋军击溃。7月14日段祺瑞自封为“再造共和”的元勋，重返北京，复任国务总理。为酬答研究系功劳，特赠阁员五席，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汤化龙为内政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汤长内政，有利于研究系操纵选举，各部又均属要津，故这一段号称研究系在政治上的黄金时代。

段内阁重建后，梁启超为了在议会中彻底铲除原国民党系势力，倡议废止《临时约法》、不再恢复旧国会，重新指派议员召开新的国会。段祺瑞及继黎任总统的冯国璋也都不愿再受原国会掣肘，所以梁启超这一提议当即经内阁会议通过

公布。此议提出时，汤化龙参加副署。国民党之痛恨汤化龙，此亦为一大原因。

北京政府解散国会、践踏临时约法，引起南方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怒，孙中山为此发动护法运动，南北公开破裂，动乱因之达十年之久。1917年9月29日北洋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通缉段祺瑞、梁启超、汤化龙、倪嗣冲四人，以示报复。此虽然仅为一纸通令，而梁、汤名列第二三，仅居段祺瑞之次，于此可见革命党人对汤、梁愤怨之深，也可见汤化龙异日身遭横祸历有由来，决非偶然了。

但汤、梁与段的结合，不过是一时的互相利用。段一贯独断独行，认为汤、梁不能唯命是听，因而并无合作诚意。徐树铮又煽惑其间，常对段说：“梁、汤辈只能利用其空名声点缀门面，实在事，还要我们自己有办法。”因此段在国务会议上无所主张，会后则召徐密议于私宅，然后直接发电各省督军，指挥一切。汤、梁本意欲造成“名段阁实梁或汤阁”的局面，徒自流于幻想。汤、梁常对亲信发牢骚说：“北洋派把我们当文案老夫子，不是国教员。”

更使汤、梁难堪的，一个是戴戡问题。戴戡当时任四川督军，是护国战争中随蔡锷入川的黔军将领。梁、汤原打算以蔡锷为进步党的武装力量，但蔡不幸于1916年11月病逝，由戴继任四川都督。戴亦是进步党人，梁、汤希冀把戴戡培养成一支地方武力。张勋复辟时，川军军长刘存厚为争夺四川督军，派兵攻戴，戴战败退出成都。此时正值段阁建立，梁、汤主张援救戴

戡，更主张惩办刘存厚。殊不知段欲利用刘存厚反对滇黔，早已将刘收买到手。而且7月21日刘军已将戴击毙。这些，梁、汤都如同闷在鼓里。8月10日，四川来人带来戴戡已死确讯，段才在国务会议上亮出刘存厚部下早已发来的“戴戡自杀”的密电。梁启超当场要求严惩刘存厚，段以“责任不明”拒绝，气得梁启超怒气冲冲离席而去。

再一个是选举问题。当7月20日内阁会议通过梁、汤的废止旧国会，另选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提案后，研究系即拟定临时参院议员名单，由汤利用职权，密电各省照办。

按照汤、梁的想法，第一步是通过各省指派临参院议员，先使己党占居多数席位，再修改国会选举法，以利于己党在新国会中当选。汤、梁内定由进步党山西领袖梁善济出任临参院议长。第二步，在新国会中，至少使研究系达到三分之二席位，以便建立研究系内阁。为此梁、汤密议，暂时隐忍，以待另组政党内阁。

徐树铮这时也同段祺瑞密议道：“如此选出的临参院议员必须多是进步党，仍要受其挟制，等于去了一个国民党，又来一个进步党。”于是两人另拟了一个名单，以段或徐名义，密电各省，取消汤的名单，代以徐的名单。

11月10日临参院组成开幕。在选举议长时，徐树铮推出王揖唐，并事先为之做了许多手脚。梁、汤不知内中情形，仍按计划以梁善济竞选，结果王揖唐当选，梁善济大败落选。梁启超、汤化龙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发誓一定与段决绝。

梁、汤与段意见一再冲突，原已有意辞职。段祺瑞为了使他们替自己分担舆论的谴责，恶意强留。表面上双方似乎是共相始终，实际是貌合神离。因此段祺瑞也恨极了汤化龙等人。

1917年11月22日，段祺瑞内阁，因其推行“武力统一”的军事在湖南等地遭到严重失败，不得不倒台。汤、梁的研究系也便随着段阁的倒台退出了政坛。

汤、梁下台后，梁启超转而潜心于学术，成为学者。汤

化龙却仍不甘失败，决心出国考察，学习实现议会政治的道路。1918年3月，浮海东游，先到日本，滞留了一段时间后，于6月间离开日本，来到美国。

汤化龙为了东山再起，力图在海外为自己谋取新的政治资本，在美国招摇了两个多月，后又来到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在这里的革命党人终于盯上他，要拿他来做被他践踏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被他用阴谋送上断头台的国民党人的血祭品了。

盛筵方残枪声乍起富文街

下野政客溅血维多利亚港

1918年9月1日是个星期天。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港，除旅社餐馆外，按照当地习惯，各商店都休息一天，闭门打烊。下午，街头行人稀疏，只有电车汽车穿梭般地不停运行着。但在华侨聚居的热闹市区富文街的叙馨酒楼，别有一番热闹场面，盛筵五桌，主宾共达六十多人，谈笑风生，济济一堂。东道主是维埠姓汤的华人，被宴请的客人就是游历美国后来到维港打算候船回国的汤化龙。陪客则是中国北洋政府驻温哥华市领事王麟阁及中华会馆董事等人。

原来维多利亚是加拿大太平洋岸温哥华岛的良港，交通便利，工商贸易

繁荣。当时来这里的华侨已达四千多人，其中三千多人做工，七百多人营商，其余从事教师、办报等各种职业。汤化龙在美国到处拉拢华侨及留学生，以增加其政治资本，并利用华侨中强烈的宗族观念，与凡是姓汤的、姓甄的（因古史传说汤、甄两姓同出一地）都结为同宗，所以

在维港姓汤的华侨联合起来搞了这次宴会。汤化龙于下午六时携带随行人员霍坚及留美学生傅霖赴宴，至七点五十分散席下楼。当时维多利亚港实行夏时制，又由于该地纬度接近北纬 50 度，夏季昼长夜短，所以此刻虽太阳已落山，夜幕则犹未降临。出得酒楼，汤化龙意欲到位于前面拐角不远的费士克街的华商俱乐部——适适轩休息一下。众人说，海外情况复杂，三年前进步党人黄远庸就是在旧金山一次宴会中被人暗杀的。到适适轩路虽不远，为安全起见，劝他还是乘车前去为好。汤化龙说，“我怕什么！”坚持步行前往，走在最前面。侨商马瑞堂和教师黄笏南紧迫在他左右，其余诸人尾随，霍坚和王麟阁同行，与汤相隔二十余人。沿敢富文街边行边谈，走了约三四分钟，转弯进入费士克街，即将抵达适适轩门前。突然由路旁窜出一名刺客，双手各持一枝手枪，迎面朝着走在最前端的汤化龙开枪便射，原来此人当叙馨酒楼宴会进行中，已在楼外窥伺多时，只因参加宴会的人多势众，不便下手，得知汤化龙步行前往适适轩后，乃先行赶到适适轩门前，埋伏于路旁，等汤行经且近，一枪即击中其腹部。汤双手捂着腹部，张口似欲喊叫，又一颗子弹已射入口中，贯穿后脑，登时倒地，气绝身亡，年仅 44 岁。枪声突起时，随行诸人惊慌万状，急忙转身向来路奔逃。霍坚见汤化龙倒下，上前想去看视，凶手已逼至眼前，朝霍连续开枪。霍向旁边一闪，一颗子弹从跨下穿过，击中另一行人脚部；另一颗子弹则擦耳边而过，霍吓昏，瘫倒在地，凶手以为霍坚已死，即舍霍继续射击王麟阁，王一开始听到枪声后，即转身奔回敢富文街，沿街一侧，想逃入商店躲避，但因星期休息，各店均关门，不能进入。到第三家门前，正在敲门求救时，凶手已追至，相距仅十余丈，一枪射来，王急忙侧身紧贴门框躲

避，子弹从门扇下端射入门内。正危急间，忽见马路对面有一家旅馆仍在开门营业，乃急忙穿越马路奔向旅社。凶手见状亦穿越马路紧紧追赶。正巧此时街心有一辆电车驶过，稍为阻挡了一下他的进路；同时又遇到一名过路的加拿大士兵，上前拦阻，欲夺其手枪，凶手向士兵开了一枪，子弹洞穿军帽，士兵不敢再拦，但经这两次拦阻，王麟阁终于乘机逃进了旅社。凶手见已追赶不及，转身意欲逃走，但此时警察、消防队员已闻声而至，将该处三面包围，双方开枪互射，均未命中。凶手发现已无路可逃，即举枪自杀毙命。经人辨认，乃是在该地从事理发师职业，具有国民党籍的广东香山县人王昌。王麟阁敲门的那个第三家商店，就是王昌所开设的理发馆，当时如果进去的话，实无异自投虎口，难免于不幸，真可谓惊险万状！

枪声终于停止了，空余下斑斑的血迹，维多利亚港复归于平静。事隔几十年以后，当年国民党美洲支部的负责人冯自由在《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一文中追述这个事件时说：和 1915 年在美国旧金山暗杀进步党人黄远庸一样，“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

壮志未酬身先去 ——为国共合作遭杀害的廖仲恺

8月的广州，正值盛夏，气候异常炎热而沉闷，天公似乎在以它的烦躁向人们暗示着一场隐然的危机。

上午九时许，一辆黑色小汽车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人，他们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廖仲恺先生，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女士，以及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廖仲恺和陈秋霖一下汽车，便健步登上通向大门的石阶。一阶、二阶、三阶，突然，从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窜出两个暴徒，向廖仲恺开枪射击。与此同时，躲在大门铁栅栏内的凶手也向廖仲恺开枪，廖仲恺和陈秋霖当即中弹仆地，鲜血染红了石阶。何香凝一见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人，一面扑向廖仲恺，当她低头看扶廖仲恺时，又是一阵枪响，子弹擦着头顶飞过。党部卫兵听到枪响，寻声赶来，向凶手追击，射中一人，余者都夺路而逃。何香凝等人急忙把廖仲恺抬上汽车，驰往东门外百子路公医院抢救。但廖仲恺终因伤势过重，所遭四枪皆中要害，途中即与世长辞，时年仅48岁。

噩耗传来，国人痛悼。国民政府在距孙中山辞世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又失柱石，立时陷进一阵恐慌和惊乱之中。

少年壮志不言愁

1877年（清光绪三年）正是清政府暮气萧索的时期，但这晚世的光景却不能遏制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这一年的4月23日，在远离祖国的太平洋彼岸，廖仲恺以他的第一声啼哭作为来到人间的宣言，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取字仲恺。他的父亲廖竹宾，是客家人，由他省迁至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栖身，因家境寒苦，早年卖身当猪仔，来到旧金山做苦工，终岁辛劳，慢慢地积聚资本，终由经营小本生意发达，成为一个商人。后来，廖竹宾又在旧金山汇丰银行分行任职。廖仲恺的童年时代，一方面在美国学校读书，同时又被送到私塾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我们是中国人！”这句话在廖仲恺幼小的心灵中就占有着非同寻常的重量。1893年，廖竹宾病故，16岁的廖仲恺陪同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了祖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终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告惨败。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使中华民族的苦难更进一步地加深。这一时期，欲图自强的变法维新运动在全国蓬勃地发展开来。一回到祖国，青年廖仲恺便切身地感受到风云的变幻。为了探求救国图强的道路，1896年廖仲恺离开家乡赴香港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何香凝女士，并于第二年在广州同她结为伉俪。他们二人的结合，正可谓“天作之合”。廖仲恺的父亲由于亲身经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临终时留下遗嘱：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根据客家人的规矩，儿子长大后必须讨个大脚姑娘作媳妇。但是在

当时的中国，女子几乎都被严酷的封建伦常裹小了双足，而天足女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但人世间仍有离经叛道的果敢女子，激烈地反抗这非人性的摧残，何香凝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何香凝出身于香港一个大地产商的家庭，

从小就不顾家长的阻挡，坚持读书学习。在家人为她缠足期间，她每天晚上都用剪刀剪掉缠足布。剪刀被没收，她就再找一把，藏在祭祀的香炉下，待到深夜后再剪掉缠足布，再缠再剪，始终不屈。她向家人表示宁肯不嫁人也决不缠足，经她苦苦的抗争，终于保持了一双天足。经媒人介绍，廖仲恺和何香凝成为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并双双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

廖仲恺的叔父廖志岗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他是从故纸堆中爬出又爬进清政府的官场的。仲恺回国后不久，母亲也因病辞别了人世。这样，父母双亡的仲恺便寄居在叔父家中，他和何香凝结婚后，再也不能容忍叔父骄奢淫逸的生活，便从叔父家搬出，住进了哥哥廖恩焘家中，这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妇在一起静心攻读，讨论时局，发愤承担救国之重责。

这时，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改良的救国设想遭到了破产。《辛五条约》的签订，更使古老的中华民族陷进了灾难的深渊。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在苦苦地寻觅着拯救中国的道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日本，他们决心跨海东渡，到那同文同种的东邻列岛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于是，在二十世纪初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浪潮。

廖仲恺也决心投身到这一浪潮之中。但是叔父和哥哥却希望廖仲恺步自己的后尘，进入清朝官场，对廖仲恺欲留学日本，不肯提供资费，连去日本的盘缠也拒绝供给。何香凝毅然变卖了陪嫁的珠宝首饰，于1902年秋先送仲恺到日本留

学，两个多月后，她也东渡日本。两人分别进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和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在东京，廖仲恺先后结识了苏曼殊、胡汉民、朱执信等人，逐渐萌生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中国留学生的一次集会上，廖仲恺夫妇结识了刚从东南亚归日不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们对孙中山先生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政治主张，表示由衷的钦佩。几天之后，这对夫妇和另外一个留日学生黎仲实一起，拜访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跟他们谈了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并指出一定要进行革命，推翻封建清廷。后来，廖仲恺夫妇又去见孙中山两次，表示愿意参加革命，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贡献力量。中山先生非常高兴，当即指示他们在留学生中广为结交，物色有志之士。从此，廖仲恺正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留学生中广泛进行联络及宣传工作，积极从事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成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骨干。

1905年，孙中山先生作完环球旅行，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由于孙中山先生活动频繁，来往函信很多，为了避免日本警察的监视干涉，便以廖仲恺在东京租赁的寓所为秘密联络点。为了安全，廖仲恺夫妇按照中山先生的指示，连女佣人都没有雇用，从此，何香凝每日下课后亲自操持家务，自己动手洗米做饭，负责为孙中山收发信件，看门望风。

1905年9月29日夜，廖仲恺和胡汉民夫妇，请孙中山先生来到自己的寓所，请中山先生主持，正式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成为同盟会最早成员之一。在这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中，还有黎仲实、何香凝、马君武、胡毅生、朱执信、胡汉

民等人。同盟会根据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原则，分作评议部、司

法部、执行部。廖仲恺被任命为执行部下属机关外务部干事，主持外务工作，负责办理与西方革命志士的联系事宜。

中山先生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贫富对立，提出“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一些革命党人对此表示怀疑，仲恺则坚决拥护这一主张。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以“屠富”的笔名发表文章，阐述平均地权的主张。同时，他又和朱执信等人一起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对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各种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些学习和研究，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多篇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参与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与朱执信一样，廖仲恺是同盟会成员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物。

1908年到1909年，清政府临近覆灭的前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在这期间，廖仲恺受孙中山的指派多次潜回国内，在天津和吉林进行活动。1909年初，距大学毕业只有最后一个学期，廖仲恺又一次从孙中山那里接到一项特别任务，回国到天津去与那里的法国社会党人联络，以便使中国革命从法国社会党人那里取得支持。廖仲恺为了革命的需要，又一次中断学业，启程返国。当时，祸害中华民族五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后和长期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刚刚死去，摄政王载沣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加紧把各种权力集中到皇族亲贵小集团手中，在这时刻，只身前往清王朝的腹心地区，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临行时，何香凝赠诗相送：

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

廖仲恺在天津顺利地完成了中山交给的使命，回到日本后又抓紧时间补上了耽搁的学业，当年夏便从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为了打入清政府内部，做为革命的内应，廖仲恺怀着深入虎穴掏虎子的无畏气概，赶往北京参加了留学生考试，果然得中法政科举人。廖仲恺绝对无意于去做清政府的官，但这一公职可以为他提供革命的方便和掩护，于是他便作别了妻子。临行，他郑重地对何香凝说：“香凝，我的学业能够完成，多亏了你，现在又要远离，此去以身许国，也不知道团圆何日，家和孩子们都托付给你了，你要保重。”何香凝十分坚强，丝毫不做儿女情长，慨然地对丈夫说：“你就放心地去吧，这一切都有我呢！”

廖仲恺回国后，被清政府派赴东北，进入东北边务督办大臣陈昭常幕下任翻译，帮助陈昭常及会办大臣吴禄贞办理吉林省延吉地区回归祖国的交涉事宜。这一地区以图们江为界与朝鲜接壤。日本在占领了朝鲜后于1907年派军队渡江占领了龙峪、光霁等地的中国领土，并强列名目为间岛，亡图吞为已有。在廖仲恺等人的协助下，吴禄贞努力奔走，据理交涉，终获成功，收回了被占领土。嗣后，陈昭常调任吉林巡抚，廖仲恺仍赞其幕中。在这一段时间里，仲恺一方面为收归祖国领土而奔忙，一方面又利用公职之便，往来于吉林、营口等地，进行秘密联络和策反工作。当时林伯渠作吉林省劝学总所所长，廖仲恺和林的交往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最终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地老天荒苍松啸

武昌革命的枪声，犹如晴天霹雳，震塌了清王政的基石，各省纷纷响应，

宣布独立，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濒于覆亡。1911年11月9日，广州光复。次日，胡汉民就任广东都督，并即开始了组织都督府的工作。应胡汉民的邀请，廖仲恺只身南下，来到广州，担任了广州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和枢密处参议，何香凝也带着儿女从东京回国。

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由美国经欧洲回国经过香港，廖仲恺陪同胡汉民一起乘兵舰赶到香港迎接。根据行前他们与朱执信、陈炯明等人的商议，胡汉民希望留孙中山于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修治战备，以待不测，劝阻孙中山不要北上沪、宁。孙中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详细地解释了前往上海南京组织中央政府的必要性。他说：“现在最大的祸患是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也未必能为患于新政府。为今之计，我必须迅速到南京、上海去主持对内对外军国大计，不能留在广州练兵，而且你们最好都跟我去。”胡汉民见中山主意已定，却也无可奈何，只得说：“既然先生已下定决心，我自当服从，陪先生北上。”当即胡汉民写了一封信，说明中山先生的意旨，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交廖仲恺带回广州，向陈炯明、朱执信等人传达落实。朱执信、胡毅生等人见不仅未留住孙中山，反而把胡汉民带走了，不禁非常生气，当即也要撤下广州，北上追随孙中山，经廖仲恺多方转圜，才得以挽留他们，并使陈炯明代理了广东都督，维持了广东军政府。

12月25日，中山先生来到上海。29日，又被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清王朝终于被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志士们埋葬了。

孙中山当了四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便根据南北议和时的协议，于4月1日解职，让位于袁世凯，而以在野的身份专门从事社会实业活动，推行自己毕生致力的“民生”主张。当时担任广东省军政府财政司长的廖仲恺，把全部精力投注在整顿广东的财政上，开始着手推行更换土地契约法案，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逐步使土地国有化，并藉此增加财政收入，为往后经济建设筹集一点资金。但为廖仲恺料所未及的，这个法案在广东省议会处处受到挑剔，阻力重重，终未能获得实现。尽管如此，廖仲恺没有沮丧，他凭借着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和细致果断的工作能力，全力对广东财政进行整顿。他通过清理各类税，厘捐，发行有奖公债，以银币取代纸币，以及鼓励发展工商业等办法，很快使广东财政从入不敷出变为收支相抵，而且使库储逐渐有余。由此显露出卓越的理财能力，深为人们所器重。

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苦苦奋斗，没有换来民主共和的真正实现。袁世凯耍尽阴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又进一步扩大了他那反动的政治野心。1913年3月12日，廖仲恺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那里与黄兴、于右任等共商支持宋教仁赴京争取组织责任内阁的计划。3月20日上午十时左右，廖仲恺与黄兴、于右任等到上海车站欢送宋教仁北上，十时四十五分，宋教仁在廖仲恺的陪同下步行走向月台，突然，有凶手在背后向宋教仁开枪射击，教仁当即中弹仆地，经救无治，于22日晨四时许离开了人世。

宋案在陈其美等人的侦缉下迅速得破，撕去了袁世凯的

面纱，露出了那一副罪魁祸首的嘴脸。枪声惊醒了沉迷于实业建设幻想的革命党人，他们看透了袁世凯反革命的凶残本质。孙中山从日本归国，和

廖仲恺、黄兴等入举行紧急会议，组织武装，反袁讨贼，以卫共和。

5月中旬，廖仲恺奉中山之命到北京，以处理有关财政问题为遮掩，暗中走访有关议员，揭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策动国会议员反袁。很快，廖仲恺的秘密活动为袁世凯的暗探侦知，把他列进了捕杀的黑名单中。廖仲恺从友人处得到消息，在袁世凯搜捕他的前夜，只身离开北京，经天津南返，于6月初回到了广州。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宣布讨袁，18日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但由于袁世凯早就作好了准备，而南方力量薄弱，终遭失败。民生主义化归泡影，民主共和名存实亡，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9月4日，廖仲恺与何香凝，带着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随着广东军政府的其他要员仓促地离开广州来到香港。香港的英国当局把这一批中华民国的缔造者统统视为政治犯，不许在香港停留，限他们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这样，廖仲恺等人怀着满腔的悲愤，再度辞别了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的惨痛教训，使孙中山认识到同盟会的涣散和缺陷，他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党，以铁的纪律约束党员，共兴大计。1914年5月2日，廖仲恺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他在“誓约书”上写道：

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救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

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实际主持财政工作，千方百计向各方面筹款，为党务工作提供经费。同时廖仲恺积极参与了《中华革命党方略》的制定，热心支持创办《民国》杂志，在上面发表诗文，加强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廖仲恺还帮助孙中山筹组革命军，购买枪械，组建革命党武装力量。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下令称帝，当即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蔡锷云南起兵，各省响应，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4月27日，廖仲恺陪同孙中山由日回国，当时国内护国讨袁声势高涨，孙中山打算亲赴山东主持战事，先派廖仲恺为特使到青岛，对东北军进行慰问和视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但从此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分争割据的局面。皖系军阀段祺瑞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军阀统治，假手张勋，赶走了黎元洪。张勋进京后竟又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于是段祺瑞便组织“讨逆军”，驱逐了张勋，推冯国璋为总统，自己以国务总理的身份独揽大权，并宣布不恢复临时约法，解散国会。

为了与北洋派抗衡，实现共和，坚持约法，孙中山亲自同海军总长程璧光会谈，同时又遣廖仲恺、何香凝到海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中做发动工作，

争取他们共同起义，维护约

法。1917年7月6日，廖仲恺夫妇陪伴孙中山登上“海琛”号军舰，驶出吴淞口，离沪赴穗。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并于9月1日选举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就职后，即组织军政府，通令讨伐段祺瑞，揭起了护法义旗，发动了护法战争。

廖仲恺被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次长，特任署理财政部长，专职管理财政，再一次担起了为军政府与护法战争筹措经费的重任。但是，由于西南军阀之间的勾心斗角和对中山先生的排挤，护法运动旋遭夭折，孙中山愤而辞职。1918年5月21日，廖仲恺随同孙中山离开广州，6月26日返回上海。

在上海，廖仲恺积极响应孙中山制造舆论启发国民、唤醒社会的号召，开展理论建设和宣传的工作。1919年6月和8月，廖仲恺和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作为从事革命宣传的阵地。廖仲恺翻译了《进步与贫困》和《全民政治》二书，在《建设》杂志上连载。此外，他还撰写了《三大民权》、《革命继续的工夫》、《国民的努力》等十多篇政论文章。这些著述主要是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权民生主义和最新著作《孙文学说》，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同封建军阀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廖仲恺仍在探索解救中国走出危亡困境的途径，为此，他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廖仲恺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混乱现象，根源就在于“国家权力失去了他原来的位置”和“人民的主权很不完全”。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实现“全民政治”。即人民要实现直接的权力——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国民有了这三种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实在回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

多要好八九分了。”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廖仲恺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要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对交通建设，币制政策，他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不仅如此，廖仲恺还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的建立，表示由衷的喜悦和极大的希望。他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握于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坚信这“前途曙光，必然出人群与黑暗。”

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翌年6月，廖仲恺和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两次去福建漳州，敦促陈炯明率粤军回师讨伐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廖仲恺按着中山的指示，为陈炯明筹募军饷。在仲恺和朱执信的催促和帮助下，陈炯明于1920年8月16日在漳州誓师，分兵三路，回粤伐桂。10月下旬，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组建军政府。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并开始准备北伐，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全力筹措经费，整顿财务，支持孙中山北伐。

廖仲恺一上任，便深感处处掣肘，工作局面很难开展。原来，陈炯明回到广州后，自以为羽毛已丰，便独揽大权，欲图架空孙中山，对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更是极力反对。廖仲恺被任命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使陈炯明深感不安，故而百般刁难，必欲去之而后快。廖仲恺为了顾全大局，辞去了省财政厅厅长的兼职。

孙中山在桂林建立了北伐军大本营，陈炯明却拒绝提供一粟一弹，企图以此使孙中山大军不战自解。廖仲恺竭尽全力筹措军费，供给大军以子弹与

米粮，保证了军用供给，因

此他更遭到陈炯明的嫉恨。为了驯服陈炯明，1922年6月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希望能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声望，迫使陈炯明就范。

但是，陈炯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策划武装叛乱，妄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幸于事变前二小时得到消息，于叛军逻弋之中，间道出走，免于罹难。在炮轰总统府的前两天，陈炯明下决心要割掉“孙大炮的钱荷包”，于6月14日打电报给廖仲恺，邀请仲恺前往惠州。仲恺行抵石龙时，便被逮捕，陈炯明把他囚禁在石井兵工厂，用三道铁链把他锁在一张铁床上，严加看管，准备过些时日将其杀害。

廖仲恺身陷囹圄，自忖必遭毒手，面对死亡的威胁，廖仲恺给何香凝和他们的儿女写下了绝命词。在给何香凝的词中，仲恺写道：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在给女儿，儿子的诗中，仲恺写道：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不言归。欲要阿爹
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
学。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躯壳本是
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
日新德日新。当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表达了廖仲恺对妻子儿女的殷殷期望和骨肉深情。

何香凝得知廖仲恺被捕的消息，多方奔走，设法营救。8月18日，何香凝冒雨爬上广州北面的白云山，到粤军总司令部当面责问陈炯明说：“我问你，仲恺有什么对不起你？你们说仲恺帮孙中山先生筹款，要把孙先生的荷包锁起来，就囚

禁了仲恺。但仲恺何尝没在民国九年之时帮助你们呢？你们在漳州两年多，把孙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抵押了两次来帮助你们的不也是仲恺吗？难道只有帮助你们才对，助中山先生就不对了吗？同样都要帮助，帮助孙中山先生更要紧，我们没有对不起！”陈炯明理屈词穷，仍欲继续玩弄诡计，何香凝据理力争，终于使陈炯明下令释放了廖仲恺。当夜，廖仲恺与何香凝就乘船离开广州。第二天上午，陈炯明后悔，再令重新逮捕廖仲恺时，仲恺已经到了香港。

陈炯明轰击总统府的炮声，彻底震碎了孙中山等人对南方军阀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们认识到依靠军阀来反对军阀，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处在失败的惨痛和迷茫中的孙中山、廖仲恺看到了前途的曙光。

国共合作急先锋

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决心以苏俄为榜样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4日，孙中山指示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与各

省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国民党改组计划，决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原则，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组。廖仲恺坚决支持孙中山提出的三大主张。会后，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赴日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他们在一起详细地交换反对帝国主义及中苏合作的初步意见。11月中旬返沪向孙中山做了详细的汇报。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确立了平等友好的中苏关系。随后，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派，陪同患足疾的越飞去日本，继续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秘密地设在日

本著名的温泉伊豆山海滨的“热海饭店”。经过前后近三个月与越飞的朝夕相处，使廖仲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有了较多的了解，开始明确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完全理解和赞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代表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开幕。孙中山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廖仲恺担任大会的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廖仲恺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以三大政策的原则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全力赞助国共合作。针对国民党右派破坏改组，反对国共合作，廖仲恺坚定地表示：“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经过激烈的辩论，大会终于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上，廖仲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工人部长。由于廖仲恺在国民党改组中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始终是赞助最力的一人，被誉为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

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队伍，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就下令筹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并指派蒋介石担任筹委会委员长。由于筹建工作极其困难，蒋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擅自离粤返回原籍浙江，孙中山于是委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筹建黄埔军校。军校正式建立后，廖仲恺担任驻校的国民党代表，“殚精焦思以期有成，艰难百折非所恤，蜚语万端非所顾”，为党的主义和政策在军校中得以贯彻，费尽了艰辛。

1924年2月24日，廖仲恺在广州主持中国国民党追悼

列宁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赞扬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他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廖仲恺举荐鲍罗廷担任中国国民党特别顾问，并与之有非常密切的交往，认真解决来华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同志的各种困难，被苏联友人视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当时，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刚刚来到广州，人生地疏，颇为困难，每逢他们遇到疑难的事情，廖仲恺都十分热忱地帮助妥善解决。这年10月的一天夜里，苏联的一名海员因患热症，用快艇从黄埔送到长堤，最初想直接送到德国医院，但当时已是深夜二点，鲍罗廷知道消息后，就给廖仲恺打电话，廖仲恺一口应承，“此事交给我办好了。”深夜亲自赶到长堤，与医院接洽，安排了一切事宜，使苏联友人十分感动。就这样，廖仲恺以自己的热情和真诚，赢得了苏联同志的无比信赖，使他们能愉快地在广州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努力。

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联共政策的右派势力。对此，廖仲恺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者，坚信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使国民党起死复生、成为一个新生命的重要因素。廖

仲恺明确提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亲自迎接从巴黎归来的周恩来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并经常推荐共产党人担任工农运动部门的干部，彭湃、冯菊坡、罗绮同等都得到过他的提携，对他们的工作多有信赖和倚重，同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何香凝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在广东的或者到过广东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李大钊、彭湃、苏兆征、杨鲍安、周恩来、邓颖超、林伯渠、吴玉璋、聂荣臻、肖楚女、熊雄、熊锐等人，毛主席也去过广州，仲

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谭平山当时也是中共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仲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对国共合作后出现的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廖仲恺给予积极的扶植和支持，国民党一大后，廖仲恺担任国民党中央第一任工人部长，接着又成为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成员。1924年11月，他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其后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在廖仲恺的主持下，广东国民政府先后制订了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第二次宣言，制订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法以及工会组织条例，分别以大元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广东省政府的名义公布。这些文件，是第一个保护农民协会、提倡农民自卫的政府法规，也是第一个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以及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权利的法规，这是中国工农运动史上的创举。

廖仲恺强有力地执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尤其注重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他大力支持建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共产党员彭湃担任第一届主任，他自己还亲自兼任第一、二届讲习所教员，多次到讲习所演讲和授课，尽心尽力地培养农民干部。在百忙之中，廖仲恺还挤出时间，不辞劳苦，多次到香山、南海等县农村访问农民，调查情况。他随身携带行军床，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与农民群众交朋友，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1924年夏，廖仲恺偕同谭平山到香山县出席农民代表大会。他们从广州乘船登岸后，拒绝乘坐县公署为他们预备的轿子，步行到了县党部。廖仲恺的这种平易近人的朴素作风，使当时欢迎的群众十分惊讶，都惊叹有如此的新鲜事。廖仲恺在会上会下亲自找农民谈话，了解情况，倾听他们的反

映和要求，更使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感到兴奋。

在农民运动发展过程中，廖仲恺始终站在广大农民一边，1924年11月，在彭湃等人领导下，广宁县农民协会开展减租运动，地主劣绅为了对抗减租运动，竟先后组织了“保产大会”和“业主维持会”，并组织民团武装强行收租，围攻农会、屠杀农民，气焰十分嚣张。廖仲恺得知后，派出以共产党员徐成章、廖乾五为领导的大元帅铁甲车队去镇压地主的暴行，并亲笔草拟了大元帅命令，明确指出：“此次调兵，全在保卫农民，清除土劣，务使横霸乡曲、损人肥己者，绝迹销声，不为农害。”在廖仲恺的支持下，这场对地主武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1924年底，广州市郊第一区的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因反对地主武装联团局加捐田谷，遭到杀害。廖仲恺闻讯后，迅即通过省长胡汉民将联团局长彭础立等扣押，并查封了联团局，彭础立是廖仲恺妹夫的妹夫，廖仲恺的妹妹向他痛哭求情，但廖仲恺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还有一次，当廖仲恺自己曾经教育过的广宁县县长蔡鹤鹏阻挠农民减租运动时，非常生气，责问蔡鹤鹏：“你究竟是拿谁的薪水，吃谁的饭？你拿政府给你的薪水，吃农民的饭，却无视政府的政策，不支持农民，反而去破坏农

民的斗争！”当即便解除了蔡的县长职务。

廖仲恺也十分重视工人运动。他把组织工会和工团军，看作工人阶级求得解放的极为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并亲自帮助工人解决运动中的一些问题。1924年5月，他主持了广东各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和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开幕式，并担任工人代表会主席。他经常亲自过问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关心工人的疾苦，维护工人的利益。当时广东江门油业工会会员千余人参加“五一”游行，遭到油业资本家和商

团军的包围，杀伤工人数十名，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廖仲恺闻讯后，十分愤慨，即以工人代表会主席的身份领衔发出通电，谴责资本家和商团的反革命暴行，声援江门油业工人的斗争，提出“保护工人，成立工团军，以保工人行动之自由”及“依法严惩江门油业车行及商团”等最低要求，7月，廖仲恺帮助广州工人团体筹组工团军，并下令于8月下旬开始训练，他亲自参与广州工团军的领导，把工人武装做为广东革命政策的依靠的力量。

廖仲恺果决而有力地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使国民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也由此，廖仲恺遭到了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的极端嫉恨。

留得中华史上名

1924年，中国革命逐渐高涨，广东呈现出一派革命景象。而北方的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决定兴师北伐，讨伐曹锟、吴佩孚。正在这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受到国民革命浪潮的影响，发动了北京政变，表示拥护国民革命，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解决时局问题。

孙中山北上前，审慎地部署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并特别对廖仲恺委以重任。孙中山确信“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因此他命令廖仲恺复专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之职。孙中山北上前二天，11月11日，对廖仲恺发出三个手令：一是任他为所有党军及各个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二是任他为大元帅大本营参议；三是委派他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从中足见孙中山对廖仲恺倚重至重，期望至殷。

孙中山北上后，由于长期的艰苦奋斗，积劳成疾，在北京卧病不起。廖仲恺得知孙中山的病情日趋恶化，非常担心，要求入京侍病。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复电阻止，言“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于是廖仲恺委托夫人何香凝赴京照料孙中山。1925年12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廖仲恺极为悲痛，于3月22日和胡汉民、蒋介石、许崇智、谭延闿联名通电，声明“谨遵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从此，为完成孙中山未竟事业，廖仲恺更加积极努力地贯彻三大政策而斗争。

为了打垮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廖仲恺领导了东征。作为东征主力黄埔学校校军的党代表，廖仲恺亲自筹划作战的策略，终于在1925年3月底击溃了陈炯明的势力。接着，他又参与领导了平息滇、桂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的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师生在谈到廖仲恺当时的工作时说：“我们亲眼看见，为了东江战争，他每天做十几个小时的工作，还要穿着草鞋，领导我们去打仗，在

跟刘扬作战的时候，晚上二时以后，他还要单独一人由黄埔回到广州办事。”苏联代表顾问鲍罗廷感慨他说道：“象廖仲恺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又活跃起来。他们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破坏工农运动，捕杀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排挤打击统一战线内部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时间，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在这艰难危

急的时刻，廖仲恺挺身而出，号召国民党人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发扬他的革命精神，贯彻三大政策，把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廖仲恺坚决地表示：“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正是凭着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廖仲恺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支持工农群众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亲自处理国民党右派破坏工农运动的事件。对于妄图分裂革命力量的人和事给予严肃的惩处。

1925年6月，广州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廖仲恺积极支持这一斗争。他亲自担任广东群众反帝斗争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和罢工委员会顾问。他废寝忘食地日夜奔波，与领导罢工的中共党员苏兆征、邓中夏等研究情况，制定策略，维护工人权益，抵制敌人的破坏活动，办理有关交涉和筹募款项等等。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廖仲恺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封闭了长堤一带的烟赌馆和利用停业的酒楼及祠堂、会馆的房屋来安排罢工工人的临时宿舍，拨出广州市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开办免费食堂等。为使罢工能长期坚持，他还积极设法解决罢工工人的就业问题，真正是“尽其力劳所及以援助罢工工人”。为这次罢工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必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

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时间

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谋杀害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常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

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在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和，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素愿，何事顾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说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党部门前，惨遭杀害，八月的广州出现了这一幕悲剧，苍穹为之低沉。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

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廖仲恺牺牲的消息传出，各届深切哀悼，人民无比悲痛。国民政府通令：所有文武职员及兵士，一律臂缠黑纱一周，为廖仲恺致哀。广东各地工农群众举行追悼会，仪式之隆重为广东历史上所罕见。印度、波斯、德国、苏联、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代表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追悼大会。中国共产党为廖仲恺遇难唁电国民党，给予廖仲恺以崇高的评价。廖仲恺被害的当天，周恩来就赶到医院探望。他对廖仲恺的牺牲，非常悲痛，亲自撰写《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文章，指出廖仲恺一生革命为党，牺牲为国，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继续者”，在革命斗争中“勇往直前，凌厉无比”。自国民党改组后，他建立了很大的功绩，“而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恽代英在悼文中称颂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最急进最不妥协”的领袖。

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绪之严肃，气氛之悲壮，为广州空前之例。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 1935

年9月1日，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廖仲恺以他的壮年生命，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用鲜血在中华英雄史的丰碑上镌下了他那光耀人寰的英名。

廊坊车站的枪声 ——远威将军徐树铮之死

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溢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房谋；又杨历乎域外，增学识于四洲；其暗鸣废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竟杀猛士兮，天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

——康有为挽徐树铮

1925年12月29日午夜，千里北国，万籁俱寂。雪月相映，格外逸丽。突然，京津之间，爆出撕裂长空的枪声，陆军上将、远威将军、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前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段祺瑞的智囊、灵魂、左右肱股”——徐树铮，应声倒在血泊之中……30日，上海《时报》登出“徐专使专车被炸”的消息。31日，国内外大报登出“徐树铮在廊坊被杀，陆承武为父报仇”的新闻。北京《晨报》还登了“陆承武的通电”，说他“本月二十九日遇徐贼于廊坊，手加诛戮，以泄国人之公愤，

报杀父之深仇”等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专车被炸”还是陆承武“手加诛戮”？陆承武何以得遂其手？行凶后为何没有被捕？其通电又从何处发出？廊坊现在可是冯玉祥国民军张之江部驻扎的军事要地！这中间的事情……？一个疑团接着一个疑团。南通张謇写道：

风惨云愁，
莽中夏今是何世？
远归客九关轻犯，
身危命致。
符节谁司南北卫？
囊丸任圯东西市！
问幽都紫陌亦甘人，
谁之耻？

问题纷纷，一时疑狱。欲明底细，还得从头说起。

树铮投袁愿未成合肥访客遇书生

徐树铮，字又铮，早年号铁珊，又曾自号徐则林，反过来念就是林则徐了。1880年11月11日，生于江苏肖县——徐州城南50华里处的醴泉村。村子周围群山起伏，风景殊特。这里世世代代流传着孔圣人经此雨后晒书、刘邦血战敌兵等许多动人的英雄故事。树铮曾祖徐济川、祖父徐兰，都终生务农而又贫寒。父亲徐世道，勤勉耕读，入选贡生，榜名忠清字葵南，后来成为徐州城乡有名的教书先生。徐树铮就是由父亲一手教育成人的。他从小随父课读，3岁识字，7岁能

诗，13岁中秀才，17岁乡试一等第一名，补为廪生。可是次年到南京

投考举人，却榜上无名。从此不图科举及第，而以经世致用为旨，刻意攻读兵法时政之书，孜孜为国家前途担忧。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希望百日破灭；义和团起，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狼狈西逃。这每一事件，都使他那颗报国之心倍为焦虑、异常烦恼。他满怀痛楚地写道：“居恒窃念，儒者读书，要以致用为宗。频年朝政日非，丧师割地，为国大辱。释而不图，虽皓首牖下何益！”因而在父母跟前，从容论述此旨，表示有心出外从戎。可是父母觉得他还年幼——他上有两个哥哥，六个姐姐；兄弟姊妹行中，数他年龄最小——不许他离家当兵，只希望他能一心向学，早日中举，将来能象父亲那样，作一位教书先生足矣。然而徐树铮还是“私究兵谋，留意天下政财大略”，预作投笔之计。

1900年，慈禧光绪西逃后，徐树铮听说国家征兵，便私自拿取父母钱，乘夜出走，不料未至江浦，却被母亲坐着骡车追还，强为娶妻，以作羁绊，不过，徐树铮的心已经飞出山村，慈母和娇妻是绊不住的。

果然，未隔多久，徐树铮毅然请求再度出走，父母看他意志甚坚，不忍复加阻挠，即出平日积蓄，送他远行。新婚之妇不但未加拦阻，而且倾出奁金相助。虽说开通，心里也有离别的悲苦，忍不住送了一程又一程。此时正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夕阳古道，衰柳长堤”。但谁知道这是不是又一场莺莺送张生的重演呢。

徐树铮只身一人，跋山涉川，径奔济南，去投因创练新军名声渐起、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他带给袁世凯的礼物则是一纸万言书。书中言道：“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

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袁世凯看后甚以为壮，但因正服母丧，不便亲自接见，即命道台朱钟琪接待。朱自视为名士，素来目无余子，对这初出茅庐的青年自不放在眼里，问对中话不投机，徐树铮便愤然离退。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宿？苍凉苦闷之中，树铮借酒浇愁，似乎要一醉方休，疏狂地挥笔《醉中》一首：

性气粗豪不自收，等闲岁月太难留！
此生称意须何日？抵死衔杯未肯休。
苏晋清才并仙佛，灌夫故态慢公侯。
安能化得身千亿，处处迎风上酒楼。

遂又顺手纸笔，写信讥笑朱钟琪。不料两信被转至家中，朋友惊为奇特，长长辈讶其鲁莽，甚者胆战心惊，忧虑即将获祸。独有其父手书训诫说：“汝之出将以待用也。未得人用，乃妄拟用汝之人先为汝用乎？”真是知子莫若父也。

投袁的希望似乎已经破灭，树铮却意外地见到了段祺瑞。此时已届严冬，树铮还羁居在济南一家旅店里。一天，他穿着一件夹袍，正聚精会神地书写楹联，忽听旁边一个安徽口音的人问：“喂，伙计！天气这么冷了，怎么还穿得这么单？”抬头一看，是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面虽消瘦而眼中神采不凡，即随声回答：“因投友不遇，暂往此地，等待家款寄来，即作归计。”那人本是到该店来访客的，看他气质不俗而又写得如此一手苍劲有力的好字，顿起延揽人才之心，接问姓甚名谁，家居何地，进而又问愿意就事否？

“值得就则可就！”徐树铮毅然回答。

那人更觉奇趣，于是约与长谈。经介绍徐树铮才知道此

人乃袁世凯手下爱将名叫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年方 37 岁，大于树铮 15 岁，正以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和随营武备学堂总办名义，跟随袁世凯驻防济南。徐、段二人促膝而坐，纵横议论天下大事。徐树铮大发宏论，慨然结语：“创练新军，转抚山东，大有可为者，莫若项城袁公（世凯）也。”段祺瑞深以为是，遂引树铮作为记室。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确定了徐树铮一生事业发展的路线。段祺瑞以树铮为左右手，逐渐发展为言听计从，信任无疑；徐树铮深感知遇之恩，大发士为知己者死之宏愿，奔南闯北，鞍前马后，始终奉段为至尊。

就在徐、段相识不久，袁世凯调防直隶，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委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徐树铮便随段到了保定，仍掌记室。虽是文职，却天天坚持晚睡早起，与士兵操练搏斗与射击。祺瑞称赞他“坚苦卓绝，志趣异人”。

1905 年，依照徐树铮的请求，段祺瑞保荐他到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10 年回国仍至段幕，段任江北提督，派徐树铮为江北军事参议。辛亥革命爆发，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统率一、二两军，驻节湖北孝感，派徐树铮为总参谋。时南北两军对峙，有推倒清帝不战而和之思。段祺瑞奉袁世凯之意领衔北军高级将领通电，逼迫清帝退位，主张共和。此电一发，清廷震动，时局为之一变。草拟电稿之人正是段祺瑞的总参谋徐树铮。

冯玉祥停兵倒段陆建章秦谋讨倪

民国建立后，段祺瑞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总长期间，先后派徐树铮为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陆军部次长。袁

世凯进行帝制活动，徐树铮与段祺瑞颇有异议。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遂以徐树铮为秘书长。后因“府院之争”，两人又均遭免职。

1917 年 7 月 1 日，张勋赶走总统黎元洪，抬出溥仪，宣布恢复帝制。当天，退居天津的段祺瑞即在马厂誓师讨张，由徐树铮与梁启超等作为参议。事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英雄复任总理，并兼陆军总长，仍以徐树铮为次长。同时，举冯国璋代理总统。冯原为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坐镇南京，与段祺瑞原同是袁世凯手下大将是颇有交谊的老同胞。然而不久，两人就争权斗势，如同水火。冯是直隶河间人，遂成为直系军政人物的首领，段则成为皖系头目。

这个时候的中国，真是四分五裂。桂系军人头目陆荣廷，坚持他在反对张勋复辟时提出的“自主”；滇系首领唐继尧，极力反对段内阁；因未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宣布以武力卫护他在民国元年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特别是他的“护法”军，很快就向湖南、福建、江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三省驻军一时难于顶住进攻，告急的电报接连到达陆军部。徐树铮与段祺瑞商定后，随即下令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率部增援福建，并同意增加冯部编制，满足他扩充一团的条件。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 年生于天津附近的兴集镇。不久随父迁居保定。其父冯有茂是位行伍出身的小军官。玉祥 10 岁丧母，12 岁从军。从军前有艰苦生活的经历，并读过 15 个月的私塾。从军后，刻苦训练，奋发向上，由一名小兵，逐步升至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辛亥革命时，曾

发动滦州起义，被袁世凯派人镇压。后随陆建章再起。几年

前开始信奉基督教。蔡锷在云南举兵讨袁时，他命所部张之江、蒋鸿遇等与蔡锷暗中联系。不久，促成陈宣布四川独立。后来（1917年春）段祺瑞以其不能忠于北洋团体，免去其旅长职务，改任为正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他坚辞不就，以养病为名避居北京西郊天台山。张勋宣布复辟时，段祺瑞约他率其旧部参加讨伐，即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所部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颇强，是享有时誉的北洋军，因而深受段祺瑞与徐树铮的重视。

冯玉祥接到援闽命令后，派得力部将李鸣钟，到河南归德招募新兵2700人，组成一个补充团。11月上旬，他以远征的姿态，带领部队由丰台转京汉路南下。本来，他完全可以走津浦线，但他偏偏不那样走，从而拖延时间。当他到达河南彰德时，护法军攻占了湖南长沙和岳州，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之一——由徐树铮极力荐任湖南督军的傅良佐，从前线败回北京。此后，冯玉祥前进得更慢了。11月19日、22日，徐树铮与段祺瑞相继辞职。12月上旬，冯玉祥才缓缓到达浦口。

徐树铮与段祺瑞辞职后，鼓动各省督军12月上旬到天津开会，继续布置对南用兵。会议决定两路进攻湖南，曹锟为第一路主帅，张怀芝为第二路主帅；直隶、山东、安徽分别出兵一万，奉天出兵二万，山西与陕西各出五千；所需军费，由各省自行负担。12月6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张敬尧等督军和上海护军使卢永祥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冯国璋不得不答应对南用兵，并于12月18日派段祺瑞为对欧参战督办。事实上，段又成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从军事、外交，一直管到内政的太上皇。他所作

的决定，可直接交有关各部办理，因而更积极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冯国璋表面象似屈服了，暗中却指示江苏督军李纯和江西督军陈光远，设法阻止北军南进，并暗中与西南方面的桂系等信使往来。以推行“和平混一”的政策。同时派他的高等顾问陆建章奔走黄河上下与大江南北，为进一步打击段方作积极的准备。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行伍出身，是和段祺瑞同辈的老北洋军人，曾任陕西督军，与段不甚相合，被皖系陈树藩逐出陕西。近来接连到豫、鲁、沪、皖等地，煽动倒段。听说冯玉祥率兵抵达浦口，急忙从上海赶来，见面就说：“焕章，你不能去援闽，那是帮段的忙。……”

“是啊，姐夫，我根本就不想去，正准备在这里停兵呢！”冯玉祥非常坦诚地表明了心迹。

“对！停止前进！就停在这里，我再去和李纯说一说，以获得他的谅解和支持，还有，安徽督军倪嗣冲，是段最得力的干将，与徐树铮等一个鼻孔出气。他积极鼓动对南用兵，并派马联甲等率部进入江西，往攻南军。你在这里停兵正好，我准备在六安、霍邱、寿县、淮南一带组织些人马，趁机把倪驱逐出安徽。我已同孙毓筠、王庆云、柏文蔚、岳相如等皖人联系，相约讨倪……如果你能出兵支持，估计可以一举灭倪！”建章双拳紧握，咬了咬牙。

“好！若是安徽组成讨倪队伍，首先发难，我就率兵直捣安庆，打他个措手不及，人仰马翻。”冯玉祥非常爽快地说。

两人商定之后，陆建章又到南京找其旧部李纯。李纯字秀山，时任江苏督军，是继冯国璋之后坐镇南京的直系将领。他听说陆建章来，急忙起身

出迎，毕恭毕敬他说：“郎老匆匆远道而来，有要紧的事情吧？”陆建章即将冯国璋反段用兵、

冯玉祥浦口停兵和相约讨倪之事，一五一十地密述于李，要求予以协助。

李纯欣然答应：“既然冯代总统对段很反感，绝不愿意对南用兵，那就让焕章在浦口停兵好了。如果因此缺少粮饷，我在这里想办法接济他。逐倪出皖之事，倘若焕章出兵，我即响应。我可以调集军队，在苏皖毗连地带，接应讨倪军，讨倪军失利时，可以撤退到苏省范围。”

陆建章一拍大腿，随即拉住李纯的手说：“好，秀山！就这么干，给段点颜色看看。”

这时，福建督军李厚基，已准备好许多船只，欢迎冯玉祥旅入闽。冯玉祥则以“海军难靠，船运危险”和“易被攻击”为借口，提出要走陆路——经浙江仙霞岭这一最迂远的路去福州，好象他还准备去援闽似的。实际上他再也没前进一步。段祺瑞方面再三催促，他均置若罔闻。更为出段意料的是，南征军施从滨部从山东进至浦口时，冯玉祥公开加以拦阻。

1918年2月，湖南战事再度紧张，段祺瑞改派冯玉祥援湘，率部沿江西上，取道荆州、沙市，往攻津市、沔县，以逼长沙。冯玉祥接到命令，开始还是不予理睬，后来听说代总统也主战了，才勉强离开浦口而西上。可是到了武穴，他又停兵不前。武穴地形险要，素有“长江锁钥”之名。冯玉祥即据此要地，于2月14日通电主和。说“民国肇基，甫经七载，内部争斗，于今三年，而最无意识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既无不共戴天之私仇，又无非我族类之公怨，兄弟阋墙，全球腾笑”，提出要“迅速罢兵，以全和局”。18日，他再次通电指责主战派，说“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今之主战者，咸

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既获胜利，讵有光荣？……为意气与私忿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申，罢兵修好，早定时局。”段祺瑞看了这两封电报，不禁震惊他说道：“这是在别我的马腿，要把我彻底打倒。”

这个时候，陆建章图谋驱逐倪嗣冲的活动也在迅速进行。他与安徽地方势力联系，分别在寿县、凤台、霍邱、怀远、定远、和县、含山、来安等地组织了许多武装力量，号称“安徽讨倪军”。陆建章自任总司令，领衔孙敏筠、柏文蔚等34人，发出讨倪通电，电称兵分东、中、西三路，以袁家声、王建芳、岳相如分任三路司令，公推陆建章为总司令。声势之浩大，实令倪嗣冲心惊胆战。他火急布置安武军应付，并连电北京告危。这时，段祺瑞已命徐树铮到奉天引奉军入关。冯玉祥已率兵乘轮过安庆，但他反复估计讨倪不会成功，又有情报说倪和段方已作准备，徐树铮引带奉军时刻可能南来。于是，冯玉祥佯称坠马伤腿，需往武汉住院，就没有进攻安庆。李纯看冯军未动，也就没有出兵响应。“讨倪军”虽然声势浩大，但组织分散，未能及时集中力量，而且孤军无援，所以很快即遭失败。倪嗣冲因此恨陆刻骨，决心除之而后快，并要求徐树铮予以协助。

段徐相契杀建章玉祥隐忍图自强

1918年2月间，徐树铮奉段祺瑞之命，奔赴东北联络张作霖，并自作主

张，到秦皇岛截取日本运送的——冯国璋预备主要用以武装直系的——一大批军械军火，作为礼物送给奉军，遂引奉军源源入关。3月12日，徐树铮与张作霖联名宣布成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总司令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直接指挥关内奉军。3月23日，段祺瑞得以再度组阁，遂又大张旗鼓地进行对南用兵，并积极准备选举新国会。徐树铮经常往来于天津、北京、武汉、长沙之间，既主持对南军事，又要包办国会选举，真是一位大忙人。为了推动湘南战争，他把关内奉军布置到湖南战场上，还亲自到衡阳，给有厌战情绪的吴佩孚打气，还写了一首《衡州谣赠吴子玉》，盛赞吴佩孚的为人治军，鼓起了吴佩孚的斗志。戎马倥偬之间，徐树铮尚有逸兴，归途中又挥笔而就七律一首：

湘波一碧太无情，不洗纷纷战血腥。
欲过长沙吊贾谊，求贤谁复问苍生？
九疑云物久无灵，帝子苍梧唤不醒。
明日岳阳楼上望，君山一发可怜青。

4月下旬，段祺瑞到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徐树铮和直隶省军兼援湘军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山东督军兼援湘军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等有关督军代表及段的主要随员财政部次长吴鼎昌、交通部次长叶恭绰等出席。席间，张怀芝突然告陆建章

扰鲁一状，说：“陆建章到山东，大肆鼓吹‘和平混一’，严重扰乱军心，影响援湘作战，请予处分。”

“有证据材料吗？”段祺瑞严肃地问。

“有。”张怀芝随手将一份材料摆到段面前的桌上。

“有电报告诉国务院吗？”段祺瑞显然震怒地问。

“有！”

“既然如此，请在座诸位，加意协拿，就地正法。”段祺瑞随即命令，并且申明：“朗斋老同袍，不如此，将法曲于情。”

在座诸位连称“遵命！”徐树铮却独自默然不语。

段祺瑞回京后，进一步指示徐树铮，要注意陆建章的活动，设法缉捕严办。5月17日，徐树铮与曾毓隽联名密电上海会办卢永祥：

亲译，密。奉揆座（祺瑞）交示元电，并谕密致台端。陆建章、孙洪伊等前次勾结土匪，扰害地方，今复在沪密谋，希图煽惑，望速密悬重赏，设法缉捕，务获究办。树铮、毓隽。筱印。

6月11日，倪嗣冲、曹锟、张怀芝和各省军阀代表到天津，准备13日开军事会议，讨论继续对南方作战问题，并要讨论总统问题。由于直系长江三督撤回了他们的代表，会议改在19日召开。冯国璋得知要开这次会议时，暗中授意陆承武把他父亲陆建章从上海叫到天津，来拉拢曹锟等，企图使会议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段。陆在上海时，还拉拢卢永祥，卢即用电报介绍他来天津。

12日，陆建章到了天津。14日中午，徐树铮与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商定后，

写信派人请陆到驻津奉军司令部晤谈。陆建章虽然也觉得情况有点不妙，但自恃为现任总统府高等顾问。

问、陆军上将和北洋派中的长辈，他儿子陆承武夫妇又是徐树铮夫妇留日期间的同学，也就欣然应约而往。徐树铮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说话。当陆建章走进花园时，就觉有人从后面用枪顶住后背，还未来得及转身夺枪，就随着两声闷响倒了下去。

事关重大，徐树铮当即致电国务院、陆军部和奉天张作霖、浙江杨善德、福州李厚基、长沙张敬尧、武昌王占元、太原阎锡山、渭南陈树藩、开封赵倜、卜奎鲍贵卿、张家口田中玉、热河姜桂题等督军、都统，及龙华上海会办卢永祥、浙江省长齐燮元等，对于在津的倪嗣冲、曹锟、张怀芝等，则分别抄送电文，报告杀陆的情况，以取得谅解和支持。

15日，冯国璋盖印发表了由国务院秘书长方枢拟就的一道命令，令文如下：

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山东、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飭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陆军刑事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著褫夺军官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这个时候，冯玉祥正在开往湘西的途中。由于武穴停兵主和，政府2月25日下令免去他的旅长职，交曹锟“严切查明呈候核办。”同时曹锟还在武穴悬赏两万元，购捕在他幕后主和的陆建章。3月1日，该旅官兵电报声明：“宁与旅长同

死，不愿任其独去，否则请将全旅官兵九千五百五十三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冯玉祥自己也电请“戴罪图功”。结果是“革职留任，”交曹锟节制。4月武汉会议时，由曹锟从中调解，段祺瑞同意冯玉祥开赴湘西“戴罪立功”。现在冯玉祥已到了津市临津一带。徐树铮清楚地知道，冯是陆建章的亲戚，陆是冯的老首长和知遇恩人。杀陆当天，徐树铮就给冯拍一封电报：

急。津市临津探投十六旅冯旅长鉴：

密。顷由弟上院及军部电云：“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锋剑切晓示，勿为所动去后，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经各员即向树铮陈明一切。树铮犹以为或系不逞党徒假名行动蓄意勾串之所为，陆将军未必妄谬至此。诘该员又函致树铮，谓树铮曾有电话约到彼寓握谈。查其函中所指时限，树铮尚未出京，深堪诧异。今午姑复函请其来晤。坐甫定，满口谩骂，皆破坏大局之言。尤复痛詈曹宣抚使，深以前在武穴悬赏两万元购捕为恨；并顿足大骂冯玉祥忘恩负义，不复听其指挥。树铮婉转劝告，并晓以国家危难，务敦同袍情谊，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则云：‘我已抱定宗旨，国家存亡，在所不顾。非联合军队推倒现在内阁，不足消胸中之气。’

树铮即又厉色正告，以彼在军资格，正应为国家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纵不为国家计，宁不为自身子孙计乎！彼见树铮变颜相戒，则又言：‘若然即请台端听信鄙计，联合军队，拥段推冯，鄙人当为力效奔走。鄙人不敏，现在鲁、皖、豫、陕境内，尚有部众两万余人，即今受公节制何如？’云云。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连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今竟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复国家而不惜，殊属军中蠹贼，不早消除，必貽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追褫该员军职，用昭法典，伏候鉴核。”等语。该陆某罪恶昭著，久为同人所切齿。今兹自行送死，亦是恶贯已盈之证。敬以奉陈。树。寒印。

冯玉祥接读电报，一阵惊惧，一阵酸楚，一阵愤恨。往事如烟，却又浮现眼前。早在1902年，他在袁世凯武卫右军当兵时，就与陆建章结识。是陆最先“发现”和培养了他，带他沿着军阶向上攀爬。1907年，陆把内侄女刘氏许嫁于他，给他安了个温暖的家。1911年，滦州起义失败被捕时，经陆多方营救，他才幸免于难。次年陆奉袁世凯之命编练左路备补军，任他为前营营长，派他到直隶景县招兵，招到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侈麟阁、冯治安及旧部李鸣钟、韩复榘等，随陆驻防北苑。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陆保升他为左翼第一团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派他到河南鄆城招兵，因招吉鸿昌、梁冠英、田金凯等。半年后，陆带他到陕西镇压白朗军，升他为旅长。陆做陕西督军时，派他以旅长兼任陕南镇守使，驻军汉中。今年浦口停兵、武穴主和，陆又为他运筹帷幄。……冯玉祥越是回忆过去，越是感到悲痛，越是追念陆建章，越是痛恨徐树铮。他抹去眼圈的泪水，又不免有些顾影自怜：我与陆的关系，众所周知，会不会株连到

我？徐树铮经常到武汉、长沙来，会不会对我下毒手？怎么办？我还在“戴罪图功”啊！冯玉祥思虑再三，深以祸及己身为戒。6月24日，他应酬似地回复徐树铮一封好象只关心陆“身后之事”的电报。28日，徐树铮又致冯玉祥一电：

常德冯旅长鉴：

密。敬电悉。弟于陆君本属旧交，毫无私忿，谅为兄所素知。自其近岁以来，行止不正，迭尽忠告之谊，苦口劝戒。去岁亦尝再三托由执事往劝，乃竟执迷不悟，以至于此。明为国法所不许，幽亦鬼神所难容，非个人有嫌怨也。身后之事，自当悉力筹维，期无艰苦，借全私交，并副诤讷，祈纾远注。树。勘印。

为使冯玉祥安心，段祺瑞方面还采取了一些措施。6月17日，撤销对他的免职处分，恢复其陆军中将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原官，还委他兼任湘西镇守使。22日又授以勋四位。段祺瑞本人还赠给陆建章遗属五千元，以表北洋袍泽之谊。事后，冯玉祥绝口不提陆案，而且自告奋勇，要求调往福建去打护法军。仇恨暂时压在心底，暗暗祈祷上苍赐给他一个报仇的机会。

冯玉祥北京政变徐树铮香港多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曹锟、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张之江为副总司令，率部出古北口而趋赤峰。此路长约两千，且多山路崎岖，非常难于攻守。冯玉祥早就对曹锟、吴佩孚深怀不满，面对这一征程，认为曹、

吴阴谋使其“牺牲于塞外”，推倒曹吴之心更力坚定。他率领所部，佯装前进，进而又退，进进退退，徒作搪塞。暗中积极组织反对势力，密作倒戈布置。待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与张作霖大战失利，冯即命令所部鹿钟麟等师旅，偃旗息鼓，日夜兼程，回京政变。10月23日凌晨，一举囚禁总统曹锟、迫其下令停战，撤去吴佩孚职务。吴佩孚自前线闻讯仓惶乘船从海路南逃。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的局面随之垮台，冯玉祥北京政变成功。

这时徐树铮正在上海至香港的海途中。原来直皖战后，徐树铮被列为十大祸首之罪，悬赏十万元通缉。他潜至上海，闭门读书，默究国事，待机再起，并撰写出版了《建国论真》一书。1922年到广西会见孙中山先生，筹组孙、段、张反直同盟。同年10月，到福建延平，利用旧部王永泉旅，赶走背皖亲直的闽督李厚基，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但仅一个月即告失败。1924年9月初，江浙战争突起。10月13日，卢永祥兵败北逃。徐树铮收其残部，准备再战，不料刚开了两次高级将领会议，15日就在公共租界，被亲直的英国人唆使工部局拘禁。21日被迫乘上英国蓝烟囱公司的货轮离开上海，在未到达英国利物浦之前，一路不准下船。

24日早晨，船抵香港。原内阁总理梁士诒、前广东省长李耀汉和徐的旧友数人前来看望。孙中山先生也派专员到港接洽。正谈论间，忽接北京大局已变之电。徐树铮当即决意上岸，经与有关方面交涉，香港总督派人请他下船，并向他表示歉意，告诉他完全可以自由活动。26日上午，他登岸住到坚尼路六十一号李耀汉家，以观时局变化，再定行止。

很快即有冯玉祥将迎段祺瑞进京主政的消息。并有香港一家英文报社特派记者，就时局等问题采访徐树铮。徐树铮

一一作了回答。

问：“您与段祺瑞旧交甚深，可否请您谈谈段祺瑞的情况？他是否会复出？”

答：“合肥段上将军，为国家柱石，又为树铮唯一长官，德望在人心，故；日满天下，出任国事，则确尽已责，退居在野，则苍生引领，论及段公出处，应为国计。此刻段公仍在天津，不易轻出/

问：“因与段氏关系，今后您还再从政否？”

答：“余在本国，已饱历风尘。现无从政问题。”

问：“闻冯玉祥有拥段为总统之表示，确否/

答：“段公现时必自保存其声誉，而不汲汲于实力之活动。此时所组之政府，不过过渡时代之产物，恐不能久存。似此之政府，于现状仍无甚补益。”

问：“有谓段氏非与吴佩孚合作不能出山。请谈谈吴佩孚好吗？”

答：“吴将军子玉，为树铮】日友，其任第三师师长及早威名号，皆树铮一力推荐，素与树铮往还元件，树铮始终许其为战将，未许其可假以国政。当六七年前，渠始与树悔意见不合，时曾与以一电，以君行径，必有进退维谷之一口，俟届彼时，君但记徐某尚可为君解释足矣，好自为之，他事不必相涵云云。翼岁在沪，尚述此言，以电警之，仍只许为战将而已。今春斋公复完，派员到沪，今夏树铮到奉，晤张公雨亭，共商国计，树铮皆虑子玉一

部，须好安置。若尽以力征经营，即获全胜，亦损国家元气。此皆为国事计，非与何人有何私爱私恶，今仍此心志耳。吴君之自计，作何打算，能否念及树铮前言，非所问及。若云其中国，今日不可再得，溢誉误友，树铮素所不为，然渠果能降心相从，不复谬自悻恃，则尚有可取也。”

问：“请谈谈冯玉祥可否？”

答：“冯将军焕章，亦树铮旧友，共事更久于子玉，且部曲将士，彼此互调者，亦属不少，渠曾有一二困窘之事，由树铮为之援手。综树铮之于渠，及渠之于树铮，未见有何反复之事。”

说到这里，徐树铮顿了顿，又感慨他说：“但今日用人之人，率以己利为主，用时则甘如饴，用后则弃如遗！”他宣称：“段祺瑞不能与冯玉祥合作。”

说到底，徐树铮不赞成段祺瑞和冯玉祥合作。他接连几次打电报给在津的段祺瑞，请其“暂缓入京，即入京须有条件。”段即暂缓入京，同时提出：“须先定裁兵办法，余始出山。”

这时，孙中山已表明赞成冯玉祥。但冯玉祥虽然控制了北京，却控制不了全国大局。张作霖拥兵十万，进驻在津浦沿线，高喊着：“北京政府之收拾，当请段老当之。”吴佩孚有回师之说，东南齐燮元、孙传芳等联合声讨冯玉祥。冯玉祥赶紧到天津，与段祺瑞和张作霖会议，决定拥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段迫于形势，即于11月24日进京，次日就任“临时总执政”。

徐树铮认为，段祺瑞进京仍太匆促，难免做冯玉祥的政治俘虏；“临时总执政”名义，“与中华民国实属不能相属者”，“不能连贯”，不合中华民国之约法。因此，他更加反对段与冯合作。他在香港的言论引起了冯玉祥的深切关注，冯恨他称赞吴佩孚，更恨他反对段冯合作，还恨他骂自己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徐树铮看事不可为，即决计趁机出国求学。临行从香港

致函《申报》说：“今当远行，尤不愿与闻时政。一俟护照船票，屏当妥贴，即当放棹云海，一扩尘襟。归期早晚，虽不敢预定，要当习新学，补所不足，国事有所急需，则沿途皆可折回，国事得所安定，则寄居研学，期能深得，他日实学而返，重图报国，计亦天下之所许也。”随后不久，段祺瑞特任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徐即组织考察团，横渡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

张冯交兵启战端则林旅途发通电

冯玉祥刚刚政变，张作霖即举军入关，收编吴佩孚之残兵败将，强占津浦与京津沿线地盘。气得冯玉祥仰天长叹。天津会议时，两人为划分地盘吵翻了脸，段祺瑞反复调和，才勉强弄出个折中方案：张作霖的队伍驻津浦线，冯玉祥的队伍驻扎京汉线，双方都可以沿着分得的路线向南发展。但冯玉祥认为张作霖还是占了便宜，据说他曾与张约定奉军不入关。

段祺瑞就任执政后，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一天天深化。不断地互相扯皮，争军费、争地盘、争中央的人事职位。张作霖一度提出要他的部下李景林担任北京警备司令，以取代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冯玉祥坚决不同意。张作霖又派一万人马进驻京师，随后亲自进京亮亮威风。可是冯玉祥驻京的人马远比他的多，有人对他说，“冯是个惯于采取非常手段的人，你应当提防

一下才是。”张作霖听了不禁毛骨悚然地离京而去，并带走了他的一万人马，以免被冯的队伍吞掉。

1925年5月，张作霖从关外带来更多的队伍，布置在京奉、京津、津浦各路驻扎。其势似乎要和冯玉祥一决雌雄。又

有人说张作霖可能与伺机再起的吴佩孚联合，这对冯玉祥将很不利。冯玉祥听了急忙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将其驻扎北京地区的大部军队，撤往宣化、张家口等地，暂且让一让张作霖，以防他与吴佩孚联合。

张作霖在京津地区站稳脚跟后，又积极向南扩张。同年八九月间，派杨宇霆、姜登选分别率部进驻江苏、安徽，并任两省军务督办。此时坐镇浙江的孙传芳，认为这对他是很大的威胁，即和冯玉祥联系，相约南北夹攻奉军：先由孙在南方发动，把奉军大部吸引到江浙一带，随后冯在北方发动，南北夹攻，一举将奉军消灭于关内。10月上旬，孙传芳以双十节阅兵为名，迅速集结军队，布置战线。张作霖一看势头不对，急令杨宇霆和姜登选赶回沈阳讨论对策，但时间来不及了。孙军已箭在弦上，而奉军还在榆关——天津——浦口——南京——上海之间漫步，宛如一字长蛇。如果孙打头，冯截后，奉军就将首尾不能相顾，后果难于想象。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奉军。杨宇霆在南京急喊姜登选来商讨如何是好。两人请孙“念及同窗之雅，毅然止戈”，并保证奉军“不犯浙”。可是孙传芳这时不愿再讲老同学的交情，悍然分兵五路，大举进攻奉军。冯玉祥在北方磨拳擦掌，正准备响应孙传芳以全歼奉军，忽然报纸登出《徐树铮劝孙张息兵电》。这封电报，是徐树铮10月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考察，“顷闻大江南北又将为两公大部交战之地”而发的。电中说“尊奉合肥（段祺瑞），为两兄共抱之旨，合肥方执国柄，两兄果有所争执，何不诉请裁决；弁髦相睹，甘自矛盾，狐埋狐掘，智者不取。”“两兄坐抚兼圻，境内诸政，未闻修举，何忍更事侵略，徒便他人，自取笑骂。”“欲跻大位，须得民心，兵诈所争，不免

曹氏覆辙。”并说不久回国后，要将考察所得，“周历诸省，详晰破述，共商此后经国良图。”冯玉祥看了非常恼火——这哪里还有我的位置？这“徒便他人”、“不免曹氏复辙”，不是含沙射影地责骂我吗？更重要的是，孙张果真歇兵，岂不毁了我的大计？……他正沉思着，忽又传来徐树铮请段祺瑞阻止奉浙之战的电报，电中又有万勿听使“庶政滞弛”，“甘自暗于眉睫”之言。冯玉祥疑心重重，自言自语他说，京城在我控制之下，怎说“暗于眉睫”？这是要防备我了？

10月22日，徐树铮又从美国电劝杨宇霆撤兵，电报也登在报纸上，内中说：“奉省兵力，兄所明知，匪多财困，蹶后有人千里作战，何能持久？果仍一意南图，不出数月，必有大乱。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兄纵不为雨帅惜，独不为奉天桑梓计乎？兄今当为雨帅策万全，不可私逞意气，妄动干戈。江南之地，固不必争；江北之地，亦不必守，宜劝雨帅力持三省之力……以待天下之归心。”

同一天，徐树铮还致电盛京齐齐哈尔吉林，探投张辅臣、吴兴权两督办，谓“雨帅为拥戴合肥中坚，奉事即大局之事”，希望两督办与张作霖妥议东三省之事，“保养全力以待后图。”倘若入于困战，“奉军尽失所长，再经挫败，奉事何以善后，大局益无根蒂。”

冯玉祥越看越气。恰恰这时张作霖、杨宇霆已将主力撤退。孙传芳进军

至徐州，也就宣布“胜利”回师了。冯玉祥怅然若失，殊怨徐树铮多事，不禁顿足骂道：“狡猾的胡子（指张作霖），可恶的小徐！”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件震动一时的重大事件。奉系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师师长郭松龄，曾为奉张立下汗马功劳，但却没得到想要的地盘和奖赏，并和杨宇霆、姜登选等矛盾日

深，因而图谋倒戈反张，暗与冯玉祥相互联系，两人一说即合。11月22日，冯郭双方签订了联合反奉密约。次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讨张，率军七万人反攻东北。25日，冯玉祥派宋哲元率部出喜峰口，向承德、热河进军，以配合郭军，并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26日，徐树铮从美国檀香山轮抵日本东京，29日通电国内各报馆，指责郭松龄等“苟合之朋，皆无救国主旨，徒以利结，利尽交疏，舍干戈相向，更无他能”。犹如脓肿，“不容姑息”。

郭松龄初战得胜，张作霖竭力组织反攻。接着，日本出兵助张，郭即战败身死。冯玉祥难免郭死已悲，不但怨恨徐树铮助张之屡屡通电，更怀疑他联络日本出兵。

冯段交恶政局乱徐孙联合访状元

冯玉祥对段祺瑞早就怀有敌视之心。段祺瑞撤过他的职，推行他极力反对的武力统一政策，支持徐树铮杀害陆建章。这些，冯玉祥都不会忘记。天津会议时，他主张实行委员制，段祺瑞不愿接受，徐树铮在香港也坚决反对。他之所以让段进京就任执政，也只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他曾想迎孙中山来“主持大计”，但远水不解近渴，孙也未必就能同他一般见识，而段、张也不可能接受。段就任执政第一天，冯玉祥就提出辞职，说要“游学欧美，俾遂素愿”。段以“此次该使（玉祥时任陆军检阅使），维持京畿秩序，军民翕服，功在国家。现在大局粗安，岂容高蹈，尚期勉尽职责，共济时艰。所请开去本兼各职之处，应毋庸议。”坚持挽留。此后，冯又三次提出辞呈，段照样“嘉许慰留”。段一上台便任命亲近他的梁鸿志为执政府秘书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龚心湛为内

务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张伯英为秘书，卫兴武为侍从武官处处长。另以曾毓隤为执政府尝事。段甚至“以张制冯”，“联张排冯”。冯玉祥深感孤立，遇事与段掣肘。冯的西北军有十余万人，张的东北军还更多。段赤手空拳，夹在张、冯之间，左右为难。凡事张不点头，冯不同意就难于办成，或者根本不能办成。孙传芳又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称霸东南。吴佩孚在武汉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时刻准备逐鹿中原，西南唐继尧、陈炯明等更是各自为战。整个大局一片混乱。

这个时候，徐树铮虽在国外考察，却未尝一刻忘却国内政局。他不断地与段祺瑞电信往来，为段出谋划策。

徐树铮率领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波兰、捷克、比利时、荷兰、美国、日本等十二个国家。名为政治专使，实际上不仅考察了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信仰等，并且考察了各国的军事、工业、农业、法制、文化、科技、教育和地理状况等。这是一次综合性的大规模考察，欲取各国之长，补中国之短。所到之处，各受重视。先后同法国总统杜美格、总理班乐卫、英国首相鲍尔温、瑞士联邦首长、意

大利总理墨索里尼、苏共总书记斯大林、经济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比利时国王、荷兰女皇威尔敏娜、美国总统柯立芝、日本天皇裕仁等首脑人物和各国有关部长等，进行了晤谈，并同法国和意大利草签了购买军械的合同。由于国内时局生变，特别是郭松龄倒戈反张，冯玉祥出兵助郭，徐树铮深感形势急迫，即将原拟在日本访问一个月的计划压缩为 10 天，于 1925 年 12 月 6 日离日返国，临别赠言：“尤希望日本上下，对于本国此次变局，取绝对不干涉主义。”

12 月 10 日，徐树铮一行抵达上海。上岸前，在上海交涉员许沅等迎接的小轮上，他回答中外新闻记者的问题时说：“在外人观察，以为树铮与北京政府关系甚深，但政府与段执政个人，须分别言之，树铮与段芝老感情极深，诚然，且觉中国目下无第二人再较段芝老适于为元首之人，但对政府不觉其如是。……树铮前日曾主张推段芝老为总统……至各方是否拥护，原不可知，但问除芝老外，尚有谁可以拥戴？……”原来，他 11 月 29 日在日本对国内各报馆的通电中就主张由各省共同拥戴“速正总统大位”，并谓“国家前定制度，不容轻议，委员陋制，不宜国体，且各邦疑虑。冒主此议，必悖舆情，不啻自戕，国亦受损”。还表白自己“素无他长，惟有至诚之心，至正之行，至刚之气，堪供国人驱策。不竞权，不营利，不畏威势，不惜辛苦，但冀得稍纾国难，虽捐顶踵，无所吝避”。这些都发表在报纸上。冯玉祥看了，实在深恶痛绝。他绝不拥段“速正总统大位”。他仍主张委员制度。他期待着与徐树铮较量。他打电报欢迎徐树铮北上，并保证徐的安全。

12 月 11 日，徐树铮乘专车到杭州，与孙传芳接洽。徐对孙说：“馨远（孙传芳，字馨远）兄坐镇东南，赤诚拥戴芝老当政，此乃国家福运。雨亭亦拥戴芝老之人。近闻二公兵戎相见，大可不必，何不请芝老裁决，以弥缝隙。鄙意兄宜拥段联张，以砥柱中国，免为宵小之辈所毁。”孙传芳将浙奉战争原委，一一作了解释，徐树铮表示均可理解，相约共同拥段。当晚，孙传芳欢宴浙省全体议员，请树铮到席为讲考察欧美情形，树铮扼要作了介绍，当场声明不赞成本国现行的执政制。这时段方已在修改执政制，且派专人将方案送往张家口给冯玉祥看，张作霖已经点头，只经冯玉祥同意就可以

付诸实施了。徐树铮还说，“鄙人今次入京，或将供职政府，尤冀诸君加以指导”等等。次日上午，徐树铮又应孙传芳约请，到笕桥阅军。之后即专车返回上海。

徐树铮在上海，与军政商及外国领事、中外新闻记者多方联络，一再申明要合力拥段为总统。15 日，孙传芳又到上海与徐树铮联络，进一步商讨大局与拥段等事。17 日，两人携手至南通，拜访状元公张謇。三人相见甚欢，谈论时局，观点颇为一致。徐树铮兴奋异常，当晚在张謇所设的宴席上大唱昆曲。

次日，徐与孙乘兴同游东奥山庄，张謇“为备蔬餐”，勉励二位携手效力国家。三人还合影留念。晚上，徐树铮返回上海，孙传芳去了南京。此后，南京电讯，“冯玉祥关于组织中央政府问题，频向孙传芳征求意见。孙不愿表示真意，仅谓反对现政府。至关于维持今后政局之方法，则迄未吐露何种意见。”这表明，徐孙联络，已有了作用。这是冯玉祥所不能容忍的。

隐悉杀机来复还承武混沌了仇怨

12月19日，徐树铮从上海乘船北上。23日抵天津，转乘宋子扬借自英使馆的汽车，当天到达北京，即见段祺瑞汇报考察结果，并讨论时局问题。27日，执政府举行了徐专使晋谒段执政的庄重仪式，以向国内外表明徐树铮考察欧美日本各国的重要性。仪式后，徐树铮遍仿各国使节，出席国务会议，报告考察各国的情况。29日傍晚，他托龚心湛出面，设宴和冯玉祥方面的人联欢。鹿钟麟也应邀到席，与他碰杯笑语，好象老朋友一般。这时，他忽然决定离京南返。在他进

京之前，李思浩等友人就劝他“切勿进京”，或“暂缓进京”，段祺瑞也几次“电止缓行，且派员阻其来京”，说北京的形势对他可能不利。但他不以为意，自觉肩负使命，一定要尽快到京，依照礼法复命。同时龚心湛等也有电报催他北上。他回国前曾通电推荐龚心湛为即将成立的新年阁的总理人选。他本人也打算在政府中任职，以推行他的经国大计，所以亟亟赴京。进京之后，发现形势确实对他不利，才忽然决定离京南返。

就在29日下午，段祺瑞突然发现自己的书桌上有一张纸条，上写“又铮不可行，行必死”。他赶紧叫人送给徐树铮，树铮看了只是一笑置之。专车已经备好，有人劝他借乘英国使馆汽车先到天津再转往上海，但他坚持要乘火车走。他说“北京四周，到处都是仇家爪牙，随时随地都可致我死命。我之所以犹能安然无恙者，徒以鬼蜮伎俩，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露其面目耳。我若躲躲藏藏，岂非正中其计！”到站时，褚哲文带一连人准备护送，但他坚辞不允，自信绝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然而，致他于死命的事情正在进之中。

早在一个月之前，冯玉祥方面就已布置杀徐的计划。11月26日，即徐树铮归途抵达日本的第一天，冯玉祥命令鹿钟麟拘禁了曾毓雋，接着又逮捕了姚震，还准备逮捕梁鸿志、李思浩、吴光新、叶恭绰、朱深、沈瑞麟等，这些人都是徐树铮的老朋友，并在执政府任要职。逮捕这些人，就等于断了徐树铮回国后活动的渠道、门路和支柱。冯玉祥派朴化人在上海搜集情报，派副官长张允荣负责布置计划，派其督办公署外交处长唐悦良住京负责避免引起外交方面的问题，令鹿钟麟在北京坐镇主持执行计划，为尽量避免是非，先从手枪队中挑选20人，由陆承武带领，化装入京，伺机行刺。但陆

等一直没能得手。鹿得知徐树铮突然准备离京南下，立即打电话报告驻在张家口的冯玉祥，请示处置办法。冯玉祥沉思了一会，断然以电话指令说：“现在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只有就地逮捕枪决！”鹿觉得那样干对自己很不利，便脱口说道：“那能行吗？那样做问题太大，恐怕……”

“怕什么？天塌了有柱子顶着！”冯玉祥丝毫不容分辩地厉声说道。

鹿钟麟随冯玉祥多年，深知其秉性，他的决定谁也不能更动，谁若稍微触犯了他，谁就会遭到不幸。他具有无上的权威。对于部属将领来说，他是位至尊而极严厉的家长。甘肃督办刘郁芬和察哈尔都统张之江不都曾被罚跪？鹿钟麟自己也曾在全军将上面前，因没扎好皮带而被罚跪。对于政敌，那就更可想而知了。鹿钟麟只有执行命令，但还是深怕对自己造成不利，仍想找个不落痕迹的办法。

这时，专车已从北京开出。鹿钟麟急命参谋处同丰台站联系，答复是“车已开过丰台，计时尚未到达廊坊。”鹿赶紧再向冯请示办法，并说：“小徐一走，从此多事。如决心干掉他，仍可用电话命令张之江执行。”冯即命鹿转达张之江，派工兵队埋地雷炸专车。负责冯军运输的许祥云，也接到命令，

转饬各站，设法延迟徐的专车通过，以便作好杀徐的充分准备。

张之江是河北盐山县人，行伍出身，信奉基督教。在冯玉祥部历任团长、旅长军职，是冯的主要战将。推翻曹锟后，任察哈尔都统兼骑兵第一旅旅长。现在是冯部第五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12月20日才结束了在京津路东与李景林部的战斗，撤到廊坊办理善后，并等待回到察哈尔都统任上。接到鹿的电话，他若有踌躇他说：“此事重大，不宜鲁莽。”鹿

说：“这是命令！”张即找参谋长黄忠汉计议，决定改用“先理后兵、截车抓人”的办法，遂命副官长宋邦荣（号汉铮），把彭仲森叫到总指挥部。彭是张部第七混成旅参谋长代旅长，与宋是保定军校同学，并相处至好，此时负责廊坊车站及附近一带的警戒工作。由他亲自到车站守着站长给万庄车站打电话，让徐的专车通行到廊坊来，并“不让它开走”。

专车晚上7点钟由京开出，夜半12点一刻始抵廊坊。车刚停，黄忠汉即持张之江名片上车请徐，说“张都统特开欢迎会，请专使下车”。徐答：“极感盛意”，但他“此刻头晕”，即命褚其祥代表赴会。褚正整衣，处面一声哨笛，兵队将专车紧密包围。长于武功的手枪营官兵王子平、马华祥、于国冻等多人，蜂拥登车，立刻将徐树铮和随员、跟差等，尽数拥架下车去。徐树铮顾谓士兵说：“我徐某作事，向来了澈生死，不劳诸位簇拥！”说罢大踏步向前迈入张营，随后被拥到离站不远的地方枪杀了。

张之江立即用电话报告鹿钟麟，鹿又立即报告冯玉祥。冯命鹿转教陆承武当夜赶往廊坊。陆从睡梦中惊醒，迷迷糊糊地对来说：“还需要我去吗？”来说：“你不去怎么行？非去不可！”于是，陆被用汽车接送到廊坊，用他自己的话说，“糊里糊涂地唱了一出替父报仇的戏”。他奉命向被拘的褚其祥、徐赞化、薛学海、段茂澜、孙象震、李骏、刘卓彬、韩宾礼等十几位随员们宣称：“过去徐树铮杀了我的父亲。今天我杀了徐树铮。我杀徐树铮是为家父报仇。”接着，随员们又被“军法官”等审问了八小时，并被迫各写保证，按上指印，发誓对当天的案情不泄漏一字，否则各人全家性命难保，还集体拍了一张照片。30日下午5点，宋邦荣告诉他们：“徐某系陆承武所杀，乃冤怨相报。君等获释，皆张都统力保之功。”

随后放他们赤手空拳离开廊坊。

这时，冯方已于29日向上海《时报》预发了“专车被炸”的消息，30日又向国内外记者发了“徐是陆杀”的新闻，还有“陆承武的通电”，张之江和鹿钟麟还编造了响应的电报。可是，由于国内外多方关注，不久真相就暴露了。

获悉徐树铮被杀，段祺瑞禁不住痛哭失声：“断我肱股！断我肱股！”正打算辞职下台，不料冯玉祥先声夺人，竟于新年元旦通电下野。冯玉祥认为，徐树铮之死，必然引起大局震动，以致对自己不利，“与其遗误将来，见讥国人，莫若早日引退，以勉咎戾”，并“拟即出游，潜心学问”。他还给段打来电报，请开去本兼各职。这当然是再将段一军。这时孙传芳在东南组建五省独立政府，吴佩孚称尊武汉，准备联奉讨冯，张作霖稳霸东北，也要联吴讨冯，山西阎锡山对冯亦深怀敌意，他们都不承认冯玉祥控制下的段政府。段祺瑞痛感“事愿俱违，心力交瘁”，1926年元月7日也通电下野，后于4月无可奈何地离京南返，从此再也未能重登政坛。接着冯玉祥也真的解职出游，离张家口到苏联去了。

二十年后，徐树铮之子徐道邻提出控诉。他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控

告冯玉祥，到北平地方法院控告张之江。此时张之江已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与委员长蒋介石素有嫌怨，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唯恐有什么政治背景。他仍坚持说徐树铮是陆承武杀的，与他完全无关，徐道邻告他，是错认了仇人，并很快组织反攻，在《扫荡日报》上骂徐树铮“亲日”、“卖国”。

此案关系甚大，除冯玉祥、张之江外，当然还有时任华北某集团军总司令的鹿钟麟，甚至其他要员。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谁敢受理？蒋介石权衡轻重，又怎可去掉冯玉祥等？1945

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徐道邻的诉状批示说，依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适用的刑法，杀人罪的告诉时效是十五年。所以此状失去了时效。徐道邻马上以抗战八年时效中断为理由提出抗告，但军委会没再回答。法院也一直没有下文。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从皇姑屯传来了爆炸声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死东北王？

日本人终于得到了张作霖坐上火车的消息，将于上午6时左右通过京奉线和满铁线的交叉点，皇姑屯老道口。

果然来了，张作霖的专车终于慢腾腾地靠近了交叉口，日本人都瞪大了眼睛。虽然整趟列车都因张大帅的落荒而回，笼罩着一层煞是低沉的气氛，但那轰轰的声音似乎依然在向人们炫耀这东北王的威扬。

列车把张作霖载到了他的死亡点。坐在五百米以外的望台上的日军东宫铁男大尉毫不迟疑地按下了电钮，轰隆隆一阵巨响，黑烟腾达二百公尺的上空。张作霖，这个被称作“东北王”的一世枭雄，最终得到了悲惨的下场。

时间是：1928年6月4日早晨5时23分。

怪杰出绿林张作霖关外起家称大王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于奉天（今辽宁）海城县西八十华里的小洼村（今属大洼县）。张作霖自家境赤贫，14岁对，其父张有财因结仇于人，被赌徒打死。家中更无生计，便随母投奔镇安县

（今黑山）二道沟外祖父家就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入清军宋庆标下马队当兵。他伶俐机警，精于骑射，深得赏识，被擢为骑兵哨长。次年战争告停，宋庆部移防关内，张作霖也就解甲返乡。三年后离家北走，经冯麟阁介绍，在广宁（今北镇）境内投入董大虎伙帮，步入“胡匪”行列。四年之后脱离董帮，还归家乡，在小黑山赵家庙组织“保险队”，为有钱人作保镖。1901年春节除夕，广宁中安堡镇驻地被沙俄支持的金寿山匪帮偷袭抢占，张作霖逃到八角台（今台安县城）与张景惠合伙。张景惠自感能力不足，便把八角台“团练长”让于张作霖。张作霖接任后，又网罗了周围汤五麟、张作相等伙帮，逐渐形成了一支横行辽西的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转年9月，张作霖在地方绅商张紫云等人的作保下，接受了清政府的招抚，被委任为清军游击马队管带，率部进驻新民府。这样，张作霖便结束了多年的土匪生涯，冠而皇之地当上了清军军官。1906年张部扩编为五营，张升任统带。1907年6月，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指使下，张作霖于新民骗杀了自己的“绿林”同道辽西巨匪林立三，深得赏识，被耀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

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张作霖已在东北崭露头角。武昌起义的枪声震荡全国，各省纷纷独立，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士也积极准备响应。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闻变后，匆匆从黑龙江返回奉天省城，连夜召集会议，商议阻止东三省的革命。赵听从袁金铠的建议，急调张作霖部进驻奉天，拱卫省城，防止革命。驻省城后，张作霖兼任巡防营中路统领，手中握有兵力十五营以上，俨然已是奉天省地方最大的实力派了。经张、赵、袁等人的

阴谋策划和武装镇压，奉省革命终被绞杀于萌芽中。张作霖也因镇压革命有“功”，被清廷委任为“关外练兵大臣”并赏戴花翎。不久，清政府覆灭已定，不足为倚靠，张作霖便一转身去帮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

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果实之后，便命张作霖所部之巡防营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也一跃成为民国陆军师长，其部下张景惠、汤玉麟、

张作相、孙烈臣等人便分任旅长、团长，驻防奉天省城。在奉省张作霖竭力排挤都督张锡奎，锡奎不得已以“老病之身不胜重任”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不久，袁世凯将张锡奎调离，遣亲信段芝贵继任奉省都督。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国民的一致声讨，殃及段芝贵。于是张作霖提出“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决计把“帝制祸首”从奉省赶走。袁世凯苦干处境难撑，无暇与张争胜，为拉拢计，不得不于1916年6月间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至此，张作霖终于得秉省政，成为奉省最高统治者。之后地方官制改革，张作霖于1916年6月7日改称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

1917年初，因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在北京政府内发生了“府院之争”，张作霖宣告奉天独立，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并在此期间乘机扩大实力，新编了第二十九师，任吴俊升为师长。在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进京复辟帝制时，张作霖先骑墙观望。当他发现复辟帝制注定要失败时，再也不顾与张勋的极密过从，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复辟，又乘机夺取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兵权。这样，张氏拥三师之众，奉省全境便成张氏的一统天下了。

同年7月，黑龙江省发生驱督内乱。陆军师长兼军务帮

办许兰洲，自恃兵权，先后将三任督军赶走，自称黑省督军兼省长。旅长巴英额等因与许兰洲分赃不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张作霖一看有机可乘，先派孙烈臣到黑省活动，并于8月间派兵护送儿女亲家鲍贵卿往任黑省督军，夺取了黑省大权，纳黑龙江于奉系之势力领域。

本来，张作霖在取黑省之后，便欲因势解决吉林。斯时他完全可以抓住吉省督军孟恩远参与张勋复辟的把柄，策动在京的吉省议员控告并罢免孟恩远。当他明白倘把孟氏赶走，段祺瑞必将派出自己的亲信田中玉督吉，这对自己非常不利时，故转而采取保存孟恩远吉督职位的策略。直到1919年6月，张作霖见时局对自己有利，才建议北京政府撤换孟恩远。北京政府根据张的意见，便下令免去孟氏职务，调鲍贵卿转任吉督，并任命孙烈臣为黑督。孟氏得革职令，莫名其妙，目瞪口呆，欲图举兵反抗，见张作霖大兵压境，不得已开城投降，交出督印。至此，张作霖完全统一了东北，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

纵横小三省中原问鼎既折将又损兵

早在1904年，张作霖曾在“愿为日军效命”的誓约上按了手印。当时日俄战争在我东三省展开，清政府采取“中立”态度。因迫于清廷的这种政策，张作霖也不敢违拒，只得在表面上采取旁观者的态度。但在私下里，他却抱定主意：欲乘日俄会战之机，弄些好枪壮马，壮大自己的武装，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在日俄战争中，他对“中立”政策阳奉阴违，对日俄两方双管齐下。起初，他见俄军强大，便暗中为俄军效劳。随着形势的转变。日军明显地居于优势，他又

暗中倒向了日本一方。不论他为哪一方效力，都是想从中为自己捞到一点好处。

当时，日本陆军满州军司令部翻译黑泽兼次郎在新民府进行间谍活动，曾经在张作霖家里住过。张作霖当时虽为日军效力，却对黑泽等人的“特别任务班”（日本间谍组织）人员没有好感，所以日本军人便想伺机除掉他。

日军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获悉这个消息，立予制止，说道：“现在张作霖正在为我军效犬马之劳，要留着加以利用！”并派黑泽赠张作霖一千元银币，使他专为日军效劳。

日俄战后，日本宪兵怀疑张作霖曾为俄军充当过间谍，予以逮捕，并呈请中佐井户川判处死刑。井户川见张氏所部骑兵颇多精锐，可资利用，便向参谋次长儿玉请示，又使福岛安正和田中义一（亦为参谋部参谋）从中斡旋。最后，井户川命张作霖在“愿为日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按了手印，便释放了。这样，张作霖又一次从日本人手中逃得了活命。

1912年，张作霖捞上了民国二十七师师长。他当然不以此为满足，暗自可心的乃是独霸奉天，统治东三省。张作霖心中明白：日本在东北地区，有极大的势力，自己要想独占关外，首先还得和日本套上关系，增加自己的威慑力。所以，这一年初，他亲自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他对落合说：“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洲有特殊的关系，日本如果对我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中将途经奉天，张作霖又亲往拜访，向福岛表示“宁愿按日本指示行动”。但当时奉天将军为张锡銓，有关东北问题，日本仍与袁世凯和张锡銓进行交涉。对张作霖的亲热表示，只作心中有数，而未有明确表态。

张作霖倒不愧为一大怪杰，经他一路砍杀，终于把关外

三省全部抓在自己的手中，掌握了东三省的实权。这样不得不使日本对张作霖刮目相看了。日本当局深知，今后与张作霖打交道的次数将会多起来，所以便积极地帮助张作霖打败了对手冯德麟，并支持他强夺了吉林。日本想把张作霖培养成日本在满洲权益的维护者，并希望通过张作霖夺取更多的权益。张作霖却也乐得拉上日本作为自己的后盾，去与直皖军阀争胜。这时的张作霖已不满足于东三省的最高统治权了，他的心愿已经变成“我终久非干他一下（指当总统）不可”了。

日本在东三省的权益，与英、美、德等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更不相同，日本当局把东北视为“生命线”，并声言这些特殊权益是日本以几乎使国家覆亡的极大代价换来的。所以，日本在击败了俄国之后，霸占了“南满铁路”、旅大租界，又在东北开设银行、企业，遣驻大批军队、警察，把东北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动辄拨弄事端，干预中国内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便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侵略。“二十一条”因袁世凯的归天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终未落实。现在，张作霖掌握了东三省，且屡屡表示亲善，日本当局一下子便把眼睛盯住了他，希望从他手中谋取尚未到手的权益。

1916年10月，力主支持张作霖的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寺内认为：前任大隈重信内阁，采取赤裸裸的侵华手段，蛮横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复辟叛乱，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所以他决定采取较为隐蔽的手段来侵略中国：对北京政府，以大借款的方式攫取中国权益；对东北，决定支张作霖“统一东北”，以推行日本的“大满蒙主义”。

张作霖得知寺内上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日本顾问

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亦抱欢迎态度。”“现在中国南北冲突，我力欲避开投入政争之漩涡，只想一意与日本相互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以专心致力于开发。请阁下把我这些意见转达贵国总理。”日本新内阁内务大臣后藤新

平 根据自己在 1916 年 6 月至 9 月对东北的两次政治考察,对张作霖分析到:“张在满洲有一种特别的地位,他并无特别官历,也与中央政府无密切因缘。其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纶。且他知道日本在满洲有绝大权力,知背日本不利,顺日本有益。如果吾国利用有这种特殊地位和这种思想的张作霖,那么,满蒙之事,日本皆可以横行无阻了。”所以后藤也主张支持张作霖。

日本人却小瞧了这东北王,而东北王正在耍弄春日本人。张作霖是土匪上身,故而他在秉持大权之后,处事外交亦免不了有土匪的风格。他与日本亲热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藉日本以自重。完全从自己的利欲出发。所以,张作霖的对日外交绝无一定之规,也无具体之策,更不愿与外交当局研究对待办法。因此,遇有中日交涉事件,只凭他个人的意见,随时应付应付,如果有利用日本的必要,便不惜任何牺牲,允诺日本的条件。一挨事过境迁,感到对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损时,便予坚不承认或者托故拖延,不肯履行诺言。他这种作法,日本人大为头痛。领教过几次之后,日本人不再认为张作霖出身绿林,头脑简单,容易利用了。

现在,张作霖深知自己不仅已把东三省严格地握在自己的手心中,而且也获得了日本的支撑。他不再满足于“东北王”这样一个一隅之君的地位,于是在取得奉吉黑三省之后,便即挥军入关,问鼎中原了。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更加复杂。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皖两系军阀,矛盾重重。皖系首领段祺瑞藉“参战督办”的身份,凭仗手中握有的“边防军”和谋士徐树铮所操纵的“安福国会”,把持着北京政府的实权,扩张其势力。皖系的蛮横擅权,引起了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的强烈反对,而皖系势力的扩张,也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于是,1920 年 3 月,张作霖借办寿的名义,在沈阳召集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4 月上旬,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又一次召集八省代表秘密会议,组成了八省反皖联盟。

皖系亦不示弱,段祺瑞急从库伦召回徐树铮。皖直情势已达剑拔弩张的境地。6 月 19 日,张作霖应总统徐世昌的邀请,打着“调停时局”的招牌,带着两营卫兵,开到北京。表面上,张氏以“和事佬”姿态,奔走于直皖之间,貌似公允,但实际上却与直系曹锟暗通声气,并亲往保定与曹会谈。通过张氏的“调停”,于 7 月初徐世昌罢了皖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等官职。这一切,引起了徐氏对张氏的愤恨。

徐树铮早就侦知张作霖与直系在暗中勾结,但却佯装不知。7 月 7 日,徐树铮假借段祺瑞的名义,邀请张作霖到段的住所团河会晤,欲乘机捕杀。但段祺瑞考虑到张作霖过去曾经和他联合,支持他反对直系,不愿对张作霖暗下毒手。这天夜晚,张作霖如约来晤。在会晤席上,张作霖看破了徐树铮的暗杀计划,明白事情不妙,便要段祺瑞亲自送出,急驰而去。徐树铮一看计不果成,又拟令廊坊驻军截击。张作霖得到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赴津,脱却此一劫难。到了奉天,张作霖一走下火车,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我又回来了。”颇为自己能再还奉天而庆幸。

张作霖遁回老巢,再不愿带那“和事佬”的面具了。他致电徐世昌和段祺瑞,扬言将以“武力调停”。随即派出七万大军进入榆关,集结千军粮城、北仓一带。7 月 12 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两军激战于涿州、高碑店、玻璃河等地。奉军便在东路掩护直军。结果皖军大败,段祺瑞不得已而自请免除

本兼各职。这样，直奉两系便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张作霖也藉此把势力伸出关外，扩展到察哈尔、热河和绥远等地，占据着京、津要地。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特区都统。

直皖战后，直奉两派又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而导致了尖锐的冲突。张作霖与吴佩孚各张其强，明争暗斗。英美诸列强积极赞助吴佩孚对抗张作霖。张作霖一方面派员赴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援，一方面又与皖系段祺瑞等人联络，以谋共挫直派。

日本当局自然紧盯着中国时局的变化和张作霖的折腾。当侦知英美列强支持直系打击奉系，百般排挤日本在华权益时，日本政府决定采取支持奉系，更加扩张自己势力的方针。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重申“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内阁在华派设机构，支持张作霖的呼声更是愈喊愈高。

张作霖得到日本政府如此的支持，自然十分得意。12月12日，张作霖再度入京，逼迫靳云鹏内阁下台，组成了以梁士诒为总理的内阁，打击直系势力，大搞亲日外交。张作霖和梁内阁的作为，引起直系吴佩孚的极大愤恨，连发通电，揭露梁内阁和张作霖勾结日本“卖国媚外”。双方唇枪舌战，各披其短，骂得不亦乐乎，奉直矛盾升腾到白热化的程度。

1922年4月末，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张作霖亲到军粮城，

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在长辛店、固安及马厂一带与直军展开激战。战至5月5日，奉军全线崩溃，退出关外。北京政府完全落入直派手中。大总统徐世昌按直系意旨，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想“藉此离间张作霖旧部”，迫张氏安分。

当张作霖正在山海关天泰栈收拾残兵败将时，吴俊升坐专车前来会晤。张作霖在门前散步，见吴到来，转身回室，一反往日款接欢迎的态度。吴紧跟入室，张作霖板起面孔说道：“你怎么这时才来，我正等着你，好办交待。不该玩忽国家命令，赶快回奉就职以安地方人心。咱是老朋友，你干不比别人强吗！我交代完，你叫我住哪里，我住哪里。”吴俊升赶紧说，“唔，大帅！咱不提这个，我在江省，有熟地多少垧，生荒多少方，够我过几辈子了。钱呢，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我还存了多少万款子，我的财产不比你少。再说，他们北京尽闹把戏，咱们斗不过。北京对付广州，还不是这一套，今天撤掉陆荣廷，明天撤掉陈炳焜，结果大家谁也干不成。唔，大帅！你的肩膀比我宽，什么都能担得起。教我在黑龙江剿匪放马，垦地开荒我会，把我搁在奉天，外国交涉，各省代表，文的武的，我可一样也应付不来，一天也干不了。我这时才来，我把家都安置好了，你住大连，我跟你住大连，你到哪里，我跟着到哪里。”张听完，笑了，问道：“他们怎么不来？”吴说：“大帅生气，谁敢来！电报叫他们来，他们就会来了。大家捧柴火焰高，咱们还是干哪！”

张作霖失去了关内的地盘，但奉军的主力依然保存，而且其背后有日本支持，又有吴俊升等奉系集团的拥戴，所以张作霖在关外的霸主地位和权势丝毫没有受到损害。他退撤

关外，即以东三省议会推举的名义，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自治”，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拥兵割据，盘踞东北，行使统

治权。对北京政府的一纸免职空文，张作霖自然压根不把它放在眼里。

自重仗日人张雨亭榆关之内再逐鹿

张作霖不能容忍自己已被直系战败，更不愿坐视直系的飞扬跋扈，他决心要把北京政府抓到手。

1922年5月30日，张作霖返回奉天，立即召集东三省各界代表会议，议定今后的行动计划。7月上旬，张作霖将前巡阅使、督军两署合并，组成保安总司令部。各省省长也以所谓“民选”的形式，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长，魁升为吉林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这样张作霖在关外搭起了“联省自治”的架式。

第二步，张作霖便是着手整治军队，准备他日再与直系军阀决一胜负雌雄。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看到，他的那帮“绿林”式的旧军队，不堪一击，刚一交战便溃如山崩；而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派奉军，却因训练有素，败而不溃，而且也正是依仗这支新式军队，奉军才得以稳住阵脚，没有把全部家当丢在关外。张作霖深切地感受到，要想与直派军阀作一周旋，必须重用新派军官治军，对奉军以专门的军事知识，进行严格的训练，以求能适应正规战争的需要。于是，他听取了杨宇霆等人的建议，大量提拔在日本和国内高等军事院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并将二十五万兵力整编为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两个炮兵独立旅和一个重炮团。同时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由张学良、

郭松龄和萧其煊等人为教育长和教官，负责教育和训练军官。此外还建立了空军、海军，扩充了兵工厂。

日本当局看到张作霖立志颇高，甚为欣赏，接连派出很多军事顾问帮助张作霖整顿训练军队，向奉军提供大批武器装备。不久，又派遣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到奉天为张作霖建设兵工厂，生产战争武器，而且日本政府在后来制定的“对支政策纲领”中强调指出：“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的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

一切准备就绪，张作霖又在寻找新的朋友了。奉系和皖系本来都是亲日军阀，受日本人支持的。过去张作霖虽然曾经联合直系反对皖系，但是在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同样也遭到了失败，于是段祺瑞、张作霖便尽释前嫌，欲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直系，推到曹锟、吴佩孚。同时，张作霖又派姜登选为驻沪代表，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密切商计，双方共同议定：“在政治上互相呼应，在军事上……攻守同盟”，在“打倒曹、吴之后，即拥段上台”。

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军正准备北伐曹、吴。张作霖深知孙中山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声望，于是便派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前往南方同孙中山联系，孙中山先生也很想利用北洋军阀各派间的矛盾，藉以孤立曹、吴，推翻反动的北京军阀政府。孙中山说：“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和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的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孙中山通过姜登选等人知道了张作霖的意愿后，便于1922年9月派遣汪精卫来到奉天，会晤张作霖，商议讨伐直系计划。这样，双方都怀着利用对方的同样用心，结成了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联合同盟。至此，由奉、皖、粤二方力量组成的反直三角同盟便告结成。

张作霖这一次下了极大的决心，要把直系一举置于死地，以解自己心头

的一腔怨恨。他祭起两手，一手是竭力联合皖、粤公开抗衡；一手是利用冯玉祥对曹、吴的不满，从内部瓦解直系势力。张作霖先是派出亲信游说冯玉祥，见有转机，又通过段祺瑞付给冯玉祥三百万元的军费，最后又命张学良付冯玉祥以巨额款项。终于双方约定：“两军相遇，均应对天鸣枪。”直系后院的火便这样点燃了。

张作霖这次可以说是肆无忌惮，没有忧患了。1924年9月4日，张作霖便向直系挑战，致电曹锟，声言“将由飞机以问足之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9月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率六个军二十五万人向山海关、热河一线推进。直系也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出兵二十万人，驻屯在山海关和热河一线。第二次直奉较量正式开始。

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事可从来都不愿闭上眼睛不闻不问，但他们口头上却又永远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直奉战事一起，日本军部和右翼集团中支援张作霖的嚣声便猛涨起来。9月28日，日本宪政、政友、革新三派议员，发表宣言说：“中国政局波及东三省、蒙古，帝国断不能容忍，望政府采取适当之处置。”10月10日，日本军人和政党人士又召集了“对支国民大会”，敦促日本政府以实力支援张作霖。同时日本军部还动员了财阀和政党中的一部分力量援助张作霖。战争中，日本又向山海关派来了一个有十余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帮助张作霖制订具体的战斗方案。

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地带一团混战。正当打得不可开支之际，奉军子弹忽告紧急。原来，奉军训练太差，士兵们以乱放枪来给自己壮胆，随意射击，尤其是在黑夜，乱放子弹更是成了习惯，所以弹药耗费得很快。张学良知道情况后，

非常着急，一面派人购买大批纸制鞭炮送往前线，代替子弹。一面召集郭松龄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说：“我这就回奉天向大帅要子弹，如一周不回，咱们只有去内蒙索伦当土匪了。”会后，张学良便甩下这几十万军队，回奉省找他父亲要子弹去了。正在这时，山海关以北安民寨方面直军靳云鹏派军使来向奉军求和。奉方便利用这个军使，虚与委蛇，与直军拖延时间。一周之后，张学良由奉天回转，带来了步枪、机枪子弹四千万发，炮弹十万发。于是，郭松龄率领四个旅出击，一举突破直军阵地，直军大乱。吴佩孚看出阵势不妙，“亲立炮火下督战”，调用所有精锐，但已不能挽回败局。

奉军刚占优势，冯玉祥便起策应，率领直系第三军阵前倒戈，于10月21日杀回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直系首领曹锟。24日冯玉祥又解除了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吴佩孚获知情状，大吃一惊，刻即回师救京，然大局已定，一切都晚了。吴佩孚强作挣扎到11月3日，已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只得率残部二千余人，乘华甲运输舰，狼狈地逃至英美势力所在的长江流域，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张作霖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张作霖费尽了苦心，终于在1924年11月14日，又耀武扬威地来到了北京城。第二天，他便与冯玉祥、卢永祥等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执掌北京政权。孙中山先生因受邀请，也来到天津，期待与张、段等人共谋国事。张作霖、段祺瑞本无意于坐下来与孙中山认真图谋，便使尽种种手段，与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相对抗。张作霖在孙中山到天津后的第二天，便整衣前往拜访，关起门来和孙中山密谈。张作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可不是好惹的，而

且各国公使都非常反感联俄联共的政策，希望中山先生放弃。他还表示愿代替中山先生疏通外国人的感情，且拍着胸脯满有把握地对孙说：“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也无可奈何，然而他的召开“国民会议”，共谋大任的主张，最终还是被段、张破坏了。不久，孙中山先生病发逝世，粤、皖、奉“三角同盟”遂告瓦解了。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以后，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奉军也在1924年末和1925年初大举入关，到8月间，先后占领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直达上海，几至半个中国。这一时期奉系势力最为鼎盛，张作霖更是洋洋得意。一天，他对一个即将去上海接任的旅长说：“你们快去接事吧，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对没有人敢打我老张。”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一时间席卷全国，掀起了中国反帝革命的又一高潮。英美日诸列强也随之纷纷出动，疯狂地进行镇压和破坏。张作霖也从中充当列强帮凶，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摧残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张作霖这下又把事情办过头了，给他的对手们创造了一个绝好的反奉时机。奉系势力直下长江，进薄上海，直接威胁着直系军阀和江南的各路军阀，这些军阀利用全国兴起的反奉气势，乘机发动反奉战争。而被张作霖挤出北京的冯玉祥和逃至长江流域的吴佩孚也相机而动，准备再与张作霖一拚高低。

浙江督办孙传芳主演了这一场戏。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以“国庆阅兵”为名，调兵遣将，部署反奉。15日，他正式通电反奉，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进击奉军。

16日便攻入上海，逼迫奉系邢士廉辞职，并将邢部未及逃走的三百人解除武装。同时，福建、江苏，湖北等地也都群起响应；吴佩孚也于20日自称十四省“讨逆军”总司令，呼应上海的反奉战争；北方的冯玉祥，也已跃跃欲试了。

奉军处在三方力量的包围之中，情势十分不妙。张作霖手下干将杨宇霆，见机紧急，顾不了许多，尽裹中国银行所有现款，从南京坐压道车仓皇北逃。这样，在南京的奉军第八师全师被俘；在蚌埠的姜登选被迫将军队撤到徐川；张宗昌率军反抗也遭惨败，损折兵力一万多人。孙传芳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便把奉系势力驱逐出苏、皖一线。

上海一役，奉军中只有一个旅长曾率所部进行过几个小时的抵抗。张作霖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气得两眼冒火，他对这个旅长说：“他妈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这小子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奶奶的都少一个胆，一枪没有放，就他妈的全投降了。”

张作霖这次亏可吃得不少，但大局未定，他也不敢怠慢。一等杨宇霆跑回奉天，张作霖便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商讨对敌计划。最后决定，由张宗昌和姜登选的部队在徐州防御；由驻守在热河的张学良、李景林、郭松龄和阚朝玺的部队，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张作霖一方面加紧调兵遣将，进行部署，一方面又与冯玉祥虚与委蛇，向冯表示：“只要一线的和平希望，也不能不委曲求全。”这样，张、冯双方又一次达成暂时的妥协。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签订了“和平条约”。然而，此约签订不到十天，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又于11月22日，与冯玉祥签订了“郭冯密约”，矛头直指张作霖。

后宅起大火 张大帅惜命勾日肇祸因

郭松龄倒戈反奉，把个张作霖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这场戏演得也是十分热闹，东北王被逼得差点没有跑到旅顺去跳海。

郭松龄乃张作霖手下的一员悍将，为张作霖霸业的成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张学良关系十分密切，深得少帅的器重。在奉系军中，郭氏乃一“新派”代表人物，因他和李景林都是国内陆军大学毕业的，所以又被人称为“土派”。而新派中的另一批人如杨宇霆、姜登选等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人称“洋派”。这些人资格老，地位也高，所以对郭松龄等“土派”中人，很是看不上眼，屡屡排斥。由于郭松龄治军严整，英勇善战，战功卓著，颇得张作霖的赏识，其地位和声望也在不断地提高。杨、姜等人对此更是嫉恨。因此，郭松龄和杨、姜等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地加深。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一次军官首脑会议上，郭松龄因山海关久攻不下，主张突袭九门口。姜选登认为第一军已占领九门口过半，不同意郭将山海关的正面部队调到九门口方面。双方由是发生口角，争执不下。郭松龄在盛怒之下，拂袖而去，擅自指挥部队撤离前线。张学良得知后，策马急追，经过苦心说服，郭松龄才带着人马重返前线。等郭松龄回到战场之后，姜登选却又托病离开战场回到沈阳。这样，郭、姜私怨进一步加深。

战争取胜后，自然是论功行赏了。郭松龄本以为安徽督军非己莫属，不料张作霖却委任姜登选当督军，再环顾左右，李景林当了直隶督军，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军，杨宇霆也被委

任江苏督军，唯独自己落得两手空空。郭松龄心头怒气，勃然而生，暗忖：“自己乃一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的将军，为你老张立功匪浅，到头来反倒不如一个在帷幕之内指手划脚的参谋，如此赏罚不公，实难心平，当真可气可恨！”于是，贰心遂定。所以，在奉军江南惨败，张作霖又欲挑动干戈，对付冯玉祥时，郭松龄便联合李景林，与冯秘密地订下了反奉协定。

11月22日，正当郭、冯签约之际，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奉，张学良也劝郭松龄回转奉省，向张作霖面陈自己的意见。郭松龄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已被张作霖识破，召自己回奉，不会是好意，立刻下定了“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郭松龄便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无可挽救了，不如父让子继，由你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整治东三省局面。”张学良听了，骇然吃惊，却不动声色，遂即使搭乘北宁路火车离去。早先，冯玉祥曾建议郭氏将张学良扣留，可郭因感于学良与自己的私人厚谊，不忍下手，任其走了。

当夜，郭松龄与李景林进行密议，连发三个通电。第一电，要张作霖即日下野，请张学良接掌大权；第二电，要杨宇霆下台；第三电，宣布奉军和国民军双方停止行动。第二天，郭松龄率司令部人员和卫队搭车东上滦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郭松龄在会上列数了张作霖的种种不是，表达了自己倒张的决心，最后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了固然没有问题；倘若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其夫人韩淑秀当即应声说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了。”在座军官一个个都默然无声，会议气氛低落得很。

说来姜登选也活该绝命于此。正当郭松龄开会之际，姜氏乘专车返奉经过滦州，郭闻知后便命人以请姜氏晤面为名，

把他扣押。姜氏知郭欲起事，极力反对。新怨旧恨使郭松龄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命令把姜枪毙。于是，王副官带着两名卫士，骗姜说用汽车把他送往城里。当行经一片沙滩地时，这位王副官向姜说：“这是一段沙滩，车子不好走，请督办下车走几步吧！”姜登选便下车前行，未走几步，王即向姜开枪射击，姜即应声仆地，随即又补上两枪。这样，声名一时的安徽督办姜登选就这样死去了。王率两名卫士，就地掘了一个坑，收尸掩埋，便即回城向郭松龄复命去了。

11月24日，郭松龄在滦州再发通电，列举张作霖“失政”和杨宇霆“祸奉罪状”，并说此次挥师还奉，一待驱除祸首之后，“即率部屯垦边境，以固国防”。与此同时，冯玉祥和李景林也宣布“中立”，并通电迫张作霖下野。之后，冯玉祥即遣宋哲元率师出喜峰口，向承德、热河进军。

25日夜，郭松龄派魏益三部熄灭车灯，潜行出击。26日攻下秦皇岛，27日冲过山海关。29日进占绥中。郭部俱是奉系军中精锐之兵，来势果然一路横扫，不比寻常。30日，张作霖发出了对郭松龄的“讨伐”电，声称“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悬赏八十万元求购郭氏的头颅。同时为作一缓兵之计，又赶忙将杨宇霆免职，请日本驻奉总领事内田转达郭松龄，表示自己要和平安交出政权。

郭松龄没有予以理睬，坚持要张作霖下野。张作霖一看计不得售，只得倾其全力陈于连山，想借地形之利阻退郭军。可郭军不惧天险，不顾严寒，一举击溃奉军的阻击，取得连山之战的胜利。12月5日，郭军又占领了锦州，前锋抵占沟帮子等地。紧接着，郭松龄便准备进兵新民、营口，两路直夺奉天。

张作霖这一下可真是心惊胆战，计无所出了。奉天省城

一片混乱，人心惶惶。张作霖也是整天躺在床上抽大烟，抽一会烟，又起来在屋里来回地走。嘴里口口声声骂小六子（张学良）不是东西，又自懊悔误信鬼子（郭的外号）。张作霖估计着这奉天省城过不了几天恐怕就不是他的了，于是便收拾家当财产，用车运往满铁车站，准备给郭松龄腾挪地方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张作霖打定了走的念头之后，便让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召集省垣各法团负责人在财政厅后院的公馆里开会。王永江说，“大帅让我召集你们大家来谈谈。军事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但集中兵力还可以背城一战，不过使家乡父老遭此兵燹之灾，大帅还是不忍心的。所以大帅说：政治好象演戏一样，郭鬼子嫌我们唱的不好听，让他上台来唱几出，我们到台下去听听，左右是一家人，何苦兵戎相见，岂不失去了亲近？现在专车已经备好，烦诸位辛苦一趟，沿铁路向西去迎接他，和他说明，我们准备正式移交。”王永江这一席话，直把在座诸公听得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捉摸不透张作霖究竟是怎么个意图。不得已，大家便推荐省议会会长范先矩为团体首席代表，商定了起身时间、准备事项等事谊后，各自散去。第二天又突然接到省公署的电话，言称昨日所嘱事宜，暂且缓行。大帅又下决心，准备抵抗了。诸公知后更加目瞪口呆，不知所从。于是有人传说：大帅请南门里的张瞎子给他算了一命，这瞎子说他乃大命之人，将有“九五之尊”。因此大帅陡觉胆壮气粗，信心倍增，下决心与郭鬼子作一番较量。

日本人一直瞪大眼睛紧盯着张、郭间的对垒。日本在东北王身上花费的心思可不少，好不容易才扶植起来，怎么也不能容忍就这么一下子被打

倒。而且日本还考虑到张、郭

之战推进到东三省境内，日本的权益更可能大大地受到损害。因此，在郭松龄宣布倒戈的第三天，日本便宣布：在满蒙有帝国非同寻常的特殊权益，对满蒙发生的任何事件，日本政府都不能持“旁观态度”。张作霖这时已经是走投无路，又想起了他的日本朋友们，赶紧派杨宇霆到大连去同日本人磋商，请求援助。

1925年12月4日上午，日本内阁召集会议。日本陆军大臣宇垣说：“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情报表明，这一战的结果对奉天大约很不利，很可能以张作霖的失败而告终。我所感到忧虑的是，倘若张作霖果然被郭松龄赶下台，何人能够取而代之以维持奉天政局？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其结局很可能出现无视日本在满蒙地位的狂暴事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为张作霖所统治的北满势态，将难以保持以往的平静，如果这种情况不予制止，其结果对日本必有不少不便及不利之处。可说在这种形势下，如对即倒的张作霖给予强有力的援助，采取积极的行动，则又是十分危险而且显得草率得很。所以目前可尽力采取各种手段，以保护南满铁路沿线帝国侨民的生命财产。本人以为可以根据附属地之地势及败军杂乱的情况，在距铁道沿线一千米以内的地方派军队巡逻，以寻求防备措施，所以我们还须和关东军司令官取得联系，共作计议。”宇垣谈完了自己的看法后，日本外务大臣币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今年的时局与去年直奉战争对不同，总的趋势表明，冯玉祥和南方的国民党将左右中央政局，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若只把目光囿于满洲的局部情形而不顾及北京和长江方面的形势，轻率地作出表态，这对帝国的利益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对辽西目前的形势，帝国当不应反应过于灵敏，可以援引去年对直奉两军发出通告之

例，向郭、张双方发出通告，提请他们慎重对待帝国在满洲的权益。而且，据今天早上的报纸报道，国民党中与日本关系颇深的殷汝耕，已经参与郭松龄外交方面的事务，这样我们正好可以通过殷向郭转达我们的意愿，并警告郭，如其敢有反对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的言行，则引起的一切重大后果均由其自负！当然我们也当看到郭松龄很可能战胜张作霖而掌握满洲，所以我们也当为帝国在满洲的权益留条退路！”

日本政府果然狡猾得很。他们已经明白日后不是仅仅和这东北王打交道了。但是如果让他们坐视张作霖被郭松龄轰下舞台，却是不能甘心。而且日本还想乘张作霖危急之机，从中攫取更多的东西。

东北王收拾好家当，正欲往旅顺海边跑，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来到沈阳，通过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约请张作霖在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同町野去和斋藤与三浦会晤，日本驻奉总领事馆副领事田中喜市任翻译。斋藤对张说：“现在郭部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以前，阁下如有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张作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即答道：“日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黑、吉两省军队前来援助，但恐远水难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我想去旅顺暂避风头，到时很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

日本人来找张作霖，可不是想请张作霖离开奉天，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斋藤说道：“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的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若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

时，关东军还可以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

若能同意这种办法，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倘您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上面签字。”斋藤便拿出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叫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要求是：

一、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二、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三、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门江以东的铁路接轨和联运；

四、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五、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东北王的心思一直在考虑摆脱自己的狼狈处境，那顾得上许多。他听田中念完了这五要求，即不加思索地说：“行，行！”随即就在日方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随后，张作霖又小心翼翼地：“万一我去旅顺，需要相当数目的日本金票，现在我不能让官号银行在市场上购买，希望由日本银行借给一部分。”斋藤自然不在乎这个，说道：“可以。”当即用电话通知朝鲜银行奉天支行行长到旅馆商定，用张作霖的个人名义向该行借用日元三百万元。张又要求将他所有的贵重物品三百余件代为保管，斋藤决定将物品送交满铁仓库保存。到此，这一会晤便告结束。张作霖也因此再壮了胆气，不打算走了。

斋藤一回到旅顺，便派三浦中佐搭乘汽艇赶至秦皇岛，然后换乘京奉路车到沟邦子会见了郭松龄，面交关东军通牒，谓郭、奉两军在南满铁路两侧和两端的十二公里以内，不得有军事行动，违者即解除武装云云。三浦又向郭松龄示意，如果能允许将关东州的界线向北扩展到沈阳线，关东军即把张

作霖驱出沈阳，郭军便可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奉天省城，取张作霖而代之。郭松龄当面拒绝日方要求，三浦愤然而去。

关东军通牒虽然明确限制双方军队在满铁附近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却只想阻止郭军进攻沈阳，而张作霖的援军反可以利用满铁火车直驱奉天，转赴兴隆店前线。因此，当郭军进抵白旗堡时，即遭吉、黑增援部队的顽强抵抗。前敌受阻，郭松龄即派蔡多样、齐士英为代表，前往大连，向关东军直接交涉，终究没有结果。

日本一出面帮助张作霖，形势便对郭松龄军不利了。但是郭军也果真有股子狠劲，对日本人也不缩手缩脚，克服严寒单衣、铁路中断等种种困难，顽强进军，于12月17日占领白旗堡，20日攻克新民，进薄巨流河岸，与张作霖军隔河对峙。

12月22日，郭松龄分兵三路与张作霖展开决战时，日本侦察部队组成若干小组，切断了郭军指挥部与前线的联系；吴俊升部又在日本的帮助下，突袭白旗堡，焚烧了郭军的弹药库，切断了郭军后路；日本空军更是对新立屯、新民等地狂轰滥炸，配合张作霖军的正面进攻。由于郭军三面受敌，又闻知弹药库被炸毁，阵脚大乱。郭松龄一看形势不妙，亲临前线，组织了三次猛烈的激战，终至惨败。

郭松龄意识到自己功败垂成，已无法再与张作霖争胜。24日，郭偕其夫人韩淑秀，带着少数机要人员与部分卫队，向营口撤离。当郭氏夫妇化装成农民，围着棉被乘坐一辆骡车到达辽中县的老达房时，日本人获悉了情报。

吴俊升部骑兵营长王永清，得到日方送来的情报，当即驰骑迫踪而来，郭氏夫妇见势危急，急忙藏于一郝姓的白菜窖中。王永清在窖外发现了郭松龄遗失的一张名片，遂将郭氏夫妇从地窖中搜

出逮捕。

张作霖得到电话报告之后，以手加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冲着电话喊道：“他妈拉巴子，可把郭鬼子捉住了，把他给我送到沈阳来，我要亲手毙了他！”继而一思量，说道：“你们把郭鬼子给我看住，我这边派人去取他。”随即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侍卫官二十多人乘两辆大汽车前往老达房押解郭氏夫妇。

高金山电告张学良，说自己奉派押解郭氏夫妇。张学良当即给高复电，叫高金山押送郭松龄时经过兴隆店。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刘鸣九不明白他的意思，问道：“到这里干什么？去沈阳又不顺路。”张学良答道：“到这里我把他放了。”刘说：“这不行啊！大帅本来对你就很恼火，你再把 he 放了，大帅能跟你完吗？”张学良说道，“不要紧。”可是没等电报稿拟完，张学良又接到高金山的第二封来电，言“走到老达房，奉帅令已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学良看完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道：“这下全完了。”

原来，杨宇霆恐把郭氏解至奉天后于自己不利，遂密使高金山设法在途中处死郭松龄。高到后，便矫传大帅命令而把郭氏夫妇就地枪毙。尔后用棉被裹上尸体，用汽车运往奉天。张作霖心头之恨未解，便令部下将郭的肠肚挖出，然后在小河沿暴尸示众三日。可叹开明将领，反奉驱张业未竟，却遭日、张毒手。

四面作楚声皇姑屯一世枭雄绝性命

张作霖终于在日本人的维护下保住了戏台，把那个想上台唱戏的郭松龄送上了断头台。但他依然觉得关外的戏台太

小，一心想到北京去搭一个大戏台子。所以，张作霖一等自己喘过气来，便遣出密使，联络吴佩孚，准备共同对付冯玉祥，然后挥戈南下，扑灭南方革命火焰。这样，张、吴这两个对头，竟然又重新联手成了朋友。

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再度挥师入关。吴佩孚也于1月19日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一方面由湖北向河南进军；另一方面又命直系将领靳云鹗部从山东向河南进攻。这样，国民军所控制的京畿及直豫两省，便处于南北直奉两军阀的夹击之中。与此同时，段祺瑞也暗中与张作霖勾结，企图在北京策划打倒国民军的阴谋活动。面对这种形势，国民军退出了北京。

张作霖对段祺瑞的曲意逢迎未加理睬，他一直想践九五至尊之位，岂能容得脚下多一块绊脚石？段祺瑞一看自己无所依托，遂决定回到天津，结束自己的执政生涯，北京也因此陷入无政府状态。京津地区和直、豫两省也就落入奉、直军阀手中。

张、吴二人的合作只是同床异梦，双方各怀鬼胎，争权夺利，相互争吵不已。但由于面临着强敌，两人尚觉不能撕破面孔，故双方都以些许的让步达成谅解，藉以维系暂时的联合。

6月26日张作霖又一次来到北京，28日晨，吴佩孚也到达北京。当天上午，二人进行互访，随即相偕到同仁堂，参加杜锡珪内阁所设的“庆功宴”。在宴会上，忽听“囊”地一声，双方随即神经紧崩，各自抽枪在手，相互怒

视。当查知是顾维钧所戴的大礼帽从衣架上落地的声音，双方才把手枪收回，十分尴尬地坐下。在宴会上，张作霖又耍绿林手法，与吴佩孚交换兰谱结为兄弟，表示要相互合作到底。张、吴约

定：关于内阁问题，暂仍由杜锡珪代摄，等待军事结束后再组织正式内阁；关于军事问题，推吴佩孚全权主持，参加进攻南口冯玉祥国民军的奉鲁部队，也一律归吴统一指挥。等到攻下南口后，吴即回汉口进攻广东，张即在北方继续攻击冯部国民军。会晤相谈仅三十分钟便告结束，当天吴佩孚回到长辛店，张作霖也回到天津。

这时国内的形势又一巨变。6月间，广东革命政府正式誓师北上，举兵讨伐北方军阀。兵事伊始，广东国民革命北伐军便以凌厉的攻势，先后攻占湖南和湖北的汉口、汉阳。吴佩孚被迫逃出汉口。张作霖一见有机可乘，便于9月7日至11日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援吴讨赤名义，向南方扩张奉系势力，以挤兑吴佩孚。

与北伐军遥向呼应，冯玉祥这时也重振旗鼓，在绥远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潼关，对北洋军阀构成南北夹击之势。

张作霖一见形势有变，在沈阳又坐不住了，10月11日来到天津，意欲纠集各方面力量，与南北革命军相抗衡。11月14日，他在天津蔡召开会议，与会者除奉鲁军将领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的代表也被邀列席，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如何把北洋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北伐军和冯玉祥军的进攻。

这时，据守东南的孙传芳与北伐军对抗，已遭到惨败。他虽然过去与张作霖多有于戈之争，不甘心奉系势力南侵，然而北伐军来势迅猛，自己已无挽回颓势的力量，只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反奉转为联奉了。18日，孙传芳易名换装，深夜搭车北上，19日到达天津后径至蔡园拜访张作霖。一见张作霖，孙氏便深深地一鞠躬，说道：“以前多有开罪，

对不起大帅，今后一切唯大帅马首是瞻。”张作霖对孙传芳这种曲节来归的态度，果然十分欣赏，满面笑容地对孙说：“你辛苦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然后，张作霖请孙传芳谈谈关于讨赤的意见，孙说：“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来，我看应当建立统一的军事组织，由大帅为总司令，跟他们干！”在场的奉鲁军将领听了孙的发言，齐声赞道：“漂亮！爽快！”

11月29日，孙传芳、张宗昌以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热、绥、吉、黑十五省区联合的形式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即在蔡园宣布就职，并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宣布南下“讨赤”。12月27日，张作霖气派洋洋地再进北京城，调度北京政府。张作霖又根据杨宇霆制订的国事计划，派遣孙传芳军在长江方面担任前线，鲁军在江北为后盾；派遣韩麟春率李景林旧部由京汉线“援吴”；命令热河和察哈尔两军协助晋军在包绥方面防范冯军；张学良负责警备京、津；吴俊升、张作相负责巩固后方。张作霖自己坐镇天津，策应四方。从1927年1月至3月，奉军以援吴为名，占领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可是，江浙局势不太令张作霖满意。3月，孙传芳在长江南岸战败逃回江北，南京被北伐军占领。吴佩孚一败涂地，逃出武昌，阎锡山见势又与张作霖脱离关系，奉系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张作霖在军事上逐渐处于劣势。

张作霖又陷于惶恐之中，整天满面愁容，无论是开会时，抽鸦片时，与

人谈话时，或者是看电报公文时，从未一开笑脸。他又想起了那个曾给他算过命的张瞎子的预言，心头蒙上了一块阴影。他时常自言自语，或对其宠爱的五姨太说：“我的好运还有两年吗？真不得了时，我们惟有叫姓段的出来挡挡；再不得了时，我们只有一走了之，回关外，关起大门来过日子了。”

张作霖处于困境，在华各列强也各自惴惴不安起来，英、日等国公使纷纷出动，为维护他们在华的权益，积极策划南北议和。北伐军一路旋风，杀到长江岸边。但在英日的策动调唆下，蒋介石叛变革命，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反革命政权，与武汉革命政府相对峙，北伐因之滞步不前。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

长江岸边的形势变化，给了张作霖喘息的机会。他一方面在北方肆意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方面大树“讨赤”大旗，向蒋介石暗送秋波，同时又派人奔走南北，向蒋声称自己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一直支持三民主义，表示愿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

蒋介石这个新军阀，看透了张作霖急于妥协的心理，便想以招安的办法收买张作霖的奉系集团，却压根没动过与张对等议和的心思。张作霖这时也是迫于势急，权出缓兵之计，哪有真心和蒋介石议和罢手。

张作霖一直没有忘却过自己有九五之尊的大命。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他依然要过一过当总统的瘾，并希望借此团结北洋派力量，巩固他的一隅山河，取得与蒋介石抗衡之势。1927年6月16日，孙传芳、张宗昌和奉系诸将同至北京顺承王府，参加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以及推举最高元首等问题。会议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元首为“大元帅”，并由孙传芳领衔发表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的通电。此时此刻张作霖又忘却了目前的难堪，高兴地说道：

“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从你们就是。”当天，便由孙传芳等八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电，“吁恳总司令”“勉就陆海军大元帅”，充任国家元首，以求“道扫赤氛，澄清华夏”。

大元帅就职典礼本安排在第二天，因“日象不利”，只得延至18日申时的“吉日良辰”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天下午三时半许，张作霖入席，南面而立，鸣礼炮一百零八响，张作霖宣读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和他的“异姓兄弟”张宗昌、孙传芳、吴俊升等人向“大元帅”，行三鞠躬礼，表示祝贺。张作霖就这样实现了自己多年来“要干一下子”的夙愿。不过张作霖至此就到了他的极点，等待他的再也不是好运了。

1928年4月10日，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同时下攻击令，对奉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张作霖四面环敌，濒于全线崩溃，情势大大地不妙。

日本当局对中国政局的变化了如指掌，现在见张作霖已处绝境，再也无意伸出手来再拉他一把了，而只有是落井下石了。

说来这也是张作霖的报应。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张作霖势迫情急，毫不思索地答应了日本关东军提出的五项要求。等到郭部覆灭，他便把这事抛在脑后。日本可不会忘记。早在1926年的4月初，日本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便找到东三省交涉总署署长高清和。林说：“我受关东军的委托，来见贵署长商谈一件机密事宜，那就是去年冬季郭松龄反奉时张上将军同关东军参谋长所签定的密约，当时张上将军以个人的名义签了字，现在关东军希望由日中外交机关协商详细实施的办法，完成两国正式外交换文手续。日本方面由我

代表，中国方面的代表可否由贵署长担任，我们共同决定开始协商日期，
并将关东军的意愿转达上将军，热望及时开始这一工作。”说完便将“日张密约”的抄件拿给高看，并解释说：“第一项就是说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与中国人一样，可以购买土地，享有居住往来和经营工商业的自由权利；第二项所说的间岛，系指吉林省的延吉、珲春、和龙及汪清四县而言，该四县的居民大部分为朝鲜人，其中又多系思想不良分子，为了取缔便利，日本人除在延吉已设有领事馆外，其他三县亦得由日本人设置领事馆、警察署和宪兵队等机构，以便严格管理朝鲜人，借免过去必须同中国官宪办理的麻烦；第三项由吉林的敦化县到中朝边界的图们之间的铁路，由满铁设计包修，在近期内开工，建成以后，与朝鲜南阳站接轨联运；至于最后两项，条文甚明，不用解释了。”

高清和听了心中直骂日本贪得无厌。口中却向林说道：“我即刻将贵总领事的来意向张上将军报告，以后有事随时可由田中副领事前来联系。”林偕田中便告辞而去。日本总领事去后，高清和匆匆去找张作霖，告诉他日本讨债来了。张作霖气得够呛，跺着脚说：“我同斋藤所订的四个条件，当时只说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及东部内蒙古有商租权，让日本人在那里租一点土地做买卖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妈的，谁想到那就是杂居权！吉林省延吉县一带居民都是朝鲜人，土匪很多，即使不是土匪，也是通匪的，不然就是反对日本政府的青年党，我以为让日本人在珲春、和龙及汪清各县，派驻些警察、宪兵，还可以帮助我维持地方治安呢，所以就答应了。我哪知道这就是把咱们的地方行政权让给他们了！总而言之，日本人没有好下水，全是欺骗人！”然后，他又让高清和和省长王永江、政务厅长玉靖寰一起想办法：“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项，以免让东三省父老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一个星期后，田中果然又到交涉署找处长罗靖寰探寻消息，罗说：“近日张上将军公务太忙，高署长还没找到机会向他报告呢！以后有消息时，再通知您吧。”又过了两三个星期，高清和派罗到日本总领事馆见林总领事说：“关于张上将军同斋藤参谋长签订的密约，已为一般人知道了。现在省议会和各人民团体纷纷开会，决定群起反对这一密约。尽管大帅府和交涉暑都说这是造谣，绝对没有这事，但是有的人民团体还常到交涉署打听有关消息。所以这个事件暂时不能进行协商，等待风头过去再谈吧！”田中干瞪眼，却对这种推诿抵赖的做法一时也无办法，只是暗增恼火而已。

日本政府分析着中国的局势，并着重研究了对张作霖的策略。1927年6月间，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一份《有关中国时局对策考察》的报告，指出：日本对南方国民革命中的稳健分子，要给予精神上的支援，对华北尤其是满蒙，从帝国的立场上来看，必须谋求保持政局安定的政策。而且，总是以张作霖为唯一的目标，对帝国的利益来说是极为短见和不策略的。日本应当及早把张作霖一人的沉浮和帝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的维护，加以截然区别考虑。鉴于张作霖现在的苦境，帝国只要不给予援助，他的自我消亡只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而且在必要时给他施加相当压力，亦在所不辞。所以，日本应当抛弃帝国权益和张作霖存亡与共的想法，进而寻求新的应对策略。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刚上台不久的田中义一内阁在外相官邸召开了“东方会议”，确定了积极侵略中国的政策，并决定与“中国稳

健分子”相勾结，宣称“万一动乱波及满蒙并扰及治安，帝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有

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其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8月15日，日本人又在大连召开会议，强调“在满蒙实行强硬手段”。

不过张作霖依然据持着北京政权，在苦苦地支撑着。日本还想乘机从张作霖手中索取满蒙权益，叫嚷解决“满蒙悬案”，在东北修建七条铁路，要求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商租权”、“营业权”等，还逼着张作霖履行郭军反奉时他和日本签订的密约。

张作霖对于日本的种种要求，或是推诿，或是拒绝，或者干脆拖延。虽然他的得势在极大程度上依靠了日本的扶助，可是让他甘心听从日本摆布，做日本的走狗，他可坚决不干。但是南方军队苦苦相逼，自己堪堪难支，所以张作霖又很希望和日本人再次达成妥协，为自己寻找喘息时机。这样一直纠缠到1928年5月中旬，张作霖才在日本要求的五条铁路中四条协议上签字。同时张作霖又一再向蒋介石致意，希望达成妥协。并幻想获得英美的支持，藉以对付日本。张作霖的这种“以夷制夷”的想法和做法，更是引起了日本的怨毒之意。

1928年5月，国民军逼近京、津。日本深恐战乱波及东北，损害其在满蒙的权益，一面出动军队，威胁南军北进，一面对张作霖再施压力，迫其及早退出关外，让出北京，庶可使蒋介石的北伐到此为止。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他谈至深夜，敦促张作霖退出关外，以免战乱在北方展开。张作霖很不乐意，当即拒绝了芳泽的要求，芳泽追问道：“你有信心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这时自然知道自己的无望，答道：“果真打不过时，我再退回关外。”芳泽阴阴他说道：“到时大元帅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的

家，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走，这有什么不行！”芳泽见张作霖不听劝告，便又向他提出“满蒙权益”要求，逼张答应。继而又威胁他：“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要对此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对日本人早就气不顺，这一听更是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烟嘴猛向地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对芳泽吼道：“这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

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也觉十分恼火，继续对之施加压力，警告张说：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关外，“日军当解除其武装”。与此同时，关东军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移至沈阳。

张作霖这次真正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了。蒋介石军队行将攻至，日本又如此相逼，他明白了自己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得于5月30日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2日，发布了“出关通电”，下定决心要关门收摊了。可是日本已布下机关，不打算再让他回到关外了，因为日本也觉得与张作霖打交道也不是遂心所欲的。

其实，按照日本田中首相的想法，倒没有打算干掉张作霖，只想把他逼回关外，“继续与之合作”，把张当作日本武力威逼下的傀儡。可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岗和他的参谋河本大作，都是十分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一直主张使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且他们又深感于“与张作霖谈判也是无济于事的”，

毋宁将其除去，免得碍手碍脚。倘可以藉此造成关外的混乱，使日本有借口出兵占领东北，使之彻底脱离中国，则再妙不过了，他们觉得“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于是，河本大作自

告奋勇，抢过了谋杀张作霖的任务。

河本大作为一举置张作霖于死地，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首先派竹下少佐到北京刺探情报，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和还奉时间，以及张将坐哪一次火车；接着勘察地形寻找最佳的爆炸地点，最后选定了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皇姑屯。同时，河本大作还精心设计了爆破方案：决定用炸药炸掉列车，万一爆破失败，则立即颠覆列车，让“拔刀队”杀死张作霖；再杀死三个中国工人，换上服装，在衣袋中塞进伪制信笺，陈于肇事地点，以作为假相，掩盖炸车之责。这样，万全之策已定，日本人就等张作霖自投罗网了。

张作霖决定回奉的前几天，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密电，说皇姑屯附近近日来日本人不许行人通过，提请大帅注意。张作霖对这一消息未加在意。但他自然也只得为自家性命着想，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起程，后改为2日，最后却在3日离开北京。

日本人依然想从张作霖手中攫取点什么。6月3日午后4时许，日使芳泽又到中南海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在“日张密约”上签字。这可把个张作霖气坏了。在办公厅内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当时芳泽坐在客厅，听得很清楚，坐立不安，急得打转，约过半个小时，张叫陈庆云拿出一叠文件，交给芳泽。芳泽满心以为事情已成，也未细看，接过文件便匆匆离去。等他回到公使馆，打开一看，只见张在每个文件上都只写了一个“阅”字，却没有签署自己的姓名。芳泽急忙打电

话询问，张作霖已偕其六姨太和三公子学曾等人乘专车回奉天了。

张作霖的专车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车，共二十二节，张的包车在中间。专车经过天津时，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下了火车。到山海关时，吴俊升已由奉天赶到迎接。

1928年6月4日5时半许，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日本人事先埋好的三十麻袋黄色炸药突然爆炸，威力非常，南满线路桥炸断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几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和张的六姨太当即被炸身亡，张作霖也身受重伤。齐恩铭临时拦截了一辆汽车，把张作霖护送回到沈阳元帅府。这时张作霖已奄奄一息，对其卢夫人说道，“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便即死去，离被炸受伤仅四个小时零七分钟，终年54岁。

奉天当局为稳定东北政局，秘不发丧，对外佯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张学良知父身亡，匆忙化装回奉，先处理了急迫问题，稳住了东北局势之后，才于21日发布大元帅去世的消息。这样，日本希望通过这把野火，烧乱东北，挑起战端的计划，也就宣告破产了。

本为怪豪出绿林身却每陷纷乱场

横行泉志无竟时穿梭榆关总张扬

待至楚歌四面起还乡为民亦妄想

世间本厌逞强事无限感叹对夕阳

这是后人读了这一段历史，不禁感叹东北王身出绿林，一世枭雄，心却每每留念于是非利欲之中，身亦时时徜徉在纷乱争胜之场，到头来终落得凄惨悲凉的下场，岂不可悲可叹！

混世魔王血溅济南站 ——张宗昌被刺案

1932年9月3日晚6时22分，济南火车站突然枪声大作，随着枪声传来一个男人急促的喊声：“我是郑继成，乃郑金声之子，杀死张宗昌是替父报仇！”喊毕，迅速跑进附近的铁甲车内。这时，人们看到在第三站台北面的第七股道上，躺着一个肥大的汉子，殷红的血和白花花的脑浆正在汨汨外流……，他就是作恶多端的张宗昌。

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幕血淋淋的替父报仇场面因何而来？郑继成、郑金声、张宗昌这一串名字的背后又埋藏着什么仇仇相报缘由？郑继成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这篇故事就从解答上述问题开始说起。

张宗昌暗收姜明玉 郑金声身陷济南狱

郑金声字振堂，山东省历城县人。光绪二十五年投新建陆军当兵，由哨长升任奉天陆军第一混成旅第一营前队队官，与左队队官王石青、后队队官冯玉祥结为密友，共同组织武学研究学会，密谋革命。郑金声于1908年考入奉天讲武堂，毕业后任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管带。民国成立后，郑曾任绥远陆

军第四团团团长，混成旅旅长。1924年投靠冯玉祥，参加首都革命，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又因参加天津战役有功，实授陆军中将。1926年初，郑调任西北军东路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7月，郑指挥所部刘汝明、佟麟阁、陈希圣等师四万余人，与奉（张作霖）、直（吴佩孚）、鲁（张宗昌）联军三十余万人大战南口。鏖战月余，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守绥远。

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在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誓师，宣布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所部绕道陕甘，东出潼关，联结国民革命军，共同北伐。这时，冯玉祥委任郑金声为总参赞，襄办军务，并主持包头至五原间军事工作。

1927年3月，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逃入四川，依附直系的陕西督军刘镇华易帜，投靠国民军。冯玉祥将刘镇华部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任命刘镇华为总指挥，姜明玉为第一军军长，张得胜为第二军军长，万选才为第三军军长，7月，冯玉祥令刘镇华为援鲁军总司令，率所部开往杞县一带待命东征。刘镇华深知第八方面军成员复杂，且缺乏训练，恳请冯玉祥简派大员前来襄助军务。军界人士均知刘部多系土匪改编，将骄卒悍，很难驾驭，多不愿到该部任职。冯玉祥经过慎重考虑，才选派郑金声出任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兼援鲁军前敌副总司令。时郑金声正在郑州医院养病，许多人都劝他以病推辞，勿入危险之地。郑乃慨然道：“国家多难，安避危险。”遂只身前往杞县就任。

刘镇华见郑金声前来襄助军务，极表欢迎，事事均与相商；且将该军分为两部，即以姜明玉部为第一部，拨归郑金声统辖，以张得胜、万选才两军为第二部归自己统带。斯时，

东路战事吃紧，第一集团军派郑大章骑兵团正向济宁前进，冯玉祥令郑金声率姜明玉部进驻曹县，相机进援。但姜明玉按兵不动，致使郑大章于8月6日占领济宁后，因孤立无援而撤退。虽然郑金声对姜明玉已生疑团，然

犹冀以诚相感，并与之食眠同俱。

第一集团军暂时撤退之时，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人即拟由山东、直隶两路猛进，以期夺取河南，进窥苏皖，恢复被北伐军占领的地盘。于是令褚玉璞、张敬尧、刘志陆、孙殿英等人，率二十余万直鲁军迅速南下。冯玉祥见敌来势凶猛，即命鹿钟麟率杨虎城、王金韬、刘镇华等军迎战于黄河口一线；又命郑金声在曹县担任左翼指挥，严防直鲁军刘志陆、潘鸿钧等部来犯。双方重点在陇海路展开激战，直鲁军损失严重。张宗昌为援救败局，唆使刘志陆收买姜明玉，背叛郑金声。双方达成的条件是：张宗昌许诺给姜明玉现金三十万元、手提式机枪十架，并委任姜为军长。而姜明玉必须将郑金声逮捕，押送到济南，始为表示反水诚意。有此密约，姜明玉遂决心伺机叛变。

10月11日，冯玉祥令刘镇华部分三路进攻鲁军，刘即以姜明玉军为左翼，由曹县向成武前进；以万选才军为左翼，攻菏泽；以张得胜军为中军，攻定陶。当郑金声找姜明玉商量出兵时，姜骗郑说：“今敌亦分三路来攻，吾部可暂取守势，俟万、张两路攻至敌背后，敌必退回，至时吾再尾击，当可收夹攻之效。”郑认为此计尚妥，遂表示同意。

10月12日，鲁军刘志陆、潘鸿钧等部故意来犯，姜明玉即佯作防守之势。这时，郑金声到姜军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谓：“今敌已逼近，万、张两路刻已动员前进，吾部务速预备作战；倘敌来攻，望各部沉着应战，万勿轻躁。”众尚

唯唯听命。午后4时，待刘镇华派慧玉珍师长率部来援，鲁军已逼近城下，惟两方尚未开战。

10月13日，姜明玉在军部宴请慧玉珍，郑金声出席作陪。晚10时送慧回营后，郑金声对姜明玉说：“敌人既已逼近，恐明早拂晓来攻，我辈可坐以待旦，以免临时仓卒相召。”姜明玉佯装听从。郑金声索地图置案上，察看曹县附近地形，选择出击方位。夜12时许，张宗昌派参谋乘汽车偷偷进入曹县城，给姜明玉送来现款五万、手提式机关枪十架，催促姜明玉速履行密约。姜明玉的副官即以更衣为名，促姜外出与张宗昌的参谋相见。姜明玉见部分款项和枪械已到，遂表示一定按原约进行。姜明玉回到室内，对郑说：“今敌军数万，人数枪械十倍于我，且饷项充足，接济无虑，较之吾部大有天渊之别；况严冬将至，兵士尚着单衣，无弹无饷，何以应战？不如暂降，以图发展。”至此，郑金声已知姜明玉投敌决心已定，仍以温语激以义气，希冀挽回于万一。郑说：“我东路军，连日败敌于马牧集，大有再取徐州之势，至吾方军队虽少，现慧将军的援军已到，尚何所惧？况北伐军自入豫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收复平津，指顾间事。君如振刷精神，勇力前进，至时吾必力保汝有相当位置。”姜明玉听完这番劝告，无语可对，复又相对闲谈，支吾言他。

10月14日凌晨5时，姜明玉又以夜间投敌之言试郑金声。郑愤然道：“汝既欲降，可任汝为之。我以身许革命，不能从矣。”言毕，郑金声即忿忿回归驻地。郑金声刚至驻地，姜明玉的副官来告：姜军长即来商要事，请暂勿休息。郑知姜此来必有变，与其坐以待变，不如仍回姜军部以观究竟。郑再至姜军部，见手枪队均已佩枪侍立，如临大敌。姜见郑复来，下令卫队将郑逮捕。郑之随从见形势有变，开枪向姜射

击。姜急避入室内，旋即随从缴械，郑被推进暗室中。姜在室外向郑宣

布：“吾已与张督办（指张宗昌）合作，请君即往济南，代吾报告此处情形可也。”郑厉声斥责道：“吾待汝非薄，今尔竟以卑劣手段对我，汝尚有良心耶？”姜不理郑言，命令副官强押郑登车，速送至定陶刘志陆军部。刘志陆派人押解郑赴济南。张宗昌命令济南警察厅长袁致和，将郑金声囚禁于警察厅狱中，严加看管。

海参崴卖妻换赌本济南城杀郑不留情

张宗昌何许人也？其人为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绰号“狗肉将军”，时人给他起个浑号叫“混世魔王”。其父张万福，是个蹩脚的吹鼓手。母亲侯氏，在张宗昌 13 岁时，因家贫如洗，无法生活，便丢下儿子改嫁走了。不久，张宗昌被送到邻近的杲村一家酒店当了伙计。17 岁时，他伙同几个老乡闯关东，先是在吉林省三道沟打短工，后来又去一家金矿当矿警，一混就是几年。23 岁时，他长得身材高大魁梧，看上去倒也挺有些威武之气。每日值班闲暇，不是去逛妓院，就是下赌场，一天不赌手就发痒。他是一赌就输，越输越赌，背上了大宗赌债。有一次他输红了眼，竟用刀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扔在桌上押赌，惹得几个赌徒差一点用刀子捅了他。张宗昌无钱偿还赌债，为了躲债务，便偷盗了矿上的金子，先跑到大连，后又乘船逃到海参崴。

张宗昌在海参崴住下来，便用黄金兑换到一大笔钱，在繁华的大街上租了两间房子，买了一些杂货，雇了两个伙计，居然开起店来。不久，经人撮合娶上了媳妇。这媳妇名叫志萍，是本地一家小康人家的女儿，生得身材苗条，面目清秀，

聪明伶俐。过门没几天，她就将杂货店的营生摸熟，不用张宗昌费什么心思，只须外出办货就行了，日子过得倒也平顺。安稳的日子没过上几天，张宗昌的赌瘾又起，经常出没于赌嫖场中。有一次，他外出办货，货未办，竟先到“王日灵”赌场又赌又嫖，流连忘返，接连三十多天没有回家。这次他不仅把买货的钱全部输光，而且还欠下大笔赌债，只好立了一张文书，把小店和老婆志萍全都充作货财抵押给赌徒们。

这时，正值 1905 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到处扯旗招兵，走投无路的张宗昌便到招兵处报名，当了俄国兵。俄国战败后，张宗昌又凭着身强力大，被卡斯罗夫中队长看中，收作站岗守门的卫士。有一天，卡斯罗夫的随军夫人过生日宴请宾客，为了显示排场，调集一班卫士到海参崴郊外的私寓守门。张宗昌被调随从前往，侍立中门守卫。宴会开始，卡斯罗夫与随军夫人在众人陪同下，兴高采烈地步入宴会厅，张宗昌斜眼瞟了一下夫人，大吃一惊！那一头乌发、白皙俊俏的面孔和身材窈窕的中队长夫人，正是一年前被自己赌输卖掉的妻子志萍！此刻，张宗昌六神无主地失声“啊”了一声，很快恐惧地低下了头。原来志萍在一年前被张宗昌抵押给赌徒们之后，便被这些人卖给一家饭店当“女招待”。由于她长得美艳，被俄国中队长卡斯罗夫看中，花钱赎出，作了随军夫人。今天正是为她大办生日。张宗昌的啊声，引起志萍寻声而视，一眼就认出是张宗昌，立即怒火中生。志萍把客人送到大厅，转身来找张宗昌“算帐”。这时，张宗昌已逃到大门外的树林中，志萍紧追几步把他喊住，张宗昌只得跪地求饶，连声央求“饶命”！志萍一腔怒火，满面怒容，说：“快滚！以后不准你到这里来！”张宗昌羞愧而去。

张宗昌离开卡斯罗夫家，再次陷入困境。后来，他打听

到海参崴商会会长孙正栋是山东黄县人，便借钱买上一份厚礼去攀乡亲。斯时正值孙正栋的5岁小儿子被当地土匪头子程子安绑了票，索金十万，否则就要撕票。孙正栋正为这件飞来横祸发愁。张宗昌得知此情，正想乘机取得孙正栋的青睐，便炫耀他有办法救人，并保证不出十天定把小少爷接回来。孙正栋对张宗昌的话虽然将信将疑，但出于救子心切，便允诺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果然没过几天，张宗昌一分钱没花，就从程子安手中把小孩夺了回来。孙正栋非常高兴，遂留张宗昌在家作亲信保鏢，后又收为义子。从此，张宗昌经常出入商行、官场，居然“抖”起来了。但好景不长，张宗昌劣性难敛，竟和孙正栋宠爱的五姨太偷情幽会，丑事很快败露，被孙驱逐出门。张宗昌懒惯了，只能干钱财来得快而又不费力的行当，思之再三，便去投靠了土匪头子程子安，干起了抢劫的勾当。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民军在关东招兵，张宗昌率领百余名土匪去烟台，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张宗昌又去上海担任光复团团团长。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下令裁编南方军队，把张宗昌团改编为徐州冷遹第三师的骑兵团。1913年“二次革命”时，第三师被江淮宣抚使冯国璋所率第二路军张勋部打败，师长冷遹弃职潜逃，张宗昌的骑兵团也被消灭，他便带几个亲信去向冯国璋投降。

冯国璋对来降的张宗昌开始不太信任，只给他一个营长职务。张宗昌看出冯国璋对自己有狐疑，决心先干出点名堂来博取新主子的信任。在徐州有个土匪头子叫褚玉璞，手下人多枪多，连北洋军也对他奈何不得。张宗昌靠过去当土匪练就的本领，自告奋勇愿去和褚玉璞谈判收编。收编成功后，张宗昌率领褚玉璞这帮土匪队伍随冯国璋去攻打南京，因功

升任团长，成了冯国璋的心腹干将。1916年春，张宗昌又根据冯国璋密嘱袁世凯的旨意，派人去上海刺杀了策画反袁的陈其美，被冯先后授为旅长、军官教导团团团长等职。11月，冯国璋任副总统后，张宗昌成为冯的侍从武官。

1918年春，张宗昌由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升任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即被北洋政府调往湖南讨伐湘粤桂三省联军。1920年6月张宗昌被湘军赶出湖南，退兵江西袁州（今宜春）。1921年初，张宗昌部闹饷，江西督军陈光远以武力强迫散解，张带了几个亲信逃出袁州，成了光杆司令。

张宗昌潜遁保定，打算投靠直系军阀曹锟，因引荐无门，只好用金钱打通关节。他用暂编第一师军饷二十万元，铸造了八个金寿星送给曹锟。曹锟见张宗昌送来如此厚礼，便答应给他一个师的番号，由他去招募兵员，但又怕吴佩孚不同意，便唆使张宗昌去洛阳疏通情感。张宗昌到洛阳见到吴佩孚，先自我表白说：“吴将军，我是冯大总统亲自提拔的师长，不久前全军在江西被非法解散，没办法只好逃出来。久闻曹大帅和吴将军的大名，愿为二位带兵打仗。”吴佩孚问道：“请问将军有什么特长，你懂得军事吗？在我的印象中，你好象常打败仗。陈光远向中央报告说，你在江西强行索饷，骚扰地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些年来，中央就是被一些投机分子搞坏了。我现在岂能良莠不分，坐视不管！你说我的话对不对呀？”张宗昌听了吴佩孚这些轻蔑嘲笑的话，直气得脑袋嗡嗡作响，依着他平时的秉性，会立即掏出枪来闹得人仰马翻，但现在是在人家的大帐中，如果稍有发作，自己就会立刻殒命。于是，他心中只好狠狠骂道：“你他妈的不就是新找了美国和英国两个洋爸爸吗？狗仗人势，老子以后定要找你算帐，非出这口气不可！”

想到这里，他强压怒火，

突然说道：“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不等吴佩孚回话，他转身而去。他知道保定曹锟那边去也无用了，只好忿忿回到北京。

张宗昌回到北京后，马上去求见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表白投靠诚意。张学良见他委实有些可怜，便带他回到了奉天，让他自己去见张作霖。张宗昌去见张作霖时，特意买了两个粪筐带进大帅府。这时已是1922年初，张作霖正和郭松龄、杨宇霆等人谋划进兵关内的军事布置。张宗昌不等卫兵禀报就闯了进来，郭松龄一见张宗昌就训斥道：“这里是大帅府，不是赌场，你怎么敢随便闯进来？”张宗昌大声回答：“咱特来拜大帅为师，怎么不能进来？”郭松龄说：“原来是这样，听说你给曹锟送去八个金寿星都没拜成师，这次给大帅带来的是什么礼呀？”张宗昌转身从门外提进来两只粪筐放在大厅，说“这就是咱送的礼！”郭松龄不解这是何故，认为他是有意捣乱，正要严厉训斥，张作霖开口问道：“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张宗昌急忙答道：“听说大帅要盖楼，咱想来为你添土打基。”郭松龄听此话更不解何意，可是张作霖却哈哈大笑站起身来，走到张宗昌的身旁，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有心为我添土，我就送给你一条扁担！”张宗昌闻此言万分激动，扑通跪倒在地说：“只要大帅重用，说句丑话，我张宗昌会像狗一样为大帅出力！”张作霖非常高兴，忙把张宗昌扶起，命令设宴为张宗昌洗尘。宴会上，张作霖说明了图直大计，委任张宗昌为苏鲁别动队总司令，让他去招募新兵。张宗昌得此宠幸，喜出望外，激动得泪花滚落。在场的清末讲武堂教官出身的旅长郭松龄，对张作霖如此重用张宗昌很不服气，发牢骚说：“大帅真是慧眼识真玉，也是王母娘娘喜蚯蚓，对眼一条龙呀！”张作霖笑着说：“松龄，你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没看到吴佩孚那小子自战胜皖系后势力越来越大，咱们要跟他打仗可是硬碰硬，弄不好就得伤元气，眼下正愁没人去打头阵冒险呢！我用张宗昌去拼命，胜了不赔，败了不亏，这种合算的买卖怎能不干？”说完俩人哈哈大笑！

1922年4月底，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新招募的乌合之众有千余人，被称作“苏鲁别动队”，跟随奉军东路总司令张作相向苏鲁边境进发。但不久奉军东西两路全线溃败，张宗昌也率残部退到沈阳休整。这时，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起兵反对张作霖，向哈尔滨进攻。张作霖命令张宗昌率部前去剿除。张宗昌到后，很快将卢永贵所部打垮，并收缴各种枪械二千余支、收编降卒二千余人。张作霖接到张宗昌的报捷电报后，立即委任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绥宁镇守使、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张宗昌见张作霖如此重用自己，便乘机大量招兵，扩大势力。

人到走运时，遍地生机遇。该着张宗昌走运，正当他大量招兵的时候，被苏联红军追剿逃窜到黑龙江的白俄军官谢米诺夫率一个师来降，并带有装甲车二辆、步枪六千支、机枪八挺、炮十三门，此外还有不少通讯器材。这一下可乐坏了张宗昌，他吩咐大摆宴席，招待谢米诺夫等白俄军官。宴席上，张宗昌在白俄军官中发现卡斯罗夫中队长和他身边坐着的志萍。他想，这真是冤家路窄，怎么在这个地方又碰上了他们呢？他感到羞愧惊恐，现在已成了大名鼎鼎的军官，怎么能让赌输卖妻这种丑闻传出去呢？他起了杀心。这时，志萍也认出了这位得志的将军，就是曾经出卖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在十六年前她在海参崴过生日时被赶走的门卫。此时此刻，她已意识到张宗昌已

认出了她，心中更加害怕。她知道

张宗昌为人不仅薄情，而且更加心黑手狠。她拉起卡斯罗夫离开宴席匆匆回到寓所，急忙收拾东西准备逃走。刚走出大门，他们就被张宗昌的亲信王栋等人开枪打死了。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任命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六人为军长，张宗昌在李景林的第二军任副军长。战斗一开始，李景林命令张宗昌部攻打直军董政国师，双方在玉麟山激战七昼夜，终于攻克玉麟山、冷口，进薄直军大本营滦州。张宗昌部成为第一支首先攻入关内的奉军。张宗昌又率部直扑天津，意欲捉拿“常胜将军”吴佩孚。当他得知吴佩孚已由塘沽乘舰逃跑后，急转兵锋，过卢台、越昌黎，一路追击由山海关溃退下来的直军散兵。他利用先破敌入关的优势，收编了近十万直军，在马厂改编成四个步兵旅、三个特种兵团、两个先遣梯队、一个辎重大队。从此，张宗昌就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北方实力派了。

1925年初，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张宗昌为苏皖宣抚军第一军长，协助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南下攻打直系干将江苏督军齐燮元。张宗昌命令白俄军冲锋开路，一直打到南京、上海等地，使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下游地区。不久，段祺瑞任命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防徐州。5月，迫于张作霖的压力，段祺瑞又改任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独霸山东三年，为所欲为，成为祸鲁的著名地方军阀。

在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依靠地主豪绅，横征暴敛，残酷地压榨民众，无所不用其极。他征收的田赋，每漕丁银一两，至少八元，多至二十元。按正额累计，竟征至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至于各种苛捐杂税，名目多达五十余种。此外，还特加军事善后特捐、地方公债、

“讨赤”地亩附加捐等等。张宗昌还经常向银行、钱庄、商会进行大宗借款，致使济南的一百二十多家银行、钱庄几乎全都倒闭。他还多次发行“军用票”，强令商民购买，违者军法从事。他把鲸吞搜刮来的大批钱财，都存入大连日本银行。他的生活极端荒淫，仅姨太太就有数十房。他酗酒赌博，一掷千金，毫不在乎。他到处招兵，但又常不发饷，一任部下贩毒抢劫，胡作非为，闹得济南城乌烟瘴气。山东民众称张宗昌为“混世魔王”，并送他外号“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

张宗昌不仅反动，而且嗜杀成性。他任山东督办不久，就下令封闭进步报刊，把大批的进步青年学生投进监牢，有许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1925年5月，青岛日本纱厂三万余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日本财阀的压迫剥削。张宗昌调动三千多军警镇压罢工运动，当场开枪打死打伤罢工工人数十名，嗣后又强制押解回籍三千多人，并杀害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李慰农和青岛《公民报》记者胡信等革命志士。汶上县的老百姓因不堪惨酷的压榨，暗中串联各庄起来反抗，不幸机密泄露，张宗昌立即派兵进行大围捕，不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掉。剿洗过后，尸骸成堆，许多村庄都成了瓦砾场。对张宗昌的种种黑暗统治，山东人民恨入骨髓，怨声载道，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

张宗昌在统治山东时期，他作威作福与愚昧无知的表演都达到了极点。他每逢外出，必在两三个钟头以前净街，卫队排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车马行人等一概不准通行。在他的汽车前后，有二十余辆卡车满载卫兵，个个都端着手提式机枪，空中还有飞机多架随行护卫，直可谓威风八面，总

统不及矣。有一年山东大旱，张宗昌下令要济南全城家家门外插柳，户户设立雨王神位，向天祈祷，求降甘露。但数日过去了，依然是晴空万里，连一丝云彩也没有。张宗昌大怒，仰天大叫道：“限三天再不下雨，必与你老天宣战！”又过了三日，仍然万里晴空，张宗昌命令炮兵把大炮架在千佛山上，向天猛轰。这就是传为笑谈的张宗昌“炮轰青天”的一幕闹剧。

1926年夏，张宗昌随同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在南口打败冯玉祥的国民军后，进入北京，强迫商号、市民使用奉票和山东军用票。为了钳制舆论，他下令杀害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还封闭了几家进步报馆。

这年秋天，广东国民政府派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击败盘踞在华中和华东地区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兵锋直指张宗昌控制的山东。为了抗拒北伐军的进展，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人在天津举行会议。会上，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决意狙击北伐军。

1927年初，张宗昌率十万余众分兵两路南进；一路直趋南京、上海，一路进取皖北合肥。在北伐军强大的攻势下，进攻皖北和上海的两路军队屡战屡败，最后只得退守山东。

8月，国民党发生内讧，宁汉分裂，张宗昌、孙传芳见有机可乘，命令褚玉璞率直鲁联军，沿津浦、陇海线向蒋介石、冯玉祥部展开进攻。冯玉祥见褚玉璞率军来犯，分兵三路迎战：第一路为鹿钟麟部，由马牧集经砀山攻徐州；第二路为刘镇华部，由曹县经考城攻济宁；第三路为孙连仲部，由大名攻德州。冯玉祥又安排韩复榘与石友三部，在郑州、开封一带策应。10月10日，鹿钟麟部与直鲁联军战于杨集、马牧

集一带。

早在开战之前，冯玉祥特命郑金声在曹县担任左翼指挥，统率姜明玉军拦截直鲁军刘志陆、潘鸿钧各部。战斗打响后不久，张宗昌见陇海一线战事失利，直鲁联军损失惨重，而刘志陆等部又不能增援，遂指使刘志陆以重金收买土匪出身的姜明玉叛变，这就演出了10月14日姜明玉逮捕郑金声事件。

郑金声被张宗昌囚禁在济南警察厅之后，其亲友与开明绅商闻讯，无不为之焦急担忧，到处奔走，设法营救。张宗昌每遇人来为郑金声说情，答复均极圆满，各界人大咸以为郑金声生命无虞。殊不知，随着前线战事越来越不利，张宗昌杀害郑金声的决心也越来越大。11月16日，当得知直鲁联军在柳河、内黄、归德等地被冯玉祥军打败，损兵折将三万余人，丢弃铁甲车四列，指挥官褚玉璞仅以身免的消息后，张宗昌气急败坏，立即命令济南警察厅长袁致和（张宗昌的妻弟），把郑金声枪毙，以泄其淫威。

袁致和接到张宗昌速杀郑金声的命令后，恐杀国民革命军的将领被人察觉，会激起公愤，便派出保安队严守警察厅附近道口，不准任何人员通过。至晚十二时，行刑队将郑金声押至院内，郑立而不跪，破口大骂张宗昌：“吾为革命将领，岂能跪而受戮！张贼祸鲁，神人共愤，罪恶之多，罄竹难书。吾生虽不得食张贼之肉，死当夺张贼之魂……。”言未尽即饮弹而死。当夜，袁致和用汽车将郑金声的尸体运往千佛山下掩埋，严令在场的警察和保安队，倘有泄露消息者以军法从事。郑金声被害数日，外界尚无人知道。

狗肉将军图谋再起蒋冯韩巧设连环计

杀害郑金声之后，张宗昌把山东军队倾巢调往前线，要与冯玉祥决一死战。张宗昌仍以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分兵三路进行反攻：右路为姜明玉等

部，由成武、单县进窥考城，直扑开封；中路为褚玉璞等部由陇海路正面西犯；左路为张敬尧等部，由夏邑经归德向杞县、太良进犯。冯玉祥派鹿钟麟、韩复榘、孙良诚等部亦分为左中右三路迎敌。11月26日，冯军击败中路之敌于柳河。12月2日，右路吉鸿昌师亦将姜明王军包围于曹县。姜明玉垂死挣扎，多次突围均告失败。1928年1月31日，姜见弹尽粮绝，大势已去，又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恐城破被俘后不得好死，遂举枪自杀。姜部官兵抬着姜明玉尸身开城投降。冯玉祥令将姜明玉尸身陈于开封街头示众，以为郑金声报仇雪恨。

2月中旬，蒋介石到开封与冯玉祥、阎锡山等会商北伐大计，决定集中兵力先击败盘踞山东的张宗昌。4月30日，蒋、冯军攻克泰安。张宗昌弃济南往北逃窜，经德州、天津至冀东。他扬言要“班师”回奉，被张学良拒绝。不久，张宗昌的残部，在张学良和白崇禧夹击下溃败，他逃到大连求日本主子庇护，其部下五万余众全被白崇禧缴械改编。

张宗昌逃到大连后，一直妄图东山再起。1929年初，他在日本人支持下，纠合一部分鲁军余孽进攻烟台，失败后逃往日本别府当寓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急忙从日本回国，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私邸集合亲信，积极图谋东山再起的活动。这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十分担忧。韩知道张宗昌是山东人，又督鲁三年，在山东有一定的基础，若

要东山再起，必以山东为据点，定是心腹大患，决心设法迅速除掉张宗昌。

此时，蒋介石也对张宗昌图谋再起感到不安。因为张宗昌的旧部，很多人在国民党军队中供职，如果张起而召唤，这些人就是军中的隐患。为此，蒋介石派蒋伯诚到济南与韩复榘磋商，都主张将张宗昌除掉，以根绝后患。至于除张的地点，若派人去北京暗杀会有诸多不便，不如设法将他诓骗来济南，而后除之比较稳妥。经过一番筹划，一个如此这般诱杀张宗昌的方案制定出来了。

张宗昌有个马弁叫刘怀周，曾经跟随张亡命日本，回国后掌管张家内外诸事，被人称为“承启处长”。韩复榘打听到刘怀周和他府中一个参议相识，于是派这个参议去北平找刘怀周联络，刘怀周便介绍这位参议与张宗昌相见，极言韩对张的“仰慕”之情，并说韩打算向蒋介石疏通，使张蒋合作，共图国事。这番“甜言蜜语”，正迎合张宗昌的野心，尽管刘怀周在一旁帮腔，但是张宗昌仍狐疑不决。不久，韩复榘又派张受骞参议赴北平谒见张宗昌，再次传达韩愿与张合作共事的诚意。由于张受骞曾是张宗昌的旧属，所以张宗昌对韩复榘的“诚意”遂信而不疑。

为诓骗张宗昌来济的方案早日实现，韩复榘决定亲自去北平走一趟。1932年7月下旬，韩复榘假借与张学良商议华北局势的名义，偕石友三、纪甘青等人赴北平。7月24日，韩复榘同石友三等到铁狮子胡同张宗昌的私邸拜访，两人一见如故。韩佯表“钦佩”之意，张宗昌极为感动，两人遂结为金兰之好。既结为异姓兄弟，张宗昌大摆宴席庆贺，邀来各方要人作陪，又招妓侑酒，征伶助兴，闹得煞是亲热红火。这时，韩复榘乘机撒下钓饵，对张宗昌说：山东眼下匪患正炽，

我要呈请国民政府委派你为山东“剿匪”司令。又进一步故作亲热他说：既然是兄弟们合作，便是一家人，以前你发行的山东银行钞票，在民间尚为数甚多，也可以向财政部商量拨款收回，以资清理。这些事今天我只不过提

出来，等你去济南时再作具体商议。韩复榘娓娓动听的言词，只说得张宗昌乐不可支，认为韩复榘真够朋友，根本没有去想这是引诱他上钩的饵食。张宗昌表示一定要尽快赴济一行，并密嘱韩复榘千万要严守秘密，万勿泄露给外人。

回归济南后，韩复榘马上向蒋伯诚透露在北平会见张宗昌的情况。他们估计，张宗昌是想来济，但现在可能还有些顾虑，下一步就是要帮他打消顾虑，坚其来济南的决心。于是商定先由韩复榘给张宗昌一封密函，诡称成立剿匪军队事已与蒋伯诚接洽，蒋回南京即与蒋介石商准。现在可将通缉令（指1928年张宗昌兵败逃亡大连后，南京政府对张下的通缉令）先行撤销，一俟军队编制大致就绪，再发委任状。然后，韩复榘再派省府参谋张受春及顾问程希贤赴北平，进一步笼络情感。迨至月底，张宗昌与刘怀周商定，决计赴济南一行。

曾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的张宗昌，毕竟和一般头脑简单的鲁莽军汉有些不同；虽然他对韩复榘的“诚意”“表示相信，但为了慎重起见，在启行前还是托友人暗中打探韩复榘的情况。这位友人打探得知，韩复榘所谓编组“剿匪”军队云云，纯属子虚乌有。考虑其中必然有诈，便决定亲自赴北平向张宗昌面陈实况。行至天津，因事耽搁行程，便发出快函请张暂缓动身，详情等他到北平后面告。快信到北平后，因被刘怀周压住，张宗昌没有看到。赴济南前一日，总参谋长李藻麟认为，蒋介石与张宗昌根本对立，而通缉令又未明

令撤销；韩复榘为人又阴险诡诈，不会有合作的可能，因此力阻此行。张宗昌认为，韩复榘一再表示友好合作，盛情难却，即使事情不成，也不至发生其他变故，遂罢而不听。

至8月29日，韩复榘、石友三催行的电报相继到来。张宗昌复电准予9月2日启程。9月2日，张宗昌偕同承启官刘怀周、副官长程榕及副官刘长清等人，假借去西山游玩为名，秘密乘车赴济南。同行者除刘怀周外，其他人均不知赴济南为了何事。张宗昌一到济南，韩复榘便派石友三、程希贤等人到车站欢迎，引领到纬二路石友三的私邸。让张宗昌下榻石家，这也是韩复榘的精心设计，目的是要使张有个安全感，不产生疑心。

到达济南的当天，张宗昌就到省府去拜会了韩复榘。当晚，韩复榘在石友三寓所大摆宴席，为张宗昌洗尘，并请来各厅厅长、师长作陪。席间，韩复榘说：“张兄高尚之人格，实堪兄弟敬佩；兄弟与张兄订交，不胜荣幸之至！将来同舟共济，一定受益非浅。”这一番“热忱”的吹捧，使张宗昌大为感动，坚信韩是靠得住的朋友。至此，韩复榘绞尽脑汁诱骗张宗昌来济南的方案已顺利实现，下一步就是如何下手杀掉张宗昌的问题了。

郑继成依计报父仇 张宗昌济南遭报应

在张宗昌尚未到达济南之前，韩复榘派人把一封亲笔信送给正在泰山休养的冯玉祥，密告杀张意图，并请示进行机宜。由于过去张宗昌曾与国民军多次交战，杀戮过包括郑金声在内的许多国民军将士，所以冯玉祥极赞成韩复榘的计划，在复函中提出：“可着郑继成以替父报仇之名义杀之。”

冯玉祥提到的郑继成是何许人也？他原是郑金声的侄子，幼时被收为嗣子抚养。及长，随郑金声入营当兵，曾在清军第二十镇学兵营充当正目。民国初年，在冯玉祥的第十六旅当过连长、奋勇队队长。1921年冯玉祥督陕时，郑继成成为巡防第二路参谋。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委派郑继成

策动郑金声率绥远陆军混成旅合作。由于郑继成圆满完成任务，冯玉祥提升郑继成为炮兵团团长。不久，郑继成又升任京兆警备司令兼泰宁镇守使。1926年秋，国民军在南口之役失利，退往西北，郑继成奉冯玉祥之命留守京津作秘密工作。1927年11月，张宗昌杀害郑金声后，为防郑继成报仇，四处张贴告示，悬赏缉拿郑继成，明谕有人能生擒者赏钱三万元，死获者赏一万元。郑继成被逼得东藏西躲，到处无法栖身，只得流亡日本、英国，暂避杀身之祸。一年后，张宗昌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郑继成才敢回国，投奔韩复榘，当了山东省府的参议，日夜未忘报不共戴天之仇。冯玉祥熟知郑继成的为人秉性，所以在密函中建议用郑继成为刺杀张宗昌的人选，名正言顺，最为合适。

韩复榘接到复函后，对冯的建议极表同意，立即依计而行。他召集济南市长闻承烈、省公安局长王恺如、前农矿厅长王芳亭及高等顾问程希贤等人秘密会商，一致认为郑继成替父报仇，合乎情，顺乎理，不仅可得社会舆论的谅解，亦可使外人不怀疑是政府主使。于是决定待张宗昌来济南后，就按计划行动。他们还商定，事成之后，郑继成先到警察厅投案自首，然后再设法营救。会后，韩复榘把郑继成找来，说明杀张宗昌的意图与部署。郑继成报仇心切，欣然领命。

张宗昌来到济南后，韩复榘派人口出散布张是去掖县原籍扫墓，路过济南，转移人们的视听。

就在张宗昌来济南的第二天，韩复榘怕夜长梦多，密谋泄露，就派程希贤敦请张宗昌暂返北平，等待中央发表委任命令。张宗昌也为避免不测，不想在济南久留，遂决定当晚返回北平。张宗昌走期既定，韩复榘决定刺杀地点选择在火车站。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韩复榘制订了两套行刺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济南站行动，委派程希贤为临时指挥。又虑及仅郑继成一人行刺势孤力单，加派陈凤山等五人相助策应；万一郑、陈等人行刺不能成功，再由埋伏在车站四周的卫队待机行动。第二套方案是在列车上行刺。张宗昌此次来济南随身带有新式德国造手枪一支，韩复榘深知张宗昌枪法极好，便指使石友三借口喜爱此枪予以索去，使他失去防身武器。

当日下午，韩复榘在石友三寓所为张宗昌举办饯行宴会。宴会开始，韩复榘首先致词说：“张兄为军界泰斗，勇谋超群，今后果能共事一方，同舟相济，实为我辈楷模，将来承请襄助之处正多。此次张兄来济，兄弟招待诸多简褻，万望张兄海涵。今日送行，虽系暂别，但为庆祝合作之成功，必须痛饮，尽醉方休！”张宗昌也在致答词中对韩复榘大加吹捧，并对其热心提携及殷勤招待表示深切感谢。韩见张身材高大，膂力过人，不免又对他布置的行动计划能否成功产生怀疑。

韩复榘想：酒饮适量能壮胆，酗酒过度能醉人。猛然他心中陡生一计，何不借酒之力，将张宗昌灌醉，使他失去抵抗能力！于是，韩复榘不仅自己向张宗昌频频劝饮，还令陪客的厅长、师长们也轮番敬酒，又让名妓多人献媚把盏，使张宗昌灌下许多黄汤。宴会进行到下午时，因开车时间快到，张宗昌遂起身告辞，偕随员乘汽车赴火车站。临行时，韩复榘假托有重要事情，要留厅长、师长们在省府开会，特委程希贤、张受骞和石友三等人代表到车站送行。

就在张宗昌偕随员去火车站时，郑继成、陈凤山等人也乘坐汽车尾随驶去。郑继成在临行前对妻子李淑芸说：“大仇如能得报，我死你也荣耀，不

必难过。”李淑芸深知丈夫之志，亲手替他包好两支手枪送行。当郑继成六人乘汽车行至距火车站还有半里路程时，郑想此去生死未卜，不能让别人同去冒险，力劝同车五人下车。经他再三劝说，有四人下了车。惟陈凤山坚决要求留下，愿同生死。郑继成无奈，只好同意陈留下，二人遂驱车进入火车站。

张宗昌乘坐的是平浦 202 次快车，下午 6 点 25 分开车。他上车后进入预定的 208 号头等客厅车。宴会上他虽然多喝了酒，但没有醉意，仍同送行人谈笑应酬。开车前三分钟，程希贤、石友三等人下车，张宗昌起坐到车门口，与众人握手告别。这时，郑继成、陈凤山二人正站立在张宗昌东北面，陈凤山首先举枪高喊：“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连开三枪均未响。张宗昌见有人开枪行刺，返身躲进餐车。等陈凤山重新换上子弹，跳上餐车，这时张宗昌已跑到餐车尽头，正欲开门潜遁。陈凤山举枪射击，枪是响了，但未能击中。张宗昌拉开车门，逃下餐车，在餐车上，陈被承启官刘怀周抱住，很快挣脱出来，也跳下火车继续追击张宗昌。在车下等候的郑继成见张宗昌跳下火车，举枪射击，亦未击中要害。张宗昌的随员见有人行刺，都拔枪还击。郑继成本想随陈凤山去迫张宗昌，见张的随员从后追来，隐身避立站台台柱后面等候狙击。果然，刘怀周匆忙从车上跳下，举枪向陈凤山射击，未中；又开第二枪，适陈凤山被脚下石头绊倒，子弹从头顶飞过，又未中。郑继成在石柱后面看得真切，当刘怀周从自己身旁跑过时，向刘开了一枪，当场将刘击毙。陈凤山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追击张宗昌。郑继成从背后赶来追击。就在

这时，埋伏在车站四周的卫队，见张宗昌从车上跑下来，也一齐开枪。当张宗昌跑到第三站台的北面第七股道上时，被击中头部倒地。郑、陈随即追到张宗昌身边，又向张宗昌头部、背部连开两枪。断定张宗昌确已被打死，郑继成遂大呼：“我是郑继成，乃郑金声之子，杀死张宗昌是替父报仇！”

这时，张宗昌的数名随员边跑边向郑、陈开枪。郑、陈一面还击，一面迅速进入附近的铁甲车内躲避，旋即向执法队投案自首。

韩复榘审郑又放郑 国民怨愤终得舒伸

张宗昌由汽车送至济南医院抢救。经检查，左脊背中一枪，弹从左前胸穿出；左眼下中一枪，弹由脑后穿出；左额角中一枪，弹从右颈下穿出。由于张宗昌脑骨被击碎，脑浆一直外流，到医院前已经断气了。承启官刘怀周是小腹中弹，因流血过多，到医院后不久亦死去，副官刘庆顺左膝及左肩各中一枪，因不属要害，幸免于死。其余随员在混战中均已逃跑，不知去向。

郑继成投案自首后，先押在第三路军军法处，9 月 24 日转送到山东省高等法院，旋又交济南地方法院审理。陈凤山也去投案自首，由于郑继成全部承担杀张责任，陈也就很快被放出去了。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及此案处理问题，曾在全国，尤其是司法界、新闻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郑继成是预谋杀人，应该对他从重判处；而多数人则称赞郑的行为是“为民除害”、是“英雄行为”，要求予以释放。社会各界还掀起了援郑运动，给郑继成的慰问品、致敬电源源而来；专程

到济南地方法院看守所来慰问的人络绎不绝。看守所所长的办公室成了郑继成的会客厅，所长又让出自己的住室作为郑的寝室，对郑优待备至。

有许多民众团体、社会组织都纷纷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电，申言张宗昌祸国殃民，通缉令尚在，人人得而诛之。郑继成杀死张宗昌，是为民除害，是正义行为，要求特赦郑继成。各报馆也都纷纷发表社论与评论。《大公报》社论说：“张氏盛时，兵则多多益善，而饱之有无不问焉；妾媵之多，与兵之无数可稽相等。一门脂粉赏赉之费，月至数十万金。不但兵权财权任情滥用，即生色之好亦归独占。纵欲无度，挥金亦无度，而一夕挟妓赌博之费，足令千人万人胼手胝足，劳力一年亦不能供应之。长官如此，部属鹰犬，乃为之吸髓敲骨巧取干民。方其督鲁之年，捐输之重，全省饮泣，以人民卖儿卖女之钱，供督办放荡淫昏之乐，世间不平事，宁有逾此乎？”《历下新闻》以《郑继成复仇论》为题，历数张宗昌督鲁时的罪状说：“溯自民国十四年张宗昌坐督山东，招大批白俄、拥数十万匪军，穷凶极恶，据地称雄，威风凛凛，气压一时。山东民众之惨遭蹂躏，至今道及，尤觉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即以预征丁漕论，一年有征至四次，每两征至八元之多。而勒派军款、发行军用票、省银行钞票、公债票等不兑现纸币，涂炭乡里。而残杀革命民众，在张氏且视为家常便饭。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张即联络残余军阀孙传芳等顽强抵抗，力阻北伐军之进展。后见大势已去，乃不惜引狼入室，勾结日本军阀进兵山东，炮轰济南，造成空前之五三惨案。……张督鲁三载，郑金声之外，被残杀者更不知凡几。郑继成固可杀张，而张更应为鲁人所杀，尤应为国法所杀。是以在张案发生以后，吾人除私自庆幸之外，而

以‘杀得痛快’四字祝郑君之成功，并以‘死得其所’一语对张氏问吊焉！”

《山东民国日报》以《对于刺张案说几句话》为题评论说：“张宗昌割据山东三年，搜刮民财，奸淫民女，虐杀民命，真是无恶不作！临走的时候，更勾结残暴日军炮轰济南，酿成‘五三惨案’的国耻。山东三千万人民谁不恨张入骨，愿得食其肉而寝其皮！只以张氏遁走大连，托庇日人保护之下，遂致无可如何。天幸张氏回国，郑、陈一击而中。元凶殒命，山东三千万人谁不拍手称快？张氏之恶，一死尚不足蔽其辜！欲得张而死之，又可以说是山东三千万人民的公意，不过假手于郑、陈而杀之罢了。”“郑金声为革命健将，不幸落张手中，致遭惨死，真可谓死者赍恨，生者含怨。今郑嗣子乃能乘问杀张，以复此不共戴天之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总而言之，张氏祸国家，殃人民，自有可死之罪；郑、陈复家仇，雪国恨，不无可原之情。况郑、陈事后直认行凶，并不潜逃，情同自首，在法亦有减等之条。愿政府尊重民意，对刺张案从轻发落，非独山东三千万人民同声称快，想为国牺牲之郑金声，亦当含笑称谢于九泉之下！”

特别是以前被张宗昌杀害之人的家属，更是纷纷向山东省政府请愿，要求对郑继成予以特赦。如，曾被张宗昌杀害的前青岛《公民报》社长胡信之女胡玉华，在致韩复榘的电中说：“张宗昌祸鲁三载，翻北海之波，不足湔其恶，伐南山之竹，不足罄其罪，况复残害革命先进！今次回鲁，又包藏祸心。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郑继成杀之，为党为国为父为山东为天下复仇。”坚决要求对郑继成特赦。这时，在泰山休养的冯玉祥，也让人编写了《郑继成为父报仇》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对郑的英雄行为大加称赞，一时使郑继成成了全国人所共知的英雄。

韩复榘为使他导演的这幕刺张剧演得有声有色，令人信服，乃令地方法

院要排练出“审郑”、“判郑”和最后“放郑”的三部曲。10月7日，对郑继成以“预谋杀人罪”起诉，15日公审，17日判郑有期徒刑七年，褫夺公民权利七年。判决不到百日，即于1933年1月，由于韩复榘及社会各界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责令济南地方法院，将郑继成予以特赦。至此，韩复榘诱杀张宗昌的预谋，已全部按照他所设计的步骤完满实现了。

韩复榘杀掉张宗昌后，为了掩人耳目，又用重金备棺厚殓，并于9月11日把张宗昌的灵柩运到北平。此时，张宗昌之子张继乐意欲赴济南报仇，被其母袁氏所阻。袁氏遂携张宗昌之母及子，并所有家财，亡命大连。其余张宗昌的十多房姨太太及追随他的几十名军官护兵等，也都纷纷作鸟兽散去。

津门佛堂溅血记 ——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之死

1933年4月初，天津南马路草厂庵清修院正在举行佛教居士林成立大典，主持法师引导着几十名男女，焚香仪礼。参拜佛像之后，林长靳云鹏、理事长孙传芳宣布林规。曾经显赫一时的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及江浙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今日竟成了佛门信徒。强盗念经，古往有之，军阀参禅，倒是民国时代出现的新鲜事情。他们影息津城，皈依佛门倒也做得惟妙惟肖。孙传芳不仅逢三、六日，风雨无阻，要到居士林佛堂听经，每天在家里还偕同夫人向佛祖行三跪二十四拜大礼。

光阴荏苒，两年过去了，一桩津门佛堂奇案，竟在此刻发生了。

弱女子佛堂开枪 孙居士血溅经文

1935年11月13日，细雨蒙蒙，寒风恻恻，街市行人稀疏，商肆门庭冷落，天津城失去了昔日车水马龙的喧闹景象。

午后二时，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把正在内宅闭目养神的孙传芳惊醒，他拿起电话，操着一口鲁腔问道：“喂，哪位？”

电话里传来紫竹林清修院主持富明和尚的声音，询问他今天下雨，还来不来听经。孙传芳应口答道：“到时间你们就开始吧！我有一点事要办理，未必能到，不用等我了。”

搁下电话，他心里盘算着：今天是诵经日，若借故不去，事后免不了受老靳头的训戒；再说与靳有约在先，也不便失约。他起身吆喝仆人给自己预备冬装，夫人在旁劝道：“馨远，外面还在下雨，天气又冷，就不要去了吧。”

孙传芳并不答话，心中却泛起一丝念头，切莫一不慎而乱了大谋，成为终身憾局。原来，近日孙传芳与日本人土肥原正在暗中频频接触，欲依恃日本势力，图谋东山再起。为了不引起政敌的注意，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煞费苦心。在人前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堂皇样子，在人后却整天做着重振往昔荣耀之美梦。到佛堂去念经拜佛，这是掩盖世人耳目的最好办法，所以今日夫人劝说再三，他根本不予理会，匆匆带领一名亲信侍从，乘汽车直奔居士林而去。

佛堂内，富明法师盘腿打坐正在喃喃诵经，十几位善男信女坐在蒲团上也正跟着唸诵，谁也没有留意这位姗姗来迟的孙传芳。侍从安置好座椅，他也很快披上了黑色僧袍，轻声慢步走到讲经案前。焚香祷告后，起身环视四周，眼光停留在靳云鹏的位置上，空空无人，心中骤升不快，遂悻悻端坐在太师椅上，与众居士一起默诵经文，脑子里却总晃现出那空空荡荡的地方。

诵经还在进行着，居士中一位身穿青色棉袍，外罩蓝呢大衣的妇女悄然离去。约摸过了半点钟又悄悄归来。殿堂中的信徒们好似踏上了三清道路，已被引入彼岸美妙的未来世界，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位妇女的异常行动。

这位少妇在前排就座片刻，心中默默祷告：“父亲，助儿

勇气。”缓缓起身，走到孙传芳的背后，从大衣内袋中掏出勃朗宁手枪，枪口移动到孙传芳的后脑，扣动扳机，子弹应声而出，孙传芳身子向左一斜，倒下去了。少妇又发狠般地照着孙传芳的右额、后背再发两弹。孙传芳立时毙命，鲜血溅满了手中的经文。

三声沉闷的枪声，凝住了佛堂中十几名居士的暇思，惊慌滞呆的目光彼此互相对视着，朦胧中感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这位少妇从容不迫地垂下持枪的右手，向众人高喊道：“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只杀仇人，不伤旁人！”边喊边从大衣口袋中掏出几十张传单，向人群中纷纷扬扬散去。顷刻间，男女居士们看到那具血流如注的扭曲尸体，魂飞壳外。富明和尚率先亡奔，居士们尖叫着、拥挤着夺门而逃。少妇来到电话间，拨通家人的电话，嚷喊着：“孙传芳被我打死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孙传芳被我打死了！”

此时，她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炽烈的心绪开始崩塌下来，感到周身无力，疲惫地拖动脚步，向赶到现场的警察交出手枪，投案自首了。

天津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阎家琦闻讯，迅速率领两名局员和警长赶到刺杀现场。空空荡荡的佛堂内，依然烟雾缭绕，昏暗的烛光映着那具僵直的躯体使人毛骨悚然。孙传芳的尸身，头北脚南，外罩青袍，内穿蓝绸棉袍、灰青棉裤袄、蓝条绒衬裤褂，系白布腰带，脚上穿的是白洋袜青缎鞋。验明孙传芳饮弹三处：一处由后脑勺穿入，子弹卧于右眉角；一处由右额下穿入，从左太阳穴透出；一处由左后背穿入，从胸前透出。昔日威慑五省的联军总司令，今日如此命赴黄泉。阎局长摇头叹气地走出殿外，警长从院子里随手捡起数张传单。传单是油印的，纸张已被雨水浸涩，但字迹仍清晰可辨。

一种是《告国人书》，一种是“说明书”。《告国人书》中写道：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公鉴：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完全是为父报仇。在十年前（即民国十四年）十月三日，有一位堪为军人模范的老将军施从滨在蚌埠车站被孙传芳杀害，那位老将军就是我的先父。现在我把他老人家的为人和这段事的经过，简单地向各位申述：

先父讳从滨，字汉亭，祖居安徽桐城沙子岗镇。兄弟四人，滦州起义烈士施公从云，即先四叔父也。少孤贫。先父弱冠从军，历任曹州、镇江、兖州、济南镇守使、师长、军长、山东军务帮办等职。生平立言行事，尊效关、岳，尤以解除民众痛苦为己任。爱民爱国，一点忠心，非特齐、鲁民众有口皆碑，皇天后土，实所共见。当先父镇守曹州时，该地民风强悍，失业者多流为盗寇。先父多方筹划，创设草帽工厂，收容失业者，授以工艺，使能自食其力，活人无算，盗贼之风顿息，至今该厂营业不衰。此先父为政之一斑耳。常教翹等手足而言曰：汝等存心立志，须能爱民爱物，勿怠惰，勿骄奢，应克己而益群，毋损人而利己。勤劳俭朴，乃人生之美德，汝等共永记之。先父秉性清廉，为官数十载，所余者房屋数椽，薄田数亩而已。

慨自民国十三年政变，张宗昌督鲁，先父以年将耳顺，请退者三。卒以民众之爱戴及政府之慰留，不果辞。十四年孙传芳以五省之众，自称联帅，南拒革命之师，北窥齐鲁之境，穷兵黩武，祸国殃民。先父为捍卫地方，奉政府命率师战于徐州之野，将

士用命，屡战皆捷。卒以孤军深入，众寡悬殊，且见忌于张属。后援不继，遂至兵败被俘，于民国十四年十月三日上午四时，被孙杀害在蚌埠车站之侧，时年五十九岁。夫两国相持，不斩来使，国际战争不加害被俘长官，况国内之同胞乎？而孙传芳鬼蜮其心，豺狼成性，冒天下之大不韪，启内战之端源，粉身碎骨，死有余辜。若孙之伤天害理，反自称“联帅”，与大匪首有何异乎！唯我先父，为国为民，奔走数十载，身逢乱世，卒以热血头颅，牺牲疆场，以政府之命官，为捍卫地方而被杀于乱臣之手，宁不冤乎？宁不痛乎？先父之冤，举国尽悉，中外人士，俱起公愤。而当时之政府，以孙握有五省兵权，惧莫敢问，致此为国牺牲头颅之老将军含冤地下。苍苍蒸民，谁无父母？剑翘处此，呼天不应，吁地无门，能不卧薪尝胆而图报此不共戴天之仇乎？是以忍痛含悲，待母教弟，蜷伏津门，期乘杂乱纷争之际，借政治或军事之力以雪此仇，故于民国

十七年牺牲一切，与同姓施靖公结婚。彼当时曾任要职，窃意借此可报父仇。孰意北伐成功即遭编遣，从此一蹶不振，岂非命乎？从兄中诚，自幼受先父教养培植，且藉先父遇难之机，得握兵权，但此不共戴天之仇，久已置之度外。此手足也，良可怨。夫大舍弟则凡自日本留学回国，即期进行此事。翹阻止曰：死者之仇当报，但生者之气也当争，若弟有万一，则母老弟幼，情何以堪？你我应共同努力，以期万全，达成此志，免伤母怀，是为上策。

时至今已十年之久，且先父已拟定今冬或明

春安葬，翹意在先父安葬之前，务求将孙打死，好慰老父在天之灵，亦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以是离井返津，秘密进行，以必死之决心，尽为人子之天职，成败利钝，非所计也。事成而死，此信可作遗书；幸而不死，此信可作供辞，伏乞苍天鉴翹一点愚忱，使此鬼蜮豺狼勿再逍遥法外，使人皆知，施从滨大仇已报，则翹得瞑目矣。临楮怅望，不知所云，诸维鉴察不宣。”

阎家琦读完这千余字的慷慨陈述，对此桩命案缘由已基本清楚。再看另一种传单，系用明信片正反两面印刷的说明与诗句。正面印有：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翹（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仇女施剑翹谨启。

背面还印有两首七言诗。

局长暗自思忖：天下难道真有这等潜心立志的女子？仅仅是为报私仇，还是有其它政治背景？说是个人行动，策划的何能如此周密？说是集团操纵，又何必自首声张？带着一团疑窦，阎局长未等现场全部堪查完毕，就急急忙忙乘车赶回局里提审犯人去了。

佛堂血案，震动了津门。当晚六时左右，《新天津报》抢先发出《号外》，“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弱女子手刃大军阀的惊人之举，不日便成为轰动全国、震惊中外的新闻。各报记者蜂拥而至，争相采访当

事人和有关人士。各地大小报纸也连篇累牍地转载有关消息。正当民众对这起令人瞩目的案件拍手称快时，天津市地方法院已接到孙传芳家属的起诉书，开始立案审理。

孙联帅兴师东南 施从滨暴尸蚌埠

死者孙传芳，字罄远，山东省历城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孙传芳的母亲因不堪忍受嫡母的歧视，带着四个子女流浪到济南。三个姐姐相继出嫁后，孙传芳和母亲寄食在三姐夫王英楷家。他自幼饱尝寄人篱下的羞辱，立志要为做人上人而奋斗。

1904年，孙传芳在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毕业后，练兵处以直隶官费生送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国，陆军部对留日士官生进行了严格的考试，孙传芳名列上等，赏给他“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派往北洋第二镇第三步队第五标任教官。

孙传芳自24岁步入军界，凭着他善于应酬，广为交际的本领，深得上司赏识。辛亥武昌起义以后，第二镇改为第二师，驻防湖北。他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由辎重第二营营长升任步兵第六团团长、再任第三旅旅长，又调职

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1年8月湘鄂战争后，孙传芳投靠吴佩孚，当上了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江浙战争以后，他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被授予“格威上将军”的称号。

正当孙传芳踌躇满志的时候，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再度开战。在张作霖的胁迫下，北京政府任命奉系大将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字霆为江苏督办，藉图向东南延伸势力。这一

举动不仅限制了孙传芳攫有东南的野心，也构成了对直系势力的威胁。

面对这种军事势态，孙传芳以浙江军事善后督办的身份，调兵遣将，集结军队于苏皖一线，压迫奉系势力。同时，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委命白宝山为苏军总司令，马联甲为皖军总司令，方本仁为赣军总司令，周荫人为闽军总司令。兵分五路，准备迎战张作霖部。孙传芳本人任总司令，号称“联帅”兼掌第三路军兵权，委任陈仪、谢鸿勋、卢香亭、周凤岐为第一、二、四、五路军司令官。布置就绪，孙传芳又竭力宠络苏省士绅、名流张謇等人，制造反奉舆论。

1925年10月，乘奉军孤军深入、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孙传芳命令部队全线出击奉军，江苏杨字霆因毫无防备，只能仓促撤退；上海毕庶澄一夜间也成了孙传芳“花子军”的俘虏。轻取江苏、上海后，孙传芳命令各路军继续挥师北上。是时，奉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张宗昌，已在徐州一线布防重兵，准备与孙传芳在徐州决战。

10月下旬，张宗昌决定派山东军务帮办、第二军军长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统率鲁军狙击孙传芳部。孙对施说，若收复安徽成功，必向北京政府请授皖督之职作为酬劳。

这时施从滨已年近六旬，历经三十年的戎马生涯，遂从区区一马弁成了统领兵马的北洋将官。此次出战，并非施之本意。授命的时候，施从滨曾以年事已高为由，向张宗昌坚辞再三，却都遭到回绝，出于无奈，不得不拼死一战。

11月1日，施从滨率鲁军由兖州、泰安防地出发，迅速向安徽集结。兵至蚌埠，尚未布防就绪，即遭到谢鸿勋与卢香亭两部的三面夹击。施从滨率军仓皇应战，鏖战一夜，终因无力立足，只好撤兵退屯固镇一带。

固镇是津浦铁路上的一个小镇，只有一条一里多长的街道，居民不多，平时以盐为大宗营业。镇南有一大铁桥横跨阴河，河面宽阔。施从滨下令把所部万余人（中有俄军二千人）布防在阴河北沿线，准备迎敌。他又下令：“各将领如有敢退缩者，即以军法处置。”

2日，施从滨获悉桥南十几里处已有联军倪朝荣旅的先头部队驻扎，立即命令白俄队乘铁甲车前往攻击。开始，倪旅只是防守阵地，并不出击，白俄队见状，纷纷跳下铁甲车猛扑倪军。倪朝荣先头部队迎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全数缴械投降。白俄队将俘获的联军官兵绑在树上，电线杆上，凌迟至死。

施从滨得报此仗获胜，乃急令军需用张宗昌事先特备的烟酒犒赏白俄队。时已是4日。

联军卢香亭闻听倪旅先头部队受挫，立即率马葆珩团来援。与此同时，谢鸿勋也命令上官云相团暗渡宿州，绕至固镇以北，扒掉铁轨，切断施军退路。

战事又起，联军出动大部兵力，向固镇桥南压来，打死打伤自俄军八百

余人，很快扭转了局势，双方处在对峙局面中。

在前沿督战的施从滨，见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欲打电话请求张宗昌派兵支援，不料电话线已被割断，无法与外界联络。他估计情况有变，不敢再继续恋战，急忙下令撤兵退守阴河以北，冀图据河阻击。当施从滨乘坐铁甲车驶到固镇桥头时，桥面上已挤满了队伍，他命铁甲车往回开，驰出十几里光景，正面又遇联军拦截，只得再命令铁甲车循原路奔逃，夺桥而过，桥上一千多官兵碰撞挤压，坠入阴河者无算。施从滨驶过固镇桥后，前路铁轨已被拆掉，铁甲车立

刻倾倒路旁，他和随从人员全部被俘。

固镇一仗，“双方死亡枕藉，尸体遍野，惨不忍睹”。据孙传芳部随军记者报导：“此次该镇房屋，为炮火所毁者甚多，人民大都无屋可住，荡析离居，至为惨痛。屋户无一不被抢劫，虽煤油亦被其携去，以一里许之小镇，损失竟达二十余万之巨，灾情之重，不问可知。”

施从滨等人被俘后，很快被押往蚌埠联军总部，孙传芳令军法处逐一讯问。当孙传芳得闻施从滨战事成功而以皖督为赏酬时，怒火中烧，马上将施从滨押至总司令部，声色俱厉地质问道：“我曾三次致电，并派员与你联络，你为什么不理？”施从滨自知落在他人手中的败将，无理好讲，只是默不作答。孙传芳冷笑一声说：“施老，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的吗？请马上去上任吧！”随后命人将施从滨及张宗昌之弟某团团团长，立即押至蚌埠车站南边的旷野上，执行斩杀。

5日晨，蚌埠车站军部的铁甲车上悬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上面用白布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并将尸身置于野外，不准收敛入棺。直到当地红十字会以有碍卫生为由，才允许将施从滨尸体草草入棺掩埋。

11月8日，孙传芳在徐州，大摆庆功宴，炫耀联军的胜利，当时有苏省某巨绅致电云：“钱武肃开府一十三州，吴越奉其正朔，郭令公中书二十四孝，朝野仰若天神。”亦可略见孙传芳在浙奉战争胜利后，张扬威武，群流翕附之一斑。

须眉忘恩不丈夫 巾幗茹辛磨霜骨

孙传芳逞一时之愤，虐杀了施从滨，此事对他来说如同儿戏，但对于施家，却犹如降下塌天大祸。

这日早上，施女谷兰起床，象往常一样来到厨房舀水洗脸。正低头抹泪的老厨子看见她脚上穿着绿色毛线鞋，便哽咽着说：“大小姐，鞋不能再穿了，军长死了。”

闻听噩耗，如同晴天炸雷，直震得谷兰头晕目眩，险些跌倒在地。之后，又听了从战场上逃回来的马弁讲述，谷兰心碎欲裂，痛哭不止。念父亲生前对自己的百般慈爱，想父亲被虐杀时的修景，谷兰一腔怒火无法遏制。她既恨这个战乱的年代，使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她更恨那个杀人如麻的恶魔，使施家顷刻凄凉败落。此时此刻，仇人若在眼前，她能马上扑过去活剥生啖之。复仇的火种已深深地埋藏在谷兰心中，然而，替父报仇，对于一个年仅20岁、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小姐来说，又谈何容易呢？

施从滨死后，膝下遗有四男二女。长子中良平日性情懦弱，凡事不多与闻。长女谷兰，虽生就女子，却具有男子的侠义肝胆。无奈女子空具有男子

的才干，却只能在家帮助母亲佐理家务，外面一切支撑门面的事情，均由族兄施中诚张罗应酬。

中诚是谷兰大伯的遗子，从小在施家长大，施从滨待如亲子一般。谷兰知道父亲在世对族兄期望最厚，并刻意在军界加以栽培，所以一开始就把报仇的希望全寄托在族兄身上。1926年6月，谷兰利用与母亲去济南为父领恤开吊之机，面恳张宗昌，为中诚某得一团长职位，亦预为将来报仇做准备。二年过去了，族兄中诚官升志消，背信弃义，谷兰痛苦万分，毅然写信断绝了兄妹之情。

1928年，23岁的施谷兰以“为代报不共戴天之仇”的条件，委身于山西总司令部谍报股股长施靖公。岂料子婿更远一层，报仇之事仍被搁置一旁。眼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复

仇之事却无半点眉目，谷兰痛定思痛，愈加感到求人不如求己。闲暇之时谷兰嗜读忠烈侠义一类书籍。偶有一日，谷兰观看《聊斋·商三官》一节，颇有一番感慨：三官一个16岁的少女，尚能女扮男装深入富豪之家，将仇人身首两断，替父报仇。我谷兰出自将门之后，平日目濡耳染，难道还不如一个旧世少女。反复阅读，胆壮志坚，新的复仇念头油然而生，要学商三官，矢志不移冒死报父仇，谷兰改名剑翘，发誓必手刃孙传芳以祭亡灵。

天津英租界十号路166号，是施从滨为妻子儿女们留下的最后一处寓所，剑翘每次从太原回来探母，都免不了触景伤情。1933年春，翘剑带儿子大利回到天津，此行有二个打算，一是想借机秘访孙传芳的踪迹，二是为大儿子安排个受教育的良好处所。

在太原时，她就听说下野的孙传芳正在天津隐居，因此在送儿子大利入园时，剑翘有意识地选择了租界区一所颇具盛名的“培才”幼稚园。这个幼稚园是当地富贵人家子弟云集的地方，剑翘琢磨着，万一有孙传芳之子女也在此处，就可以为报仇找到线索。于是每日按送儿子时便十分留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日，该园的教师指点着一个穿大红袄裤的女孩对旁人讲：“这就是孙传芳的小女儿。”站在一旁的剑翘听到这句话，窃窃自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嗣后，剑翘曾尾随小女孩身后多次，确认孙传芳居住在法租界32号路西头。正当她筹划着下一步报仇的具体计划时，突然接到丈夫施靖公的来函，催她速速返晋。

春去秋来，一晃两年又过去了。1935年施靖公升任旅长，而夫妻情份亦就此了结。剑翘带着对丈夫的怨恨，携着刚满两周岁的小儿子回到母亲身边。

7月的天津，骄阳似火。剑翘不顾旅途的劳累，开始实行自己的复仇计划。

第一件事是放足，矫正那双被人称为“三寸金莲”的小脚。要把女人从小折断的脚趾慢慢拉直，这是一项难度较大，而病人又十分痛苦的整形手术。剑翘打听到天津有一家私人医院可以做这种手术，毫不犹豫前去诊治。

脚的整形手术需要接连开刀多次，每五天的拆线换药，更令人望而生畏。剑翘并不怯阵。每次手术疼得她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每次换药，橡皮膏在皮肤上反复撕扯，犹同上刑一般，她都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有时，她还鼓励医生不要手软，尽可能放开手脚治疗。一个多月的时间，业已成型的小脚竟奇迹般地伸展放平了，穿上平底布鞋，剑翘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能够像男人一样轻松自如地走路。成功的喜悦，使她更加坚定了复仇的信念。

第二件事，探访行踪。手术后，频繁地访查工作又继续进行。在一次耀华学校的开学式上，剑翘又巧遇孙传芳之女孙家敏，记住了孙传芳的汽车牌号为 1039。以后，她在各娱乐场所注意观察，试图摸清孙的行动规律，以便适时采取恰当的报复手段。

阴历 8 月 16 日，施剑翘来到日租界观音祠，为父亲十周年祭日诵经，正在痛不欲生之际，忽闻该寺和尚教诲道：“善女请不要过分悲伤，入了佛门，就可免除一切烦恼。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流，如今也放下屠刀，归顺佛门，修身养性，卓见成效。望善女仿效之。”闻听“孙传芳”之名，剑翘欣喜若狂，她随即请老和尚指示地点，急不可待地赶到南马路草厂庵清修院。

居士张太太，见来了位“志同道合”的女林友，十分高兴。经她热情介绍，剑翘化名“董蕙”登记入林。在浏览室内陈设时，她窥见墙壁上悬挂的两张居士林团体活动照片，均有孙传芳夫妇在内，脑中又泛起陈年往事，痛楚得心欲碎裂。

剑翘第二次到居士林，是一个星期六的讲经日，高僧海慧正在讲经。靳云鹏与孙传芳也都参加了听经会。靳坐供桌西面，孙坐供桌东面，下首是几排木凳，女居士多坐前排。剑翘留心环视了一下方向，认为在此地行刺条件最佳，于是立即致函南京，请大弟中杰、族弟中达火速来津。

第三件事是共商复仇大计。中杰、中达到津门后，三人就刺杀行动的各个细节，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及应急措施、案发后的态度等一一作了详细周密的研究。一、刺杀工具是现成的，家里有一枝他人寄存的勃朗宁手枪、六发子弹。案发后为了不牵连别人，可谎称是在太原一退伍军人手里买的。二、起草“告国人书”及说明要点，刺杀后投案自首，以期得到减刑和营救。三、做一件合适的大衣，以便携带武器和传单。四、预定报仇日期为 11 月 13 日。

刺杀方案制定就绪，剑翘请大弟中杰携带母亲回南京，中达暂去北平。自己买了一架小型油印机，私下将“告国人书”等传单印好，并预写遗书数封分致家人。至此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复仇之日的来临。

13 日，秋雨连绵。这样的天气，孙传芳还会去听经吗？剑翘带着烦乱的心绪，打算先去居士林看看情况。剑翘随着十数名居士上殿听经。见无孙传芳踪影，狐疑今日行刺有可能不能实现。未逾时，孙传芳进了大殿，剑翘默念苍天有眼，我蓄志十年，今日可以展现宏图了。她立即返身回家取来手枪，遂导出了血溅佛堂的一幕。

施剑翘慷慨陈词冯玉祥呈请特赦

孙传芳被刺一案，经天津地方法院检查处多次开庭侦查，认为应按杀人罪提起公诉。该院刑庭订于 1935 年 12 月 25 日上午首次开庭，公开审理此案。

25 日晨 7 时左右，法院门前围满了等待旁听的群众，其中有许多天津女师、南中的女学生，期望借此一睹施剑翘这位女中豪杰的风貌。地方法院唯恐人多乱了秩序，便借民事大法院开庭。有幸领到旁听券的男女二百余人，鱼贯而入，剩下未领到旁听券的近二百人，只好失望而归。

8 点 10 分，主审推事文人豪宣布开庭，被告施剑翘被两名警察押至被告席。主审依照常规对被告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等进行查询后，由检查官涂璋首先起立宣读起诉书，大意为：被告持有军用枪弹，杀死孙传芳，已自白不讳，且核与证人富明、东海、王化南等所供相符，并有传单、手枪、

子弹、《告国人书》等证据，实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杀人罪，请求公判。”

法庭内鸦雀无声。剑翘神态自若，侃侃而谈，言至动情之处，声泪俱下，谈到复仇笃志，又慷慨激昂。旁听群众无不为之落泪，为之倾倒。

接着传讯四位证人，证实自首无误。时已是 12 点，推事乃宣告本庭为调查庭，定期再审。

半个月后地方法院再次开庭，双方当庭辩论。关于刺孙情节，与上次开庭侦查相同，唯关于自有问题，辩护律师胡学骞、余燊昌，与检查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检查官认为，自首条件有二：一、须在犯罪事实未发觉

前；二、须向该管公务员投诉。本案表面上似无违背，但被告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实为现行犯，任何人都可以逮捕。所委报警人实不得人，致虽委和尚东海去报警，而实际乃系号房刘恕修听得枪声奔去，警察到后，刘尚未知杀人。警察赶到电话室，始称自首，是自首条件是否完备，颇值研究。

律师辩护说：被告施剑翘杀死孙传芳各节，均由当事人自白不讳。本辩护人应代辩者两点：一、被告自首，照《刑法》六十二条，当然可以减刑；二、报父仇与其他原因不同，在现在时代中，此情孝义可奖，应援《刑法》五十九条，酌情减刑。

12 月 16 日，天津地方法院对本案宣判。次日送达了由刑一庭审判长孔嘉彰及推事叶德怪、文人豪等三人签署的“诉字 622 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施剑翘杀人，处有期徒刑拾年，但肯定了自首成立的依据。

地方法院判决后，剑翘不服，提出上诉。同时，检查官方面也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等法院接受双方上诉后，于 12 月 28 日开庭审讯，但复审时，重要证人均借故不能出庭作证。剑翘对此极为不满，谓“凡有力的证人俱离津不知下落，孙家有钱有势，其情可疑”。

1936 年 2 月，河北省高等法院又经过两次开庭辩论，于 11 日正式宣判：“原判决撤销，施剑翘杀人，处有期徒刑七年。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三粒没收。”随即告知被告：“你父施从滨非死于法，你杀孙传芳乃为父报仇，是情可悯恕的，故减至最低之刑。但原判认为你是自首，是错误的。”

高等法院认定刺孙复仇“情可悯恕”，施剑翘对此感到一些宽慰，但因自首一节被推翻，仍然表示不服，乃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与此同时，孙之长子孙家震对复勘减刑更为不

满，加聘律师撰状，要求检查官提出上诉。

按照当时诉讼程序，最高法院对上诉案件并不开庭审理，只是调集案卷审核，然后分别作出驳回上诉或发回重审等判决。该案于 1936 年 2 月双方先后提出上诉，直到同年 8 月 1 日，南京最高法院才作出判决。8 月 25 日送达当事人：驳回上诉。至此，施剑翘被判处七年徒刑已成定局。剑翘表示：“为父仇，死且不惧，刑期之长短，更为身外之事矣！”9 月 9 日被移解第三监狱服刑。

正当刺孙案在报纸上渐趋沉寂时，《申报》突于 10 月 15 日发表了国民政府特赦施剑翘的消息：南京 10 月 14 日中央社电：国府十四日令：据司法院呈称：“施剑翘以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所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即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以一女子发于孝思，奋身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

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处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情。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这一特赦令的突发，的确是件奇迹，施以一个弱女，身陷囹圄而能如此神通广大，是有其原因的。

自从刺孙案发生，社会上对施女的行动始终是拥护的，天津市地方法院、河北省高级法院在量刑时，都不能忽视社会舆论的压力。能使剑翘根本得以解脱牢狱之苦的，实赖国民政府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冯玉祥将军。人们都知施剑翘是施从滨之女，却没有注意她还是施从云的侄女这层关系。时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与剑翘的四叔施从云是滦州起义时的伙伴。“从云为国殉难，其遗族应当予以特别优待。”冯玉祥正是以此为理由，联络李烈钧、张继等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

名呈请政府明令特赦。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下野军阀本来就不放心，深恐伺机再起，如今存人代除身边遗患，焉能有不准之理。再加上安徽同乡会及其他团体也联合保请，遂使特赦很快得以实现。

津城居士林血案，从案发至剑翘出狱止，历时十一个多月，各界人士旁观此事多有不同感想与评论。1935年11月15日上海《民报》曾就孙传芳被刺一事发表社评，虽不能算做高论，但就事论事却也说出几分道理，仅此做为本案之结尾吧！

“近来蛰居天津之孙传芳，前日于天津市居士林礼佛之顷，为前师长施从滨之女，枪击毙命。昔日一世之雄，从此瞑目地下。长江中下游数省，为当日孙氏势力笼罩之地，人人脑海中尚留有对孙之印象，今闻孙氏之凶耗，当有不相同之感想。综孙氏近二十年来之所为，为功为罪，为善为恶，昭在人心，今值盖棺，自有定论。然迹彼之所以顶礼空王，意图忏悔者，自必有其自疚于心之处可断言也。夫所谓自疚于心者，当以杀人太多为最，姑不论其杀人动机如何，而怨毒之结，则已如海之深，不可复解。是以二十年来，军阀之收场，鲜有不遭横祸者，而孙氏之死，尤为徐树铮、张宗昌如出一辙，皆属于报复私仇，而不涉及政治问题者也。其所以不涉及政治者，盖因军阀本身，既无一贯之主义，生杀予夺，惟其私利自视。初与政争之结果不同，吾人即以施从滨之被杀而言。孙氏当时所持片面理由，无非指施听从张宗昌之乱命，认为希图夺地攘官，违法乱纪，故缚而斩之，自以为罪有应得，然孙氏此种见解，根本即陷于错误。盖由第三者平心论断，当时孙、张彼此皆同属一丘之貉，如论国法，则彼此皆是师出无名，并非为民为国。然则此时彼此纵有俘获，又

讵可以国法相绳，必置死地。顾孙氏彼时为恶感所冲动，竟藉此以泄其愤。如是，而施氏之子女又安能不结成不共日之私仇哉。果使孙氏当日之杀施某，诚属为国为民，不得不如是之苦衷，则天下后世，且应称快，即为之子女者，尚愧恧之不暇，焉能更执此为复仇之口实乎。是以世之假公济私，妄行诛戮者，今后宜以孙氏为鉴，要知怨仇不可轻结，一己利害关系之私仇尤不可结，否则嫌怨既修，无远近而不报。恶因之种，无久暂而不应，迨夫事后追悔，虽乞灵于神佛，以冀消释于无形，亦终无能为力矣。”

东南处处有啼痕 ——为争民主而惨遭杀害的杨杏佛

1933年初，《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发起了以《新年的梦想》为题的征文。当时有一百四十余人对“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进行一番憧憬。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向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和力量应用在创造和服务方面。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杨杏佛还说，他个人生活最梦想的是希望建设一个儿童的乐园，使儿童都能受到教育，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成为未来大同世界的主人翁。这是在说梦？而且仅仅是在说梦？不！这是杨杏佛的理想，杨杏佛奋斗的目标！杨杏佛为了把自己这美好的梦变成现实，几十年不辞危难，毕露褴褛奔走呼号，但是却有人不愿意也不允许杨杏佛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在杨杏佛向世人叙说着自己美好梦境的时候，罪恶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子弹带着凄啸夺走了他那满怀热情和信心的生命。

青年俊才不欲袁门逞猖獗 冷梦骤醒更思乱世图救国

杨杏佛，名铨，谱名宏甫，1893年5月4日出生于江西玉山。他的父亲杨凤昌，为人忠厚却不善处世，加之子女众多，所以在杨杏佛幼时，家境十分贫寒。为了一家生计，杨凤昌携全家先移居江苏扬州，后又移往浙江杭州。杨杏佛从小就过上了颠沛流移的生活。艰辛的生活使人早熟，自幼年起，杏佛就十分懂事，白天在私塾读书，晚上一回到家里，就立刻帮助母亲做家务活计。幼年的生活在杨杏佛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很久以后，他在一首《对月有怀三兄吉甫》诗中是这样描述当年家庭中衰的困苦生活的：“开帘对明月，疏星耿河汉。金风冷衣裳，忽起平矢叹。兄弟四五人，零落已及半。饥来相驱逐，各相东西散。索居多悲思，何况历历乱。旦暮有余隙，当借凌风翰。”凄然满笺情怀。

1908年，杨杏佛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就读，当时，正值清王朝的黑暗统治摇摇欲坠。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列强的践踏下满目凋落的情状，青年杨杏佛的心中愤懑难平。在课余时间，他经常与同学张奚若、任鸿隽等人在江边堤道上散步，畅谈国事，评论古今，流露出向往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志向。1911年8月，杨杏佛进入河北唐山路矿学堂，编入预科第六班。不久，从武昌传来了革命的枪声，学校停办，同学们纷纷回家，血气方刚的杨杏佛却以同盟会员的身份，意气风发地赶往革命的中心武昌，亲历了辛亥革命。这一年底，孙中山先生回国，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杨杏佛

便在总统府秘书处任收发组组长。他工作干练，被人誉为“青年才俊”。不久，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北迁。杨杏佛不愿在袁世凯手下留任，在孙中山先生的亲自安排下，跨洋过海，到国外留学。

1912年11月，杨杏佛与任鸿隽同船赴美，12月1日抵达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由当时在美国的曾在中国公学任教的胡适接去安排住处。在康奈尔大学，杨杏佛学习机械工程，毕业后，又进哈佛大学商学院，专攻工商管理 and 经济学。留美期间，杨杏佛潜心学习，并利用时间在福特汽车厂实习，

进行考察，希望能在将来以自己的才学，以科学技术为祖国的复兴与繁荣做出贡献。他与胡适、任鸿隽、赵元任交往甚密，被称作“四俊”。

来到美国不久，杨杏佛便与任鸿隽、赵元任、章元善等人一起于1914年夏酝酿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并于次年10月15日正式宣布成立。同时编辑出版《科学月刊》，杨杏佛担任该刊编辑部部长。这个以发展科学为职志的学术团体，在创建之初只有七十多名社员。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它成为中国最大的学会，在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风尚，交流科学研究成果，团结科学工作者以及培养科学人才等方面都起了相当的作用。直到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社才宣告结束。从中国科学社创立时起，杨杏佛便十数年如一日，积极地参加社务工作，为筹措基金、建设明复图书馆和创办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多方奔走，力促其成。

在紧张的学习和编辑《科学月刊》杂志的同时，杨杏佛还利用课余时间 and 假期搞勤工俭学，将所得的报酬寄回国内贴补家用。在留学期间，杨杏佛结识了惠斯莱女子学院肄业

的赵志道，在回国前俩人结成伉俪，相偕归国。

1918年10月，杨杏佛偕赵志道与任鸿隽一起，同乘日本轮船，由美国经日本回国，抵达上海。当时中国科学社已迁到南京，上海只有部分成员，如胡敦复、胡明复等，虽然杨杏佛和这些人的工作尚没有着落，他们却经常聚会，讨论中国科学社的发展、筹款和杂志出版等问题，并做过几次科学演讲。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国内形势纷纷攘攘，军阀混战不断，列强们虎视眈眈，人民处于灾难之中，国家陷于空前的混乱和动荡。所有这一切，使回到祖国的杨杏佛感触万端。正当他四处寻找职业之际，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朱少屏介绍他到一家外国人开办的银行做簿记工作。杨杏佛在应约到这家银行谈话时，看到中国人在洋人面前所遭的百端歧视和屈辱，不禁感慨满腔，愤而辞去。最后，杨杏佛在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找到了一份工作。1918年12月18日，杨杏佛到了汉阳，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

未过多久，杨杏佛应南京高等师范之邀，赴宁担任工科主任兼教授。从海外回国之时，杨杏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决心要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思想界与今日中国之乱祸》的文章，批驳那种认为科学、教育可以跟救国事业相脱离的观点。他写道：有人讲科学家不分国际，不问政治，但有研究，不问款之来自赔款或者军阀，那么又何必回到祖国？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有许许多多的研究地点，又何必恋着这一片破碎之中国土地！但是，北洋军阀干戈频仍，列强外寇肆意凌压，国家隐忧四伏，危机遍布，他这一切美好的愿望又怎能实现。杨杏佛最终明白了：在当时的中国，想从事“实业改造”，而“租界之外更无安土，原料之来源，出品之销路，在在皆受打击”。想进行“教育革

命”，但当时学阀馅事军阀官僚，教授腐蚀青年学生，教育几乎成了少数人“升官发财之捷径，苟且愉情之护符”，造就了一大批的“新绅阀、新市侩、新游民”。杨杏佛只能把自己这美好的愿望深藏在心底，他要把精力放在民族独立运动中，谋求中国的根本改造，他表示：“学者生当乱世，自当报国救世为先务。”

愤对仇眼却把感慨辞旧友

痛心疾首国难民殃为号呼

1924年，在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下，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杨杏佛和陈去病、顾实等人在东南大学（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成立了国共合作的地下组织，其中有共产党员吴肃、宛希伊、董觉新等人。同时杨杏佛在东南大学还与共产党员恽代英、侯绍裘、高尔松、高尔柏等人有密切的交往。杨杏佛的革命活动，使得东大校长郭秉文对他十分仇视，这一年夏，郭氏藉仗军阀的淫威，通过校董事会取消工科，杨杏佛愤而去职。

杨杏佛辞去教育界的职务，回到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任孙中山的秘书。这一年底，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的邀请，自广州出发，前往北京商定国是。杨杏佛便随同孙中山先生一同北上。由于北洋政府的毫无诚意，加上旅途劳顿，孙中山先生旧病复发，于1925年3月12日溘逝北京。那是一个严霜冷月的深夜，坐在中山先生卧室间壁的一间很小的客室里，在沉寂的空气中听着中山先生临终前粗促的呼吸声，杨杏佛悲急交加，五内俱焚。他真想减少自己的寿数来延长中

山先生的生命。静守到第二天上午9时30分，中山先生溘然逝世。杨杏佛在无限的哀痛中下定决心，以孙中山先生之志为志，把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临终遗言化为自己的行动。他热情地宣传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说，“俄国是世界上革命学识经验最富的国家”，俄国“人民与政府都是革命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劳工两界之人数最多”，“最富血性”，革命应“立足在农工无产阶级上面”。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制造了“五卅惨案”，面对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杨杏佛怀着满腔的悲愤，在上海主办国民党左派的《民族日报》。他不顾因病咯血，坚持采访、编辑、校对等繁重工作。这份报纸从6月10日发刊，到同月25日停刊，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15天，但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运动中，发挥出了强大的舆论威力，一时间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理论指导机关。杨杏佛逐日为该报撰写社论，痛斥帝国主义的罪行，批驳一些人屈服谄外的可耻言行。他大声痛呼：反对屈于外国人之武力，反对屈于外人之外交，反对屈于外人之经济力！还深刻地指出：幻想依靠帝国主义致中国于福地，则无异于与虎谋皮，绝无成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民族才可独立。在6月23日写的社论《反自杀》文中，对那些因愤懑于国家的危难而欲自殒生命者，发出了充满悲情而又铮铮有声的呼号：

有志建国者不可死！

决心奋斗者不屑死！

畏惧亡国者不敢死！

以救国为己任者不能死！

6月25日，《民族日报》出版了最后一张，杨杏佛写了《高等华人的高调与责任》和《告别辞》两文。在《告别辞》中，杨杏佛说：“《民族日报》产生于举国忧伤哀痛之日，发起于少数有心无力之人，处无可告语之地，而有不得言之势。祸患及身，骨鲠在喉，不暇思索，而有斯报之作，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十余日来，竭少数人之心力财力，谋旦夕之言论自由，……”

而环境所迫，竟使我生于忧患之《民族日报》，不得不向读者为暂时之告别。呜呼！当此中国民族危急存亡之日，国事前途，黯淡无光……此岂特记者所不忍言，度亦读者所不忍闻也。”杨杏佛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当分别之顷，又述先生之言：“结合民族团体，抵抗外国之压迫！”

1925年9月，杨杏佛与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郭沫若、沈雁冰、陈望道、杨贤江等人共同发起了中国济难会，并编辑出版《济难月刊》。大革命期间，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公开的群众组织，“它只表同情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的政治罪犯而不问其他，它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之被难者，结果他便救济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使一切受压迫的中国人更容易得到解放”。1926年1月17日，杨杏佛在济难会上海市总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他在演讲时说：“中国民众为解放运动而死者屡为社会所轻视。吾济难会目的，在表同情于民族谋解放之人，而予意尤当注重工农。”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济难会转入地下，继续坚持工作。直到三十年代，杨杏佛一直与中国济难会保持着关系，利用各种途径营救和接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杨杏佛负责北伐军

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在上海陶尔斐斯路24号孙中山葬事筹备处的三楼设有秘密电台，每天将有关情况通告前方。不料此事为军阀孙传芳侦悉，派人会同法租界捕房搜查，杨杏佛不幸被捕。就在将要移送军阀当局处决之时，幸亏得到著名女律师郑毓秀的帮助，及时向法租界当局疏通释放而幸免于难。获释后，杨杏佛旋即又借用华龙路公园内法驻军电台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与此同时，杨杏佛还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和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他热情支持共产党人恽代英、侯绍裘的工作，积极赞助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有人攻击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杨杏佛当即授意侯绍裘、高尔柏等人奋起批驳，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国民党方面的吴稚晖、钮永建与共产党发生摩擦，杨杏佛坚决支持共产党提出的武装起义计划，并努力沟通国共两党的意见。1927年3月5日晚，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参加的特别军委会上，杨杏佛被提名为上海市民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3月23日，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三天，杨杏佛被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

燃尽膏血为阻狂徒施暴虐 力争民权愿作斗士血中眼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了国民革命。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期间，国民党右派指使杨虎将杨杏佛扣押于上海警备司令部，准备同被捕的共产党员一同枪决。又

幸得朋友相救，杨杏佛再次幸免于难。这一切却丝毫没有使杨杏佛产生任何胆怯，他继续奉行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遗训，与共产党员密切合作。

大革命失败后，前途茫茫，暗夜沉沉。1927年8月，杨杏佛在《现代评论》第六卷142期发表了《牺牲与堕落》一诗：

人们，你苦黑暗么？

请你以身作烛。
用自己骨血换来的，
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同志们，我累了！
但是不敢后退，
与畏缩落伍的行尸作伴，
还情愿和被创的战士在血泊中僵睡！

他以燃烛自喻，愿以膏血换取光明，他情愿象战士一样倒在血泊之中，也不肯“与畏缩落伍的行尸作伴”。这些诗感人至深地表达了杨杏佛忠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

1927年10月，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杨杏佛任副院长。次年4月，蔡元培和杨杏佛等人又筹创了中国第一个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蔡任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当时蔡元培年逾六十，性格宽容迂缓，杨杏佛则年富力强，精悍机敏。两个人都主张学术自由、改革教育、罗致和保护进步学者。大学院曾聘鲁迅先生为“特约撰述员”，中

央研究院聘李四光为地质研究所主任。杨杏佛还大力支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些进步学者，到上海日商纱厂调查女工包身制，在无锡、保定、东北三省调查农村经济，进行研究。

1931年，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军事“围剿”。杨杏佛根据自己平日收集的资料，并亲自到江西作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考察，写成了一篇报告《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这篇报告打破了反动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是当时国内第一篇比较客观地介绍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红军情况的报告。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回顾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第二部分，报道了当时国内八个苏维埃区域内的情况；第三部分，集中介绍了江西苏区红军成长过程和三次反“围剿”战争。在报告的结论部分，杨杏佛指出，国民党舆论工具所吹嘘的“围剿”胜利，“不过是治标而已”，只有避免内战，促成团结，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能建设独立自由的中国。报告的中文本曾于1931年7月17日至21日在上海《民国日报》连载，英文稿发表于1931年7月19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第八、九、十版。英文稿还曾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文件印行。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篇报告公开发表时，杨杏佛借用国民党政府学者的口吻说话，中文稿的标题是《赤祸与中国之存亡》。尽管如此，这篇报告仍然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中文合订本刚刚印好，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但是这篇报告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是从报纸上看到这篇报告后，才激发了亲赴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他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特别提到了杨杏佛这篇描述详尽、饶有趣味的考察报告对自己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沈阳悍然发动侵

华事件，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浪潮。蒋介石政府执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民主的反动政策，加强了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革命群众遭到当局的逮捕、关押和屠杀。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政策。针对国民党政

府血腥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罪恶行径，宋庆龄于12月19日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无情地揭露“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明确地指出：“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积极援救为抗日救亡而遭到监禁的爱国志士和青年，争取民主自由权利，1932年夏，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筹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布“同盟”的任务是：“（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任意处决的制度；（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三）争取公民权利，开展争取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这一年7月，宋庆龄和杨杏佛等就蒋介石非法逮捕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提出抗议，要求保释。后来，他们还亲自前往南京江苏第一监狱探视牛兰夫妇，并通过各种形式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使其改善牛兰夫妇的待遇。10月，他们又相继开展了营救陈独秀和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逮捕监禁的许德珩、侯外庐等进步教授和学生的活动。

1932年12月29日下午，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厦主持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宋庆

龄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由蔡元培代为宣读了她的书面讲话。她指出：“我们的组织的宗旨，在于支持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并特别强调：“本同盟首先关切的是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的无名无告的政治犯。”蔡元培也在会上致词。之后，由杨杏佛报告了会务，宣布“同盟”的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美国进步记者，当时在上海编辑中英文的《中国论坛》报）、邹韬奋、胡愈之七人组成。宋庆龄任中央临时执委会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负责主持日常工作。1933年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它是同盟的最早一个分会，也是同盟的基本队伍。会议通过了分会章程和宣言，选举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林毓胡愈之、鲁迅九人为执行委员。后来鉴于同盟会章关于中央执委不得兼任分会执委的规定，宋庆龄、杨杏佛等七人辞去了上海执委职务，另由会员中补选了郁达夫、洪深、吴迈、沈钧儒、王造时、钱华、宁明予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上海分会成立后，同盟就立即筹建其他地区的分会。1月下旬，同盟派代表杨杏佛到北平，筹设北平分会，营救被关押在北平的政治犯。在杨杏佛等人的努力下，北平分会于1月30日宣布成立。北平分会接受同盟总会所制订的分会章程，主张废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呼吁释放平津各地被非法拘禁的一切政治犯，决定通电声讨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擅杀镇江《江声报》记者刘煜生的罪行，要求国民党当局罢免顾的职务。选举了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炳昶、许德珩、任鸿隽、蒋梦麟、李济、马藻等九人为执行委员，由胡适任主席。

在北平期间，杨杏佛还考察了北平各监狱及被关押的政治犯的生活状况，并与张学良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政治犯。后来，北平地下党组织举行公祭李大钊同志的游行时，杨杏佛所撰写的挽联放在行进队伍的前面，其辞曰：“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犹在，那用吾辈哭先生。”一时传遍北平。2月2日，杨杏佛离开北京，临行时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号召北平

各界人士积极从事民权运动。

北平分会成立后，立即遭到国民党北平市当局的压力和威胁。分会主席胡适因此动摇和害怕起来，他寻找借口，制造事端，反对同盟章程，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为此，杨杏佛并未因与胡适的早年的同学交谊而纵容，与他做了不妥协的斗争。2月23日，杨杏佛代表同盟执委会致信胡适，谴责他“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批评会务”，“为反对者张目”的行径。宋庆龄和蔡元培也致电警告。然而，胡适对此置若罔闻。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通过了鲁迅先生提出的开除胡适会员资格的提议，并重申了要求释放政治犯不可分离的原则。3月28日，同盟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举行全体会员大会，正式开除了胡适的会籍。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并进一步向华北进犯。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时刻，民权保障同盟主持发起了一个范围更广泛的救亡团体——国民御侮自救会。参加的团体有上海邮务工会、彩印工人反帝同盟、沪东印刷工人抗日会、印业工人抗日救国会、中国诗歌会、东北义军后援会等三十多个工人、学生、商人、知识界的抗日反帝团体。该会提出收复失地、武装民众、保障民权、抵制日货等斗争目标。在该会成立大会上，杨杏佛代表民权保障同盟发表演说，强调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及释放政治犯运动

不可分离。国民御侮会成立后，积极组织慰劳抗日将士和募捐活动，并与外国洋行联系购买枪支。这些使国民党当局又恨又怕。御侮会成立不久，租界当局就搜查了设立在上海环龙路43号的临时办公处，逮捕了四名成员。到5月份，就明令取缔了国民御侮会。

1933年3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廖承志、全总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余文化由于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民权保障同盟连续召开执委会会议讨论营救办法，并为此专门成立了营救政治犯委员会。一方面发动舆论进行揭露，一方面派出代表宋庆龄、杨杏佛、吴凯声、沈钧儒、伊罗生等，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的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严禁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的行为。他们还向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司法部长罗文干提出立即释放罗登贤、余文化等人的要求。随即，他们又考察了南京的监狱情况。5月13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又前往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德国自希特勒上台以后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在国内实行的法西斯统治。

1933年5月15日，上海《申报》上发表一条消息：“昆山路发现惨死之无名男尸”。同一天，著名女作家、左联总团书记丁玲和史学家、文委书记潘梓年也告失踪。一时间，成为扑朔迷离的无头案。不久，民权保障同盟收到一封署名“蔡飞”的来信，报告了这一事件的经过。民权保障同盟将来信译成英文发表，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原来，5月14日，住在上海公共租界昆山花园路7号二楼的丁玲，发现与她同住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干部冯达两天未归，预知情况有变，准备搬家转移，正巧潘梓年来访，耽

搁了一些时间。下午一点左右，叛徒马绍武、朱光亚带领一批特务闯了进来，了玲和潘梓年同时被捕，挟持出寓。同时，留下三名特务在室内等候抓人。下午四时许，一位身着灰色哗叽纱长裤、戴眼镜的高个子男人大步跨入室内，他就是左翼作家、中共江苏省宣传部长应修人。应是丁玲家的常客，

常常不敲门而入，他一推门，即遭特务逮捕。应修人身上带有文件，于是他拒绝搜查，夺路而跑，遂被特务枪击，壮烈牺牲。这就是昆山路无名男尸的由来。

丁潘案发以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矢口否认捕人。杨杏佛经多方奔走，掌握证据，以此来揭露当局，并会同蔡元培等人再次致电汪精卫和罗文干，要求释放丁玲和潘梓年二人。杨杏佛还主持成立了“丁潘营救委员会”进行宣传 and 募捐工作，呼吁上海各界团体、组织给予帮助。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争取民主自由，营救政治犯的活动，使国民党当局在社会舆论面前陷于十分尴尬和狼狈的境地。蒋介石及其爪牙对同盟的领导人恨之入骨，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同盟主席宋庆龄具有崇高的声望和特殊的地位，反动当局尚不敢贸然对她下毒手。于是他们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庆龄进行恐怖的威吓，以此来摧毁民权保障同盟。蒋介石拿着民权保障同盟主要领导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目光停在了杨杏佛这三个字上。

枪声黑雨壮士贾志戚殁身 举悲泣血共为斯民哭健儿

戴笠于 1933 年 4、5 月间，接奉蒋介石的命令，开始策

谋刺杨。杨杏佛从北平回到上海不久，复兴社的特务们就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进行布置。他们先侦察了杨杏佛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杏佛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杨嗜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每天早上有空便会到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驰骋一两个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对杨杏佛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蒋介石得到报告以后却不同意在这个地区动手，他认为把杨杏佛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又会增加当局的麻烦，还会引起各方舆论指责以至非得破案不同”。他坚持要在法租界宋庆龄的寓所附近刺杀杨杏佛，这样既可向宋显示特务的力量，又可以不负责破案。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戴笠只得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杏佛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的途中进行狙击。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行人很少。6 月初，戴笠又亲赴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便设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负责军统行动多年。他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也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参加刺杀杨杏佛的六个凶手，事前在这里都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宣誓，并约定如果被捕，应即自杀，绝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的制裁。

对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活动，杨杏佛是有思想准备的。虽然他曾说过：“有志建国者不可死，决心奋斗者不屑死！”但是对反动当局的枪口，他坦然处之。他知道，“革命本是自动的牺牲”，凛然而呼：“嗟呼！不自由毋宁死！今则争自由死，

不亦死”，完全置个人之生死于度外，泰然地为民主自由呐喊号呼。在他被害前两个月的一个晚上，杨杏佛专程探望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告诉他们，已几次有朋友直接从南京来警告自己，说某些人正阴谋杀害他。接

着他又说道：“即使我遭不测，你们也会有人照顾的。”牺牲前两天，杨杏佛又特意探望了宋庆龄，他拿出近几周收到的恐吓信，并向宋庆龄转述了他所听到的关于阴谋杀害他的一些口头警告。之后，杨杏佛又关切地对宋庆龄说，在他收到的恐吓信中，有几封把宋庆龄也列进了黑名单中。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6月17日早上下手，但这帮凶手刚到中央研究院附近就碰上法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凶手们没敢动手就一个个溜了回去。

1933年6月18日，这是一个星期天，法租界比平日要安静许多。早上6点多钟，赵理君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王克全等四名杀手又一次开车来到中央研究院附近。赵理君坐在汽车上，停在亚尔培路向马斯南路的转角处。过得诚等四个凶手身穿灰色劳动服分散潜伏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两头又各有一人巡风掩护。8时左右杨杏佛身穿鹿皮上衣和骑马裤，头戴灰色呢帽，带领着他14岁的儿子杨小佛准备乘车到大西路乘马郊游。当杨杏佛在院中准备上车时，特务们便走到门前观察。杨杏佛和小佛上车后一会儿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以为杨杏佛已经发觉他们，正欲冲进去的时候，杨杏佛领着儿子又登上了另一辆纳喜牌敞篷车。当汽车刚刚驶出亚尔培32号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时，四支手枪同时朝车内射击。听到枪声，杨杏佛立即意识到有人要杀害他，但爱子心切，立即用身体扑倒在小佛身上。他自己连中三处致

命枪伤，小佛在自己父亲的袒护下仅腿部中了一弹而终幸免。凶徒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一听枪响就令司机起动汽车。这时过得诚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追汽车时，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迫一面喊着：“等一等我！”赵理君见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再顾不得停车等候；他害怕过得诚被捕后泄露消息，立即在车上朝他射了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逃去。过得诚在租界巡捕的追击下，见无法逃命，只好举枪自杀。子弹从胸侧穿过，但仍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与杨杏佛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杨杏佛终因受伤过重，于上午9时20分停止了呼吸。

过得诚经过急救，到下午即能说话。但他矢口否认参加刺杀杨杏佛的活动，只说自己叫高德臣，是山东人，到上海来投亲等等。戴笠得知过得诚还活着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放心不下，马上通知在法租界任华籍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的关系和名义接近过得诚。于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便披露了过得诚“气绝身亡”的消息。戴笠也便于20日晚上回到南京，找蒋介石报功邀赏去了。

杨杏佛被刺身亡，各界震惊。19日上午11时，蔡元培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善后问题。他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请予饬属缉凶”，并电召许寿裳、李四光等人立即来沪，会商杨杏佛之善后事宜。又设法委人与法捕房政治部长撤利交涉，索回了杨杏佛写有同盟成员住址的笔记本，防止了国民党特务窃取民权保障同盟的秘密，保护了同盟的其他成员。宋庆龄获知杨杏佛遇刺的噩耗，立即发表严正声明，愤怒谴责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她说：“这些人和他们所雇佣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

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

付出的代价反而使人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惩罚！”

6月20日晨，中央研究院下属各所负责人集会议决，呈请南京政府严缉凶犯，组织治丧机构，拨款为杨杏佛治丧并抚恤其家属，并任命下西林暂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接着，蔡元培率中央研究院同人举行公祭。他泣不成声地说：“中央研究院之得有今日，先生之力居多。今先生以勇于任事、努力服务之人，而死于非命，同人等之哀悼为如何！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20日下午，苍穹垂泣，大雨倾盆。杨杏佛入殓仪式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举行。杨杏佛的遗体安放在灵堂西首，四周摆着何香凝等人敬献的花圈。宋庆龄、沈钧儒、鲁迅、史沫特莱、伊罗生、洪深等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参加了入殓式，前往吊唁的还有各界人士一百余人。入殓式后，鲁迅先生冒雨踏上归途，他怀着满腔的悲愤，吟成一首七绝《悼杨铨》：“岂有豪杰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民权保障同盟成员郁达夫在杭州也写了一首七绝：“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远在北平的许德珩听到杨杏佛遇害的噩耗后，也奋笔写下古诗一首，题为《哭杨杏佛先生》：“天暗暗

兮我心悲伤！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此仇必报兮时间不长。百倍以偿兮何时？宋蔡心情兮可想！泪落京华兮今日。雪耻到来兮地覆天翻！”

7月2日上午，在万国殡仪馆内为杨杏佛开吊。亲往吊唁的有何香凝、蔡元培、沈钧儒等二百多人。灵堂中心悬挂着杨杏佛已经离异的夫人赵志道题赠的挽联：“当群狙而立，击扑竟以丧君，一瞑有余愁，乱沮何时，国亡无日；顾二雏在前，鞠养犹须责我，千回思往事，生离饮恨，死别吞声。”正午举行家奠，下午3时，灵柩发行。蔡元培等乘送殡车数十辆随送。4时正，杨杏佛灵柩在霍必兰路永安公墓徐徐落入墓穴。全体吊唁者环绕墓地三鞠躬，向这位伟大的民主斗士致哀告别。

早在这一年的元旦，鲁迅先生在读完了杨杏佛的“梦”后，不胜感慨，冷静而清醒地说道：“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写得怎样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好残酷，一切都让先生不幸而言中了！

在杨杏佛仅仅只有四十个春秋的一生中，充满了艰辛和奋斗，他生前曾引石达开诗句以抒怀：“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处处有啼痕。”然而当他带着未酬的壮志辞别人间时，他用自己鲜血所浇铸的民主和自由的坚强信念，已经深深扎根于他的战友和各界人民的心中。

遇刺不死亦非福 ——汪精卫被刺历险记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土时，
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从 1935 年到 1939 年，汪精卫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两次遇刺，居然不死，这其中的祸福难以论定。如果汪精卫死于 1935 年的枪下，还可说是死于政敌之手（当时说法），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还可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在 1939 年饮弹而亡呢，当然逃不脱汉奸的恶名，但比起 1944 年死于异国又稍胜一筹。因为他还来不及建立伪政权，没有成为伪政权的罪魁祸首。

汪蒋合作妥协卖国激民愤 志同道合热血青年欲除奸

1935 年 11 月 1 日的刺汪案，严格地说应当是刺蒋、汪案，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事情还得从蒋介石、汪精卫合作谈起。

1932 年 1 月，在“一·二八”炮火声中，汪精卫登上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宝座。汪麾下的大将顾孟馀、陈公博也当上了铁道部长和实业部长。另一铁腕人物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专管军事。蒋氏麾下的要员控制了财政部和教育部。这样就形成了蒋汪合作的格局。

汪蒋上台伊始，各自提出了应付时局的方针。汪精卫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蒋介石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四不方针。蒋的方针立足于一个“拖”字，静观待变。汪的方针是什么货色呢？是一个恐日媚日的方针。面对日寇侵略的严峻事实，他说：“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故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他进一步说：“政府今后的措置，应严格规定最低限度的标准。若在最低限度以上，则政府应顾虑国家人民的力量及军事财政的状况，不惑于一部分人士的一时强硬论，纵使为国民所误解，亦应忍痛签订。若在最低限度以下，则签订固亡国，不签订亦是亡国。……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

汪精卫在这里强调的是：“不故作强硬”，“不惑于一部分人士的一时强硬论”。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肆叫嚷：“纵使为国民所误解，亦应忍痛签订。”他是患了恐日媚日的顽症。在主持行政院工作期间，汪精卫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前者使中国丧失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的驻兵权，而日本侵略者可在该地区驻军；后者使华北门户洞开，侵略者可以自由出入绥东、察北、冀东等地区。

1933 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将军在察哈尔、绥远地区组织抗日同盟军，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位汪院长又跳出来，和蒋介石联名通电斥责冯玉祥“妨碍中央统一政令”，以后索性对同盟军实行围攻打击。

1934 年，汪精卫迎合日本侵略者的意旨，在华北通车、通邮、设关等问题上，卖足气力，满足侵略者的要求。

1935年5、6月间，汪精卫批准了《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秦土协定》（秦德纯、土肥原贤二），肆意出卖国家权益。汪精卫这一系列残民媚日的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一场悄悄的刺汪行动正在行进中。

刺汪策划者是几个爱国热血青年：

直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孙凤鸣。孙是江苏徐州人，32岁，粗通文字，早年随父母往东北经商，挣得一份小康家业。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使他倾家荡产。怀着国仇家恨和不甘当亡国奴的赤子之心，孙逃入关内投军，之后充任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刺汪前的身份是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

谈到晨光通讯社，还必须谈谈华克之和陈惘子等人的情况。

华克之，江苏宝应人。江苏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的理事。大革命时期，他担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被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誉为“振兴党国的中坚”。蒋介石亦欣赏华的能干，欲引为己用，在遭到拒绝时，就索性将他囚禁起来，后来由国民党元老保释，才免受缙继之苦，出狱后，华克之跑到苏北打算组织反蒋抗日游击部队，毫无结果。在上海，华克之结识了陈惘子，一起住在上海新新南里232号，继续筹划反蒋抗日活动。

陈惘子，江苏宝应人。江苏六中毕业后，考入安徽大学，是一个活跃的反帝爱国份子。一次蒋介石赴庐山路过安庆，陈惘子参加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作为发言代表之一，向蒋介石请愿。蒋以陈出言不逊，亲自下手令开除陈的学籍。安大校长刘文典为陈辩护，蒋介石一怒，将刘撤职。陈惘子在安大无法存身，就流亡到上海，随后进入法政学院学习，也同华克之吃住在一起。

另一名刺汪的年轻伙伴为张玉华，他是陈惘子、华克之的同乡同学，本是金陵大学的学生，这时也来到上海。他找到华克之，华问他：“你这个新兴的地主，此来何干？”张激愤地说：“南京的乌烟瘴气，我感到窒息，此来拟通过你们找革命出路的。我既不想当牧师，又不想免费到美国去留学，得什么硕士、博士学位，荣宗耀祖，何惜乎金陵大学这张文凭。”随后，孙凤鸣也为了同一目标和他们住在一处。

此外，和他们共同计议的还有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以及在工人中颇有影响的王亚樵等。在行刺案进入实行阶段时，江苏丹阳人贺坡光又以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积极分子身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陈惘子是其中惟一的中共党员，他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对待这一行动应采取何种态度，中共中央军委代表答复陈惘子说：“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是信奉马列主义的党，我们不能鼓励人家去搞暗杀工作。”当陈惘子对其伙伴传达这一指示时，华克之、张玉华、孙凤鸣、贺坡光表示：既然共产党不赞成这一行动，那么陈惘子今后就不需要再过问行刺活动了。

苦心经营晨光通讯社问世 慷慨悲歌孙凤鸣搏浪一击

行动从何着手呢？他们想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通过这一公开的组织，有了合法的身份，就有可能伺机接近蒋介石、汪精卫，才有可能实现暗

杀计划。

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没有经济来源。为此华克之专程赴香港，会见曾发动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李、陈颇表赞同，认为“这是一件神圣的事，大家应竭力而为”。不久，李、陈就拿出五千元港币，托王亚樵转送给华克之，充作筹办通讯社之用。

有了这笔开办费，华克之就通过有关人员向国民党党政机关疏通，办好了通讯社的立案登记手续。1934年11月，“晨光通讯社”在南京成立：社长胡云卿（即华克之），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在公开场合，以宣扬三民主义的实践为理由，几乎每天向南京有关报社发稿，隐蔽得很成功，丝毫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

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孙凤鸣曾进入了中央党部会场，由于看到蒋介石的时间很短，未能实现刺蒋的计划。到了1935年的8月，蒋介石自武汉抵南京，途中戒备森严，又图刺不果。

在上述情况下，李济深、陈铭枢表示不再从经济上给华克之等以支持。10月底，晨光通讯社的活动资金只剩下一百多元，难以为继，于是他们决定加快步伐。年轻气盛的孙凤鸣决心承担这一狙击任务，为了表示决心，他托华克之将妻

子和侄儿送往香港。

10月28日晚晨光通讯社成员设便宴为孙送行。华克之亲自将一支六响左轮手枪交给孙凤鸣，说：“四弟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乾转坤，其名可留芳百世。”孙也慷慨悲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当孙凤鸣进入中央党部后，华克之即布置有关人员撤离南京，把招租条贴在通讯社门口的电线杆上，表示通讯社已经关闭。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早晨7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一百多人到紫金山谒陵。9时全体委员回到丁家桥中央党部，接着举行开幕式。汪精卫以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的资格登台致开幕词，不到半小时开幕式就结束了。

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走出大礼堂，到附近的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站成五排等着照相。可蒋介石就是左等右等也不来。蒋生性多疑，见参加会议的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的要人们都带有马弁，心中犯嘀咕，说不定马弁中有异动者，于是决定不参加合影。中央委员们都在列队等候，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出来，便进入会议厅休息室催蒋下楼，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显得很为难，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时针指向9时35分时，摄影完毕，委员们陆续准备上楼参加预备会。突然从照相机、摄像机旁半圆形记者群中闪出一名身着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他从大衣口袋里抽出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正转身的汪精卫连续开枪。汪身中三弹，一在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

从后贯穿左臂，最要害的一弹则是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

孙凤鸣的袭击，引起一阵骚动，秩序大乱。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物狼狈不堪：腿不方便的张静江，连爬带滚跌倒在地；身体肥胖的孔祥熙，钻进汽车底下，随从们费了很大功夫才把他拖出来，可是马褂袖子已撕成两半。朱

家骅气急败坏地走下石阶，见到陈公博说：“有人打张静江先生。”参观、摄影和参加典礼的人们，象潮水般涌出，又象波浪般分散。

壮士牺牲凤鸣英魂留人间 顽凶未毙却把枪痕捞利名

当汪精卫遭到枪击倒地之际，站在汪身旁的张继将孙凤鸣拦腰抱住；张学良也奔上前来猛踢孙一脚，孙凤鸣一松手，手枪落地。汪精卫斜躺在地上，脸上淌着血，身上的西装和内衣也浸透着血水。陈璧君屈一条腿跪在汪的身旁，把着汪左手的脉搏，带着哭音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似乎在和汪精卫作最后的诀别。蒋介石闻声赶来，屈着一条腿把着汪精卫的右手，只说：不要紧，不要多说话。汪精卫一面喘气一面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罢，我死之后，要你单独完全负责了。”陈璧君认定，蒋介石不参加摄影，事出有因，愤然地说：“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甩毫不含糊的语言，一口咬定蒋介石是主使行刺的幕后人。蒋介石这时也吃不准刺汪是否他手下特务干的，气急败坏地召集了特务队的负责人大骂：你们每月花了

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你们三天之内，把幕后的凶手缉获，否则要你们的头！因为这次开的是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出事地点又是在中央党部，在军警戒备森严之处发生行刺事件，蒋介石的特务当然有很大嫌疑。第二天下午，蒋介石找陈公博、顾孟馥、谷正纲、唐有壬等汪派人物到军官学校谈话。蒋解释说：“我看这件事不是自己人干的，因为那种子弹不是配那种的手枪，而且他们所用的手枪也不是那一种。”陈公博对蒋的解释，认定“实在当时他（指蒋介石）也失去了自信”。不仅如此，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还拍来电报正式质问，使蒋介石有口难辩，处境尴尬。

孙凤鸣被汪精卫的卫兵击倒后，失血过多，急送医院抢救。国民党南京政府当局为了弄清刺汪的政治背景，由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悼、内政部代理部长陶履谦、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等人亲临病床查询孙凤鸣到底受谁指使？孙义正辞严地声明：“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是我的良心！”接着，又说：“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爱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孙凤鸣身中两枪不治身亡，汪精卫身被三弹却侥幸不死，还捞到一笔政治资本。汪被送进南京中央医院后，他接受“中央社”记者的采访，侃侃而谈地吹了一通：

“昔英士被刺于沪，执信被刺于虎门，余皆未及赴。仲元被刺于广九，昇归督署，余奔往抚视。仲元莞尔笑曰，观君等哀痛迫切之状，使余不能死，不其慰耻。仲恺被刺于中央党部，惟见廖夫人号陶而已。当余昇到中央医院时，身中三枪，自度必死，顾得以随诸先烈之后，亦复心安理得，而诸

同志之惶惶抚视情状，宛然仲元被刺时也，顾仲元已死，而余伤非致命，且得名医，势当可生，以慰诸同志。夫革命党人以身牺牲，死何足惧？且国难至此，生亦何幸？既然留此余生，则一息尚存，仍当本鞠躬尽瘁之旨，黽勉从事，斯方足告慰诸同志耳。”

汪精卫对国民党内大人物被刺事件，如数家珍，暗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把陈英士、朱执信、邓仲元、廖仲恺等先烈的被刺，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先烈们的死是光荣伟大的，他自己呢？自然也是伟大光荣的。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汪精卫的被刺，倒使他在政治上的形象一下子高了一大截。

陈公博就曾说了如下的一番话：“民国以来，国民党人物遇刺没有不死的，只有一个不死的，就是汪先生。这也可以算开国民党人被刺的新纪元。汪先生也可算是大难不死，许有后福。”看来，汪精卫真有点因祸得福了。

当汪精卫被刺后到欧洲疗养，一位驻法使馆的官员这样回忆说：

“1936年汪精卫被刺后到了欧洲，先到了巴黎，我去见了。在座的有李石曾、曾仲鸣和汪精卫的儿子、亲戚等。汪在另一间屋里和我单独谈了很久。他先为我叙述了被刺的经过，他说：‘凶手的目的是刺蒋先生的。因为蒋先生有事还没有到，所以打着了我。……凶手的动机也并不坏，所以我还为凶手向主管部门讲过话，要他们从轻处理，不要判处死刑。’”

汪精卫为行刺自己的案犯求情，并不表明他对自己推行的对日妥协路线有所认识；“凶手的动机并不坏”这句话，也不能说明汪精卫能接受了什么教训。后来事实表明，汪在这

条错误路线上越滑越远，终至不能自拔。1939年汪精卫的再次被刺，就是对他的又一次当头棒喝。

西安事变汪精卫疯狂反共 卢沟枪声侵略者妄图灭华

说到汪精卫的第二次被刺，我们还得说一说西安事变。

1936年，汪精卫出国就医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抗日形势的高涨，发生了作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使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进而初步形成了联共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对此，汪精卫是不甘心的，1937年初汪精卫刚由国外回到南京，就恶狠狠地叫嚷：“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尽管汪精卫发誓反共到底，但是蒋介石还得维持联共抗日这个大局，蒋、汪之间的裂痕已无法愈合了。

1937年，日寇挑起“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件，狂吠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汪精卫在日本战争狂人面前，惊慌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他厕身抗战阵营，却大肆传播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在这年的8月，汪抛出《大家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声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这种做法，无他巧妙，只是说老实话而已。”汪精卫散布的是不折

不扣的失败主义。因为按照汪精卫的逻辑，“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这哪里还有一点胜利的希望。

当中国全民抗日的烽火点燃后，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组织“低调俱乐部”，叫嚷“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鼓吹“和平”。周佛

海后来供认不讳地说：“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确认识之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汪精卫其实就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

日本招降汪精卫暗签密约 群奸窜逃卖国贼潜入河内

1938年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近卫声明，汪精卫（开始还包括蒋介石）、周佛海等还想试探日方对和战的真实意图，于是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和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相继被派去日本，探听虚实。高宗武后来干脆改换门庭，由为蒋介石搜集情报转而为汪精卫另辟求降蹊径。蒋介石一怒之下，叫来陈布雷，大声呵责：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立即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高宗武生病后，汪精卫、周佛海改派梅思平接替高宗武的对日谈判工作。在梅思平与日本人松本重治会谈五次后，由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了重光堂密约。这项密约要求：缔结防共协

定、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华经济提携、中国应补偿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等等。

汪精卫只有承认这些条款日方才应允支持汪建立反蒋、反共的政权。汪精卫经过一度踌躇之后，终于决心下水。

汪精卫下了当汉奸的决心后，手下的人就分头活动：11月29日，陈公博应汪召自成都飞渝，与周佛海、梅思平等研究日、汪密约的各项文件，并通知在香港的高宗武。还制订了行动计划，决定汪精卫于12月8日赴成都，11日赴昆明，梅思平则于11月30日乘飞机赶回香港。12月5日，周佛海利用宣传部代部长的名义，赴昆明“视察”，率先溜出了重庆。但蒋介石此时突由湖南返回重庆，一下子打乱了汪、周们的外逃计划。他们表现了极大的恐慌。汪精卫孤注一掷，命陈春圃于12月a日赴昆明，因汪的行期一再拖延，陈代定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不得不取消。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等到出逃的机会。这一天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汪可不参加此会。于是他通过彭学沛（交通部长）预留几张飞昆明的机票，偕陈壁君、曾仲鸣等人乘机脱逃。当飞机抵昆明时，龙云及云南省各厅、署、局负责人均前来迎接这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怕露了马脚，拒不接见任何人，托辞因飞机颠簸，脉搏间歇，改日再见。第二天，汪精卫等乘机直飞越南河内。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出《调整对华外交方针》，即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要求：（一）承认满洲国。（二）反共，以反共的名义，在内蒙古日军拥有驻军权。（三）在经济方面实行垄断。29日，周佛海、陈公博携带汪本人起草，陈、周等参加修改的汪精卫声明（即后来臭名昭著的《艳电》），赴香港发表。作为对近卫声明的响应。

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竟然通过林柏生主办的《南华日报》，赫然在目地发表其响应日酋声明的声明，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背叛，也是对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的公然挑战。因此重庆国民党当局不能不认真对待。

顽逆难劝陈恭澍挟枪出马 高朗街中曾仲鸣充替死羊

1939年元旦，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会上群情激愤。在冯玉祥、张继等人坚决要求下，由吴稚晖起草决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但蒋对汪还留有转圜余地。同年2月，先是派和汪有交情的陈布雷、王宠惠等到河内，劝汪出国休息，但汪听不进去。2月15日，蒋又派和汪有渊源的谷正鼎（原改组派）赴河内，劝汪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谷带去汪精卫、陈壁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并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不仅听不进去，反而感情冲动地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及壁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去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汪还要谷正鼎转告蒋介石说：“他（指蒋介石）如把党国搞得不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这是几句软中带硬的话，它的潜台词是，如蒋不采纳他的主张，他还要走得更远。

谷正鼎使命失败，使蒋介石认定对汪精卫仅仅施行规劝、诱导是无济于事的，为了根除后患，决定采用非常手段。于是叫来了戴笠。戴笠，浙江江山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官至中将军衔，是蒋介石一手栽培起来的，绝对服从“校长”的命令。他掌握的蓝衣社是专门从事暗杀、绑架、审讯、关押和处决的特务组织。活动范围和对象大致是：对付中共、指向敌伪、同时也用以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蒋介石既把制裁汪精卫的任务交给戴笠，戴就指定手下大将陈恭澍具体执行。

陈恭澍，北京人，黄埔五期毕业。

1939年元月的一天，陈恭澍在天津接到戴笠从香港发来的急电：“克日来港。”次日，戴笠即偕陈从香港飞往河内，交待完监视、侦察汪精卫行踪的任务后，戴就走了。参加这一任务的还有：

王鲁翹，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山东人。

余鉴声，杭州警校毕业。

张逢义，黄埔七期毕业，山东人。

唐英杰，四川人，身材矮小，但练就一身“登房顶，倒卷帘”的本领。

陈邦国，安徽人，力大身粗，出身行伍。

陈步云，江苏徐州人。

这批人分别到了河内，由陈恭澍统一指挥，他们租旅馆，买汽车，设立电台，探明汪精卫的住址。

当时的河内，人口仅有十五万左右，来了这批不速之客，活动近五十天，竟然没有引起越南法国当局和汪精卫等人的注意。

汪精卫的住处在河内高朗街27号，这里是一片环境幽雅

的高级住宅区。27号汪寓是一幢三层高的楼房，面临林荫大道，沿着巷道往后走，有一垛矮墙，墙内有一小方院落，也就是27号的后院。

3月19日，戴笠给陈恭澍发了个“亲译”字样的电报说：“着即对汪精

卫予以严厉制裁。”换句话说，就是要汪的命。陈恭澍岂敢怠慢。次日上午，汪精卫、陈璧君乘两辆黑色轿车外出，陈恭澍等认为机不可失，就乘自备福特小轿车尾随于后。当大轿车过了红河大桥在一个场地稍停后又折回来，小轿车紧随其后。不巧，在折回大桥时，大轿车刚通过后，红灯却在小轿车前方亮了，这样就拉大了大小轿车之间的距离，陈恭澍等废然而返。但刺汪的行动并未因此中止。

3月21日深夜二时许，高朗街27号全宅的人均已入睡，一片沉寂。王鲁翹率领他的伙伴到汪宅执行制裁汪精卫的任务。当到达矮墙外时，唐英杰动作麻利，一抓墙头，翻身进入院内，原想从里面将后门打开，不想门已上了栓，而且加了锁，用力扭不动，他伸头向墙外示意。陈邦国毫不迟疑，踏着张逢义的肩膀翻墙入内，与此同时，王鲁翹、余鉴声也由陈步云一个一个托了上去。张逢义则留下防守于后门以外，陈步云则巡游于巷道与街道之间，互相呼应，以资联络。

唐英杰、王鲁翹、陈邦国、余鉴声四人来到院内，陈用斧头劈开了通楼梯的房门，王、唐、余三人迅速上楼。陈则留在楼下，为的是掩护上楼人的安全，同时也为了保住出去的通道。听到响声有人推开房门探视，陈立即对着房门开枪，人影又缩回去了。

王鲁翹大步流星地赶到二楼，正要转上三楼之时，有位年轻人空着手钻出来，王用枪口逼住对方，不许他喊叫。王又赶到三楼，靠近前面那间主房。这是他们事先侦察好的，又

经唐英杰潜伏在房子上两次查勘，认定这间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所在。

王鲁翹用力推门推不动，扭把手又扭不开，退后两步借冲力踢门还是踢不开，就走到楼梯口，忙打手势让余鉴声赶快将斧头递上来，唐英杰见状飞快地将斧头带上了三楼，余叫唐仍回二楼，代替他的警戒任务，余随后也上三楼协助王。

王鲁翹、余鉴声二人共同用力劈掉房门中的一块木板，并探手几次传动里边的门球，仍无法将门弄开，才知门已上锁。不过门板上已露出一尺见方的大洞。在灯光照射下，王鲁翹蹲下身子朝里头张望，就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男人，这人半个身子藏于床下，腰背双腿则全露在外面，王鲁翹根据身形推断，十有八九此人就是行刺目标汪精卫。

这时王鲁翹毫不犹豫，举枪就射，一连开了三枪，眼见枪枪命中床下人的腰部。他们以为大功告成，相继退出汪宅。但到凌晨5时左右，先后接到两个电话：“你们搞错了！那个人（指汪精卫）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另一电话则说：“有三个人（指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被逮去了！”这次刺汪行动，由于误中副车，宣告破产。

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对这次刺汪行动的描述更为详尽：

“3月21日的深晚2时许，夜深人静，全宅的人都已入睡，忽有人从后园逾垣而进，循屋后的小门入室。当行经底层仆役室时，一个随从戴芸生与厨子何就，闻足声启户查看，凶徒见之，即发枪射击，戴芸生手臂中一弹，何就腿臂各中一弹。另一随从陈国星，闻枪声逃匿车房汽车下。暴徒又发一枪，地上水泥碎片伤其胸部，乃循梯拾级而登，中层梯头的一室，为汪氏内侄陈国琦所卧，亦闻声而出，凶徒迎头相

遇，再发一枪，又弹中其腿部，迫令折入邻室，行凶者于是再登顶楼。朱女公子（朱执信次女朱徽）首先听到间歇之枪声数响，入室至楼头察看，

适其邻室的曾仲鸣亦同时出视，闻楼梯有杂沓的脚步声，亟拉之一同退入曾之卧室，急阖其户，而凶徒已追踪而至。他们用利斧把木制的门室劈开一洞，将驳壳枪伸入室内。凶器是可以连发的快慢机，幸朱女公子入室后，正躲在门右的贴墙处，刚好是一个为枪弹射程所勿及的死角，得幸免于难。而曾仲鸣夫妇，则立于卧榻之前，直对着暴徒的枪口。他们一按枪钮，子弹如连珠发射，仲鸣腰腹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璧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两人同时倒卧于血泊之中。

此时何文杰（汪精卫女婿）夫妇也早被连续凄厉的枪声所警醒了。起先在楼下的数响，睡梦中尚疑为爆竹声，但以后向曾氏房中发射的排枪，近在咫尺，又值夜深人静，才觉得巨变已生肘腋。他与文愷女士（汪精卫长女）披衣而起。方步出室门，汪氏亦闻声而出，低声问文杰：‘什么事’？文杰含糊地说：‘没有什么’。就急急把汪氏推回室内。于是汪氏夫妇与文愷就于黑暗中坐在门旁靠壁的地。迫汪氏闻到对室仲鸣夫妇所发出沉重的呻吟声，几次想冲门而出，都为文愷女士力持不放。如汪氏出室，当然也必遭毒手。又如凶徒们知道汪氏所居即在对房，则只须一回身，汪氏夫妇也势必为仲鸣夫妇之续。而仲鸣夫妇受伤的倒地声，凶徒们却以为已把汪氏一击而中，就仓皇下楼而去。

何文杰是最幸运的一个，当他把汪氏推回卧室时，他还不知受伤的是曾仲鸣夫妇，所以，假如他从汪氏室内出来，对着仲鸣的房间走去，又刚好与得手后的凶徒们遇个正着。而他无意中竟先折而向右，经过自己的卧室，再走到梯头向下

俯视，看到中层有人伸手正在扭熄电灯，他发觉情形不对，急急退回。仍沿原路回至汪氏室中。前后经过了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枪声停止，凶徒也料已远扬，文杰才敢去至仲鸣的卧室，推门而入，朱女公子正在门后颤栗，而仲鸣夫妇都已倒在地上，伸手一摸，湿漉漉滑腻腻的鲜血竟流满了一地。在床头灯发出微弱的光线中，他看到他自己的半个指头已被鲜血所染红了。朱女公子下半身的裙裤，也溅满了血渍，放在前面的竟是那样一片惨怖的景象！

没有人确实知道进入室内的凶徒究竟有多少？在行凶的时候，因为汪宅以内，全部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支自卫的枪也没有，所以他们乃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为所欲为。在中下层各个寝室的门口、楼梯口、窗口，以至屋外的四周，且都有人驻守监视，直掩护至他们全部离去。汪氏的秘书汪配，才在二楼窗口向街外狂呼：‘救命！救命！’因为朱女公子谙法语，由何文杰陪着下楼用电话报警。事后知道，那时凶徒们还公然留在后园以侦察室内的动静，直听到朱女公子在电话中呼援的声音，他们相信目的已达，始从容再逾垣而逸。

受伤的五人中，陈国琦伤在腿部，自己已把手帕裹好了伤处。随从戴芸生、陈国星、厨子何就都伤势不重，初步加以包扎以免流出过多的血液，就留宅疗养。救护车开到汪宅，只把伤势最重的曾仲鸣夫妇送往军部医院救治。高朗街的汪宅，到此时河内当局才派警来保护，而来的又是几名当地的上著警察，抵达以后，方由法籍警官临时教授他们怎样装子弹与怎样开放的技术。连武器也不会使用的武装人员，则所谓保护，也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但是，为什么如此严密的计划最后反错认了目标呢？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汪之不死，其原因亦甚偶然。寓河内时汪

昼间在曾仲鸣房间看书写字（曾房内光线较佳），在外窥探者以为该房即汪卧室，殊不知昼间在该房，夜间不在也。”汪精卫就在这种偶然的状况下，暂时得以下死。另一种说法是：3月20日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汪则搬到另一间房内住。显然刺客们不知此中变化。以上两说的可靠程度如何，待考。

不过汪精卫此时已决心降敌却是无可怀疑的。事过二十五年后，朱子家在写这段历史时，却以“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的吓人题目，故甚其辞，说什么由于曾仲鸣的死，使性格易于冲动的汪精卫被激怒了，他终于下决心组织伪政权，这不是持平之论，恰恰是倒果为因，把事情的本来面目搞颠倒了。然而即使如此，汪精卫出面组织伪政权，也不见得就比华中的梁鸿志、华北的王克敏的伪组织高明多少。抓住一个汪精卫并不能挽回日寇的失败命运。历史终究不是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终于把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连同它卵翼下的所有伪政权统统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汪精卫河内遇刺这一幕历史插曲，成为他继1935年被刺后任人笑骂评说的又一历史资料。

斗士鲜血洒春城 ——记民主活动家李公朴被刺案

1946年7月11日，是昆明历史上暗无天日的一天。

天空，阴沉沉。乌云压得那样低。落了一整日的蒙蒙细雨，直到近黄昏时分才收住。

闹市中心近日楼附近，一家电影院刚刚散晚场。著名的民主活动家李公朴先生，偕妻子张曼筠女士，缓步从电影院走出来。这一对患难夫妻，原是为了帮助朋友举办一个募捐音乐会，到这里来接洽租借会场。经理是老熟人，没两句话就爽快地答应了，还热情地邀请他俩顺便看了一场新上映的美国影片《青鸟》。

李公朴与妻子安详地走向汽车站，边走边小声议论着什么。饱经沧桑的伴侣，无论什么时候，都这样相敬如宾。他们太紧张、太疲倦了。几个月来，李公朴为了呼吁和平，反对即将燃起的内战，四处奔走。抗战胜利了，他所办的书店也要筹划搬回上海。纷繁的头绪缠绕着他们，以至谁也没有觉察到身后尾随多时的国民党特务。他们岂能料到，就在走出电影院不远，一辆美制吉普已久候在那里，而另一个丢掉烟头的小特务，则在黑暗中掏出了手枪，向着李公朴的身后扣动了板机。只是子弹卡住壳，枪才没有响。

为国家献身文化事业

李公朴，著名的社会教育家与民主活动家。

1902年，李公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贫苦家庭，父母早亡，从小由哥哥抚养。13岁时，为生活所迫离开私塾，到镇江一家京广洋货店做学徒，干得是做饭、倒马桶的活计。当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时，李公朴也被爱国热情驱动了。他参加镇上一些青年组织的爱国团。不久，他因为反对贩卖日货，与唯利是图的店老板发生冲突，不得不离开镇江。这时，

他才 17 岁。

离开故乡，李公朴来到水陆通衢武昌，初在一所中学读书，却又因反对外国教师虐待学生而被开除。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的黑暗社会加深了了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李公朴参加了鼓吹农工神圣的国民党，后来还加入

了征讨北洋军阀的国民党北伐军。1927 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黄浦江上的鲜血使一腔热血投身民族革命的李公朴，顿时失望，陷入苦闷之中。他愤然脱离国民党，于 1928 年到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立德大学攻读政治学。

在美国求学的两年是十分艰苦的，微薄的奖学金不足以维持生活，他就半工半读，给人家洗碗、擦窗子、拖地板。清贫的生活锻炼了他的毅力，也使他更加了解了美国的社会，当时，邹韬奋先生在上海编辑《生活周刊》，李公朴常把在美国的见闻写下来寄去发表，还成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1930 年冬，李公朴自欧洲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

李公朴回国后，本打算从事文化事业。1931 年，他在南京筹组“全球通讯社”，还参与发起了“中国国际合作协会”。

是“九·一八”的炮声震惊了李公朴，他目睹到东三省沦入口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目睹到全国民众纷纷要求抗日救国的呼声。血气方刚的李公朴，立即投入到这一拯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时代潮流，并逐渐成为一位大无畏的民主战士。

1932 年 1 月 28 日夜，日本侵略军由上海租界向闸北、吴淞一带进攻，企图占领上海作为入侵中国内地的基地。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鼎将军率领下，奋起反击，拉开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序幕。但是，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拒绝援助抗日将士，致使十九路军在腹背受敌情况下，被迫撤离上海。5 月 5 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则可在上海驻扎军队。这一屈辱协定，无疑对愤怒的民众又火上添油，更加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浪潮。李公朴在这种形势下，与邹韬奋积极筹备《生活日报》，开展抗日教育与宣传。反动派对李公朴等人的救亡活动极为恐惧，百般刁难，阻止出版《生活日报》。但李公朴毫不灰心，经过许多努力，又创办起《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妇女夜校，为失业的青年提供精神食粮，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流通图书馆是一个发明，把图书报刊装在汽车里，哪儿有工人，有青年，就开到哪儿，为群众阅读开辟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图书馆还设有指导部，艾思奇、柳湜、夏征农都担任过指导，并轮流撰稿公开答复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使这个场所，成为三十年代初上海出现的一个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用通俗语言解释社会现实的园地。这种进步倾向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4 年 11 月 13 日，《申报》主笔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特务暗杀身亡。但是，李公朴没有被吓

倒，反而公开把《申报》流通图书馆改名为量才业余补习学校，与反动派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与此同时，他还与艾思奇共同创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建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些工作使李公朴越来越为民众所了解，越来越为同人所信任。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鲸吞华北，国民党政府则步步退让，继 6 月 9 日秘密签订《何梅协定》之后，11 月又下令撤销北平军分会，与日寇商

治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倒行逆施终于激成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当抗议华北伪自治运动的浪潮在上海掀起时，李公朴积极参与了发起组织“上海文化教育界救国联合会”。这个团体的诞生，不仅是对“一二·九”运动的有力声援，它还表明抗日救亡的群众呼声，已由自发的分散的发展为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了。上海文化教育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首次发动的群众集会，是1936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紀念会。这天上午9时，两千多人齐集于市商会大礼堂举行时事演讲会。光华大学教授，救国会领袖之一的王造时，在台上诉说连年国土沦丧，痛哭流泪，听众的情绪悲愤到极点，一个个十分激动。会中，有人提议上街游行，要求国民党枪口对外。顿时一呼百应，人群涌上街头，排成整齐的队列，沿着北河南路向闸北前进。走在前列的，有长髯飘拂的沈钧儒老先生，李公朴与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陶行知、胡子婴等，也个个精神抖擞。《义勇军进行曲》从洪流中响彻十里洋场，许多群众自动加入这支队伍。上海沸腾了，振动了。游行队伍走出英国租界，立即见到迎面而来的大批军警。李公朴毫不畏惧，率领队伍直冲过去，如临大敌的军警被人流的愤怒震慑了，被迫后退。这时，奉命来的特务又一个个

鬼鬼祟祟，企图挤进队伍乘机捣乱。李公朴与陶行知见状，立即机智地指挥大家改为四人一列，并肩挽手，迫使特务只能跟随在队伍两侧同行，这倒仿佛成了示威者不请自到的保镖。沉着和应变，使李公朴赢得了同人们的赞赏，后来多次集会，他就成了当然的指挥。中午，游行队伍经过宝山路、江湾路来到庙行“一·二八”淞沪抗战无名英雄墓，致祭后，大家向死难勇士们庄严宣誓：“我们坚决继承遗志，抗日救国！”

为民族 身陷森森图圈

1936年，中国的局势极为险恶。3月，日本操纵汉奸在厦门成立所谓“福建自治委员会”，又唆使德王成立蒙古自治军政府。5月初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订立《华北防共协定》，中旬日本向华北大量增兵，平汉、津浦、北宁、平绥诸路均驻有日寇重兵。

在这种严重形势面前，全国各界救国会于5月31日在上海宣告成立，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李公朴担任了该会的负责工作，是救国会领袖之一。救国会的活动遭到政府当局的忌恨，从而爆发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36年11月12日救国会召开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大会。为了呼吁国民党政府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迫害，呼吁全国民众团结一致抵御外寇，救国会决定利用合法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以扩大政治影响。12日下午，救国会各基层组织及民众团体纷纷赶到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大会原定在这里进行，可人们来到时，却见门旁黑板上写着“今日本会场不借给任何人开会”。显然是当局从中进行干扰。开会时间快到了，

大家不免焦急起来。忽然，一位青年前来小声通知，要人们到戈登路（今江宁路）女青年会集中。原来，李公朴得知会场被封消息后，立刻设法在女青年会开辟了第二会场。

经过李公朴的精心安排和调度，群众在女青年会绿草如茵的广场上，一

排排地坐下来。《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声，在会场上空回荡起来。大会开始了，第一个讲话的便是李公朴。他激昂慷慨地讲述了孙中山最后一次从广东北上经过上海时与新闻记者的对话，又讲述了孙中山坚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他说：“当时的反动政府一面蒙蔽中山先生，一面却鬼鬼祟祟同帝国主义者谈判修改条约。等到中山先生获知确讯，十分愤慨，曾面斥当时权贵：你们既然要同帝国主义妥协，为什么还要我来共商国是？”这虽然是回忆历史，但话中所指是人人都清楚的。李公朴接着说：“这种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老人家当时接受进步力量的意见，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策，是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必由之路。今天的民族危机这么严重，我们集会纪念中山先生，就要继承遗志，继续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继之，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人也登台演说。最后，由沪东的一位日本纱厂女工上台控诉，报告了自9月以来两万多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情况。大会群众的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成立援助罢工工人斗争的后援会。散会后，门口已设立了一只临时募捐箱，大家倾囊捐款，场面很是感人。

这次成功的集会，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一场预谋的迫害开始了。11月22日深夜，一群气势汹汹的警察，还有法国租界的巡捕，冲进李公朴家中。这些蛮横无理的爪牙，进门就

翻箱倒柜，企图寻找什么罪证，却什么也没发现。李公朴气愤地与他们争辩起来，可是手无寸铁的布衣，如何抵挡得住这般强盗。李公朴被强行押上汽车。他的夫人张曼筠女士，气得脸色苍白。从熟睡中惊醒的女儿，对面前突然发生的一切，百思不解，她悄声问母亲：“他们为什么抓爸爸？”“因为你爸爸爱国！”在那时，爱国也竟然成为一种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公朴有两个孩子，儿子生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起名为李国友，大一点的女儿则起名叫张国男。“国男”、“国友”实际上是“国难”、“国忧”的谐音，李公朴是让孩子们牢牢记住国家的多难与多忧啊！这天深夜，与李公朴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的另外六位领袖，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李公朴等人被捕后，丝毫没有松懈斗志，大家互相勉励，决心与反动派坚决斗争。12月4日，他们被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到了苏州，李公朴代表七君子向押送者致“临别词”，他说明当前国难的严重性，和救国会团结御侮的正义主张，讲到沉痛处声泪俱下，使那些押送人也大为感动。

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在逮捕李公朴等4个多月后，才勉强凑成所谓“危害民国”的“十大罪状”，说七君子“涉有勾结共产党，组织非法团体，煽动罢工罢课，扰乱地方秩序，图谋颠覆政府各嫌疑”。七君子坚持予以驳斥，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

反动派看硬的不行，又改变花招，企图劝降。5月间，由叶楚傖出面，通过杜月笙和钱新之等，要七君子写悔过书，进

反省院后出狱。但是，这一劝降活动岂能动摇李公朴等人的毅志。接着，蒋介石又亲自出马，请七君子上庐山“晤谈”，亦被断然拒绝。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正式开庭审理，李公朴在法庭上镇定自若，质问法官：

“连集会纪念中山先生诞辰，援助日本纱厂被迫罢工，你们都要列为罪状，试问你们还要不要做中国人？”一语发出，击中要害，面红耳赤的法官虽然表面上阵阵有词，而内心中早已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七君子在狱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狱外也掀起了强大的援救浪潮。慰问电、声援信，雪片样飞来。还在李公朴被捕仅仅20天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就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迫其抗日。他们曾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的一项就是立即释放七君子。旅居海外的华侨亦为七君子事件公布《告海外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号召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上海市民4800余人联名上书请愿。援救浪潮遍及全国，在第二次开庭前后，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七君子爱国无罪，应立即释放；如爱国有罪，则他们亦与七人同罪，也应当一起收押，并案处理。7月5日，宋庆龄、何香凝等带头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请求入狱，一时响应者鹊起，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宣布全面抗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政府当局不得不释放李公朴等人。7月31日，七君子终于获释，狱门外聚满了欢迎的各届民众，有人还燃起爆竹庆祝胜利。望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沈钧儒不由地想起了李公朴在狱中写的一首诗，那诗的序中说：“六月十二日退庭，有谓我等胜利者，痛伤久之，答以此诗。”诗云：

我不要这一种胜利！
眼看着地图变了颜色；
六千万同胞沦亡在深渊之底，
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人气，
那里有心思来与自家人斗鼠牙，争虫臂！
我早已忘掉了自己。
我祈祷着这一天：
能把我的血，飞洒到关外数千里与天无际的白云上，
把我们的骨，深埋在那一边的土里，
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也就是我们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
我再不要其他的胜利！

为御敌 呼吁团结抗战

李公朴出狱后，全国抗战局面已逐步展开。他立即投入救亡运动的实际工作。

他到了武汉，在这座战火逼近的古城宣传全民抗战。他去汉阳兵工厂讲演，要求卫戍司令部释放关押的工人，竟被陈诚以“煽动兵工厂罢工”为借口羁押了一个月。他到了临汾，那里已是抗日前线。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民众推动下，办起“民族革命大学”，邀请李公朴担任教授和顾问。他一到临汾，就与同事草拟了“民大”纲领，把中国共产党“实行全国总动员”、“坚持抗日民族团

结”、“实行抗战教育”等主张，写了进去。

他到了延安，参观了热气腾腾、抗战情绪高涨的解放区，还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

他又率领青年战地服务团，经过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冲破同蒲路封锁线，到达华北敌后战场，调查敌后教育情况。

他还打算走遍南北战场，交流抗战工作经验。但由于国民党不断掀起的反共逆流，使他未能如愿。1941年，李公朴一家辗转来到抗日大后方昆明。

到昆明不久，刚近不惑之年的李公朴周围，就聚集起一群群的青年。他帮助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组织起读书会、举办各种专题讲座，还出版壁报和油印的《职业青年》等刊物。在当局摧残进步书店、报刊的年代，精神食粮是那么缺乏，这位出版界的战士深知宣传的重要，于1942年年底，在几位青年的协助下，创办起“北门书屋”。不久，北门出版社也诞生了。北门书屋销售上海图书杂志公司、华侨书店，进修出版社等各地书刊，与陪都重庆的出版界保持着长久联系，北门出版社先后印行了楚图南、张光年、赵沅、艾青等人的著作，和苏联的一些名著。湘桂大撤退时，他们出版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对云南人民保卫大西南起了教育鼓舞作用。他们还出版了张光年、叶以群主编的《文艺的民主问题》，执笔者有茅盾、何其芳、曹靖华、姚雪垠、楚图南、闻一多、李何林等20多人。这本册子对当时文艺的民主问题提出了尖锐深刻的意见，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后来，北门出版社还秘密印刷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重要论著，成为云南及大后方很有影响的一家出版社。

李公朴不愧是位社会活动家。在昆明，他与文化界建立

了广泛的联系。1943年，他与郑易斋、楚图南、孙起孟、周新民、冯素陶、张天放、艾志诚、杨春洲等人发起了一个定期讨论会，研究时局，发表意见，人称“九老会”，这个九老会，不久就扩大了，华岗同志受中共南方局委派来昆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它基础上成立了秘密的学习讨论会，对外称作“西南文化研究会”，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吴晗、闻家驷等一批著名学者教授相继加入。他们听取解放区的情况介绍，学习统一战线理论，分析形势，讨论推动民主斗争的方法，为迎接云南民主运动高潮到来，做了许多重要的准备。

白驹过隙，岁月荏苒，1944年来到了。这是抗战胜利前的一年，是昆明民主运动走出低谷的一年，也是李公朴在抗战大后方大展宏图的一年。春城里许多重要集会，都有他的身影，都响着他宏亮的声音。

1944年双十节纪念大会，是对昆明民主运动的一次盛大检阅。这年，日寇为了打破战局相持，发起打通南北交通线的频频攻势。国民党军队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在妥协政策下，节节溃败。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大后方，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与昆明文化界、教育界联合召开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

下午一时，双十节纪念大会在昆华女中操场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吴晗、罗隆基都是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分别做了演说。会场里五千多各界人士，群情激昂。当大会进行到楚图南讲演时，突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卑鄙地捣起乱，“啪！啪！啪啪！”几声爆炸声从人群中响起来。“炸弹，炸弹！”顿时一阵骚动，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不知所措，互相推攘。主席台上的李公朴，对这种场面并不陌

生，他霍地站起来，大声喊道：“请大家镇静！请大家镇静！”闻一多

对着特务厉声说：“你们是中国人不是？你们不要捣乱，听听我们讲的对不对。”

会场稍稍安静了些。这时，又一声轰响，人们发现了捣乱的特务，把他抓了起来。李公朴走下台，从地上捡起一颗还没来得及爆炸的纸筒。“大家看，这不是炸弹，是爆竹。有人害怕我们这个会，想破坏，大家答应吗？”“不能！”大家齐声回答。被扭送到台上的小特务面孔苍白，人民群众的威力使他心惊胆颤。这一天，“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口号传遍昆明每个角落，它表明了人民对政府抗战不力的谴责，表明了要求打垮日本强盗的决心。

1945年的春天姗姗来迟。一天，重庆的特务头子刘健群提着一盒糕点来到李公朴家。他是奉最高当局的旨意，来这里充当说客。

“公朴，这几年你在昆明也够苦了，到重庆走走吧。教育部虚席以待，等老兄走马上任。”刘健群的话吐得很慢，显然早就想好了。

“是吗？不过我自己感觉倒不是这样啊。”李公朴说：“再说，重庆那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刘健群以为有转圜的余地，凑过来压低声音：“因为留在昆明很不安全。”

“这吓不住什么人。”李公朴很得体的回答。

刘健群被这不软不硬的钉子碰得楞住了，片刻才快快地说：“我看老兄还是答应了吧，不然我没法交代。”

“那就随他去吧！”李公朴心里这么说，抬起目光望了一下对面的墙。刘健群顺着那目光，看见墙上悬挂着一幅题字，定睛再看，是沈钧儒先生为李公朴写的座右铭：“立场坚定，

态度和平。”他明白，这次劝降是失败了。

为和平鲜血洒落陪都

1945年8月11日夜，昆明城内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各家报纸争出号外，醒目的标题各式各样，它们送来了日本外务相的乞降消息。

北门街李公朴的家里，也洋溢着欢乐，这里很久没有畅怀的笑声了，今天它却一阵又一阵地在小屋里回荡着。

在抗战胜利的喜悦里，李公朴没有沉醉。他清醒地看到真正的和平与民主，还没有实现。一次庆祝胜利的群众集会上，他见到了闻一多，发现这位老战友年轻了许多，一把长髯没有了。闻一多在知道抗战胜利的时候，立即剃去蓄了八年的胡须。

“一多，你年轻了十岁！”

“我们都年轻了！”一阵欢笑。

笑声过后，李公朴心事重重地说：“一多，胡子剃得太早了，胜利远没有来啊！”

闻一多望着李公朴的美髯，他俩曾是昆明人所皆知的一对美髯公。“是啊！剃得是有些早，要是需要，我就再把它留起来。”

10月1日，为了商讨抗战胜利后的民主运动方向，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后被迫认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公朴作为云南支部代表，来到山城。这次会上，讨论了民主同盟在新形势

下的政策、组织、机构、政纲，并发表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保证人民自由权利、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等十项

主张。在新组成的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李公朴和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吴晗、楚图南、冯素陶、潘大逵等云南代表，都进入了这一领导机构。

民盟临代会结束后，李公朴没有回昆明。他留在陪都，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为许多失学青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环境。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的中心。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签署“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各界爱国人士推动下，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宣布四项诺言：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次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协进会”成立，李公朴担任理事，负责组织联络工作。他们每天在沧白堂召开各种民主集会，邀请旧政协代表报告当天开会情况，听取各方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会场里常常有特务起哄，李公朴总是临危不惧，依靠群众的支持，一次次把特务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国民党当局从未真心承认双十协定，他们不过是为了准备内战而拖延时机罢了。这种可耻的阴谋在较场口惨案中暴露无遗。

1946年2月10日，为了庆祝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重庆各届代表、工人、店员、青年一万多人齐集较场口广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大会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团体发起，李公朴象往常一样，不仅担任了大会主席团成员，而且又为总指挥。

大会刚刚开始，一个自称是农会代表的特务刘野樵，便上台抢占播音器。这是明显的挑衅行为，李公朴与主席团成

员立即上前制止。就在这时，早已布置多时的暴徒跳上台来行凶动武，大打出手。会场中暗藏的600多特务亦乘机挥起铁条、木棒，顿时会场骚动起来。李公朴首当其冲，头被铁器打得鲜血不止。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六七十人被打伤，还有一些人失踪。周恩来闻讯，立刻驱车赶来，只见李公朴长长的头发和胡须上，都沾着无数凝固的血块，脸色因失血过多而变得发青了。周恩来立即用自己的汽车把李公朴送往医院抢救，随后又亲往医院探望。李公朴忍着疼痛，头上裹着纱布，向周恩来表示：“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自由和民主！”

较场口事件，是政治协商会议刚刚通过有利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五项决议”后，便出现的一股恶浊逆流。李公朴的鲜血向广大人民证明，和平的道路还有许多艰险和阻力。他出院以后，住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民主报》馆楼上养伤，一位同人去慰问他，他心情沉重地说：这是一个讯号，一个“打”的讯号。果然，国民党在北平殴打军调处执行部中共办事人员、在重庆捣毁《新华日报》、在南通制造惨案，在南京下关打伤马叙伦、阎宝航等请愿代表。这一切，均在李公朴预料之中了。

为民主芳名永垂青史

1946年5月初，李公朴伤愈不久，回到已离开半年之久的昆明。这时，

全国大后方的机关、学校，已陆续开始复员。国民党政府也由重庆迁回南京。李公朴这次回来，是打算把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料理一下，搬回上海，那里将成为民

主运动新的中心。

昆明街头，迎接他的是什么？是“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密谋暴动”的造谣污蔑标语。他对此嗤之以鼻，经过牢狱与流血，这点见面礼算得了什么。

6月里，昆明城内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派兵到处搜查民宅，捣毁进步书店。一个受何应钦侄子之命组织的“自由民主大同盟”，摇唇鼓舌，散布民盟组织暗杀公司之类的谣言。为了以正视听，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月底，李公朴与闻一多、潘光旦、楚图南、冯素陶、费孝通、潘大逵七位云南民盟负责人，连续举办了三次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公开身份，说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看法。

也在这个时刻，反动派磨刀霍霍，已开始谋划暗杀民主人士。

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大特务头子霍揆彰在国防部总参谋长陈诚授意下，制定了凶恶的庞大刺杀计划。他命令稽查处长王子明调查昆明民主人士的活动，由情报科长单学修负责组织4个情报组100多特务分头进行。不久，50多人的黑名单汇集成册，里面有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等人。

霍揆彰带着这名单亲自飞往南京向蒋介石、陈诚汇报，只等蒋介石圈定后便立即布置暗杀。当时，蒋介石正与美国特使马歇尔密谈，没顾得接见他。霍揆彰将黑名单和制定好的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回昆待命。

7月初，霍揆彰接到南京密电，大意为“中共蓄谋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霍揆彰手持上方宝剑，遂即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确定首批暗杀10人，由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中统云南

站、国民党宪兵十三团分头执行。至于暗杀手段，他们也挖尽心思，最后决定采用绑架到郊外活埋。

稽查处受命后，将此交与行动科长徐绍阶及其手下特务李明山、汤时亮、赵凤翔、崔镇山等人执行。他们原计划首先暗杀龙纯曾、朱家璧、李公朴、闻一多四人，由于龙、朱不在，便确定先暗杀李、闻。

7月11日，当李公朴偕张曼筠从北门书屋走出时，守候在附近的赵凤翔、汤时亮便紧紧跟随过去。另一个特务兰鹏驾驶着吉普车跟踪到大光明电影院。新来的预备队员吴传云，这时也接过一支日造手枪。

9时许，李公朴夫妇两人在人流中走出电影院，步行到南屏街口的公共汽车站。兰鹏、崔镇山企图上前强行绑架，汤时亮则抢先拔出手枪，但枪却未响。

汽车来了，特务动手的时间转瞬即逝，只得尾随李公朴上了车。这时，张曼筠已发觉身边有几个特务鬼鬼祟祟，行动诡秘，但她没有想得更多，这种特务几天来太多了。

天又下起毛毛雨，汽车在青云路口停下。李公朴、张曼筠下车后，顺着学院坡拐上去，再拐一个弯便可以看见家里闪着的灯光。这时，特务急不可待，红了眼的汤时亮急步跟上，用手枪顶着李公朴的后腰，连发两枪。由于手枪紧贴着李公朴的衣服，动静并不大。李公朴歪了下身子，倒在妻子身旁，

吃力地说：“我中枪了。”张曼筠用手去扶，鲜血立即沾满了手。“捉人啊！有人开枪打人了！”几个云南大学同学正路过这里，跑过来一看，认出是李公朴，赶忙跑去通知家人。

特务们开枪之后，纷纷登车扬长而去。而小特务吴传云则始终在附近窥测，直到李公朴被抬走才离开现场。

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李公朴呼吸急促，但神志仍还清醒。子弹从左后腰射入，从右前腹穿出，腹腔和胃里都充满了血，嘴里也大口大口吐着鲜血。医生连忙将他抬上手术台，发现腹肠已经穿了好多洞。张曼筠女士和北门书屋的工作人员王吟青守护在李公朴身边。张曼筠握着丈夫的手，眼中滚动着泪水，强抑着不让它淌出来。

一阵阵剧痛向李公朴袭来，几次强心剂中才时而从昏迷中睁开眼。他望着周围的亲人，困难地动了动嘴唇，象要想说什么，却声音低微。时间一刻一刻过去了，李公朴的生命在挣扎，心脏微微跳动着，脉搏渐渐细了下去。

12日凌晨，李公朴又一次拼尽全力张开双眼，望着窗外的夜空。“天快亮了？”他问到。张曼筠忍着悲痛，“是的，天快亮了！”李公朴多么盼望中国黑暗的大地早一点披上阳光啊！“为了民主！为了民主！为了民主……”，这是李公朴用尽全部气力向人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一句誓词，一句撼天动地、鬼神可泣的临终心声。5时20分，他吐出最后一口血，怀着未能实现的壮志和悲愤，离开了人世。

李公朴没有死，他虽死犹生。不久前，他给张光年的信中说：“民主的路不但是长而且是艰苦的，过去是从认识上理解它，现在则已开始走上实践的路子。艰难痛苦的事实已活生生的一件跟一件的摆在面前了，将来的艰苦还要多，我们需要更坚强与团结才能克服它。我信是可以的，我愿随大家坚忍持久的干下去，准备在真理旗前倒下去，是大愿也。”

李公朴的壮烈牺牲，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他合上双眼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同志便立即从延安发来唁电：

昆明探传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女士：

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愤慨。

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违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同日，在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同志也发来唁电，电文中称：“公朴先生之牺牲，必将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敝代表团誓为后援。”

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导致了国内外各阶层爱好和平民主人士极大的愤慨。无数团体和个人的唁函唁电中，都表明了继承李公朴未竟事业的决心。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53位教授，为此联名写信给杜鲁门总统及美国国会，要求“立刻撤退其驻华军队，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之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对华之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一个更壮阔的民主高潮，由于李公朴被刺，而被推向了新的阶段。

不灭的红烛 ——民主战士闻一多被刺案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洪亮、严正的声音，象急速出膛的子弹。

“暗杀了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热烈的掌声，因为它是在座者共同的心声。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我们要准备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掌声。掌声。长时间的掌声。

这是1946年7月15日中午时分，从昆明城内云南大学至公堂传出的正义吼声。四天前的傍晚，著名社会教育家、民主活动家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卑鄙地暗杀了。此刻，在这里，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正在举行李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一位中等身材，穿着褪色长袍的长者，满腔怒火地作着震撼人心的演说。他时而攥紧拳头，挥起右臂，用象擂鼓

的姿态，去敲动台下每个人的心灵；时而又睁大那仿佛将冒出火来的双目，把愤恨和激怒传播给听众。他，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先生，一位深受人民爱戴尊敬的学者。

谁能料到，就在闻一多这次著名讲演后仅仅五个小时，他竟和李公朴一样，也倒在了血泊中。国民党特务的罪恶子弹，残忍地夺去了这位只在人生道路上度过了四十七个春秋的诗人、学者、斗士的生命。

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

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诞生在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巴河镇望天湖畔一个诗书传世的家庭。他自幼受着传统的爱国教育，又受到父兄的影响，崇尚民主。少年时代，他在武昌读书，亲眼看到革命志士发动的辛亥革命，也就学着革命党的样子，毅然剪去了脑后那象征清室顺民的辫子。

1912年秋，闻一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这所用美国退还部分庚款办起来的学校里，他一面接受正规系统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一面在早期的民主风气中熏陶着。那时，他也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时时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915年12月，闻一多所在的年级举行“演装国会”，大家扮成议员，辩论“日本下哀的美敦书要求中国将南满归并日本，中国宜取如何行动？”在这前后，他还参加过“今日中国小学能否读经”、“国家富强在政治欤抑在人欤”、“今日中国修练兵甲较普及教育为尤要”等辩论或演说。这些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问题，常常萦绕在闻一多脑海里，不断启发他反复思考拯救危难祖国的方法和途径。

五四运动是对每个青年的庄严检验，闻一多的爱国主义

热忱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

五四当天，清华学校因远在郊外，没能参加白天的集会和游行。晚上，闻一多从返校同学处了解到激动人心的消息，立即展卷挥毫，怀着热血疾书

恭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那气壮山河、满腹悲愤的词句，正是闻一多此刻心情的强烈共鸣。

第二天，清华同学纷纷行动起来，成立了全校学生统一的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闻一多被公推为代表团中文书记，负责起草各种爱国运动的文件。他参加整理的《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就是清华在五四运动中的第一个重要文件。五四运动激发了闻一多的爱国热情，锤炼了他的斗争精神。5月17日，他给父母亲信中，汇报了学校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形，还写到：“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这些铿锵有力、落地出声的话语，可称得上后来他献身民主的初衷。这年6月，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举行成立大会，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前往参加。会上，他第一次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说，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1年6月，闻一多学业即将结束，准备最后一次大考通过便赴美留学。正在同学们高高兴兴的时候，北京城内爆发了“六·三”惨案，以李大钊、马叙伦为首的八校教职员为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在新华门举行索薪请愿斗争，被军警殴伤多人。为了声援索薪斗争，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宣布罢课抗议。这时，清华正值大考前夕，按清华规定，学生平时成绩优良即可出洋，闻一多实际上已取得留学资格。但

是，学校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强令大考如期进行，不参加考试者以自动退学论处。在淫威面前，有些人屈服了，但闻一多愤然表示“利害不论，是非必争”，坚决不入考场。最后，他与28位同学受到留级一年的无理处分，在严峻的考验面前，闻一多的斗争精神，又一次经受了锤炼。

一年后的夏天，闻一多离开祖国，来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他攻读的是西洋美术，但从未忘记在苦难中熬煎的祖国。1924年暑假，他与潘光旦、罗隆基、梁实秋、顾毓琇、吴文藻、梁思成等清华诸友，成立了一个政治团体“大江会”。他们的宗旨是：“本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所谓“大江的国家主义”，即“中国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闻一多特别追求“文化的国家主义”，他创作的大量新诗，都表现出这种思想。

闻一多是位中国现代诗坛中十分活跃的著名诗人。出国不久，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便在国内印行了。在异邦生活中，他诗笔不停，写下大量爱国思乡的诗篇。朱自清在《爱国诗》中说：“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的确，闻一多的《太阳吟》、《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洗衣歌》等，都抒发了他拯救危难祖国的理想和抱负。《七子之歌》，把祖国被列强割去的台湾、香港等七块土地，比作离开母亲的七个儿子，哭诉着要回到她的怀抱，情词感人泪下。《醒呀》则喊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蹂躏的强烈呼声。

闻一多关于新诗理论的建树，也颇为人注目。在文坛一片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他冷静地提出了中国新诗应从内容

和形式都达到完美的统一，即不仅要吸收外国的现代思想，也要汲取民族文化的精华。他的诗集《死水》就以热烈的爱国情绪和严格的格律，而影

响了一代诗风。他关于诗歌应具备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标准，至今仍受到诗歌理论工作者的重视。

1925年5月底，闻一多放弃学位，提前归国。他先后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吴淞政治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教授，还担任过教务长、训导长、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等职务。闻一多除回国早期曾讲授过英美诗外，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广泛，既有文字训诂、古代神话，又有楚辞、诗经、周易、先秦诸子。至于唐诗，仅《唐代诗人小传》手稿，就钉成厚厚的9大册。他的研究方法既具有中国朴学的传统，又善于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如《说鱼》以“鱼”字为例，研究了“隐语”在诗歌民谣中的应用，并指出它在社会学中的消极与积极的功能，以及它流行的时间与地域。《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直探中华文化的源头，体现了他构思中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前几章的意图。《诗新台鸿字说》从正面反面侧面证明两千年来都马虎过去了的该诗的“鸿”，原是蟾蜍，而不是鸿鸟。《楚辞校补》集十余年心血于一书，考订详尽，功夫扎实，获1943年全国学术二等奖。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成果，部分已收入《闻一多全集》，但仍有几百万字的手稿未有发表，其中真知灼见，俯首皆是。郭沫若在写《闻一多全集·序》时，不无感慨地引用了古人“千古文章未尽才”的诗句，又说闻一多“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拍案而起的凛然浩气

时光如流，转瞬1944年来到了。

这一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苏联红军肃清了境内的德国侵略军，攻入欧洲战场。美英盟军也大举反攻，在诺曼底登陆。罗马解放了，巴黎解放了，布鲁塞尔等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解放了。

在中国战场，交通枢纽昆明，也聚集着许多开往印缅的部队。然而，这些衣冠不整、三三两两的部队，正是国民党腐败的又一次暴露。

秋天，闻一多的满脸怒容与天高云淡的昆明形成强烈的反差。他走进兼课的昆华中学高三班教室，一言不发，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病兵”。这是他为同学们出的一道作文题，一道意味深刻的作文题。

当抗日烽火燃起的时候，闻一多随清华大学南迁到昆明。这时，清华大学已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南迁时，他与二百多名师生，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那飘洒若仙的美髯，就在六十多天跋涉中蓄了起来，他发誓抗战不胜利绝不剃去。

南迁后的最初岁月，闻一多仍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倾注于为抗战建国培养栋梁之材的教学工作。他认为一个大学生的价值远在一个士兵之上，因此埋头钻研，几乎足不出户，以致郑天挺教授赠他的“何妨一下楼斋主人”雅号，传遍西南联大校园。在货币迅速贬值时，贫困向他袭来，他没有怨言，因为前线还在流血，他咬紧牙关，放下教授清高的架子，握起刻刀挂牌治印，又到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好弥

补生活上的不足。可是，就在他生活已开始好转时，却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燃烧的“火”。火山要爆发了，由于闻一多再也看不下去国民党的腐败。

前不久，驻扎在昆华中学的一连国民党军队开拔时，丢下一些伤病员置

之不理。有一个士兵强撑着追部队，却被当官的一顿棍棒打了回去。这士兵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于走投无路中跳井自杀。住在中学的闻一多，目睹这残绝人寰的悲剧，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印缅公路两侧被遗弃的病兵，那一双双哀求讨钱的嶙嶙瘦臂，和疲惫无神的眼睛，无时不在他的面前晃动着。

一天，闻一多的一个远房弟弟，随国民党青年军开往印缅作战，路过昆明时和几位青年来看望闻一多。

“一哥，当官的心狠手毒，我们路过宣威，他们买了好多火腿，让士兵扛到昆明卖掉，钱都进了他们的腰包。”

“当官的打人是常事，用五节电池的长手电筒往我们头上砸，连玻璃都碎了，血流不止。”

“我们有了病，当官的根本不给治，巴不得我们死了，他们好吃空额。我们连猪狗都不如，他们从不把我们当人看啊！”

黑暗，腐败，政治不民主，贪污成风，物价飞涨，使闻一多夜不能寐，烟缸里盛满了烟灰，……这就是“病兵”作文题的由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简朴的古训此刻有着多么深刻的内涵。闻一多联想起年初以来常常出席“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习与讨论，在这些会上，他懂得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什么是统一战线，他初次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情况，看到了抗日胜利的希望和曙光。这就是国内的形势，就是政治。

于是，在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五四”纪念会上，闻一多演讲中说：“过去我总以为国家大事专门有人去管，无需自己过问，长期脱离现实。但是，一二十年来和古董打交道，今天也总算得到结论了。”

于是，在6月初给国民党青年学生教导团演说中，他赞扬青年们报效国家的热忱，斥责政府当局和军队长官抗战不力：“没有同情，没有热，是麻木不仁？还是忘恩负义？”

于是，在联大壁报协会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英专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七七时事座谈会”上，闻一多站起来批评昔日的朋友道：“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闹事，我倒以为闹闹何妨！”

于是，在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主持的座谈会上，闻一多无法沉默，厉声厉色地说：“以前我们看一切都不悲观，还希望也许在战略上有点办法。今天在这里听见各位长官的话，才知道战略上也很有问题，我只差要在街上号陶大哭”，“没有什么讨论的，只有于，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来干。”“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于是，9月25日，他给堂弟闻亦博信中写到：“今日之事，百孔千疮，似若头绪纷繁，而夷考其实，则一言可以尽之，无真正民主政治是也”，“今日我辈之无思想言论自由，正以我辈能思想能言论者，甘心放弃其权利耳。且真正民主之基础，即在似若无轻重之每一公民。由每一公民点点滴滴获得之自由，方为真正自由。故享自由若为我辈之权利，则争自由即为我辈之义务。明乎权利义务不可须臾离，则居今之世，我辈其知所以自处矣。”

于是，昆明文化界纪念双十节大会上，闻一多发表了

《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演讲。他不仅怒斥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政策，还特别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提出“走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给敌人以经常的扰乱与破坏”，“发动并组织民众，使他成为坚强的自卫力量，

以便配合着游击等”。

于是，在联大冬青社等五文艺壁报与云大学生自治会举办的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闻一多向着鲁迅遗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在大庭广众面前，他公开向这位中国文化战士表示了忏悔。

这年4月以来，日本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行动，使国民党五六十万部队节节溃败，到12月初，平汉铁路南线、粤汉、湘桂铁路尽被占去，郑州、许昌、洛阳、长沙、南宁等140多城市及7个空军基地，也被日寇占领。12月2日，贵州独山失守，大西南暴露在日军面前，昆明岌岌可危。为了保卫大西南，昆明文化界与社会各界在25日召开了空前的群众大集会，他们利用纪念护国起义29周年的合法节日，借声讨袁世凯的复辟卖国，号召坚持民主精神，维护民主政治，推动全民抗战。大会由潘光旦为主席，护国元勋黄斐章、由云龙、白小松都即席演说，吴晗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护国的意义”为中心，做了讲演。最后，闻一多走上主席台，演讲“护国起义与民主政治”，用历史来抗议鞭笞独裁卖国的现实统治。会上，数千人一致鼓掌通过了吴晗起草、闻一多等人修改的《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宣言》。宣言的誊录稿至今仍保存着，它的前半为闻一多恭录，后半部为李公朴字迹。在会后的盛大游行中——这是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次人民群众大游行，闻一多一直走在前列。

这一年，闻一多一系列战斗檄文：《复古的空气》、《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可怕的冷静》、《士大夫与中国社会》、《一个白日梦》（原题《恶性发炎的个人主义》，为免当局新闻审查扣押改为此名）、《真的屈原》等，源源不断流出他的笔椽，刊载在公开或不公开的刊物上。人们欣喜地看到，一个学富五车的教授，一个曾在长期苦闷探索中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学者，为了国家独立，为了人民自由，为了民主政治，终于走出了书斋，汇集到时代的洪流之中。

针锋相对的无畏斗志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几乎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的同时，一份铅印的传单，在昆明迅速散发、张贴。传单的标题，印着《告国际友人书》，后面附有闻一多、楚图南、周新民、吴晗、林石父（华岗的化名）、光未然、潘光旦、罗隆基等207个人的签名。

说来也是个巧合，这份传单本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纪念七七抗战八周年起草的，由于某些内容和字句还有待推敲商定，致使延误下来。不想，日寇投降，它便增添了内容，成为云南民盟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文件。《告国际友人书》，提出了目前人民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闻一多参与起草、修订这个传单的主要思想，这就是：

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团结呢还是内战？
民主呢还是独裁？彻底的胜利还是廉价的和平？
朋友们，让我们向你们保证，中国人民坚决地选择了
第一条路——团结胜利的道路，民主的联合政府的

路。

灯下，闻一多辗转反侧。他回想起这些年自己的变化和走过的路：从故纸堆走出来后，便立即投身民主事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云南民盟支部委员，《民主周刊》编委。当一些进步青年寻找报国道路时，自己又与吴晗协助他们建立起云南民主青年同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恢复活动后，自己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在开展援救贫病作家募捐运动中，自己不仅捐刻图章，还发动了不少青年组织捐款。重庆国民党当局解散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自己亲自修改了昆明文化界写给郭沫若的慰问声援信。在政治主张上，自己虽然不是政治家，但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光明的未来，呼吁团结抗战，要求结束一党专政，释放一切政治犯，建立民主政治。这些，都问心无愧。但是，内战的危机随着抗战结束，又迫在眉睫，民主的道路还那样的漫长啊这时的闻一多，在斗争中已逐渐成熟起来。他以学者的锐利目光，分析现实也比过去深刻多了。8月15日的“从胜利到和平”晚会上。他在演说中提醒人们说：“我们要密切注意着美国反动派在制造我们的内战，如果不设法避免这种危机，不但有内战，还会有外战。”9月4日文协昆明分会、民主周刊社等团体举办时事晚会，闻一多在会上宣读了《昆明教育文化界庆祝胜利大会宣言》，代表三千多人向在重庆举行谈判的两党代表，提出召开政治会议、惩办汉奸贪官、宣布谈判经过、组织联合政府、资助穷困者返乡五项建议。闻一多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十分鲜明，毫不含糊。10月底，西南联大开始的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校庆纪念活动中，《现实》壁报记者采访闻一多，要求他谈谈人们都正在关注的受降权利问题和对解放区政权性质的分析。闻一多不隐晦自己

的观点，明确表示：“共产党应该接受被他们包围的敌伪投降。我们有理由信任共产党解放区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其实，闻一多对中国共产党早就怀着崇敬和钦佩的心情，两年前吴晗动员他加入民盟，他就说自己早晚要加入的是共产党。要不是华岗、光未然的反对，说不定闻一多的足迹会留在延安呢。

“一二·一”昆明学生运动，是对闻一多斗争精神和斗争艺术的一次重大锤炼。11月25日傍晚，昆明学生数千人在联大草坪举行时事讲演会，呼吁实现和平，坚持反对内战。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登台讲演。当钱端升第一个刚刚开始讲“中国政治之认识”时，国民党军警便包围了学校，在人群头上开枪威胁。公然践踏民主是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学生自治会当晚决定联合罢课，以示严重抗议。12月1日，暴徒数百人手持棍棒袭击联大、云大，手榴弹炸死三人，刺刀刺死一人，潘琰、张华昌、李鲁连、于再四位青年倒在血泊之中，六十多师生被殴打至伤。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发生了。

大规模的屠杀，激怒了闻一多。前几天，他为了同学们的人身安全，还劝大家复课。此刻，悲愤的眼睛，又添上了许多血丝。他含恨写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作为挽联奉献在四烈士灵堂前，也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斗争决心。

闻一多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利用自己在联大师生中的影响，利用他的教授会议书记身份，千方百计设法使教授会做出有利于学生要求的决议。他与张奚若、吴晗等提议罢教支援学生运动，并与潘光旦、向达、尚钺、楚图南、费孝通、吴富恒等共298人联名发表《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

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重庆《新华日报》

为此在社论中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次罢教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国民党控制的报刊禁止刊登昆明学生运动的任何消息。为了冲破新闻封锁，闻一多应罢课联合委员会的请求，设法把四烈士的血衣照片，托途经昆明回重庆的张君勱带给郭沫若。郭沫若、茅盾接到信和照片，立即与曹靖华、胡风、巴金等复信表示支持，信中说：“诸位代表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反内战，争民主，以致流血牺牲，同人等不胜感佩，特电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同人等愿竭诚共同努力，以期达到制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之目的。”接着，陪都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昆明四烈士追悼大会，全国的反内战运动又被推进了一步。

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昆明的夏天，气候宜人，天空如碧。可是空气中却隐隐有一股逼人窒息的东西。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奉命解散，清华大学将搬回北平郊外宁静秀丽的清华园。闻一多在那里度过了10年求学生活，又在那里从事过5年的教学与研究。新南院72号的书房是那样让人留恋，宅前的几丛翠竹总让他牵肠挂肚。闻一多太喜爱清华园了。

不久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寄来聘书，邀请闻一多去讲学，还可以携眷同行。闻一多不是不想去看看已离开二十多年的美国，可他考虑到北平的民主工作还缺少人手，最后下决心拒绝了邀请。

昆明复员的机关太多了，交通工具却又太少，闻一多只

得让次子立雕和三子立鹏先行。再说，昆明还有不少工作要转交，也需要他暂时留下。

7月11日早晨，闻一多送走联大最后一批复员同学登车东去，回到家里，拿起刻刀。临行前，许多朋友都想请他留点纪念，人之常情，何况诗人气质的闻一多，向来就那么重感情。所以尽管还在猛烈的咳嗽中，刻刀却没有停。

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闻一多赶忙起身开门，妻子高孝贞也紧跟过来。

“李先生刚才被刺，伤势很重，已抬到云大医院抢救！”

突然而至的消息，把闻一多惊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李公朴，是闻一多的亲密战友，他早在三十年代初投身民主运动，因呼吁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妥协政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被捕入狱达八月之久，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到昆明时间较闻一多稍晚，但他一来，便创办了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为民主事业做了许多工作。去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李公朴、闻一多同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李公朴留在重庆，与陶行知创办了社会大学，开展民众教育。今年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李公朴又残遭特务毒打，头部负重伤。5月里，他由渝返昆，是为了准备复员回上海。……此刻，闻一多心乱如麻，尽管他与李公朴相识的时间不长，还发生过误解，可李公朴为民主事业的奔走呼号，尽心倾力，使闻一多打心里敬佩。

“我要去！我要去！”闻一多披起长衫，就去门后找拐杖。

“这么黑，你一人怎么走。……你还咳嗽，烧也没全退……，’妻子的担心、固执，不是没有道理，还在春末时，近日楼就出现过大标语说要以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这些年，他太惹人注意了，几乎没有一次活动不参加，没有一种场合

不说话。说起话来，又那么尖刻，毫不留情。今年联大一次集会上，他直点蒋介石的名字，让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这一夜，闻一多没有上床，在房间里焦急不安地等着天亮。

昆明的早上，向来是寒冷的，一年到头都一样。5点多一点，闻一多、楚图南两人——在那几个月，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匆匆赶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但是，他们来迟了，5点钟，洁白的布已盖住了李公朴闭上的眼睛。闻一多抚尸痛哭，斩钉截铁一字一字说：“这仇是要报的！”片刻，又连声道：“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公朴永远没有死！”

离开云大医院，闻一多在悲痛愤怒的心情中，与云南民盟的负责人研究起草抗议书，发表声明。当时凶手一时没有搞清楚，有人主张在措词上写得笼统些。闻一多坚持毫不含糊地写明凶手就是国民党特务，他的敏锐和警觉，正是斗争原则性和坚定性的表现。

李公朴牺牲后，昆明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起来。社会盛传国民党已制定了黑名单，第二个暗杀目标就是闻一多。这消息，很快从可靠方面得到证实。妻子和孩子，许多朋友、同事和青年学生，都为闻一多的安全担心，接连几天总有人来叮嘱，劝他尽量少外出。但是，闻一多身体中从没有怯懦的因子，他无法忍受民主力量被摧残，早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他冒着危险，坚持出版《民主周刊》，抗议反动派的无耻暴行，为《学生报》题写“纪念李公朴先生遇难特刊”的刊头，为李先生被刺题字道：“斗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看得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那几天，闻一多所住的西仓坡联大宿舍门口，整日都有歪戴帽子的特务游荡，甚至有的还跑进院子打听闻一多穿得

什么衣服。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三番五次到家里来，一手拿着本圣经，一手点点划划说：“闻一多，还不快忏悔，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你命在旦夕了。”一次，这个被闻一多家人称作女疯子的人又来了，胡言乱语后丢下一封信，信里写到：“闻一多这老糊涂……速将你们的志士约齐，听你老娘教导你们听，只要连合好，三天就可天下为公……我不是早告诉你们，有很严重的惨杀在不多的一日要发现……。”落款处写着“张柴静一”。

连日的刺激、担忧和紧张，使闻夫人的心脏病更加厉害了。她忍不住恳求丈夫别再往外跑。闻一多沉默了一会儿。他望着妻子虚弱的身子，不由一阵心酸。他们是患难夫妇，抗战八年来，多亏妻子的辛勤持家，他才有功夫钻研学术，才可能无后顾之忧地投身民主运动。现在，好不容易胜利来到了，全家将返回北平，却……。闻一多体谅妻子的心情，慢慢地说服她：“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妻子知道丈夫的脾气，只得让他多注意自己的安全。

7月15日，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将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同志们本不同意闻一多出席，但他坚决要去，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

上午11时前后，杨希孟同学受组织委托，到闻一多家来接他去云南大学至公堂。只见闻一多早已穿好洗得发白的长衫，拐杖也提在手里。“走！”

闻一多把拐杖往地面使劲一杵，头也不回，走出大门。

一出门，两个穿皮夹克的流里流气的家伙，立刻跟了上来，一前一后把闻一多和杨希孟夹在中间。闻一多瞥了他们一眼，鄙视的目光使特务心惊肉跳。这些丧尽天良的狗特务，

在暗杀李公朴得手后，迫不及待地开始对闻一多下手了。

还在9天前的7月6日，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就在翠湖司令部召开了秘密会议，警务处长李毓祜、稽查处长王子明、交通部运输局稽查处长李家杰、宪兵十三团团团长彭景仁、中统云南站站长王巍、昆明市警察局长龚少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刘寿琬等特务头子，都参加了这个会。会上，霍揆彰宣读陈诚密令，公布暗杀名单，决定首批杀害十人。王子明回到洪化桥稽查处，立即与手下喽罗密谋，限三日内刺死李公朴。

李公朴牺牲后，凶手们每人都加官晋级，还得了50万元奖赏，开枪行刺的特务汤对亮一人就分得18万元。负责暗杀闻一多的行动小组组长崔镇山，见到同伙在“东月楼”庆功吃喝，更加恼羞成怒，指着组员大骂一顿，下令三天内杀害闻一多，并命谍报队长蔡云祈带着尚福海等立即了解闻一多行踪，秦永和、崔宝山等守候云南大学门口，李明山、仲刚等潜伏在西仓坡，自己则与欧阳天化等乘着刘锡林驾驶的吉普在翠湖附近准备策应。一场罪恶行动，就此开始了。

李明山从早上就暗藏在西仓坡联大宿舍门口，看见闻一多出来，马上盯了上来。

闻一多泰然自若，生死对他来说，已无足轻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是，他清醒地知道，特务是冲自己来的，不能让一个无辜的青年和自己一起遭到毒手。“你离我远一点，不要和我并排。”他沉着地对杨希孟说。

不知是闻一多大义凛然，还是特务心有余悸，暗杀没有进行。闻一多和杨希孟顺利地走上翠湖北路，这儿人来人往，特务更无法下手。

李公朴殉难报告会上，张曼筠女士声泪俱下，悲痛欲绝，

讲了一半再讲不下去。混入会场的特务乘机嘘声四起。闻一多原是以不发言为条件，才得到同志的同意，出席这个会的。他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热血沸腾。闻一多从台前板凳上站起来，扶着张曼筠坐下，昂首挺胸走上讲台。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特务们被这尊雕像的威严震慑住。青年们知道自己的导师又要作“狮子吼”了。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污，最无耻的事情！”闻一多用低沉的声音讲到。他顿了顿，怒吼起来：“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地杀！”

几句简扼的开场话，立即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人们心中的愤怒被点燃，不断报以掌声、雷鸣般的掌声。

“他们这样疯狂害怕，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呵！在恐怖呵！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真理是一定胜利的。反动派的无耻，就是李先生的光荣。反动派的末日，就是我们的光明！”

闻一多厉声厉色，激昂慷慨。台下鼓掌，又是鼓掌。会场情绪高涨到顶点。这即席的最后一次讲演，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挑起内战

的坚强决心。这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闻一多大无畏精神的钦佩和赞美。

报告会在闻一多坚定的誓词中胜利结束。青年们拥着他离开会场。下午，闻一多与楚图南、尚钺一起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再次向新闻界表明民主的愿望和信心，要求报界把李公朴被刺真相公布于世。

下午5时，记者招待会后，闻一多让楚图南先走。他知

道反动派不会放过呼吁民主的人士，那末，即便他们要杀人，也不能任其轻易一次杀两个人。长子闻立鹤已来了多时，母亲让他接父亲回家，以防不测。

闻一多在立鹤的伴护下走出民主周刊社。这里距家不过二百多米。他们买了份《复兴晚报》，想看看上面是否登载这几天的消息，走出府甬道，一条旧府学门前的路，拐往西边进入西仓坡。西仓坡平日里行人不多，此时更象死一般寂静。宿舍大门已看到了，再十多步就可到家，多病的妻子和天真的两个女儿还在焦急地等待他们归来。

突然，枪声大作，二十响快慢机与左轮手枪里，吐出罪恶的子弹。潜伏的、跟踪的特务李明山、刘锡林、何毅，崔宝山等，一齐开枪。闻一多后脑、胸部、手腕连中十余弹，倒在血泊中，殷红的血，流在土里，流在昆明的大地上。闻立鹤扑向父亲，用自己的身体抵挡射来的子弹。他高声喊：“凶手杀人了，救人啊！”又一阵子弹打在立鹤身上，毒狠的特务连这个18岁的青年也不放过。立鹤身中5枪，腿被打断，肺部满是枪眼。

闻一多的夫人高孝真听到枪声，连忙从门内冲出来，只见父子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泊中。她跌跌撞撞扑上去，抱住闻一多，鲜血立刻染红了她的全身。鲜血还在大腿大腿地向外涌流，还合着白色的脑浆。闻一多双目紧闭，嘴唇微微张了一下，面色发黑。两个女儿的哭嚎声在西仓坡上空振荡着。一张行军床把闻一多匆匆送往云南大学医院，血从行军床渗下来，滴滴洒在路面上。医院里，医生翻了一下闻一多的眼皮，摇摇头说：“不行了。”立鹤这时也被洋车送来，他昏昏沉沉，但始终瞪着那对仇恨的大眼睛，那里面燃烧着怒火。

和平民主的巨大反响

继李公朴先生被杀之后，闻一多又残遭毒手。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和卑鄙，在全国，在全世界激起了巨大的愤怒。

17日，毛泽东、朱德同志首先发来唁电：

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先生家属：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此电唁。

正在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同志，也于同日来发唁电：

闻一多夫人礼鉴：

惊闻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立鹤君亦受重伤，暗无天

日，中外震惊，令人捶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此已暴露无余。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洗刷之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无忌，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电唁，尚祈节哀，并祝令郎早日康复。

一时间，昆明、重庆、西南、全国各团体和个人的唁函、唁电、慰问信不断，抗议的呼声此伏彼起。复员途中的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听到噩耗，纷纷就地悼念。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加拿大，还有苏联、英国的爱好和平人士，也对国民党的暴行进行强烈谴责。美国 53 位教授联名写信给杜鲁门总统及美国国会，要求立即撤除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反动派手足无措，他们万万想不到，屠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教授，竟会激起如此巨大的抗议浪潮。蒋介石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慌，不得不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特务头子唐纵来昆明进行所谓调查。8 月 15 日，闻一多被刺后一个月，由陆军总司令部、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组成的军事法庭，假惺惺地对两个替罪羊汤时亮、李文山进行审判。这把戏自然瞒不过明眼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在日记中写到：“特营官佐，而于出事之日，又皆便衣带枪出营，未久即至云大会场，听到闻之演词遂‘激于义愤决下毒手’，此实巧极，不无可更研究者。”而民盟中央调查代表梁漱溟、周新民在报告中则进一步揭露了这种愚弄人民的丑恶伎俩，指出真正的主凶是国民党政府。

人民的悼念是空前的。1946 年 7 月 28 日，重庆各界六千余人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大会，花圈、挽联、函件达 1200 余件，在“民族之魂”四个大字下，须发苍苍的鲜特生凄哀悲痛地朗诵祭文，周炳琳、史良、胡子昂、吴玉章、邓初民相继慷慨陈词，连张群在致词中也称“他们的精神是永远不死的”。

10 月 4 日上海各届五千余人齐集蟾宫大剧院，邓颖超同志宣读了周恩来的亲笔哀悼词，词中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台下报以历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郭沫若在《闻一多万岁》中曾预言到：“普天四海将要看见无数金的石的石膏的木的闻一多。”是的，闻一多的雕象在昆明、在青岛、在武汉、在北京，甚至在云南蒙自南湖畔，一个个地耸立起来。闻一多虽死犹生！

